



性与性别学术译丛  
Gender Studies

# 男人之间

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

*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Eve Kosofsky Sedgwick

[美]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 著  
郭 劼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世纪80年代以来，性与性别开始成为美国大学里的重要研究领域，而塞吉维克正是该领域与巴特勒齐名的最具原创性的学者，并在美国和欧洲拥有大量读者。她在本书中首次提出了一个区别于“男性同性恋”的重要概念“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

本书从社会、经济及权力关系的角度，对欧洲和美国文学史上的一系列小说和诗歌文本进行解读，从而揭示出传统异性恋结构是以女性为交易媒介的男-男关系，以及这一传统结构与同性恋之间的博弈关系，同时论述了“同性恋恐惧症”的现象和成因。

上架建议：社会学

ISBN 978-7-5426-3599-0



9 787542 635990 >

定价：38.00 元

# 男人之间

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

Eve Kosofsky Sedgwick

[美]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 著

郭 劼 译



上海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美)塞吉维克  
著;郭劫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7

ISBN 978-7-5426-3599-0

I. ①男… II. ①塞… ②郭… III. ①小说研究—英国②诗歌研究—英国③男性—同性恋—社会问题—研究 IV. ①I561.07  
②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3952 号

## 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

著 者 / [美]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

译 者 / 郭 劫

责任编辑 / 王笑红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特约校对 / 张向玲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396弄10号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字 数 / 200千字

印 张 / 19.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599-0/C·391

定 价 / 38.00元

# 总序：性、性别与社会建构论

李银河

这套译丛所涉及的领域是性与性别研究，所选作者的基本理论倾向是社会建构论。从1960年代开始，在性与性别研究领域展开了一场生理决定论（本质主义）与社会建构论的论争，至今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生理决定论渐渐失去了影响力，社会建构论占了上风。而本译丛的作者巴特勒等人正是这场论争当中的主要人物。

从1960年代起出现的性别新概念认为：将某些行为归属于男性或女性只是一种社会习惯（就像在英文中将船称为“她”，而其他文化中却不会如此）。社会建构论最初的观点是：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基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的许多差异都不是源于一个基因，而是许多基因的相互作用。性别是以生理性别为基础的社会建构，个人生而为男为女，并没有天生的性别认同，他们是在成长过程中获得性别认同的，在经过社会的建构之后才成长为男人和女人。虽然生理性别是天生的，但是社会性别既非内在的，也非固定的，而是与社会交互影响的产物。它会随着时间和文化的不同而改变。社会性别是由社会建构的。社会性别是社会和符号的创

## 男人之间

造物。

极端本质主义认为：一切都是生理决定的；而极端社会建构论则认为：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不存在先天的自然事实。论争双方各自坚持生理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的立场，与此相应的是“自然”与“文化”的两分法。前者强调天生的自然基础；后者强调养育的作用，社会条件，社会权力关系或者个人选择。

社会建构论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多种理论：

第一，性别的文化建构论：性别建构的差异存在于文化与文化之间，以及某一文化之内。性别的文化建构是指，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中，性别概念和行为规范会按照当时当地的习俗被建构起来。比如，亚洲文化要求女人被动和柔顺，亚洲女性的人格特征就会被这样建构起来。女性主义不仅强调社会性别文化建构，还强调性别不平等的文化建构，性别构成的权力关系。

第二，社会角色理论：男女的心理区别来源于社会角色不同，由于劳动分工不同，女性更多在家庭里活动，男性更多在社会上活动。许多文化都有男主外女主内的风俗。社会角色分工的起因部分来自身体的区别，主要包括女人的生育和哺乳的需要，身高和体力大小的区别等，但是更多地决定于社会习俗对性别角色的规定。

第三，心理分析理论：男女两性的起源和发展是长期的争论，心理分析是最早涉足这一问题的。从弗洛伊德的儿童性欲理论可以知道，虽然两性具有极为不同的心理本质、性本质，但是所谓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同性恋、同性恋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获得的，是特殊的文化环境造成的。

20 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福柯被认为是颠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关系的第一人。他认为，性别结构与权力结构共存，权力在两分的、表面上看是本质主义的性别区别中是因不是果。根据福柯的观点，生理性别，无论是男性气质还是女性气质，都是随历史的演变而变化的，是话语的产物，是异性恋霸权的产物，它是在性实践和性别实践中形成的。

福柯提出了关于日常生活中的统治和抵抗的理论，这一理论涉及国家的管理技术、医疗和快乐学的知识领域。他的基本观点是，权力是生产性的，而不仅仅是压制性的，就连压制本身也是生产性的。目前被当作天经地义的性别差异其实是由权力生产出来的。

运用社会建构论来定义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关系的最有影响的尝试是罗宾(Gayle Rubin)在1975年发表的“女性交易：性‘政治经济学’笔记”一文。她的理论和跨文化分析指出，所有的社会都存在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体系：它是一套安排，在其中，人类的性和生殖这种生理的原始物质被人类的社会干预所塑造，以传统的方式加以满足，无论这些传统方式有多么糟糕。她强调社会干预在塑造性别规范中的重要作用，摒弃了对性别结构现状的生理决定论的解释。

这套译丛的作者们更是从各自的领域极大地丰富了社会建构论这一性与性别领域中的前沿理论。这套丛书收入了在这个领域产生过并正在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从哲学、历史、心理、艺术等角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深远的背景，上面记载着从远古到今天，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包含的、建构性与性别的非凡努力和力量博弈。

相信这套丛书能够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到性与性别研究领域中最辉煌、最新颖的思想成果，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更新观念，从人类最优秀的大脑的思维成果中受益。

## 作者自序

我想知道,现在\*来读《男人之间》的话,是否可以明显看出,它的写作过程中曾注入了怎样肆无忌惮的快乐:那台奥斯本电脑(重达三十五磅的“手提”)的小屏幕让人想起大众甲壳虫汽车那无法除霜的挡风玻璃;用蜡纸盒子打包外卖的回锅肉,在深深的夜里,滋养了邦庭学院大楼里亮着灯的蜂窝般的小隔间里的我。我的口头禅是,“我本来可能会在食品店打工”——在这个工作机会稀少,女性主义批评成了最受挑战的领域,而终身教职不见踪影的时刻,我却无法解释地感到振奋。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信心——一点都没有,但似乎没有一天不让我觉得,写这本书是一种探险、一种特权。

《男人之间》意图在两个主要方面创新。我当时最先想到的读者是其他女性主义学者。当我开始本书写作之时,女性主义研究似乎是一种单一工程:那时候,它的开展还远远不够,因此,以一套数量相对较小的有力公理为依据,来对各学科在整个范围内进行女性主义的重新架构,似乎有可能,而且也很迫切。作为一个身为作家、喜欢细读的解构主义读者,我对于自己被提升到激进主义宏大理论的时代旋风中,感到惊讶、兴奋和感激。与女性思想家群体一起奋斗,带来予人力量的乌托邦式的宣告,以及持久的、

---

\* 塞吉维克这篇序作于1992年本书再版之时,此时距书的初版已有七年。——译者注



## 男人之间

日日更新的振奋——我对此产生了迅敏的反应。同时,就像其他许多女性主义者一样,我也希望——需要——出现不一样的女性主义研究。特别是,制度、概念、政治、伦理以及情感上的各种不同的偶然性允诺(威胁?)用一种“干净明了”的方式,在以女性为中心的妇女研究领域的发展中,简洁地排列起来,而在该领域中,研究的主题、框架和政治意义,以及研究者本身,可能都会被等同于女性(the female)——我觉得这种“干净明了”的方式具有压迫性。在参与这些偶然性的同时,我仍然需要尽可能相信一种顽固的直觉,即,有关身分(identity)的细枝末节,与身分、欲望、分析和需求都能被整齐地或中心性地放置的那些地方相比,是更丰饶的研究沃土。

我写《男人之间》的意图很清楚,是希望它为女性主义运动——对于与这个运动的认同,我一点问题都没有——作出复杂化的、反分离论的(antiseparatist)、反恐同的贡献。这并不是说我认为关于认同(identification)和以读者为导向的论述风格(address)的移情式诗学(transferential poetics)从来很简单;它们并不简单。本书的暗藏的观点和晦涩影响了各种女性读者对它的领会,但在当时,更古怪的似乎却是它与潜在的男同性恋读者之间那鬼魅般的关系。

几年后我遇到了迈克·林奇(Michael Lynch),他是同性恋研究领域长久以来的一位开拓者。他告诉我,他对《男人之间》的第一反应是,“这位女士对很多东西都有很多想法,但她对男同性恋者所知甚少!”他说得没错。在写作《男人之间》期间,我对涉及女同性恋的女性主义文化和批评十分投入,但在真实生活中,我只认识一个公开的男同性恋者。1990年代的今天,学术界已经出现了精细的、行动主义的男女同性恋研究景象,出现了听得见、看得到的全国性的男女同性恋运动,而且(对我和其他有着各种不同性向的男性和女性而言),还出现了一个新兴的、繁衍极强的酷儿群体,它的直接基础是各种性别、各种种族和各种性向的定义中发生的认同与欲望的交错——从1990年代的这种视角来看,很难记起那个遥远的国度感觉起来是什么样的。现在重读这本书,我常常被迫停下来,

为它的许多分析和概括所依据的经验的薄弱而感到郁闷。但让我松了口气,并感到骄傲的是,它的主要动机和任务似乎仍然易于识别。

那个时候,美国学术界已经出现了一场不断壮大的男女同性恋研究运动(如果回顾林奇主编的《同性恋研究简报》,可以看到,这场运动有多么地活跃,同时也多么地危险);无数的城市空间中,正在创造出一个极具活力的同性恋解放的文化。因此,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这本书为何依赖了一个更为邈远的同性恋思想传统——主要是英国或欧洲的传统,即杰弗里·威克斯(Jeffrey Weeks)、盖·霍昆海姆(Guy Hocquenghem)、保罗·霍赫(Paul Hoch)、马利欧·梅利(Mario Mieli)和阿兰·布雷(Alan Bray)的著作。这些文本已经出版成书,或有了英译本(如果原文不是英文的话),它们是作为经典的、或地位已确认的研究资料而出现在《男人之间》里的,而它们的作者可能——无论《男人之间》如何将他们与当代拉近——已经死了一个世纪。在这本书里,他们是作为一种几乎是神学式的推测性思考的对象来发挥作用的,而不是作为当下实际中的生命和群体的证据。很明显,(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本书的年轻作者\*身上有某种压抑不住的狭隘。如果我把那种狭隘性描述为不仅量出了她与同性恋男性创造性(gay male creativity)——对它的乌托邦式的启用成了本书的驱动力——的各个场景之间的距离,而且也是她与它之间那种热情的、酷儿式的,而且颇为奇异的认同的基础,是否有道理?

毕竟,对欧美同性恋男性的某种现代身分的创建性叙事——它比巴尔扎克还巴尔扎克——是沿着从狭隘的地方性源头向大都会式的归宿而延伸的路线进行的。由于每一个个人故事都始于对酷儿童年的提炼,我们带着强迫、带着痛苦,在手头仅有的镜子——即原子化了的、以繁殖为目的的、所谓的异性恋的未城市化(pre-urban)或前城市化(ex-urban)的起源性核心家庭——中,错认了我们自己。这种核心家庭带来的不恰当

---

\* 显然,塞吉维克此处指的是自己。——译者注

的损伤性干预可能会伤害我们，而那些足够柔韧或足够幸运，从而存活下来的人，则会获得生命，一种不同的生命。那种晚到的第二生命，那些新建构的并去自然化了的(denaturalized)“家庭”，那些姗姗来迟、充满疑惑、造就出转化了的或转化中的自我承认(self-recognition)和他者承认(other-recognition)的机会——产生这一切的场所就是大都市。但大都市是通过吸纳来自地方的那些充满怀疑的能量，而得以不断重新充员、重新建构的。或者——我换一种更好的说法——大都市吸纳了“怀疑”(incredulity)本身的地方性能量。

这本书的作者似乎不太相信男性同性恋群体存在的事实，尽管这本书如此明显地渴求这样一个读者群。这种渴求制造了这种“怀疑”。然而，它也制造了与至少一些读者之间的一种纽带力量——这本书自己那种私密的、充满欲求的、直接的论述风格来自文化权威、性别/性和学科性(disciplinarity)所构成的版图上一个不寻常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不确定的位置，这些读者在遭遇这种风格时(在那个邈远的时刻)，同样心存怀疑。

痴迷(obsessions)是知识资本最持久的形式。因此，在事后去批评痴迷，或许是愚蠢的做法，尽管这项由痴迷驱动的研究所提供的知识能量似乎显然在字里行间也带着深深的障碍。障碍和凝滞似乎已经成了它的论述风格的特征，尤其是对许多女性酷儿读者而言，因为它也引发了她们那充满怀疑的欲望。实际上，《男人之间》持久地激发着许多读者的怒火(或许还有其他反应)。对此，我相信几乎所有有力地运用过它的读者，都曾依赖过对它的一个几乎同样多样、同样矛盾的反应谱系。这个领域内那么多后继研究的激增和卓越的创造力可以证明——我希望如此——像《男人之间》这样的非常规的文学研究，有着直接或迂回的强劲活力。但是，对于已经长久深植于酷儿解读的多重历史中的那些持久、精彩的增殖力，思路上的开阔，以及大胆，渗透力，和运动参与，都还有很多论述的空间。

1992年11月

# 目 录

作者自序 .....	1
引言 .....	1
第一章 性别不对称与情欲三角 .....	27
第二章 恋爱中的天鹅:以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为例 .....	35
第三章 《乡村太太》: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剖析 .....	63
第四章 《感伤的旅程》:崇性主义与世界公民 .....	85
第五章 走近哥特式小说:恐怖主义与同性恋恐慌 .....	104
第六章 内化了的谋杀:《一名清白罪人的告白》 .....	121
第七章 丁尼生的《公主》:七个兄弟一个新娘 .....	147
第八章 《亚当·比德》和《亨利·埃斯蒙德》:同性社会性欲望和女性的历史 .....	167
第九章 恐同、厌女和资本:以《我们共同的朋友》为例 .....	200
第十章 登上后门的阶梯:《爱德温·德鲁德》和帝国的恐同 .....	224
结语 走近 20 世纪:惠特曼的英国读者 .....	251
参考文献 .....	275
开拓者:塞吉维克《男人之间》及其他 .....	287

# 引言

## 1. 同性社会性欲望

本书讨论的是英国文化中相对较短、较新、较易理解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主要在 18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中叶的小说中得到具体体现。对不少领域的理论家而言，这一时段的魅力显而易见：这个时期在经济、意识形态、对性别的处理等诸方面产生了浓缩的、自省的且影响广泛的变化。我的主张是，伴随着这种变化而来的是，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homosocial desire）这一连续体（continuum）的结构中产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紧密地，并且常常是因果地与其他更显眼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男性之间的友谊、师生关系、权利关系、对手关系以及异性和同性恋关系等新兴模式与阶级有着密切的、不断变化的关系；该模式中的任何因素都不能脱离它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或脱离作为整体的性别系统来理解。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本书书名中的这个短语是用来标示歧视和悖论的。首先，“同性社会性欲望”这种说法是一种矛盾修辞。“同性社会性”（homosocial）一词偶尔在历史或社科领域中得到使用。在这些领域中，它用来描述同性别的个人之间的社会纽带。它是个新词，显然是对应于“同性恋”（homosexual）一词而形成的，而且显然是用来区别于“同性恋”一词的。实际上，它被用于描述“男性纽带的形成”（male bonding）之

类的行为,而在我们的社会里,这样一些行为常常表现出强烈的恐同情绪,即对同性恋的恐惧与憎恶。<sup>[1]</sup>因此,把“同性社会性”拉回到“欲望”(desire)的轨道上、拉回到潜在的性爱上的做法就是在假设,同性社会性与同性恋之间的连续体很可能是不可打破的——而在我们的社会中,对男性来说,这种连续性体的可见度受到了强烈干预。在我的论述中,我会阐明,我这个关于该连续体不可打破的假说并不是建立在生物基础上的——我并不打算将涉及肉体的同性欲望作为男性同性社会性(male homosociality)其他形式的“基础”来讨论——它只是一种概括性的策略,用来标示出男人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的种种历史差异。“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正是本书对这整个连续体取的名称。

用词上我选择了“欲望”而不是“爱情”(love),是为了表示对肉欲问题的强调,因为,在文学批评话语及相关话语中,“爱情”更多的是用来命名一种具体情感,而“欲望”则用来命名一种结构;本书的批评辩证所依靠的是关于社会驱动力的结构性变化的一系列观点。大体来说,我对“欲望”一词的使用类似于心理分析对“性本能”(libido)一词的使用——它描述的不是一种特定的情感状态或情绪,而是情感力量或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像胶水一样,决定了一种重要的联系,虽然它有时可能表现为敌意、仇恨或某种不那么情绪性的东西。这种力量究竟在何种意义上与性相

---

[1] “恐同”(homophobia)这个概念本身也充满了难点。首先,这个词在词源学上看是荒谬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由于“恐”(-phobia)这个词缀汇聚了恐惧(fear)与憎恨(hatred)的意义,在使用中,就容易对压迫同性恋的原因做出预先判断:它会被归咎于恐惧——比方说,作为对权力、特权或物质的欲望的反面出现。另一个更能点出这种压迫的集体性、在结构上的渗透性及其物质基础的词是“异性恋主义”(heterosexism)。

然而,出于三个原因,本书将继续使用“恐同”一词。首先,这儿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探究——而非强行坚持——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假设上具有对称性的对立关系,这似乎暗含在“异性恋主义”这个词里面。第二,各个民族对男性同性恋采取不同态度的原因,不是本研究的焦点。第三,从18世纪末以来对男性同性恋在意识形态上及主题上的处理的确混杂了恐惧和憎恶,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用“恐”(phobic)来形容。如欲了解对恐同概念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出色总结,请参考墨林(Morin)与伽芙克(Garfinkle)的文章《男性恐同》(Male Homophobia)。

关——也就是说,从历史角度看,什么样的东西可以被称为与“性”相关——将会是我们密切关注的问题。

本书的标题特别点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部分是要从一开始就承认我讨论的主题的局限性(并强调其严肃性),但这样的命名还有一种更正面、更重要的原因。本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探寻塑造性(sexuality)的方式,探寻哪些东西可以算作性,而这两方面都依赖于并影响了历史上的权力关系。<sup>〔2〕</sup>一个推论就是,在一个社会里,如果男人和女人获得权力的途径不一样,那么,在性的结构和构成中,也会出现重要的性别差异。

比如,在我们的社会里,和男性相比,“同性社会性”与“同性恋”之间的差异性对立在女性身上似乎就不那么彻底或那么地二元化。在目前这个特定历史时刻,在女性同性恋和女性对女性的其他关注形式(例如,母女纽带、姐妹纽带、女性间的友谊、“关系网”,以及女性主义的积极抗争)之间,在目的、情绪、评估等方面存在着一个清楚的连续体。<sup>〔3〕</sup>这样的连续体中交织着深深的不连续性——伴随着不少恐同情绪,也伴随着种族冲突与阶级冲突——但其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现在似乎已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不论政治竞争如何激烈,不论情感冲突如何激烈,似乎此刻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那些爱着女性的女性,那些教育女性、研究女性、养育女性、哺育女性、书写女性的女性,以及那些为其他女性而游行、投票、谋求工作或为其他女性促进利益的女性,是在进行着一致的、紧密相关的活动。因此,在用“同性社会性”(homosocial)这个形容词来形容女性纽带时(例如,历史学家卡洛·史密斯—罗森伯格

---

〔2〕 如欲了解这个说法的背景,请参见威克斯(Weeks),《性,政治,与社会:1800年以来对性的管理》(*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Since 1800*),第1—18页。

〔3〕 在《强制性异性恋与女同性恋的存在》(*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and Lesbian Existence*)中,爱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形容这些纽带形成了一个“女同性恋连续体”(lesbian continuum)。请参见斯蒂姆森(Stimpson)和佩森(Person),《女人:性别与性》(*Women: Sex and Sexuality*),第62—91页,特别是第79—82页。

(Caroll Smith-Rosenberg) 就曾这样用过),<sup>[4]</sup>这个词并不需要被当成“同性恋”的绝对对立来使用;这个词可以清晰地命名整个连续体。

“女人爱女人”与“女人促进女人的利益”之间的连续体涵盖了性爱、社会、家庭、经济和政治等领域。它表面上的简单性和一致性,如果不是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强烈反差的话,就不会那么惊人了。当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杰西·海尔姆斯(Jesse Helms)为“家庭政策”互投赞成票时,他们是促进男人利益的男人。(实际上,他们代表了海蒂·哈特门(Heidi Hartmann)对男权的如下定义:“[男权]即男人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具有物质基础,它们尽管是等级制的,但依然在男人之间建立或创造了相互依赖和团结,以使它们能够支配女性。”) <sup>[5]</sup>他们之间的纽带与男同性恋伴侣之间的纽带是否有任何一致的地方?里根和海尔姆斯会厌恶地说,不。大多数男同性恋伴侣们也会厌恶地说,不。但为什么不呢?难道“男人爱男人”与“男人促进男人的利益”之间的连续体没有像对女性那样有着天生的力量吗?

正好相反:许多关于父权结构最有用的近期作品指出,“义务异性恋”(obligatory heterosexuality)被建构到了男性主宰的亲缘关系系统中去,或是说,恐同是诸如异性恋婚姻之类的父权制度的必要结果。<sup>[6]</sup>显然,不论使男人彼此联系、彼此促进的各种纽带合在一起会多方便(这样做产生的对称性很有用),这样的“合”会遇到一个起阻止作用的结构障碍。从我

---

[4] 请参见解特(Cott)与普莱克(Pleck)的《她自己的继承:美国妇女的新社会史》(*A Heritage of Her Own: Toward a New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中《爱与仪式的女性世界》(*The Female World of Love and Ritual*)一文(第311—42页);这个用法出现在,比如说,第316、317页。

[5] 撒金特(Sargent),《妇女与革命:论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愉快结合》(*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中《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愉快结合:走向更进步的同盟》(*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Towards a More Progressive Union*)一文,第1—41页;引文见第14页。

[6] 请参见,比如说,鲁宾的《交易妇女:关于性的政治经济学笔记》(*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第182—83页。



们的社会的角度来看,不论如何,想象一种非恐同的父权形式,明显是不可能的。比如,盖尔·鲁宾(Gayle Rubin)写道,“对人类性欲中同性恋成分的压制,以及,由此推导,对同性恋者的压迫是……用其规则和联系方式压迫了妇女的同一制度的产物”。〔7〕

对同性恋者的这种父权式压迫,从历史表现上看,一直是野蛮的,而且几乎没有尽头。路易·克朗普顿(Louis Crompton)做过详细研究,并将这个历史形容为是灭绝性的。〔8〕我们自己的社会也具有残酷的恐同特征;而且,针对男性和女性的恐同都不是任意的或无缘无故的,而是紧密地交织于家庭、性别、年龄、阶级以及种族联系构成的纤维中。如果其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不改变,我们社会中的恐同就不会停止。

然而,尚需阐明的是,由于大多数父权制度从结构上涵括了恐同,因此,父权从结构上要求恐同存在。K. J. 多弗(K. J. Dover)的近作《希腊同性恋》(*Greek Homosexuality*)似乎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古希腊反例。根据多弗的证据,男性同性恋在这一文化中广泛存在、合法而且深具影响。年长的男性对青少年男孩的追求在结构上以阶级为标准,而在市民阶层内部则以年龄为标准。用来形容这种追求的典型方式我们通常是用到浪漫的异性恋上去的(比如,征服、投降、“残酷的美人”以及爱的对象身上缺少欲望)。男孩在这样的关系中是被动的。但同时,由于男孩注定要成人,所以角色的分配并不是永恒的。〔9〕因此,尽管这样的爱情关系对对象具有暂时的压迫性,但也有着极大的教育作用。多弗引用柏拉图(Plato)《飨宴篇》(*Symposium*)中珀萨尼亚的话说,“对他(这个男孩)而

---

〔7〕 鲁宾,《交易妇女:关于性的政治经济学笔记》,第180页。

〔8〕 克朗普顿,《同性恋灭绝:从利未记到希特勒》(*Gay Genocide: From Leviticus to Hitler*);但也请参见第5章对将“种族灭绝”(genocide)这个概念用来理解同性恋男人的命运时具有的局限的讨论。

〔9〕 对于这个问题,参见米勒(Miller),《关于妇女的新心理学》(*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第1章。

言,为改进他的头脑和性格的人提供任何服务都不为过”。<sup>[10]</sup>那么,尽管有情欲成分,这也是一种师徒关系纽带;男孩们成为学徒,学习作为一名雅典市民的方式和道德标准,并继承了市民才能享有的特权。这些特权包括掌握男女奴隶劳动的权力,以及掌握包括他们自己阶级在内的任何阶级的妇女的劳动的权力。“妇女和奴隶属于同一类人,并生活在一起,”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写道。清楚的阶级控制系统和性别控制系统是男性文化最看重的东西的必要部分:“对劳动的蔑视最初(起源)于一种对不受制于必须的自由的热烈追求,以及一种同样热烈的不耐烦——对任何不留痕迹、没有丰碑、不留下值得记忆的功绩的努力的不耐烦”;<sup>[11]</sup>因此,被蔑视的劳动就被留给了妇女和奴隶。

我认为,希腊人这个例子证明了,尽管异性恋对于维系任何父权形式都是一种必要,而恐同,至少是针对男性的恐同,则不是。实际上,对希腊人而言,“男人爱男人”与“男人促进男人的利益”之间的连续体,似乎是延续无间的。用我们的话说,就好像是在大陆浴场夜总会(Continental Baths)\*的男性纽带与波西米亚林(the Bohemian Grove)<sup>[12]</sup>的男性纽带——或者说,在会议室里或上议院衣帽间里的男性纽带——之间,并没有感觉得到的不连贯。

那么很清楚,我们当前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不对称,即女性同性社

---

[10] 多弗,《希腊同性恋》,第91页。

[11] 阿伦特,《人类的境况》(*The Human Condition*),第83页;引用于里奇,《论谎言、秘密和沉默:1966—1978文选》(*On Lies, Secrets, and Silence: Selected Prose 1966—1978*),第206页。

\* “大陆浴场”于1960年代在纽约市曼哈顿开张,是包含了大浴室的著名综合性娱乐场所,前期顾客主要是男同性恋者;它在70年代关闭。

[12] 波西米亚林是美国统治阶级男性的一个全男性夏季营;对它的介绍,请参见多姆霍夫(Domhoff)的《波西米亚林及其他营地:关于统治阶级凝聚力的研究》(*The Bohemian Grove and Other Retreats: A Study in Ruling-Class Cohesiveness*);范·戴尔·塞(van der Zee)的《地球上最伟大男子们的派对:波西米亚林内幕》(*The Greatest Men's Party on Earth: Inside the Bohemian Grove*)中也有生动——尽管也具有恐同意味——的描述。

会性纽带及同性恋纽带之间相对连续的关系，与男性同性社会性纽带及同性恋纽带之间强烈的不连续关系之间的不对称。此外，希腊人的例子（以及诸如 G. H. 赫特 [G. H. Herdt] 研究的新几内亚“萨姆比亚”之类的部落文化的例子）显示，同性社会性连续体的结构依据不同文化而发生改变，而不是“男性特征”（maleness）或“女性特征”（femaleness）的先天特征。的确，尽管这种解释和男女权力竞争的问题紧密相关，但是，它要求一种比“父权”更明确的历史分类模式，因为父权权力结构（即哈特门理论意义上的父权权力结构）不仅是雅典社会，也是美国社会的特征。不过，我们不妨认定这样一条直接的公理：男女同性社会性的历史差异——它们自己同时也随时间而改变——一直会是持续的男女权力不平等的表现和机制。

为什么同性社会性连续体的不同形式会是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它会是个文学问题？对于作为少数群体权益运动之一的同性恋运动的实际政治而言，它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这可以从近期男女同性恋者在策略和哲学理念上的不同看出。此外，作为思考更大的“性政治”问题的一种方式，它在理论上也很有趣：如果一种社会关系或政治关系被性化了（sexualized），意味着什么？这会造成什么不同？如果同性社会性纽带与同性恋纽带之间的关系如此不稳定，那么，我们拥有怎样的理论框架，来将性关系与权力关系联系起来？

## 2. 性政治与性意义

目前，不同的性别政治运动正以不同的形式很重视地提出这个问题。例如，对于权力统治与性虐之间的关系有多直接的问题，女性主义者和身为男性同性恋的理论家具有很不一样的看法。让我们先来看看两个引人注目的图像：《半文本》（*Semiotext[e]*）杂志近来一期（1981 第 1 期）所谓“多重性向”（Polysexuality）专刊的封面是一名壮硕的裸体摩托车手，而封底则是令人惊悚的、受过殴打的裸体男尸（对于这期杂志里出现的所有

女性，这一期应该称为《多重文本》[Polytext]的“半性向”[Semisexuality]专刊)。这期杂志的目的似乎不只是以极端的、别出心裁的方式来挑逗，而是要坚认，性虐中呈现的暴力不仅仅是戏剧性的，而是和真实世界里的暴力完全连成一体。妇女反淫秽组织(Women Against Pornography)与美国全国妇女组织(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简称NOW)1980年男女同性恋权利决议的起草者们似乎持同样观点，只不过少了那种高调的光环：对他们而言，似乎很清楚，把暴力性化或是把暴力的图像性化，对暴力没有任何改变，而仅仅是延伸了暴力的范围和力度。<sup>[13]</sup>但是，正如其他女性主义作家提醒我们的那样，还可能存在着另一种观点。例如：一名女性的受虐性幻想是否真的只是对她自己整体上的无力与无价值感的内化及认可(如果说这种幻想不是这些无力与无价值感的原因的话)?或者说，难道这种性幻想不正好与她对压迫的政治体验之间构成一种倾斜的，甚至对立的关系吗?<sup>[14]</sup>

在男同性恋社群中及其他人群中，就“男人—男孩恋”的争论提出了一个同类问题：一名成人和一名儿童之间的性关系是否仅仅是更广义上的教育与养育关系的延续?或者说，把性包含进来，是否就一定在本质上改变了这种关系——比如，朝着剥削的方向发生改变?在这个例子里，同一份NOW公报(它假定认为，性化了的暴力与真正的社会暴力之间存在着没有打破的延续)在恋童癖问题上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性的注入会改变(会腐蚀)这种关系的本质。因此，当从性虐问题转到恋童癖问题时，“允许”式的观点和“清教徒”式的观点最终在根本上交换了它们关于性如

---

[13] 比如说，这项NOW决议将性虐、色情，以及“恋童癖”(pederasty)(这里的意思是“恋童”(pedophilia))直接定义为“剥削和暴力”的问题，将其作为“感情或性方面的偏好或取向”(affectional/sexual preference/orientation)的反面。引用于《异端》(Heresies)，1981年第4期，总第3卷，92页。

[14] 参见《异端》以上页码部分对这些观点的讨论；亦请参见斯尼托(Snitow)等编著的《欲望的权力：性政治》(Powers of Desir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及萨莫瓦(Samois)，《获得权力：关于女同性恋虐恋的书写与图像》(Coming to Power: Writing and Graphics on Lesbian S/M)。

何与社会相联系的假定。

因此,关于“性的涉入给一个社会关系或政治关系造成了怎样的不同”这个问题,答案就是——不一定。比如,对不同政治局势中的不同人群而言,同性恋行为对于同性社会性纽带既可能支持也可能对立。从这个以及其他我提到的例子来看,很清楚,性(sexuality)不是非历史的,性能量不能被简单地施加到一个社会关系上,并以稳定的、可预知的方式去“性化”它,或是与之脱离而不对它造成改变。我们也不能假设认为,性化了的形式是对一个更广泛的关系的概括或简单浓缩。(比如,凯瑟琳·巴里 [Kathleen Barry] 在《女性性奴隶制》[*Female Sexual Slavery*]中将德·萨德侯爵放到一切女性压迫的中心去,这些压迫包括传统的生殖器伤害,乱伦,以及对妓女的经济剥削和性剥削。)

相反,对性欲望与政治权力之间关系的审视应该沿着两条轴线进行。第一,当然是需要利用所有那些最能描述随历史改变的权力不平衡的分析形式,比如阶级和种族,以及性别。但与之相关的是,对表象(representation)本身的分析也是必要的。只有表象的模式才能让我们正确对待性作为权力关系的能指的作用方式的范围(这个范围十分广阔,但又并非无限或随意的)。修辞模式在这里的重要意义不是要让关于性或暴力或压迫的问题显得不那么紧急、迫切,而是要帮助我们分析并利用来自性领域的关于政治迫切性的各种极为不同的直觉(intuitions)。

例如,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在最近一篇令人瞩目的文章中试图小心详查并清理女性主义思潮不同支流之间的分歧;就性对于每个性别问题所具有的中心地位,该文章得出了以下结论:

实际上,对女性性别(gender)的典型描述中的每一点都被认为与性相关。脆弱意味着表面上或事实上容易对性追求不抵抗;被动意味着接纳性(receptivity)和抵抗丧失……;柔软意味着会因某种有硬度的东西而受孕……把女性婴儿化能激起恋童癖;对分解开来的

## 男人之间

身体部分的迷恋……激发恋物癖；对于无生气状态的崇拜则引起恋尸癖。自恋使得女性认同被男人奉为榜样的女性形象……受虐意味着侵犯中产生的愉悦变成了她自己的性感 (sensuality)。

麦金农这样总结了她在观点中的这一部分：“从社会角度说，女人味 (femaleness) 就意味着女性特质 (femininity)，而女性特质意味着对男人有吸引力，意味着性吸引力，意味着以男人的条件来提供性。”<sup>[15]</sup>

这里牵涉到不少“意味着”。通过让这里的每一个“意味着”都表示不同的东西，麦金农使得性的每个表征都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在一个符号系统（例如时尚）中，一个特性可以作为一个成分来“意味着”什么（比如，“柔软意味着可受孕”）；或者，从情感依附的角度考虑，它可能“意味着”互补的反向（比如，“把女性婴儿化能激起恋童癖”）；或者，如果存在时间跨度的话，它可能“意味着”它努力造成的成果（比如，“自恋使得女性认同…受虐意味着侵犯中的愉悦变成了她自己的性感”）。麦金农总结道，“将女性如此定义的东西正是让男人兴奋不已的东西”。但什么定义了“定义”呢？性经验的每一个交叉点都以某种象征方式与性别压迫的大网产生了关系，反之亦然。这样的说法正确而且重要，但在分析具体政治问题时，却不够精确。当然，这里的危险在于一种假象，即我们以为可以从这样一种极权的分析中知晓去哪里寻找我们的性，以及，在找到它的时候，要如何保护它，使之不受征用。

另一方面，麦金农这篇文章的一个价值在于，它以更灵巧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二十年来不断被提出的问题：“谁或什么是我们（作为女性）的性的主体？”这个问题被以种种方式提出，有的滑稽，有的直接，有的是男性崇拜式的 (phallic)，有的是女性崇拜式的 (gyno-)，有的愤怒，有的癫狂——简言之，或许可以说，有的是英美式的，有的是法国式的。但不论

---

[15] 麦金农，《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方法和国家：一份关于理论的议程》(Feminism, 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An Agenda for Theory), 第 530—31 页。

是以哪种方式提出，它都是同一个问题——它在 1960 年代鼓动了美国“性玩物”的抱怨，在 1970 年代倡导了“妇女支配自己的身体”的提法，并鼓吹了最近从法国女性主义者那里进口的“关于主体的批判”。

让我们以白人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的一部意识形态的轰动作品为例；这部虚构作品已化为经典，为一次又一次的美国女性刻画了“女人味”角色面临的限制，女性的抱负面临的障碍和迫切性，经济动机的重要性，浪漫爱情的强制性和毁灭性，以及（麦金农可能会强调）女性性欲的中心性及其彻底异化。当然，我指的是《飘》（*Gone with the Wind*）。正如麦金农的模式会预言的那样，在郝思佳的生活里，十分清楚的是，天生女性的定义取决于与“淑女”角色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角色的样子和意义则取决于性（sexuality），而这种意义上的性决定了她不会是主体，只会是客体。对郝思佳而言，作为女人活下来意味着学会把性、男人的权力统治以及她的传统性别角色视为全都意味着甚为危险的同一件事。让自己像男人那样从这些东西那里默默离开，学会从幕后将它们作为客体或单纯的能指来控制，正是生活给她的令人麻木而又有效的教训。

然而，被这个观点神话了的仅仅是一种资产阶级白人女性主义。在魔术房间里，水看起来似乎在往上流，小孩子可能看起来比他们的父母高。类似地，在任何社会里，性、性别角色和权力统治只有当从一个固定点看的时候，似乎才符合这个由互相呼应的意义构成的完美链子。从一个即使只是稍微偏离中心或脱离权力的角度看，这个形成意义的链子的错位和中断似乎会越来越明显。比如，如果这部小说中所有的女人在生活中真的和“淑女”角色之间有着某种有意义的关系，那么，随着这些女人与那种角色之间社会距离和种族距离的增加，这个形成意义的关系变得更加曲折——尽管与此同时，以小说中资产阶级白人的眼光来看，这种关系会更加具有决定性。梅兰妮既是女人，又是淑女；郝思佳是女人，同时也被要求成为或装成淑女；但亚特兰大妓女贝乐·沃特林作为女人并没有和她自己的“淑女”角色搭上边——她这个角色不起眼，但仅仅只是负

面的，和梅兰妮及郝思佳的淑女角色相比形成了既具补偿性又具戏仿意味的关系。至于奶妈，从这个角度看，她的头脑和生活完全被“淑女”这个理想奴役了，但她与之产生的关系是将她自己完全排除在外的：她为郝思佳的“淑女”角色提供模版，支持，以及强制力量，以至于在和郝思佳的角色关系之外，她个人的女性意味就丧失了任何意义。奶妈是谁的母亲？

强奸这个问题正是在统治与性的交叉点出现的。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飘》都给记忆留下了关于强奸最鲜明的画面：

这个黑鬼跑向马车，他黑脸扭曲着，目光淫邪，露齿而笑，她向他直射，开了火……这个黑鬼在她身边，贴得那么近，以至于当他试图把她拽到马车的那一边时，她闻得到他的恶臭。她发疯似的用空着的那只手打着，抓他的脸。然后，她觉察到他的大手摸上了她的喉咙，只听到一声撕裂的声音，她的短上衣就从胸到腰扯开了。然后，黑手在她双乳之间摸着，从未知晓的恐惧和厌恶向她袭来，她像个疯女人一般尖叫起来。<sup>[16]</sup>

这次袭击之后，让“强奸”在这个文化中获得意义的整个机器就开动了。郝思佳的男同胞和他们的三 K 党朋友天黑之后出发，要杀了那些袭击者，“铲平整个仙蒂镇的定居点”——结果，双方都如预期的那样流了血。郝思佳应为白人男人的死负多大的责任被广为争论，其中，贝乐·沃特林站在“淑女”角色的立场说了话——“她造成了这一切，她自己一个人在亚特兰大到处乱走，勾引黑鬼和渣滓。”而白瑞德一如既往地，从作为该小说中心的资产阶级女性主义的角度安抚她说，她产生了绝望的负罪感只不过因为迷信（第 46、47 章）。在这个中心事件的铺垫中，小说甚至提出了强奸的受害者的法律待遇这个问题（第 42 章）。那个较早案例的效

---

[16] 米切尔（Mitchell），《飘》，第 780 页。接下来的引文将被整合到文章中，并用章节号来标示。



应是种经典效应，它已经削减了郝思佳的活动能力，相应地也削减了她的个人权力和经济权力：她是为了要加快生意的进展才不得不驾车经过仙蒂镇的。

简言之，不论是对郝思佳而言，还是对她的文化中那些制造并流通了各种强烈意义的所有力量而言，对她的袭击完全意味着强奸。虽然这个案例中少了一个构成强奸的成分，但这没有让事情有什么不同——这里缺少的成分，很简单，就是性。袭击郝思佳的目的是钱；那双黑手在郝思佳白皙的乳房之间摸索，是因为这个人被告知那是她放钱的地方；郝思佳对此很清楚；小说没有提及任何其他动机；但这没有造成丝毫的不同，性的缺席没有在人物、小说或社会采用的强奸话语中留下任何破绽。

然而，《飘》这部小说并没有遗漏对强制性性行为的描写。它对某次真正的强奸的描述充满栩栩如生的细节；但是，当摸上白色皮肤的手是白色的时候，它那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名字就成了“幸福婚姻”。“[白瑞德]挫了她的锐气，整个狂野的晚上粗暴地蹂躏她，而她则为此颇为得意”（第54章）。小说里也有白种男人对黑人妇女的性侵犯，但关于这种行为是“被迫的还是获得许可的”的问题，在这里从未被提及。在呈现上看，白种男人对黑人妇女的性异化与对白人妇女的性异化很不一样，以至于强奸不再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词汇。在这部小说中，如果强制发生的性行为出现在一名黑人男子和一名黑人妇女之间，这种性行为本身并没有什么说明意义，因为在这里，黑人的性仅仅“意味着”句子在语法上发生转变，而该句子暗含的主语和宾语都是白人。

在这部原始女性主义小说中呈现的意识形态的微观世界里，我们得到的是一种象征上的经济体，在该体系中，强奸的意义和强奸本身都被迫进入流通。然而，由于该社会中出现了种族断裂（racial fracture），强奸及其意义是以截然相反的方向流通的。这是个极端的例子；在美国，大概除了性别之外，种族断裂的二元分化得最厉害。但在每一个社会构成中，仍然存在大量的、极具分裂性的其他断裂，比如，阶级（我所说的断裂指的

是特定社会以权力在量上的区别为依据,将其他事物解读成在质上具有区别)。在这种压力下,性与权力之间极具象征意味的关系,或是说,性异化与政治压迫之间极具象征意味的关系,不是最稳定的,而恰恰是社会交叉点中最易变的。

因此,在政治上具有极大重要性的是,我们检验这种具有象征意味的关系的工具应该微妙而具有辨别力,而且,当面对真实暴力(尤其是性暴力、与性相关或针对性的暴力)那种引发恐慌的意象面前,我们不能过度简化关于最难懂、最不直接的意义途径的书本知识。如果假设性(sex)是在平板、不变的暗喻关系或提喻关系中来示意权力的,那么这种假设就总包含着一种盲目——这不是对修辞范畴或辞藻华丽的范畴的盲目,而是对诸如阶级、种族等历史范畴的盲目。一种事物意示着另一种事物这种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我们能够完全掌握、使用性关系对各种压迫关系所能提供的杠杆作用之前,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进行更多、更大胆、更具洞察力的运用——进行更不一样、更复杂、更具适当历时性、更偏离中心的运用。

### 3. 性,还是历史?

至此,很清楚的是,与性相关的问题在本书中的中心地位对本书在方法上希望获得的突破也至关重要。我会不断回到性这个主题,将它作为一个极具能量的支点,或作为一个在性别与阶级(不少社会中还应该包括种族)——我们通常只将这些范畴用于描述人类的劳动分工——之间进行意义交换的点。女性主义内部存在着各种认为妇女压迫具有或多或少历史性的观点;在方法上,我希望我的文本解读能对这些观点之间的辩证关系作出贡献。

大致说来,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论谱系上最具历史性的分析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而把最不具历史性的称为“激进女性主义”。当然,“激进女性主义”会得到如此称呼,并不是因为它在常规政治地图上占据了最

“左”的地盘,而是因为它把性别(gender)本身——而且仅仅只是性别——视为人类经验最基本的分割点,而且是个相对稳定的分割点。

此外,出于此处讨论的目的,出于我下面要更全面解释的原因,我将把“法国”女性主义——即解构主义和/或受拉康学说影响的女性主义——与这个谱系的激进女性主义的那一端相融合。“法国”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在许多很重要的问题上都有区别,比如,它们对于将每个人都归类为男人或女人这一粗暴事实的观点不相同;但是,它们的相似点在于,它们都认为,人类所有的文化、语言和生活都是由性别差异的戏码来架构的——是以基本的、跨历史的以及本质上相似的方式架构的。(本书第1章将更全面地讨论本研究用了怎样的具体方式来表述这种结构主义动机。)在行文上,法国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对现在时的使用往往是预言式的、帝国主义式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观点背后的辩论活力将会是一种欲望,即,通过性这个主题——该主题在修辞上很不稳定——来利用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在表述上的手段,继而服务于一种更具历史辨别力的分析模式。

本研究以性(sexuality)作为重点议题,这个选择突现并质疑了当前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之间区分议题重点的做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一方面研究历史变化与经济变化之间的深层关联,一方面探寻性别分化诸多变迁之间的深层联系,很典型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中欠缺关于性的理论,而且对性的意义或性经验没有多少兴趣。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暗含的观点认为,妇女的性与生殖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体,因而只需借助人口统计学的工具,就可以对它进行恰当研究;或者说,它与一种简单的、规定性的霸权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一体,因而只需借助于思想史或法律史,就可以对它进行恰当研究。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导向的研究在性问题上已经取得重要成就,而它成绩卓越的方面正是被社会的法律话语已经直接鉴别为不正常的方面:显著的例子有男人的同性恋和妇女卖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揭

示妇女异性恋经验的历史意义或女性同性恋(当它在本世纪在法律和医学上变得显眼以后)的历史意义已经没有太多帮助了。<sup>[17]</sup>

另一方面,被我归类到激进女性主义帽子下的许多不同形式的理论的做法相对较为成功:它把性放到一个显著的、质询式的位置上,这样一个位置经常使得边缘的、矛盾的东西也能被纳入考察范围。凯瑟琳·巴里的《女性性奴隶制》、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的《色情与沉默:文化对自然的报复》(*Pornography and Silence: Culture's Revenge Against Nature*)、吉尔伯特(Gilbert)和古芭(Gubar)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简·盖勒普(Jane Gallop)的《女儿的诱惑:女性主义与心理分析》(*The Daughter's Seduction: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以及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的《色情:男人占有女人》(*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等作品构成了一个在许多方面——风格、紧迫性、直接的女性主义认同、与法国或美国的联系、让人“跌破眼镜”的程度等方面——极为多样化的文本群。然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在女性体验的形成中,性是个中心难题。而且,在成熟度各有不同的论述中,所谓男权文化中的女性异性恋的主体乃至最终客体都被视为是男性的。无论是从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度来看,还是从内化的心理及语言角度来看,这种方法都以性为重,经常将其放到被列维·施特劳斯的分析定为“男性对妇女的交易”的结构中来审视。

然而,和其他形式的结构主义一样,这个脉系的方法在处理历时性问题上也有困难。这样的结构的实质就是对自己的复制;从这个角度看,历

---

[17] 参见维希纳斯(Vicinus)的《性与权力:对当前性史研究的综述》(*Sexuality and Power: A Review of Current Work i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一文对这些局限所作的讨论。纽顿(Newton)等编辑的《妇女史中的性与阶级问题》(*Sex and Class in Women's History*)一书中所收的文章体现了在这些界限之内能做怎样的有用研究。

史变化似乎是某种结构之外的东西,对结构充满威胁——或者,更坏的情况是,没有威胁——而不是与之处于建构的、辩证的关系中。因此,历史大多要么是隐身的,要么是被放到极为耀眼的、使周围黯淡的对比性光线下来审视的。<sup>[18]</sup>间接或直接地,激进女性主义倾向于否认性别或性的意义曾有过显著改变;更具破坏性的是,它可以使未来改变看起来不可能或必定遭殃,即使这种改变是人们希望得到的。或者,它可能将重大改变的先决条件过分简单化。此外,在将一切普遍化的结构主义审视下,即使历史以阶级差异和冲突,或种族差异和冲突的残余共时性形式出现,也会变得不可见,或者,变得过度粗糙或被二元化。

那么,作为女性主义读者,我们此刻似乎悬在性阅读和历史阅读之间,悬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之间出现的选择点上(尽管这种出现在二者之间的选择一定是错误的)。我们清楚,这样看一定是错误的,不仅因为在抽象意义上,共时性和历时性最终必须相互联系着来考虑,而且因为在我们考虑的领域内,它们尤其是相互纠缠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是如此具有图解特征,而结构主义用来描绘性的图解方法则如此具有叙事特征。

在本书里,我将试着激活并使用这两种方法某些潜在的交融。这种尝试的部分基础是持续思考意识形态这个范畴如何能被用于对性的分析。这两个范畴在若干重要方面似乎具有可比性:比如,它们都在物质(the material)与表述(the representational)之间周旋;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性一样,意识形态既象征了权力更广阔的社会关系,自己本身又影响了这些关系;而且我还会指出,类似地,它们都周旋于社会经验的历时性叙事结构与共时性图解式结构之间。如果常识认为我们可以将历史性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历时性及叙事大致归为一组,并把“激进”女性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法国”女性主义与共时性及图解方法归为一组,那么,就可以理解这两种周旋其中的范畴在方法上

---

[18] 参见麦克利昂(McKeon)在《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的“马克思主义”》(The “Marxism” of Claude Lévi-Strauss)一文中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的保证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中,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是隐藏现状中的矛盾,比方说,通过将矛盾重新塑造成对根源的历时性叙事来隐藏矛盾。与这种功能相对应地,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结构就是让较早系统的过时价值产生理想化的吸引力,从而保护实际上损坏了这些价值的物质基础的新系统。<sup>[19]</sup>

比如,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以这样的方式分析了家庭对于证明资本主义转向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封建社会的农民大众拥有个人私有财产;他们的理想仅仅是拥有更多财产。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提供得更多,因为它在一个新的语境中(或者,在一个新观念的语境中)强调了个人私有财产的**观念**。因此,它提供了个人主义(这是个古老的价值)以及更充分实现个人主义的看似崭新的手段——自由和平等(在封建主义中,这些价值明显缺席了)。然而,能赋予这种理想一个看似具体的基础的唯一方式,就是维持家庭这个古老制度。因此,在封建制度下,家庭是个人私有财产的经济基础,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该制度将这样一个经济形式从其中心生产模式中摒弃了——它则成了个人私有财产的**观念**的聚焦点……在生产中,工人阶级为几个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而进行社会性工作,满怀让自己及家人拥有个人私有财产的**希望**。<sup>[20]</sup>

“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A man's home is his castle.)这句话给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构建提供了一个巧妙浓缩了的例子。它回溯到封建主义下关于控制与整合的空荡荡的意象,以求将男性工资工人向前推,

---

[19] 在《妇女的产业》(*Women's Estate*)中,朱丽叶·米切尔讨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方面问题,见第152—58页。

[20] 米切尔,《妇女的产业》,第154页。

使之成为异化了的劳力,为一个现在已经被分裂、被围困,但也变得更为理想化了的家而服务。拥有这个家的男人与拥有城堡的贵族并不一样;这两种拥有(他[按揭购买]的家/他[继承]的城堡)暗指的财产形式不仅不一样,而且,正如米切尔指出的那样,是相互矛盾的。通过把贵族对其城堡周围(environs)的政治控制及经济控制转化成父亲对他家中成员的个人控制,这个矛盾被缓和、填充了。这种意识形态模式因此允许能动性、时间性和空间之间的交叉。重要的是,这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即使其形式是直白的宣言式的(“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至少也具有间接的叙事性,而且,为了将意识形态重新编织,使其看不出来,叙事在结构上必须是交错的:也就是说,叙事开始时的主题和结尾时的主题不一样,这两种主题通过将其不连续性隐藏起来的修辞手段而相互交叉。

也很重要,在这些意识形态叙事中,矛盾的缝合线在另一种叙事的那种具有分解力的审视下最大程度地彰显出来,尽管这种叙事本身也有其意识形态。此外,在现状内部以历时的方式展现矛盾——即使那种历时性重塑(diachronic recasting)的工程正是要隐藏这些矛盾——可能会有正好相反的效应,让它们重新现身,为批评提供新的杠杆作用。由于这些原因,区别意识形态叙事的构建及其批评,在理论上不一定总能实现,即使是相对平板的文本也是如此;对于作为本书例子的那些厚实、丰富的文本,我们将不会做这样的尝试。

和意识形态一样,性(sexuality)依赖于共时性构成和历时性构成之间的相互重新定义与相互阻碍。正如弗洛伊德及其他人已经展示的那样,相对于构成它的大多数感觉和情绪来看,即使是这样对性的命名也总是回溯性的;<sup>[21]</sup>这样的发展性事实具有历史重要性。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哪些东西算作性是可变的,这本身是个政治问题。政治与性之间的相互边界的不确定性有其确切的暂时空间——即随时间变化的地点,这

---

[21] 对弗洛伊德理论这一方面做出最好、最清楚的讨论的是拉普兰士(Laplanche)的著作《心理分析中的生命与死亡》(*Life and Death in Psychoanalysis*),尤其是第25—47页。

个空间实际上是个充满丰富意识形态构成(ideological formation)的空间。这是真的,因为,就像性一样,意识形态构成依赖于对主体的命名或归类过程中的回溯性的改变。<sup>[22]</sup>

政治和情欲这两方面相互遮掩、相互错误表述,这是很有必要的,而同时,其采取的方法为历史上的性别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所有参与者都提供了重要且不断改变的启示。

#### 4. 本书内容

在本书的理论基础中,女性主义的历史形式与女性主义的结构主义形式之间有着困难的但又具有潜在生产性的张力,这种张力得到了本书另一个张力的呼应,即既具历史性又更具文学性的组织、方法和强调之间的张力。贯穿全书几乎所有的历史性观点都包含在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中,并由这些解读引导——如果不是因为其他更好原因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力和训练,才会这样。不论怎样,大的历史叙事对分立的解读具有一种偏离中心的效应,正如文学分析的内向技巧反过来也会对历史观点产生这种效应。因之产生的结构代表了本书历史化动机和去历史化动机之间持续进行的磋商。我用来对自己描述本书目的的两种方法表达了类似的张力:第一,使读者能更容易地得以清楚关注贯穿于欧洲异性恋情欲风气中的男性同性社会纽带;第二,用性这个主题来显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某些历史范畴对文学批评的有用性——迄今为止,它们对文学批评只产生了相对较小的影响。

这本书第1章“性别不对称与情欲三角”将本书焦点放到异性恋三角欲望的结构语境中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上。雷内·伊阿(René Girard)、弗洛伊德(Freud)以及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尤其是盖尔·鲁宾阐释下的列维·施特劳斯理论)提供了“男性对妇女的交易”

---

[22]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第8章。



这个基本模式,该模式将成为全书的基础。接下来三章分别是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脱离历史的解读,对威切利(Wycherley)的《乡村太太》的半历史性的解读,以及将斯泰恩(Sterne)《感伤的旅程》与18世纪中叶英国男人对性别、阶级和国家那种纠缠在一起的焦虑相联系进行的解读。这些解读不仅为讨论建立了一些持续模式,而且开始将它们放到现代英格兰的特定语境中来考量。

第5及第6章分别有关恐同和浪漫主义哥特式小说。它们讨论了小说中的偏执狂哥特传统,以探寻18世纪及之后恐同在英格兰不断变化的意义和重要性。对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一名清白罪人的告白》的解读没有将恐同直接视为对同性恋男人的压迫,而是将其作为控制男性纽带整个谱系——并因此控制整个性别系统——的工具。

第7及第8章着眼于更“主流”的深具公共意识形态的维多利亚小说,着眼于陷于男性同性社会性交易中的妇女的命运。这部分讨论了三个具有历史性或伪历史性的维多利亚文本,这些文本宣称描述了妇女与男性纽带之间的关系变化:丁尼生(Tennyson)的《公主》、萨克雷(Thackeray)的《亨利·埃斯蒙德》以及艾略特(Eliot)的《亚当·比德》。这部分最直接地处理结构主义方法和历史方法对于性及性别问题的不同的解释。

第9及第10章探寻狄更斯(Dickens)的维多利亚哥特式作品,展示狄更斯最后两部小说如何描绘恐同与19世纪阶级分化、种族分化及性别分化之间的互动。

最后,结言“走近20世纪:惠特曼的英国读者”提供了英国一些对惠特曼诗歌的颇有影响的解读(或者,误读),以勾画出维多利亚中期英国性政治与我们(自认为)熟悉、明了的现代英美式男性同性恋、异性恋及恐同图景之间的联系。

我选择的这些文本代表了本书的观点;这些选择不是为了要开始描摹一个不同的男性同性社会性文学经典。实际上,我的观点中很重要的

一点就是，现有欧洲经典已经构成了一个这样的经典，当它最具异性恋倾向的时刻尤其如此。<sup>\*</sup>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容易的大概是把这本书描述为（这在第1章会以更直接的方式得以描述）是对雷内·伊阿在《欺骗、欲望与小说》（*Deceit, Desire, and the Novel*）中对现有欧洲文学经典进行的三角化的重塑和重新聚焦。实际上，我只是随喜好从英国经典及相关作品中选择文本——对于理解男性同性社会性政治，这些经典代表了特别有趣的阐释性问题，或是特别指征了历史纠结点和意识形态纠结点。

希望至此已经很明显，我想把本书放到与快速发展的女性主义话语之间的辩证关系中，而不是与该话语之间的权威性的关系中。当然，我尽我所能地小心对待这些解读和阐释，尊重它们本身的语境；但同时，我也清楚，我强调了某些吸引人的（因而也是非持续的）或具有概括可能的表达形式，希望这样一些阐释对其他文本的读者也有辩证上的启示。在本书里我考虑的形式模式（formal models）来自两本很不一样的书，即伊阿的《欺骗、欲望与小说》以及多萝西·迪纳斯坦（Dorothy Dinnerstein）的《人鱼与牛头人身怪》（*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这不是因为本书与他们的观点内容一致，而是因为虽然这两个研究都相对较短，关注点具有异质性，但都足够有力地——甚至是重复地——传达了一套复杂的概念，以使之成为任何读者的方法库中的一部分，以处理自己的个人经验及未来阅读。从这种方法库的立场，每个人都能——都必须——受到批评，被改变。我在本书中想做的就是采取这样的立场。在我看来，在这些批评、改变的方向中，最迫切的、但也是我迄今为止还没能很好地整合到讨论本身的，是以下这些：

第一，我的历史化叙事给严格意义上的文学阅读带来的暴力作用可能最显著地体现于消除文体差别和略去对其结构的考虑。大体来看，历史和文本之间周旋的众多不同机制——这些机制的名称可能会有，比如，

---

<sup>\*</sup> 对于这一点，作者在之后发表的《衣柜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一书中做了进一步论述。——译者注

“文学惯例”、“文学史”——的数量和差异需要在新的可行模式中重新肯定。

同时,通过对文学作品的系列阅读来具体体现一种历史观点,会对该观点产生暴力影响,这样的暴力可能数量更多、危害更大。除了意识形态的浓缩及转移等问题——这些问题将在第7、第8章得以讨论——外,对我而言,最明显的暴力形式就是将我的观点局限于“书籍写作阶层”——这样一个群体不仅在社会经济学意义上具有独特意义,更重要的是,它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接下来,在本书据为基础的结构模式中,女性的孤立——更不用说她们的绝对从属地位——是一种扭曲,它必然不能给女性自己的权力、纽带和斗争带来正义。<sup>[23]</sup> 我认为,本书中女同性恋问题的缺席是很早就作出的必要决定,因为我的观点是围绕着男性同性社会性谱系与传承不平等地分配的权力之间的独特关系而架构的。然而,这本书对女性的关注带有排他性的异性恋视角,这造成本书自身严重苍白,也标识了一种更大的扭曲。唯一在男性同性社会性交易的语境中直接考虑了女性之间的纽带问题的是对《亨利·埃德蒙德》的解读,但女性同性社会性结构和男性同性社会性结构之间的关系,尚待做出更好的分析。

我认为,由于本书所属的这类特别研究尚属发展的早期阶段,所以,它对男性作者那种几乎是排他的关注同样可以理解;但这我们对妇女自身用于抵抗、适应、修正和生存的文化资源,起到了类似的削弱作用。我很不愿意在“意识形态化”叙事与“去意识形态化”叙事之间做出区分;悖论的是,这种犹豫可能起到了将“经典”文化话语用过分多变的、无法逃脱的(因为它内在上是矛盾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类似效果。此外,这里使用的交易妇女的模式与迪纳斯坦、乔多罗(Chodorow),以及克利斯蒂娃

---

[23] 关于伊阿著作中女性的缺失的问题,参见墨伊(Moi)的文章《失踪母亲:雷内·伊阿的俄狄浦斯敌手》(“The Missing Mother: The Oedipal Rivalries of René Girard”)中特别有用的讨论。

(Kristeva)(在《恐怖的力量》[*The Power of Horror*]中)提出的关于男女对女性的母性力量存在首要恐惧的假想之间的关系,还有待分析。

我再次重复,在女性主义的这个早期时刻,对暴力、性暴力,以及对暴力的性虐式性化之间的复杂关系,<sup>[24]</sup>还缺乏完全有用的分析模式,这使我在本书中对可以用经济术语(或多或少以隐喻的方式)描述的性别压迫的强调过于温和——这可能并不合适。

同时,文学本身的情欲偏见和个人主义偏见,以及用女性主义理论模式描写性爱和性的相对自如(更不用说从中得到的真正的愉悦了),已经使得许多极为重要的男性同性社会性纽带相对不那么受到重视——谈论这些纽带(比如,制度的、官僚的以及军事的纽带)可不是什么很有魅力的事。

最后,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本书把重心放到特定的英国社会结构,以及对“普遍性”(universality)的霸权式诉求(这在历史上一直暗含在欧洲社会分析和心理分析的整个话语中)上,这让我的讨论与非欧洲文化和非欧洲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没有得以说明,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看,这在目前可能是无法说明的。本书在英国的性意识形态和美国种族歧视的某些意识形态之间作了比较,而贯穿这种比较的潜台词并不是要试图隐藏本书覆盖面上的空白,而是试图对其他美国读者清楚指出,我用于思考英国意识形态的是美国白人文化中的某些参照点。可能向那些认为本书观点有用的人提的最合适的要求就是让他们记住,尽管在将这些参照点运用到欧洲例子的时候,对其进行批判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想要尝试将它们当作跨文化的或普遍性的(这种情况更多)观点,就应该先进行最深入的个案分析。

作为一名(部分上)书写关于男性同性恋文章的女性和女性主义者,我感到我必须在这方面对本书的政治基础、假设和追求做出特别直接的

---

[24]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除了斯尼托等编的《欲望的权力》之外)布莱恩斯(Breines)及哥登(Gordon)的文章《对家庭暴力的新研究》(*The New Scholarship on Family Violence*)。

说明。我自始至终的意图是进行反恐同的、女性主义的研究。然而，大多数迄今发表的关于妇女与男性同性恋之间关系的分析（数量极少），在成熟度、关注度上，都不如单独基于女性主义或男性同性恋做出的分析。在缺乏关于男性同性社会性谱系的有用观点时，除了少数近期例外之外，<sup>[25]</sup>这些著作采纳了两个假设中的一个：要么是，同性恋男人和所有女人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跨越历史的同盟关系，并且有着本质相通的诉求（例如，打破性别陈套的诉求）；<sup>[26]</sup>要么则是，男性同性恋是一种化身，一种拟人化，一种效应，或者，它可能是造成憎恶女性的主要原因。<sup>[27]</sup>我认为这两种假设都不对。特别是，由于本书讨论的是一种连续体（continuum），一种潜在的结构一致性，以及一种男性同性恋关系与压迫女性的男性父权关系之间的意义关系（这种关系处于变化中），所以，很有必要强调，我并没有假定或坚持认为，父权权力主要或必须是同性恋关系

---

[25] 以下著作在不同程度上属于这样的例外：费恩巴赫（Fernbach），《螺旋之路：同性恋对人类生存的贡献》（*The Spiral Path: A Gay Contribution to Human Survival*）；梅利（Mieli），《同性恋与解放：同志批判要素》（*Homosexuality and Liberation: Elements of a Gay Critique*）；罗伯萨姆（Rowbotham）和威克斯，《社会主义与新生活：爱德华·卡彭特与哈弗洛克·葛理士的个人政治和性政治》（*Socialism and the New Life: The Personal and Sexual Politics of Edward Carpenter and Havelock Ellis*）；德沃金，《色情：男人占有女人》。

[26] 这一立场近期最有影响的声明出现在黑尔布朗（Heilbrun）的著作《认识雌雄同体》（*Toward a Recognition of Androgyny*）中。

[27] 参见伊利格雷（Irigaray），《当货物聚到一起》（“When the Goods Get Together”），以及弗雷（Frye），《现实政治：女性主义论文集》（*The Politics of Reality: Essays in Feminist Theory*），第128—51页。简·玛柯斯（Jane Marcus）关于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研究著作使用了玛利亚—安彤尼艾特·玛琪奥琪（Maria—Antonietta Macciocchi）的恐同模式：“纳粹社群由同性恋弟兄构成，他们将女人排除，而尊崇母亲。”玛柯斯说道，“剑桥鼓吹兄弟关系的人在伍尔芙眼中必定与关于兄弟关系的某些法西斯概念有可比性”。玛琪奥琪的模式被引用于简·开普兰（Jane Caplan），《法西斯意识形态下的女性性欲引论》（“Introduction to Female Sexuality in Fascist Ideology”）一文（见《女性主义评论》（*Feminist Review*）1979年第1期第62页）。玛柯斯的文章名为《自由、妇女社团、厌女》（“Liberty, Sorority, Misogyny”），被收于黑尔布朗和希贡内（Higonnet）所编的《虚构作品中的妇女塑造：1981年英语研究所论文选》（*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Fiction: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nglish Institute*, 1981）第60—97页；引用部分见第67页。

(与同性社会性相区别),或是说,男性同性恋欲望与厌女(misogyny)之间有着一种首要的或必要的关系。这些观点中的每一种都是恐同的,而且,我相信,它们不准确。但是,我将提出,男性针对男性的恐同是厌女的(misogynistic),而且这种情况可能是跨历史的。(我说的“厌女”不仅是指它压迫了男性中的所谓的女人气质,而且它对妇女也具有压迫性。)这正是最可能产生错误阐释的地方。由于“同性恋”和“恐同”在其任何化身之下都是历史构建,由于它们很可能强烈相互关注,采取互联的或相互反映的形式,由于它们的斗争戏码很可能是心灵内部的、制度内部的以及公共的,所以,要把它们区别开来,并不总是很容易(有时几乎不可能)。因此,举例说,弗洛伊德对施莱伯博士的研究清楚显示,一个常识上被认为是异性恋者的男人身上那种对同性恋欲望的压抑诱发了偏执狂精神病;然而,这种认识在精神分析上的应用不是反对恐同及其增殖力量,而是反同性恋——反同性恋者,原因是“同性恋”和精神疾病之间存在关联。<sup>[28]</sup>对“同性恋”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关系的讨论也存在类似令人迷惑的地方。随着作为一种制度的“同性恋”的历史构建特性得到更多的了解,将有可能在一种更准确、偏见更少的理论语境下理解这些区别。

因此,尽管在我们的社会里,女性主义和反恐同之间的纽带通常是深刻的、直观的,但是,这两种力量并不一样。由于它们之间的联合关系不是自动的或跨历史的,那么,只有当它既具有分析性而且又不自以为是的时候,才会更有影响。以下文本解读的目的,正是要帮助我们理解这个联合关系的基础和暗含的意义,并通过这些问题来帮助我们理解深具影响的文学文本。

---

[28] 关于这一点,参见霍昆海姆(Hocquenghem),《同性恋欲望》(*Homosexual Desire*),第42—67页。

## 第一章 性别不对称与情欲三角

在接下来的作品解读中,我用得最多的图例是三角型。作为一种图形,三角很有用——在我们的知识传统的“常识”中,它常被用来描绘情欲关系,而且,这也是因为它允许我们将几种不同的近期思潮浓缩,并让它们与这种民间认识相并列。

雷内·伊阿(René Girard)的早期作品《欺骗、欲望与小说》(*Deceit, Desire, and the Novel*)本身也是对民间智慧中的情欲三角(erotic triangles)的描述。通过对主要欧洲虚构作品的解读,伊阿追溯了一种权力运算,这种运算由一个情欲三角中两个主动成员之间的敌手关系所架构。对我们这里的目的而言,他的研究最有趣的就是,他坚持认为,在任何情欲敌对中,将两名敌手相联系的纽带和将敌手中任何一人与爱的对象相联系的纽带一样炽烈、有力;尽管经历、感受“敌对”的纽带及“爱”的纽带的方式不同,但这些纽带都同样有力,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是等同的。例如,伊阿发现,在不少例子中,对爱的对象的选择首先并不是由该对象的性质决定的,而是因为该对象已经成了那个已经被选为敌手的人的选择。实际上,伊阿似乎认为,在情欲三角中,和两名爱人中的任何一名与爱的对象之间的纽带相比,敌手之间的纽带甚至更强烈,对行动和选择具有更重的决定性。而且,在欧洲高雅文化以男性为中心的小说传统中,伊阿追溯的各种三角关系最经常的情况是,两名互为敌手的男性追逐

一名女性——他极为用心地去揭示的，正是男性之间的纽带。

伊阿著作的索引部分对“同性恋”本身只给了两次引用，而他的公式的力量，部分上恰恰在于，他不依赖于作为实体的“同性恋”是如何在特定历史时刻被感知或被经历的——说真的，他不依赖于什么可以或不可以视为与性有关。实际上，他的公式的对称性总是取决于压抑住关于哪些感觉可以或不可以成为身体的性(sexuality)的一部分的主观的、由历史决定的描述。但是，通过这种组织方式获得的跨历史的清晰性自然有其代价。心理分析、福柯近来的著作以及女性主义的历史研究都指出，在什么地方划出性与非性之间的界限，就像在什么地方划出两种性别领域之间的界限一样，是可变的，但不是随意的。也就是说(就像《飘》的例子显示的那样)，在特定社会里，界限放在哪里不仅影响了这些术语——即性/非性，男性特质/女性特质——本身的定义，而且也影响了并没有明显的性意味的权力形式的分配。这些权力形式包括对物资、人以及意义的生产、再生产手段的控制。因此，伊阿的描述(它认为自己描述了从男性/女性或性/非性的二分法抽象出来的权力辩证)在考虑上忽略了那些在每一个已知社会中实际决定权力分配的范畴。而且，由于根据这些二分法来分配权力不是，而且很可能也不能是对称的，因此，伊阿的三角帮助我们发现的那些隐藏的对称，反过来也总会揭示隐藏的倾斜。同时，仅仅只是记住伊阿式的对称那种隐约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拥有了历史衡量的一种图解式工具。这会让我们更容易感知和讨论这些文本中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和异性社会性欲望的共同铭记，以及对它们的抵制。

当然，伊阿的观点不仅极大依赖于一种出色的直觉(即认真对待公认的关于性的民间传说的智慧)，它还依赖于源自弗洛伊德的一种图解方法：俄狄浦斯式的三角，即这样一种情形——幼童面对强大的父亲和所爱的母亲时，试图找到自己的位置。弗洛伊德对“同性恋”的病因学讨论(现在的研究似乎认为它只是一套对“同性恋者”个人史的归纳，因而是有



问题的)<sup>[1]</sup>指出,成人中的同性恋或异性恋的产生源于对男女家长各方的欲望和认同的复杂机制:孩子通过母亲将其欲望/认同抒发出来,获得像父亲一样的角色,或是采取相反的路径。理查德·克莱恩(Richard Klein)将这种观点总结如下:

就像弗洛伊德在其诸如《有限分析和无限分析》(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 Analysis)等后期文章中愈来愈坚持的那样,在小男孩朝异性恋发展的正常进程中,他必须经过“正面的”俄狄浦斯阶段,与他的父亲产生同性欲望的认同,对父亲产生女性化了的屈从,以之作为找到他自己的异性恋角色榜样的条件。反过来,在这个理论中,男同性恋者的发展要求假设父亲的缺席或与父亲之间的距离,要求假设孩子与母亲存在不正常的强烈认同,在这种认同中,孩子取代了父亲的位置。这个模式下产生的是一种对两极性(polarities)的令人惊异的中和:男性中的异性恋倾向……将一个同性恋阶段假设为它的正常可能性的条件:反过来看,同性恋要求儿童经历一种强大的异性恋认同。<sup>[2]</sup>

我已经提到,伊阿的解读认为自己的对称没有受到诸如性别之类的差异造成的影响;尽管对他的看法影响最大的三角多半是欧洲传统中那些涉及到男性之间“因”一名女性产生的“敌对”纽带,但是,在他看来,任何敌对关系都是由竞争和认同的相同戏码架构的,不论这些占据了三角关系各个角的实体是男主角、女主角、神、书本,或是其他任何事物,都是如此。在形容俄狄浦斯式的戏码时,弗洛伊德最有名的惯常做法是把一名男性放到“儿童”的普通位置上,并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对待女性的案例,只是做了必要的改动;无论如何,在美国普通心理分析阐释的弗洛伊德理

---

[1] 关于这一点,请参见贝尔(Bell)等著的《性偏好:它在男人与女人中的发展》(*Sexual Preference: Its Development in Men and Women*)一书。

[2] 参见克莱恩对《法国文学中的同性恋》(*Homosexualities in French Literature*)一书的书评。

论中,当女性权力和男性权力在程度和种类上的巨大差异得以进入心理分析视野时,它们被视为一种结果,而没有被当作成长的家庭结构和心理内在结构的积极决定因子。因此,伊阿和弗洛伊德(至少是这个阐释传统下的弗洛伊德理论)都把情欲三角当作是对称的——即相对来说,其结构不太受到由改变某个参与者的性别而引入的权力差异的影响。

此外,我在引言第一部分谈到,在我们的社会里,性与非性的男性纽带之间的连续体常常被激烈打断,形成反差的是,女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之间的连续体相对平顺,容易感受得到。这种不对称可能有希望通过依赖于性别的手段来改变情欲三角的结构,这在弗洛伊德和伊阿的作品中都没有得到描述。也就是说,弗洛伊德和伊阿以柏拉图式的方法对待情欲三角,在同性社会性连续体中没有体察到不连续性——不论如何,起码没有体察到能造成较大差异的不连续性——即使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也是如此。从这个方面讲,这两种做法都具有勇气,但也有其历史盲点。

最近对弗洛伊德的重新阅读和重新阐释在考虑性别的不对称性上更进了一步。在法国,近来受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推动的心理分析话语将权力、语言和法(the Law)本身与阳物及“父亲的名字”等同起来。不用说,这样的话语有潜力把女性主义分析和恶意的厌女的分析都带动起来;不论如何,它都提供了工具,以心灵内部方式(俄狄浦斯式的冲突)及公共方式(语言和法)来描述父权机制,尽管这些工具(迄今为止)对历史还欠缺敏感。而且,通过将作为权力场所的阳物和实际解剖上的阴茎区分开来(无论这种区分有多彻底),<sup>[3]</sup>拉康的描述创造了一个空间,在里面,解剖性别(anatomic sex)和文化性别(cultural gender)可以彼此区别开来,同时,形成男人与男性权力之间关系的不同路径可以得到探寻(例如,从阶级的角度)。此外,它指出了谈论男性个人与男性统治的各项文化制度——这些制度被有用地列入表述(representation)这个类

---

[3] 关于这一点,请参见盖勒普,《女儿的诱惑:女性主义与心理分析》,第15—32页。

别——之间关系的方法。

拉康式的心理分析对我们的研究另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它微妙地表达了欲望和认同 (identification) 之间的含糊关系(这种关系在弗洛伊德那里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在我上面引用的段落中，理查德·克莱恩用勾勒性的优雅笔触总结了对女性的欲求所具有的女性化潜力以及对男性的屈从所具有的男性化潜力，这至少受益于拉康学说磨出来的透镜，通过它，弗洛伊德学说正在受到审视。在拉康和那些向他学到东西的人那里，对内摄 (introjection) 和合并 (incorporation) 的仔细思考在欲望和认同这两种明显不同的过程之间形成了联系。

美国女性主义者多萝西·迪纳斯坦和南西·乔多罗 (Nancy Chodorow) 的近作也修正了弗洛伊德理论，更多地关注性别/权力差异。科佩里亚·康 (Coppélia Kahn) 对他们观点的共同主题(她将其用于解读莎士比亚)作出如下概括：

在莎士比亚时代，弗洛伊德时代，或我们的时代，大多数儿童，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不仅是女人生的，也是女人养的。因此，在女孩对身分的发展认识以及男孩的这种认识之间，出现了重要不同。因为，尽管女孩和男孩一样，都经历了同样的共生结合、分开和个人化、认同，以及对客体的爱 (object love)，她的女性特质是在与一名同性之间的关系中出现的，而他的男性特质则是在与一名异性之间的关系中出现的。她的女性特质被她与母亲原本的共生结合加强，被与母亲那种必须先于身份出现的认同加强，而他的男性特质受到了同样的结合与同样的认同的威胁。尽管男孩的自我感始于与女性特质 (the feminine) 的结合，他的男性特质感 (sense of masculinity) 则是在与之产生的对抗中出现的。<sup>[4]</sup>

---

[4] 科佩里亚·康，《男人的产业：莎士比亚作品中的男性身分》(Man's Estate: Masculine Identity in Shakespeare)，第9—10页。

那么,从以上论述可以清楚看到,一方面,在女人和男人各自的性连续体之间,在男女各自的性与同性社会性之间,更显著的是,在男性的同性社会性对象选择和异性社会性对象选择之间,存在着多种彻底的不对称;另一方面,女性的地位,以及性别安排的整个问题,被深刻地、不可避免地铭刻在看似将妇女排除在外的结构之中——即使在男性同性社会性关系或同性恋关系中也是如此。海蒂·哈特门对父权的定义强调“男人之间的关系”(见引言第一部分),这使得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权力关系看似取决于男人之间的权力关系,说明了大型社会结构与男—男—女情欲三角相一致,而正是伊阿对这种三角作了最有力的描述,其他人对此也作了非常透彻的论述。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宣称在任何男性统治的社会里,男性同性社会性(包括同性恋)欲望与维持、传扬父权的结构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在一种内在的、具有潜在积极性的结构一致性之上。出于历史原因,这种特殊关系可能采取的形式有意识形态上的恐同、意识形态上的同性恋,或二者某种极为矛盾但又高度结构化的混合。(女性同性恋(lesbianism)也必须总是处于与父权的特殊关系之中,不过立场不同[有时相反],运作机制也不同。)

近来通过(或针对)涉及这些问题的传统学科提出的最有力的观点或许出现在人类学领域。除了弗洛伊德和拉康的作品之外,通过解读并批判列维·施特劳斯和恩格斯,盖尔·鲁宾在一篇很有影响力的文章中提出,可以通过交易妇女的某种形式对父权中心的异性恋做出最好描述:妇女的首要用途是作为可交换的——或许也是象征上的——财产,用于坚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纽带。例如,列维·施特劳斯写道,“构成婚姻整个交换关系不是建立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而是建立在两组男人之间,女性只是这场交易中的物件之一,而不是伴侣之一”。<sup>[5]</sup> 因此,

---

[5] 参见《亲缘关系的基本结构》(*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波士顿烽火[Beacon]出版公司,1969年版),第115页;引用于鲁宾,《交易妇女:关于性的政治经济学笔记》,第174页。

就像理查德·克莱恩描述下的弗洛伊德研究中的“异性恋者”一样，列维·施特劳斯笔下的规范性男人将一名女性用作“一个关系中的导管”，而在这个关系之中，他真正的伴侣是一个男人。<sup>〔6〕</sup> 鲁宾拒绝像列维·施特劳斯那样处理对女性的这种贬黜，而是提供了各种工具来对它进行详细说明和分析。

在她对同性恋与男性同性社会性纽带之间关系的讨论中，露丝·伊利格雷 (Luce Irigaray) 已经将列维·施特劳斯对交换女性的描述用来做出一个极具反响却也代价昂贵的标记。在她英译为《当货物集聚到一起》(When the Goods Get Together) 的文章中，她总结道，“[男性]同性恋是维护社会文化秩序的法律。同性恋则起到进行经济角色分配的作用”。<sup>〔7〕</sup> 将这种关系描述为具有——大概来说——言语 (*parole*) 与语言 (*langue*) 之间那种对称性，意义深长；如果说她在这里对它的使用尚不具历史回应性，但是，它还是有可能增强我们记录历史差异的能力。

奇怪的是，伊利格雷对男性同性恋的想象付出的代价正是对性本身的牺牲：结果是，这里讨论的男性“同性恋”可以代表任何东西，但却不代表男人之间实际的性行为，对她讨论的那种更大意义上的、“真正的”“同性恋”而言，这种性行为——虽然，很重要，它也被称为“同性恋”——具有的地位类似于列维·施特劳斯理解的亲缘关系中乱伦具有的那种恒定的、禁忌的地位。尽管伊利格雷柔软的意义机器具有将水银一般的性 (*sex*) 刺穿，然后升华的效应。

伊利格雷的理论中历时性的丧失也非常值得注意。近期的人类学，以及福柯、谢拉·罗伯萨姆 (Sheila Rowbotham)、杰弗里·威克斯 (Jeffrey Weeks)、阿兰·布雷 (Alan Bray)、K. J. 多弗、约翰·鲍思维尔 (John Boswell)、戴维·费恩巴赫 (David Fernbach) 及其他人的历史著作都指出，过去几个世纪里，在西方文化中，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性行为

〔6〕 鲁宾，《交易妇女：关于性的政治经济学笔记》。

〔7〕 伊利格雷，《当货物集聚到一起》，第 107—110 页。

## 男人之间

(genital activity)的激烈变化(随不同的文化又有不同)体现在它的频率、它的排他性、它的阶级联系、它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它的伦理地位、它对实施它的人的生活中非性的那些方面的决定程度,以及——或许也是最激烈的——在性别尚是权力的深刻决定因素的社会中,它与女性特质或男性特质的联系。对古代斯巴达人而言,男性欲望的同性恋性取向所代表的男子气概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对惠特曼而言似乎也是这样,就像是它在当代大众文化中代表的女人气是不言而喻的那样。对男性同性恋的起因及其持续经验而言,女性(不仅仅指“女性特质”[the feminine],也指真正的女人)的重要性似乎具有同等程度的历史不稳定性(随时间、阶级而改变)。这种重要性的变化与架构了性别不平等和阶级不平等的制度的变化是不可分的。

因此,拉康、乔多罗和迪纳斯坦、鲁宾、伊利格雷以及其他从他们各自的学术传统内部进行批评,提供了分析工具,在处理情欲三角时没有把它当成一种非历史的、柏拉图式的形式,一种从中减去了性别、语言、阶级和权力等历史偶然因子的死气沉沉的对称,而是把它当成一种敏感的记录器,目的正是为了详述权力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为了以生动的方式明白地展现欲望和认同的游戏——一个人通过这些游戏与他们所处的社会进行协商,从而获得权力。

## 第二章 恋爱中的天鹅：以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为例

“男人不是因为出现了倒错而女性化的，而是因为他堕入了情网。”

——巴特 (Barthes)〔1〕

为了阐明三角图例的灵活度和组织力(即使是在去历史化语境中)，我想大略看看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这些诗是构成本书框架的两个非小说文本之一(另一个是《草叶集》[*Leaves of Grass*])，而且，它们吸引我的原因很相似：在同性恋的(不止是同性社会性的)男性互文性(male intertextuality)的形成中，这两个文本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惠特曼”——比如，拜访惠特曼，喜欢惠特曼，送“惠特曼”式的礼物——当然是维多利亚式的同性恋习语，而且还不止这样，它还是资产阶级同性恋者这个维多利亚新阶层的许多成员的意识形成和自我形成的重要一步。〔2〕类似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在男性同性恋话语中已经成为一种可以移动的小数点(floating Decimal)；王尔德(Wilde)、纪德(Gide)、奥登(Auden)、

---

〔1〕 巴特，《爱人的话语：断片》(*A Lover's Discourse: Fragments*)，第14页。

〔2〕 关于这一点，请参见，比如说，威克斯的《现身：19世纪至当代英国的同性恋政治》(*Coming Out: Homosexual Politics in Britain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第52、57、68页；亦请参见本书结语。

帕索利尼 (Pasolini) 以及其他人对我们理解这些诗做出了贡献,而从那个传统之外写作的批评家已经被这些十四行诗强迫——几乎没有多少 1895 年前的文本可以这样——去面对这个传统的问题,说出它的名字,至少对这个主题作出实际假设。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与《草叶集》的不同在于它们的流行——姑且不要把它们当成是同性恋作品的流行——出现在它们发表的几个世纪之后,此时,时间已经将它们从原本的社会、情欲和叙事语境中抽离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这个传统是个将其从历史中乃至从实际情况中剥离出来解读的传统。关于它们是否成系列,它们于何时写成,是写给谁以及写给多少人的,有多少自传的成分,有多传统,为什么出版等问题,存在着无数众所周知的谜。对这个十四行诗系列的大多数读者而言,这种去语境化 (decontextualization) 似乎提供了一个许可,允许将这些十四行诗阐释为一个具有相对持续性的情欲叙事,该叙事得以通过一个最小的人物数量——在这里有四个人物,即诗人、一位肤色白皙的少年、一位身为情敌的诗人,以及黑肤女郎——而很有效率地完成。相应地,我将采用这个简化的阐释传统(事实上,这代表了我解读这些十四行诗的方式),这个传统允许我利用这些十四行诗以一种简单化形式——该形式的简单是由它的共时性和非历史性造成的——来阐明我认为可以通过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来追溯的某些模式。马克思警告过,在“发达的,或受到了阻碍的,或被夸张的形式”中,容易出现被历史地去语境化了的各种抽象;这一警告应该在一开始就显著地张贴出来。<sup>[3]</sup>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很好的注释性材料,因为在这些诗里,性三角的对称性和性别分配的不对称性都具有令人吃惊的清晰度。伊阿式的观点认为,诗中说话人对英俊少年和对黑肤女郎一样看重(在最后一组十四行诗里,他们是敌手);这也是莎士比亚的观点,而没有哪个批评家比这些诗

---

[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第 106 页。



中的诗人自己更沉迷于对称性带来的井然有序：

你拥有她，并不是我所有的悲伤，  
但仍可以说，我曾深爱过她；  
她拥有你，才是让我恸哭的主因，  
这个爱的丧失更真切地触动我。  
爱的罪人，我会这样来原谅你们：  
你爱她，是因为你知道我爱她，  
因为我的缘故，她如此糟践我，  
让我的朋友为了我而认可她。  
如果我失去你，我的丧失就是我爱人的收获，  
失去她，我的朋友则获得那个丧失；  
他们找到彼此，而我二者皆失，  
而为了我的缘故，他们让我独自承担……〔4〕

从这样一首十四行诗可以容易地看出，像穆雷·克里格(Murray Krieger)这样的批评家是如何可以坚持认为，爱的对象的性别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意义无关——至少从第1至第126首诗都是这样(这些诗通常被认为是写给一位男子的)。“考虑到(莎士比亚)谈论的新柏拉图式爱情的纯洁的特点……我必须坚持认为，不论真相是什么，我的论证都不会因之而改变。”〔5〕第42首十四行诗并不特别地具有新柏拉图式或柏拉图式的特征，但即使在这里，出于重新建立对称和平衡的理想模式的愿望，也显然彻底地在修辞上抹除了爱人之间、爱之间的“意外”(accidental)

---

〔4〕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Sonnets*)，第39页，第42首。以下的引用将被整合到论述中，并用所引诗歌的序号标志。

〔5〕 克里格，《通往批评的窗户：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与现代诗学》(*A Window to Criticism: Shakespeare's Sonnets and Modern Poetics*)，第80页。

## 男人之间

差异。

关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结构规则，另一个更有名的例子更能揭示这种剔透的对称性与性别差异的颠覆性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我有两个爱人，一个给人安慰，一个叫人绝望，  
都像精灵一样不停地将我诱惑；  
较好的那个天使，是个正直白皙的男人，  
较坏的精灵，是个黝黑的病态女人。  
为了让我速下地狱，我的女恶魔  
从我身边把好天使诱拐，  
要把我的圣人腐化成恶棍，  
用她污秽的傲慢招惹他的纯洁。  
我的天使是否会变成魔鬼，  
我心存怀疑，却不能直接判断，  
但两个都离我而去，成为彼此的朋友，  
我猜一个天使已身处另一个的地狱。  
但对此我永远无法知晓，只能活在疑虑中，  
直到我的坏天使把好的那个赶走。（第 144 首）

这首十四行诗创造了一个系列对子，它们在句法上可以视为总是相等或正好相反：

1 号爱人	2 号爱人
安慰	绝望
较好	较坏
<b>男人</b>	<b>女人</b>
正直白皙	黝黑病态

## 第二章 恋爱中的天鹅：以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为例

天使	恶魔
圣人	恶棍
纯洁	污秽的傲慢
天使	魔鬼
1号爱人离我而去	2号爱人离我而去
1号朋友	2号朋友
.....	.....

这样看来，这里主要的句法结构是高度对称的。然而，即使是上面这个清单（它从这首诗的前九行提出，而且在后面五行中更为强烈）里，语义上的差异在这首十四行诗的句法形式上打转，最终冲破了这种形式。到最后，即使是句法上的对称也消失了：这个女人已经控制了三个主动动词，而这个男人只拥有一个被动动词；更重要的是，这个女人拥有一个属性（一个“地狱”），对此，在句法上并不很清楚那个男人是否也拥有相应的属性。

当然，从语义上说，对男人和女人的评价上的不平等被暴露得清清楚楚。除了价值的强烈对立（简单说，即好与坏的对比）之外，权力与能量之间还有着与此相关的不对称。诗中的女人是那个欲求着并行动着的人物；而诗中的男人至多只具有抵抗的潜力。诗中还暗示了，这个三角上由点到点只有一个单向路径：天使可能变成魔鬼，但它并没有说魔鬼可能变成天使。这两个精灵本来应该是对应的，但整个情节似乎只依赖于其中一个精灵的主动性。

再一次，“地狱”这个问题是很含糊的。它第一次出现在第五行，在这里，我们做好准备，以面对赫丘利式的选择\*：两个精灵，一边一个，诱惑着诗中的说话人——是去地狱？还是去天堂？但也正是在这儿，这首诗

---

\* 赫丘利（Hercules），即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Heracles），是罗马神话中的大力士。在面对苦行与享乐的选择之时，他选择了前者。——译者注

有望获得的对称性开始脱出轨道：(1)它没有提到天堂，那个好天使也没有来主动追求。（这就把我们往回推，让我们注意到，对这个场面中的“好天使”而言，提供“安慰”毕竟只是一个间接的、没有动力的功能。）(2)更具颠覆性的是，那个坏精灵太狡猾，或者说，太没有耐性，因而没有把那个好天使卷入到一场争夺说话人的剧烈而对称的拔河赛中，而是决定先去教唆好天使。在诗的剩下部分里，她完全忽视了诗人。实际上，这首诗在第五行之后的样子很关键地呈现了重新安排后的场面：好天使占据了中间的、赫丘利式的地点，他的一边是坏精灵在唆使，另一边则是诗人——他惊呆了，但也心怀最好的希望。按照假设，被省掉了的、坏精灵脑海中的最后场景应该具有总结式的不对称：好天使变成了魔鬼，而两者都在同一边与诗人拔河，笃定要赢过他。另一方面，到第14行时，每个人似乎都忘了这一点。诗人进入天堂的可能性（或者可以说是诗人的命运，甚至是诗人的中心性的问题）从诗里蒸发了，对这一情况的冷静处理可谓非凡；显然，与对这两个精灵的怀疑相比，这才是让这首诗更加令人不安、令人感动的真正原因。

到第12行时，关于“地狱”的对称性的问题，不在于好天使是否拥有天堂来与魔鬼的地狱竞争，而在于好天使自己是否拥有一个地狱：在前一句诗中出现的对称的对称性（symmetrical symmetries）之后，“我猜一个天使已身处另一个的地狱”可能就变得不确定。当然，确定性可能只是语义上的，这取决于一个人是把“地狱”概括地解读为沉溺情欲而带来的折磨（这可能与任何一方有关），还是直接解读为阴道（这必须与坏精灵有关）。最后一句诗显然解决了讨论的究竟是谁的地狱的问题，而且至少也将如何阐释“地狱”的问题往阴道的方向引导。

如果我们现在不再把这首十四行诗的问题抽象为“对称”和“不对称”，那我们会发现什么？我们会看到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进行的特征分配，这其中，女人发现，与她的女人特点（femaleness）放到一起的是一种压倒性的、末世论的负面道德衡量，一种对主动性、欲望和权力的垄

断，一种句法与用词的选择，它暗示说，她是容器，而其他则人被容纳的东西。作为用来对付女人特点的手段，将负面道德衡量与负（凹面）空间相联系并不奇怪；将男性的负面衡量与主动的女性欲望相联系也不令人惊异。但是，那个“地狱的”饥饿是间接的、未经形容的，应该是一个除那个女人外还包括了两个男人的领域之中唯一的主动力量——这种看法很独特，而且，从后浪漫主义（post-Romantic）的观点来看，让人吃惊。（比如，巴特在对人们普通接受的观点所做的有用概要中，将妇女与缺席相联系，但这也是因为他认为她有被动性：“女人是忠实的（她等待），男人是薄情的[他远航，他遨游]。是女人[Woman\*]让缺席有了形状，详述了它的虚构性，因为她有时间这样做。”〔6〕如果把黑肤女郎与具体的、多余的、资产阶级的永恒女性特质[Eternal Feminine]相联系，就把时代弄错了。）

与这名女性配对/对立的男性至多拥有一个特点（如果“白皙”（fair）在这里除了“浅肤色”之外还有美丽的意思的话\*\*），而且没有活力。就这首十四行诗所呈现的而言，甚至被“诱惑”或被“腐蚀”对他似乎都不是一种动态的内在过程；他似乎是以一种迟钝的、单一的、单纯的方式，要么是天使，要么是魔鬼，要么在地狱中，要么在地狱外。

第二个男人是这个三角中的第三个成员，句法上，他没有被配对，以第一人称出现，并与另两个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共性。就像那个坏精灵一样，他实际上是主动动词的主语，是事件发生的地点，而不仅仅是对象。另一方面，这些动词并不是非常主动——它们不是关于知晓，而是关于不知晓的动词。叙述者有意识，而且自我分裂，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和“我的女恶魔”有着一样的欲望，但他（作为被动的客体、作为男性）被更紧密地等同于“我的圣人”。

---

\* 该词在这里以大写开头 ——译者注

〔6〕 巴特，《爱人的话语：断片》，第14页。

\*\* Fair 一词既有“白皙”之意，又有“美丽”之意。——译者注

## 男人之间

那么,这里的基本组合包括了一个风格化了的女人(a stylized female),她作为行动的主体而不是思想的主体来发挥作用;还包括了一个风格化了的男人(a stylized male),他作为单纯的客体发挥作用;也包括了一个风格化程度较低的男性说话者,他作为思想的主体而不是行动的主体来发挥作用。这个构型可能不具有常识性,但它正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特征,而且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也一再出现。在这里,吸引我的不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将厌女(misogyny)和恐女心理(gynophobia)记录并主题化时体现的那种破坏性的透彻性,而是这是如何对抗各种男性纽带,以及说话者是如何计划性地维系对称性的。

说真的,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我们面临的是两种可能的坚固对称。我就第144首十四行诗讨论过——并且我们还要回头再讨论——的那种,是作为说话者欲望对象的白皙青年和黑肤女郎之间被坚持并被颠覆的对称。这种对称最有力地呈现于那些与他们的三角爱恋直接相关的诗里,但致青年一个人的早期十四行诗与致女郎的晚期十四行诗之间的对比,也说明了这种对称。另一种对称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被放大到了几不可见的地步,它处于两组诗之间:第一组中,说话者请求白皙青年结束他的单身生活,进入异性恋世界;在最后一组中,说话者陷入白皙青年与说话者的情妇之间的异性恋造成的折磨中。在什么程度上诗人/青年/女郎的最终组合给第一组诗中诗人对白皙青年的要求提供了一个有反响的答案——即使这个答案是残忍、反讽,或是准确的?

要把诗人在这些早期十四行诗中为青年规定的异性恋叠加到后期十四行诗中青年和女郎用于折磨诗人的异性恋之上,颇具难度,而这种难度部分在于,第一组十四行诗中,引人注意地几乎完全没有提到女人;女人仅仅是男人用来繁殖更多男人、满足其他男人的手段:

## 第二章 恋爱中的天鹅：以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为例

为了我的爱，请给你制造另一个自我，  
让那种美仍能活在它或你身上。

（第 10 首）

女人大多是作为潜在障碍而被引介到这些早期十四行诗中的，然后又被轻描淡写地抛弃：

哪里有那么美丽的女人——她未开发的子宫  
会蔑视你的耕种？

（第 3 首）

是否因为害怕濡湿寡妇的眼  
你才单身耗尽自己？  
啊，如果你无儿无女突然死去，  
世界会像丧偶的妻子，为你哭泣。

（第 9 首）

总的来说，在白皙青年身上注入社会化了的异性恋身分的工程，是严格在男性关系和男性教唆之下进行的。如果要就青年对女性的态度作任何假设，这种态度就是漠然，或者也可能是主动排斥，正如第 8 首十四行诗提示的那样：

如果调好的声音的真正和谐，  
以及协调的结合，真的冒犯了你的耳朵，  
它们只不过甜蜜地责备你，不该把  
你应承担的和弦幽禁在独奏中。

## 男人之间

（“你独身将什么也不是，”这首诗总结道，预示了第136首诗中的“无人”和“无事”，其意思与高中男生的残忍公理“要么使用它，要么失去它”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对女人的欲望乃至掌控似乎都不是直接问题；关键在于保持一个现有主流文化的持续性。

这些早期十四行诗的论争性轨迹经由异性恋、男人气（the manly），朝着同性社会性欲望或男人问题发展。真实的女性是如此远离意识的中心，以至于即使是相对于男性而言而具有女人味，也并不十分危险。第20首十四行诗以这样的名句开始：

你有女人的脸，被自然之手  
描摹，你是我的激情的情郎与情妇——

在这些早期十四行诗构成的语境中，这首诗似乎是异性恋化运动的一部分。说话者似乎在说，你可以拥有女人而还是继续爱我：

你的爱属于我，却让她们享用。

即使说话者表面上否认对青年有任何主动的肉体性行为的兴趣，在这首诗里，这种否认也暗示了一种轻松的含糊：男孩的阴茎“对我的目的而言，什么都不是”；但是，就像在其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那样，“什么都不是”（nothing）所指代的众多事物中包括了女性的性器官。（我提出这一点并不是为了宣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认为这些男人之间有身体上的性关系；以我的理解所能达到的境界来看，那个时代的性语境对我们而言太难复原，我们不可能理清纠结在一起的吹嘘、告白、弦外之音、言外之意、玩笑、不可想象的东西、想当然的东西、不可言说却又经常做的事，等等。）可以断言的是，出于某种原因，这首诗里的说话者可以在男女的性互换性（sexual interchangeability）问题上做到放松、文雅（在一个可能没有打算



公开的文本中)——只要他说话的对象是一名男性。而且,这种文化之外的读者会发现,男性之间的这种密切的界限很难体察,这种密切似乎是在异性恋社会化的劝说性语境中不成问题地发生的。

我坚持把这些关于白皙青年的十四行诗称为是异性恋的——这可能需要更多解释。一个具有常识的读者会问,如果这些都是异性恋的,那么,究竟需要怎样才能成为同性恋的呢?所需之一是文化语境,在这个语境中,同性恋是针对异性恋来定义的。我的观点显然不是要否认或低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男人之间的爱,不是要否认或低估用来形容这种爱的热烈的而且常常是具有性爱导向的语言,或者甚至去否认被描述的这种爱已经以性的方式实现的可能性。我也不是想说,说话者与他的男性爱人之间的纽带没有他与被欲求的女人之间的纽带那么强烈、那么中心,或是说伦理价值明显更低。然而,我所说的是,在这些十四行诗勾勒出来的世界中,在诸如同性恋(不论如何命名)与异性恋这样的两个制度之间,没有平等的对立或选择。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呈现了一种男性之间的爱,它就像古希腊的男性之间的爱一样,牢固地立足于通过女性而实施的制度化了的社会关系结构中:婚姻、姓名、家庭、对祖先及子孙的忠实等,都取决于那名青年要以特定方式利用女性,这种利用在抽象上没有被视为妨碍、否定或贬低了对他与说话者之间的纽带。

另一方面,当我们从早期诗作中的异性恋转向晚期诗作中的异性恋时,我们发现了威胁和混乱。最显著的区别就是,这后一种是包括了女性的异性恋。(确切地说,它包括了一名女性;这个被聚焦的系列中,这个世界会通过一个包含了女性之间关系的框架呈现出怎样的区别的问题是无需讨论的。)正如我们在“我有两个爱人”中看到的那样,称一名女性在场并不是说她的视角得到了表达,不是说我们可以知晓她的一切,或是说她是一个意识主体——虽然她确实是行动的主体。(我们很容易会忽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极少将女郎——同样的,还有青年——作为角色来呈现,

而读者视角的这种失败是因为一个特别原因而发生的：19世纪以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最常被当作小说来读，但是这部小说认为自己的主要角色是可知的。因此，奥斯卡·王尔德自由地将自己作为作者的洞察力延展到了说话者身上，并向女郎的方向延伸，好像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来认识他们：比如，他很自信地认为，理查德·博毕奇（Richard Burbage）“不是可以吸引她的那种男人”。〔7〕可能只有受过普鲁斯特小说教育的读者才能恢复欲望想象的那种基本偏好（这与詹姆斯小说中单纯的视角游戏不同）——这对于小说产生之前那些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作为抒情诗来阅读的读者来说是很自然的。大多数时候，黑肤女郎仅被感受为一双眼睛或阴道，但即使是以这样破碎的形式，她都打破了早前对异性恋的想象，在这个想象中，它主要指代的是男性之间一个父子传承连续性的广阔通道。一个真正的女性突然冲进这个场景，与这个入侵巧合的是儿童——即微型的父亲——的消失，而儿童本应是那些早期十四行诗中性结合的目的；而且，同样巧合的是，敦促青年好好维护父权家庭大厦的文辞也消失了。

正如我们看到的，成功地将女性遮蔽了的异性恋在面对男人的女性化（相对于另一个男人而言）时，受到的威胁也相对较小。然而，在一个包括了女性的框架中变得女性化或遭受性别混乱，会十分可怕；而且，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任何涉及真实女性的性关系都会威胁男人的男性特点。情欲（lust）本身（在这个语境下指的是对女性的欲求）是剥夺男性的自我身分的机器（见第129首）。

将一个女人包括在内不仅改变了异性恋关系，而且也特别改变了同性社会性关系。说话者与白皙青年的早期关系就像他晚期与黑肤女郎的关系一样，因为在这些关系中，他都能通过爱人而与其他男人交流。每一段爱都将其男性主体带入与其他男性的关系中去，但这种关系可能坚固

---

〔7〕 王尔德，《道连·格雷的画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第68页。

或颠覆这个主体的地位。

即便就黑肤女郎而言，这种就与别的男人分享性领域的回应，或许是出乎意料地——即使也是短暂地——兴奋。这是一种参与到高于个人的男性统治女性的权力中去的方式，可以让人靠近拥有更完整特权的男性。有两首前后出现的十四行诗为对这种兴奋的机制及其面对的内在威胁提供了特别重要的例子。

不论谁让她如愿，你都会满足你的愿望\*，  
超出你所需的愿望，过剩的愿望；  
多余的我总要来烦扰你，  
以增加你甜蜜的愿望。  
你的愿望博大开阔，难道你  
一次都不愿把我的愿望收容在你的愿望中？  
是否他人的愿望看起来正确、得体，  
而我的愿望却无法博你青眼？  
海洋，满承了水，却仍然广接雨水，  
让他的储备满上加满；  
因此，在你丰富的愿望上加上  
我的一个愿望，让你的愿望大上加大大。  
不要让无情的拒绝扼杀乞求者；  
把所有的愿望当成同一个，而我就在那一个大愿里。  
如果因为我靠得太近你的灵魂制止了你，  
请向你的灵魂发誓说，我是你的愿望[威尔]，

---

\* 愿望(will)一词也是诗中说话人的年轻朋友威尔(Will)的名字，而说话者也称威尔；此外，它还可以用做将来时态的助动词，同时还有着强烈的性意味。莎士比亚此处有意做文字游戏——参见下文对该词多重意义的讨论。此句(thou hast thy will)也有“你就会拥有你的威尔”之意。——译者注

## 男人之间

你的灵魂熟知的愿望[威尔]在这里得到承认；  
因此，请为了爱而让我对爱的追求甜蜜如愿。  
愿望[威尔]会填满你爱的宝藏，  
是啊，请用愿望[威尔]填满它，我的愿望[威尔]是其中之一。  
我们很容易证明，对容量巨大的东西而言，  
增加一个不算什么。  
那么，就让我悄悄混迹其中，  
尽管在你的储存清单中，我总是其中一笔，  
我什么都不是，但请你把  
这什么都不是的我，当成甜蜜的东西对待。  
让我的名字成为你的爱，不渝地爱它，  
而这就是你对我的爱，因为我的名字叫威尔[愿望]。

(第 135、136 首)

这些诗里可爱的、男孩气的说话者(“多余的我总要来烦扰你”)似乎感到越多越快；仅仅是基于她不会知道你在这儿才来追求你的做法，是种侮辱，但也很有趣。(即使不将这种做法归因于滥情，也是种侮辱，这种侮辱源于某些女性可能也会觉得有吸引力的意象：即，女性情欲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交熔炉，从容地容纳了各种生灵——它是通过单纯的不在意而接纳它们的。)在“我有两个爱人”这首诗里(它是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典型)，性快感似乎是某种只属于女性的东西，而在这些淫褻的、令人愉悦的诗里，很奇怪的是，似乎没有谁能够感受到任何特别的性意味，至少直到第 136 首诗最后四行都是这样：那些男人，或者，他们的“愿望/威尔们”(“wills”)，似乎被降低到矮子的比例，几乎成了遨游在温暖的但对什么都不留心的海里的浮游生物。我们的“威尔/愿望”(Will)给自己允诺了哪些快感？是隐藏的快感，或是更令人愉悦的被隐藏的快感(这是蹒跚学步的小孩的快乐)；更重要、且也是更有成人意味的，是把他的名字(威尔)交

给一个女人(或女人的一部分)而带来的快感;是那种被误认为是在女人身上具有某些所有权的男人或男人们的快感;或许也是被误认为是一个更年轻、更有活力的男性的那种快感;总的来说,是种融合的快感,这首先不是与起接受作用的女人而是与其他被接受的男人的融合(“把所有的愿望/威尔当成同一个,而我就在那一个大愿/威尔里”)。这里的这个男人严肃地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全部柔情蜜意滚成一个球。

当然,我的观点不是说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同性恋(这就会是种时代错误),而是(冒着时代错误的危险)认为,我们面对的是男性的异性恋欲望,它采取了这样的形式:欲望试图在女性身体上并通过这些身体而与权威男性建立起牢固的伙伴关系。

但是,异性恋欲望的通路从来都不简单。在第14行中俏皮快乐的一刻出现了危险,而且不会被哄走。这两首十四行诗之后的那首诗是这个系列中最苦涩的,虽然强烈的主题关联将它与那些更欢快的诗联系在一起。在这些“愿望(will)”诗篇中,我们怎样才能追踪到潜在的灾难以及灾难的新生形式?

宣称妒嫉在等候中潜伏,太没有解释力。暂时回避修辞问题可能会更有用。请注意,第135、136首诗的种种快感中,包含了对说出生殖器官名称的满足,包含了这些猥亵的委婉说法的古怪用法。斯蒂芬·布斯(Stephen Booth)提供了证明,指出这些音节被其他作家用来表达同样的意思(等同于它所不是的意思),但要理解“will”一词的用法(姑且以此为例),博学是不必要的。这种荒诞的重复(第135首诗中有14个“will”)揭示了整个故事:它必须指向一种双关(double entendre),而双关从定义上讲,不能只意味着一种事物。但这种双关意味着太多的东西;它指代至少一个,或是两个,而且可能是三个此处牵涉到的男人;它是一个将来时态的助动词;它是一个用来(大略)表示欲望的普通名词;它表示阴茎;它表示阴道。它的性别意义远不是中性的,而就像其显示出来的那样,是狂野地、危险地散布开来的。

这首诗对“will”一词的处理上，似乎最惊人的就是将这个词的用法（实际上，将其主要意思）延伸到了女性生殖器官，尤其是因为它在这个特定舞台的首要意思本应是一个男性的名字，即诗人自己的或可能是他的爱人的名字。为什么他要这么做？第136首诗中生殖器官名称的性别也同样闪烁不定。布斯给第20首十四行诗中的“nothing”作了这样的注释：“（1）无价值；（2）无物（no-thing），一种非物（non-thing）。‘nothing’与‘零’（naught）常常被用作‘阴户’的隐语（可能是因为阴户的形狀像零）”（第164页）。说话者在一瞬间充满自信，因而对否定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愿意（因为特权）“不算什么”（reckoned none）——“我什么都不是”，只要你把“这什么都不是的我，当成甜蜜的东西对待”。这后一个“什么都不是”（nothing），即被呈“给你”的东西，似乎很清楚是阴茎；实际上，在这两首诗中，这些是听起来最像描述实际的生殖器感觉的诗句，与黑肤女郎的“愿望”（will）那巨大的、分散的普遍性相反。但说话者知觉上的“什么都不是”几乎可以算是女性器官或无物（no-thing）。黑肤女郎得到他而获得的快感最终需要被隐藏起来，不是由她在其他某个名叫威尔的人身上得到的快感来隐藏，而是被她握有自己的性器官得到的快感来隐藏——因为“我什么都不是”。类似地，在这个对句中，“爱”在难分性别的性器官的名称链中占据了自己的位置。“让我的名字成为你的爱，”诗人这样建议，并指出它是哪个名字：威尔，即阴道/阴茎。（如果他关注自己的另一个名字，性别的模糊性就会过度平衡。）“不渝地爱它，/而这就是你对我的爱……”

在这些诗篇中，将自慰的快感赋予女性是不寻常的——我会说，不寻常地温良，不寻常地情意相通。而寻常的是其节律，在这样的节律下，说话者投入异性恋的冒险生涯，他期待着确定他与其他男人的认同，相反却发现自己意外地陷人与那个女人之间的身分混淆之中（而非与她的认同）。性快感——它与虚张声势和玩笑性的侮辱相反——进入诗歌的那一刻，也正是说话者冒着被当作“什么都不是”的东西的危险时刻；因为他

把自己的名字给了那位女人的“爱人”，所以这也是这个名字本身被女性化的时刻。接下来的那首十四行诗以这样激烈的恳请开始：

你这盲目的愚爱，你对我的眼睛做了什么，  
让它们视而不见？  
它们知道美是什么，看得到它在哪里，  
但却把最坏的东西错认作最好的东西。

（第 137 首；粗体是我自己做的强调）

莱斯利·费德勒（Leslie Fiedler）在讨论莎士比亚诗歌中一些紧密相关的问题时，出色地运用了奥维德（Ovid）对赫马弗罗狄忒斯（Hermaphroditus）的处理方式——这个男人从女人那里逃走，跳入塘中，变成半男半女。他下的诅咒是：

……啊，父亲和母亲，赐予我这样的情况！  
让每个从今以后  
跳入这塘中的人，成为半男出现，经由  
这恶水的触碰而变得孱弱！〔8〕

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让这种变化发生的池塘是女性地狱（the female Hell）。在这个世界中，只有女性拥有让男人变得不那么男人的力量。同时，要做彻底的男人就必须获得把女人当成工具利用的方法，并冒着被她转化的危险。

通过对一名男性爱人的竞争而与别的男性情敌发生接触，与为了那位黑肤女郎而产生的种种敌对关系具有类似结构，但前者的危险性要小

---

〔8〕 费德勒，《莎士比亚作品中的陌生人》（*The Stranger in Shakespeare*），第 25—26 页。

## 男人之间

得多。让那位“博大开阔”的女郎把她所有的情人“当成同一个，而我就在那一个里”是可能的，类似地，白皙青年那里也是精英们相会的地方。“爱的所有可爱成分”，“我消失了的爱人们的纪念品”，在白皙青年身上以“吊挂”、“埋葬”、“隐藏”的方式留存；

我曾爱过的他们的样子，现在在你身上看到，  
而你，以及他们所有人，拥有我的一切。

（第 31 首）

因为这位青年具有力量来吸引、集中其他男人的爱，他的价值增加了；一个男人拥有“让每只眼睛驻留的可爱凝视”（第 5 首），是诱惑的，而不是罪恶的。然而，在“威尔”诗篇之后出现的灾难性结局中，第 137 首里关于黑肤女郎的那些充满恨意的句子以诅咒和被诅咒的方式回应了那无动于衷的“让每只眼睛驻留的可爱凝视”：

如果双眼被偏袒腐蚀  
停泊在所有男人驻留的港湾，  
为何你用眼睛的虚幻铸造出钩子，  
牵扯住我的心的判断？  
为何明知是广阔世界的共有之地，  
我的心还是会把它当成私人地盘？

当然，“所有男人驻留的港湾”正是对第 135 首中男性生殖群落的充满不安的转化。（“海洋，满承了水，却仍然广接雨水，/让他的储备满上加满；/因此，在你丰富的愿望上……）一个更谦卑的、不那么歇斯底里的水手身分被用来形容青年以及他与敌手诗人之间的关系。



……因为你的价值，像海洋一样宽广，  
不论是谦卑小舟，还是最骄傲的帆船，都同样承载，  
我的蛮撞的桅船，远比他的低级，  
也率性出现在你的广阔水面上。  
你最小的帮助都能支持我飘浮，  
而他则无声地航行在你的深水之上；  
或者，失事毁坏的我，是只无用的船，  
而他身形高大，优美骄傲。

（第 80 首）

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说话者从未表达过对白皙青年的妒嫉（在黑肤女郎出现之前的诗篇里），以对应他对黑肤女郎表达的妒嫉。正像爱人如海洋的暗喻例子所表达的，这两个爱人之间在主题上和类别上的呼应非常完整。庆祝、忧虑、指责、自我折磨、史诗般的明喻等等对应场合，都出现在这两个关系里，而这种对应被编织到最后这个三角的深具威胁性的统一体中。但是，大体来说，这种处理中的情感差异、结构差异和风格差异几乎足以掩盖主题上的对应。

让我以青年与女郎身上的自我分裂（self-division）和自我身分（self-identity）问题为例——因为这个例子在性别问题上特别有趣。如果说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对此揭示了任何“事实性”的东西的话，那么它们指出的是，青年和女郎都有欺骗说话者的能力，而他至少有时怀疑过他们俩每人都这么做过。然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竭尽所能，将青年处理为在道德上坚如磐石；而女郎的定义本身似乎就意味着两面性与欺骗。为了围绕本质上相似的因子描绘出不同画面，变化的是说话者的位置——他的自我定义。

在致白皙青年的诗篇里，存在着许多不和谐、二重性和自我分裂，但它们都被描写为是处于青年自身之外的，而且，只要可能，就被认为是来自说

## 男人之间

话者自身内部。青年的欺骗行为与他自己之间的关系如同云彩——至多是日食——与太阳之间的关系；但它们对说话者的影响就是，为了解解并原谅想象上更单纯的、具有田园气质的青年，说话者与自己分裂了，

用比较来理解你的罪过，  
让我自己堕落以开脱你的罪责，  
原宥你不可原宥的罪恶；  
我用理智对待你肉欲的错误——  
你的对手变成了你的支持者——  
我攻击自己来为你辩护。

（第 35 首）

那些污点将留在我身上，  
无须你的帮助，我将独自承担。

（第 36 首）

为了对抗(你不再爱我)的那一天，我安身于此  
清楚自己(对你)的无足轻重，  
把手高高举起，做于己不利的证词，  
保卫你的种种合法理由——

（第 49 首）

当你打算将我轻看，  
用蔑视的眼光打量我的德行，  
我会站在你那边与自己战斗，  
证明你的美德，尽管你已背弃信义。

（第 88 首）

第二章 恋爱中的天鹅：以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为例

说你是因为我的过错而抛弃我，  
我会对这冒犯加以说明。  
说我是瘸子，我将不再把脚伸直……

（第 89 首）

心中盛满你，再也容不下别的，  
我最真实的心意让我的眼睛透出虚假。

（第 113 首）

青年的不可分性可能会显得十分险恶：如果他要背叛说话者的话，是无法被发觉的：

因为恨意无法在你的眼里存活，  
因此我无法由此知晓你的改变。  
在很多人的面貌上，虚情假意的历史  
书写在奇怪的情绪、蹙额、皱纹里；  
但上天在创造你时做了规定，  
让甜蜜爱意永远驻留在你脸上，  
不论你的想法或你的心意如何，  
你的面容除了甜蜜以外，不会透露任何事情。

（第 93 首）

第 94 首十四行诗出名地难懂，诸如“它们有伤害的力量，而不会去做”之类的难点至少可以部分地追溯到青年（表面上）如磐石般的坚固与他对爱他的男人产生的自我分裂效应之间的互动。当青年真的变化时，一个专横的、惩罚性的外在动因——即时间——就被引入，以造成改变。

这一切与说话者对黑肤女郎的处理非常不同，但作为一种对女性说

## 男人之间

话——将女性客体化——的风格，这具有古怪的熟悉感。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将白皙青年作为阅历不深的人，作为理智和道德尚未形成，并在本质上尚未成为人的（prehuman）生灵来呈现，对这样的生灵是无法抵抗、无法理解、无法责备的。就像玛丽莲·梦露一样，青年让看着他的那个男人觉得自己老了、残坏了、要负责任，虽然这个人正享受着（被许诺的）青春和沉着。说话者设下的对认知的分工十分清楚：你是性感，我是理性；你是动物的随性、甜蜜和真实，我是成人的罪恶、自我颠覆和矛盾。这种分工的必然结果就是，你可以对我做任何事——拒绝我、折磨我、消耗我、让我疯狂——任何事，除了不能让我惊奇。因为，在说话者对青年的态度中（你所能对我做的任何事，我都会做得更狠），有一种强烈的预期中的自我保护，这是与普鲁斯特书中的恋人们最相关的地方，也是防止白皙青年本身变得可见的要素之一。说话者对爱的最好的（不论如何，最具特征的）表达就是事先预防不忠，或是预防青年无法提供证据的一种悔恨：

我死的时候不要对我哀悼  
那一刻你会听到阴沉不乐的丧钟……  
不，如果你读到这诗句，不要记起  
写下它的手，因为我如此爱你  
我要你在甜蜜的思绪里把我忘却，  
如果念起我会让你悲伤。

（第 71 首）

我死后，亲爱的爱人，忘掉我……

（第 72 首）

不要再为你做过的事悲哀……

（第 35 首）

## 第二章 恋爱中的天鹅：以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为例

带走我所有的爱，我的爱人，是的，将它们都带走……

（第 40 首）

老天让我成为你的奴隶，就不让

我试图在思绪里控制你的快乐时光……

（第 58 首）

青年的变化、不忠、不安、自我分裂、隐藏动机，是如此全面地被他的崇拜者所预期并人格化——目的是将爱人作为（说话者知道的）无人能达到的单纯和忠诚的形象保留起来——以至于青年自己的形象被压扁，而且几乎被抹去了。读者们对青年的直觉猜测跨度很大：一名读者眼中的阿齐比阿底斯（Alcibiades）是另一名读者眼中的埃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爵爷（Lord Alfred Douglas）。\*

认为说话者在修辞上将青年作为沉默的金发美人并不等于说青年在这些诗篇中被女性化了。正好相反，这是要强调，即使是最具影响的压迫性女性形象也具有何等的历史偶然性：玛丽莲·梦露、海蒂·索罗尔（Hetty Sorrel）、贝拉·威夫（Bela Wifer），甚至是弥尔顿笔下的夏娃，都不是莎士比亚笔下具有破坏性或诱惑性的女人群像的一部分。（如果说有的话，作为“女人脸”的白皙青年是被作为具有夸张的阳物特征来呈现的——单一、直接、不具反思性、粉红色，而且密实。）该青年有其女人似的特征，但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完全形态下，他正是男性特征（maleness）的标准：他代表着作为纯粹客体的男性特质（the masculine）。实际上，如果说自我分裂被视为总是由他那儿转移，然后在说话者那里安家，那么，在这个语境下，被表现得更具女性特质的正是说话者。

因为，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具有传染性的自我分裂似乎定义了女

---

\* 阿齐比阿底斯是古希腊的政治家；埃尔弗雷德·道格拉斯（1870—1945）是活跃于 20 世纪初的英国作家，也是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情人。——译者注

## 男人之间

性特质——或者，更简略地说，似乎是“假的瘟疫”，意思是假性(falseness)这种瘟疫。这里的悖论是把黑肤女人感受为白皙(这个双关构成了至少十首有关黑肤女郎的诗篇中的谜题，除此之外它就不太具有别的说明意义)；对这个悖论的坚持——这种坚持具有出奇的放大作用——显示，从某种无法轻易表达出来的方面看，做一名女人就已经构成一种矛盾的好斗性，而去爱或欲求一个女人就是用同样一把凿子来制造分裂。

我的思绪和我的话语就像疯子的一般，

随意偏离了被徒劳表达出来的真理：

因为我发誓说你白皙美丽，并认为你明媚照人，

但实际上你如地狱般黝黑，如夜晚般暗沉。

(第 147 首)

这里暗含的类比是：白皙(fair)—黝黑(dark)；干净(fair)—污秽(foul)，这一方面把污秽与传染病联系起来，另一方面把黝黑与地狱及女性生殖器联系起来，产生了一个集群，其中包括了那个女人的深肤色，它被感知为白暂时产生的“虚假”，她在性方面的滥交(一种对虚假的传染)，以及说话者从自身那里的异化(另一种对虚假的传染)。

在与白皙青年的关系中，说话者的心理策略就是主动地吸收青年身上任何自我分裂造成的冲击；因为，让青年“白皙/美丽”就是让他统一、稳定，认为他“白皙/美丽”的那个人，则成了代价。与黑肤女郎的关系并没有完全不同；但在这个例子里，自我分裂被视为本来就是她身上的，是以一种说话者无法施加控制的方式传达到他身上的。说话者实施的预期的原宥，以及通过自我背叛来预防背叛，都适用于这个男人而不适用于这个女人；相反，说话者变得歇斯底里，被简化成了他的抵抗的声音以及他对她充满恨意的俯首称臣。

一种解读男男纽带与男女纽带之间差异的有用方式似乎是：男男纽带中暗含的张力是以空间方式形成的（你是这样，我是那样），因而被想象为是稳定的；而男女纽带之间的张力则是以时间方式形成的（如你一般，我也会这样），因而显然是不稳定的。因此，在爱恋白皙青年的过程中自我分裂，感觉是坚忍的，而在爱恋黑肤女郎的过程中自我分裂，感觉就像被毁灭了。换个说法，让一个男人在与另一个男人的关系中经历即使是羞辱性的变化，也仍然可以觉得是保持或参与了男性权力，而让他在与一名女性的关系中经历任何改变，都会觉得像是发生了本质的剧烈退化。

这个差异也可以帮助描述为什么对说话者与白皙青年之间的关系会持续出现无性（sexlessness）的印象，即使面对以下任何情形都是这样：挑逗、对性器官的暗示、细微的个人关注、沮丧，以及直白的爱意。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性本身似乎并不主要以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项来定义，而是以一个不可逆变化的标准——例如历时性本身——来定义：

经历时是极乐，经历后则成了悲哀，

之前，是期待的快乐，之后，是梦

（第 129 首）

这个梦与爱相反，是“永远固定的记号”（第 116 首）。（因此，在关于白皙青年的诗篇里，时间这个损害性的、贪婪的男性形象所处的位置可能后来会变成（女性的）性——但会受到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以及诗歌的对抗。）我们已经看到，在第 144 首诗里，在对所谓对称的三角的最直接的描述中，行动和性都成了女性独有的特权，但都只能通过改变男人而发生，通过将他们带上从天使到恶魔、从天堂（在某些其他版本中，通过天堂）到地狱的单向旅途而发生。

从这个问题开始，可以采用几种不同的理论策略。最直接地，上面提到的关于男女之间权力转移的性器官寓言可以变得更直接、更复杂，而

## 男人之间

且,我憧憬地认为,可以朝着家庭、童年、母性,或可能最有趣的是,父性等不直接的、极为不稳定的意象的方向延伸——这种意象隐藏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

但是,一个可能更有趣的讨论点——它也会有助于给家庭问题提供某种特定性和基础——要求我们将权力这个概念复杂化,并详加说明(而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不得不用物化甚至是量化的方式来对待这个概念)。正是在这里,一个人最希望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是本小说,读者主要将其作为小说对待,而我们却会将这些诗中让人着迷的问题与真正的小说相联系。不去知道青年“伤害人的力量”是否代表了贵族庇护的权力或演员凌驾于剧作家之上的权力(虽然它们都可以体现在爱的纽带中);不去知道“修葺……那美丽的屋顶应该是你主要的欲望”(第10首)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了青年对一个已经建立的门户和姓氏的职责,或是代表了他带着个人拥有的外貌和男子气的资本踏上的自恋的冒险;不去知道在何种意义上关于法律、关于资本与高利贷、关于食物与需求的普遍语言真的将这些关系编制到一起;不去知道在阶级、性别、历史时刻等特定性中,一个打破她“婚床誓言”(第152首)或将“掠夺他人婚床上的收益”(第142首)的人陷入危境的人,究竟敢做些什么;不去知道当某个男人对某个女人提出以下问题时,他的嘲弄底下关键的讽刺意味是什么:

当你的所能足以击溃我竭尽全力的抵抗时,  
你还会如何耍弄手段来进行伤害?

(第139首)

总之,甚至不去用初级读本的方式解读这个作品中的世俗语言,除非它纯粹是自我反省的——我们在这些巨大空白中失去的不是“莎士比亚这个人”,或是他的年代,而是作品的肌理、比例、句法、修辞,是活跃而令人着迷的对性政治的思考。而且,我们跨越这些巨大空白的阅读驱使我们产



生更大的误解——具体说来，为了对抗我们的年代和阶级的忧虑，将少数几个个例普遍化、本质化，而这些个例凑巧来自一个不同年代和阶级的话语（例如，生殖器寓言）。我们总是拥有这性别和性器官；但“家庭”、“性”、“男性特质”、“女性特质”、“权力”、“事业”、“隐私”、“欲望”、性别与性器官的意义和实质——这些都在时代与制度（包括文学）中得到具体体现。

同时，这个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隔离式的解读给更有联系性的、小说式的解读提供了以下的尝试性总结：

对情欲三角的体验很可能间接或直接地支持了性别之间的对称以及同性恋及异性恋的社会性纽带或情欲纽带之间的对称。

这样的对称是不自然或扭曲的，这既因为男女权力的量与类之间存在原始差异，也因为在大多数文化的话语中，在关于“相反”、“对应物”以及“互补性”的语言之下，一种性别被当作一个边缘化了的亚类，而没有被作为对另一种性别的平等选项来对待。推理来说，同性成员之间的纽带和与另一性别的成员之间形成的纽带不能直接相比较（而且，男人之间的同性纽带与女人之间的同性纽带会有不同的意义和影响）。男性同性恋纽带与男性异性恋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前者被后者驾驭并被边缘化的关系，这种关系和女性特征（femaleness）与男性特征（maleness）之间的关系类似，但又有不同，因为它是在一个男性同性社会性关系已经成为主流的领域里发生的。

对对称性的坚持可以通过压制有效的性别差异，或通过把它们翻译成具有人为可比性的空间上和/或时间上的修辞手法，而变得可能；这些“可比的”修辞手法将承载着它们不对称根源的印记，但其方式将不会使它们有可能被重新翻译成它们本来状况的一个可理解的版本。

一个可以介于男女“半中间”的人物形象将作为虚构的性别对称的重要主题一再出现，但其形式最终揭示了对对称性的坚持背后的偏见。这已经成了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那些甚至非常犀利而大胆的批评中的重要问题；这种在修辞上和政治上趋向对称性的可怕力量已经使得，比如

## 男人之间

说,王尔德、温德海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以及G. 威尔逊·奈特(G. Wilson Knight)将女性化的男性尊为巫师,尊为超越了性别的观察者:“诗歌本身就是一种双性觉悟,或行动”;“在任何普通的爱情里,男性在女性那里找到了完整。这个获得完整的单位——因为,在特定时刻,诗人达到了这样的状态——看到它的灵魂状态反映在它自身的整体性的肉体体现[白皙青年]中;我们的最好诗篇从那样的独特经验中开花”。〔9〕

最后,就像我在前言中提出的,肉体性欲汇聚了关于权力关系的语言,是探寻这些语言的好地方;那种语言与其他权力关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性本身与这些权力关系之间的关系——是意义的一种,因此是高度建构的,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可变性,而且常常是隐秘的——虽然联系了“性”(the sexual)与性器官的那个纽带的力量与形式是随着性器官之外的各种权力纽带、权力形式的改变而改变的,而那个纽带的性质随之影响了它们的分配。

---

〔9〕关于巫师化(shamanization)的问题,参见刘易斯,《狮子与狐狸:莎士比亚戏剧中英雄的角色》(*The Lion and the Fox: The Role of the Hero in the Plays of Shakespeare*),第149—158页,以及书中其他地方;引言出自奈特,《共同的火焰: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及凤凰与乌龟》(*The Mutual Flame: On Shakespeare's Sonnets and the Phoenix and the Turtle*),第36—37页。

### 第三章 《乡村太太》:男性同性 社会性欲望剖析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似乎对一场男性同性社会性历险的种种险境与变化提供了一个单一、散漫、感受深切的叙事。它包括了一名女性,但这或许只是多种选择中的一种:在围绕这些孤立于历史的诗篇的大量不确定成分中,包括了我们对莎士比亚的时代和社交圈中通过非异性恋路径形成的男性性爱关系的形式范围的无知。<sup>[1]</sup> 莎翁时代后一个世纪的文本,威廉·威切利(William Wycherley)的复辟时代喜剧《乡村太太》(*The Country Wife*),是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一种补充:这种补充不是要弥补我们对单纯男性关系的知识中的空白(这一研究重任开始于阿兰·布雷和其他人对16和17世纪其他文本的研究),而正好相反,是要检视对这样一个社会场景有过哪些综合反应:这一场景清晰地显现出,通过女性来传达同性社会性欲望是强制的、必须的。这部戏剧似乎为这种关系提供了一个由不同的生动原型构成的巡回图书馆,而我将用以下篇幅,浓墨重彩勾勒出这些原型,好让我们在对年代较晚的文本的解读中,将这些原型用作参照物。

---

[1] 例如,阿兰·布雷的《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的同性恋》(*Homosexuality in Renaissance England*)对这一时期广为接受的关于男性同性恋的民间看法做了有益的怀疑论调查;参见该书,比如说,第7—9页。

《乡村太太》中的一个定理是，给人戴绿帽(cuckoldry) 是其所描绘的贵族社会的主要社会动力。“给人戴绿帽”(to cuckold) 从定义上讲是一种性行为，由一个男人施于另一个男人。它的中心地位表明，这部戏强调认为，异性恋爱情主要是同性社会性欲望的一种策略。在他的著作标题里，戴维·维斯(David Vieth) 很聪明地将这部戏称为是“对男性特质的剖析”；<sup>[2]</sup>我将更进一步，将它具体作为对几种不同路径的分析来讨论——男人们可能通过这些路径试图与其他男人建立令人满意的关系。当然，我想展示的是，在这部戏里，男人们的异性恋关系的存在理由在于男人之间的最终纽带；而这种纽带只要成功结成，就不会对“男性特质”产生危害，而只会对它具有确定作用。

戴绿帽产生的关系与同性恋的至少某些社会形成有所不同，这在于它在结构上必须有等级，其中“主动”的参与者明显高于“被动”的参与者。其最大的特征在于，权力差异以知识差异的形式发生：被戴绿帽的人甚至不一定知道他身处这样的关系中。因此，戴绿帽将男性同性恋纽带中仅仅是偶发的特征铭记下来，并将其制度化——这削弱了横向的或共同的纽带，而偏向于认知超越(cognitive transcendence)的不对称关系。《乡村太太》中绿帽关系最普遍的意象就是，一个男人在牌局上欺骗另一个男人。

显然，与具有更明显性意味的男性同性社会性纽带相比，“给人戴绿帽”还有更多的不同，即，它要求一名女性的存在。就像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展现的那样，通过异性恋抵达同性社会性满足的男性路径颇不顺畅，而且受到威胁——尽管对大多数男人而言，至少在大多数文化中，这条路径是强制必须的。此外，对女性而言，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通过异性恋来绕道而行，不论这是否成功，都可能造成损害，尽管损害的方式取决于它的“成功”。

---

[2] 维斯，《〈乡村太太〉：对男性特质的剖析》(*The Country Wife: An Anatomy of Masculinity*)。

《乡村太太》中对戴绿帽的系统性强调意味着，男人之间对占有女性而进行的三角交易——这种交易在其他文本中结构性的存在有时要求进行某些推论性研究来发现——仅仅只是最明显的主题。女性在这种交易中的地位显然是这部戏的一个问题：这不是指她们在普遍政治意义上的地位，而是指她们的地位处于一种特定的模糊中，既是象征交易的对象，又是——至少潜在地是——象征符号的使用者，而且她们自身也是主体。就像列维·施特劳斯所说，“女性从来不会成为除符号以外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因为，即使是在男性世界里，她都是一个人，而且因为，只要她被定义成一种符号，她就必须被视为是符号的产生者”。〔3〕这部戏教导的是，女性很大程度上是财产，但是，就像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一样，她们是那种易变的、充满危险的财产。同样，就像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里一样，女性特质的模糊性具有某种传染性。错误理解女性是哪种财产，或错误理解只有哪种交易能实现她们的价值，意味着让一名男人在这种交换关系中作为主体的地位陷入危境：他在与其他男性的关系中要么被永久女性化，要么被客体化。另一方面，要成功完成这项交易，就要求愿意并有能力去暂时冒陷入女性化地位的危险，或是采取这一地位。男人只有通过这个阶段，同时在认知上仍控制着凌驾于性交易之上的象征系统，才能成功地获得对其他男人的控制关系。

作为这部戏中的角色，斯巴吉斯和平赤崑夫最清楚地代表了一种警戒性的笑料——他们误解了这种象征流通的规则。他们是互补的角色：各自的规则簿里都有另一个人缺少的页数，而各自又都认为他的书页构成了规则簿的全部。

斯巴吉斯的独特幽默在于，他像小狗一样急于变得机智(wit)、成为

---

〔3〕 列维·施特劳斯总结道，“这解释了为什么两性之间的关系保持了情感上的丰富、热诚和神秘——毫无疑问，这一切原本充斥着人类交流的整个世界”（见《亲缘关系的基本结构》，第496页）。这段话被鲁宾引用于《交易妇女：关于性政治经济学的笔记》第201页。鲁宾评论道，“这段话极不寻常。为什么他在这里没有批判亲缘关系系统对妇女所做的一切，而是把有史以来最大的欺诈之一说成是浪漫的根源？”

## 男人之间

花花公子，成为那些男孩中的一员；他的欲望显而易见，这使得它不可能实现，但这部戏没有首尾一贯地贬低他欲求的东西的价值。斯巴吉斯理解得很正确：从全局来看待事物的话，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纽带与他们和其他男人之间的纽带相比，必须是从属的、补充的、工具式的。多利兰特为这部戏的世俗体系辩护，他解释道，“情妇好比市镇边上的小小乡村度假处，不需要时时住在那里，而仅仅是用来小度良宵的，好让男人在回到市镇时，能更好地品尝市镇的风味”。〔4〕斯巴吉斯同样喜欢关于味觉的隐喻：“这可能是因为我喜欢有情敌来争夺太太，”因为“独自恋爱就像独自进餐一样乏味”（第3幕第2场）。

但是，哈里，难道已经有情敌来和我争夺太太了吗？可打心底里说，他可能日后会对我有用；因为，虽然饥饿现在是我的调味品，而且我没有它也行，但总有一天，对一个已婚男人来说，拿调味品般的情人与太太相比，就像拿橙子和小牛肉相比一样。

（第4幕第3场）

当斯巴吉斯把朋友哈科特介绍给自己的未婚妻艾利西雅时，他的举止很清楚地显示，他的最大动机并不是把哈科特用作婚姻的增甜剂，而是利用他的太太以及哈科特对她的赞许，来增强他与哈科特以及那些才子之间的同性社会性纽带。他这样教艾利西雅：“你必须永远欢迎他享有你我所有的一切。”同时，他把充满焦虑的问题留给哈科特裁决：“你赞同我的选择吗？”“告诉我，哈科特，你有多喜欢她？”“求求你，弗兰克，你觉得我太太是个有品位的人吗？”最后一——“去，和她到某个角落去，试试她有没有才智；和她谈点什么；她在我面前很害羞。”把朋友和太太扔到一起正是斯巴吉斯对“我们这些机智的人会为彼此做些什么”的一厢情愿的理解的一部

---

〔4〕 威切利，《乡村太太》，第1幕第1场。以下的引言将被整合到讨论中去，并在合适的地方用幕数、场次标出。

分。平赤崑夫对此的表达更刻薄也更精准：“给你自己的老婆拉皮条，给她找男人，让他们在你面前做爱，把他们扔到一个角落去，然后让他们在那里独处！”（第2幕第1场）

斯巴吉斯对哈科特说，“我会先和她离婚，再和你分手”（第3幕第2场），而这正是对他的优先级排列的准确总结。在他的想象中，恰当安置美丽未婚妻（他认为这种安排是很大方的）不仅会帮助他获得与他最崇拜的男人之间的纽带，还会让他对这些男人占一定上风。他没有忽视掉哈科特对艾利西雅的欲望，但他迅速、直接地假设，哈科特的欲望让他——他毕竟是自己的理想爱人——变成了“一个低微、卑下的朋友，”对这样的朋友，他可以用自己的极有价值的财产来迷惑、驾驭。“这可能是我对此有乐趣，因为我第一天就得在戏院展示高级衣服，在穷小子面前数钱”（第3幕第2场），他屈尊说道。艾利西雅本身并没有让他有快感。他与男性朋友走在一起，瞥了她一眼，他想要藏起来，担心她会打断他们的男子汉式的团体以及他后来在白厅对国王的服务。当他在戏的尾声失去她时，他直截了当地说，

直到现在，我都从未对你有过什么热情，而现在我恨你。说真的，我本可能为了你分得的财产和你的仆人而娶你，就像这个镇上有些有才华的男人有时候的做法一样；为了显示我的无所谓，我会参加你的婚礼，带着欢乐和你分手，就像我会把一个乡下姑娘让给一个傻小子一样；不，应该是说，我会带着和你度过第一个良宵后的那种欢乐——如果我已经和你结了婚的话。

（第5幕第3场）

这最后一个场景的用意——根据情节的整体安排——是要显示斯巴吉斯最终“吃醋”了，但即使是在这样一幕中，他妒嫉的原因仍然只是他顾忌到他作为一个特定种类的人在男人中的名声：“你难道找不到更容易欺负的

乡下佬吗？只要不是我——我可是镇上机智、风趣的绅士。但对一个有才华的男人来说，是你的傲慢太难以忍受，你这不值得珍惜的虚伪女人！”（第5幕第3场）所以，他所能努力获得的最好恢复——对他而言似乎很合适——就是坚持说他的行为只不过是像“镇上其他有才华的男人”一样，以及幻想他只是在把艾利西雅转换（男人的）人手，好像她不过是用过的货币一样。

斯巴吉斯把艾利西雅当作没有内在价值而只是在男人们的周转中获得价值的货币对待——斯巴吉斯这样做，似乎揭示了一半事实。毕竟，他的陪衬平赤崑夫显得更加荒谬，而且还令人恐惧地暴力——平赤崑夫没能看到，在男性交易流通的环境下，与一名女性之间不可能有稳定的关系。斯巴吉斯以造成恶果的方式坦承，对他而言，艾利西雅具有单纯的工具性价值和象征性价值；另一方面，平赤崑夫则被迫走向疯狂的极端掩饰，掩饰他想将自己的太太从流通里收回、将她的价值定在她自己身上，并将其据为己用的失败企图。

平赤崑夫和斯巴吉斯都把男性交易妇女的系统视为既定的东西；这两个男人只是作出了不同选择来与之发生关系。“戴绿帽者”这个男性同性社会性范畴的首要性决定了平赤崑夫作为丈夫的一举一动——他那不食人间烟火的太太完全是因为他对这个主题的幻想的、痴迷的唠叨才学会想要与别人私通以及究竟怎么做。他对妇女的价值的物恋使得他无法感受女人身上的内在价值；类似地，斯巴吉斯太轻易想象妇女的交易流通性，而无法感受她们的内在价值。“如果不是让老公戴绿帽的话，太太身上的才智有什么用？”（第1幕第1场）平赤崑夫也像斯巴吉斯一样，把妇女形容为可能会让人恶心的食物，认为她们只有通过三角式的神秘化才能变得可口：“带面纱的女人就像被盖住的食物一样，让男人好奇、开胃，而当它被揭开时，却可能会让他犯恶心。”（第3幕第1场）这里的区别在于，这个三角结构看似具有无上威力，这吓坏了平赤崑夫，而斯巴吉斯对此则胃口过大。



平赤崑夫曾经做过“嫖妓老手”，是“对这个镇和女人们了解颇多的人”；他带着经验权威来谈论戴绿帽和放荡的话题。但是，霍纳问他，

像你曾经那样不是更好吗？养女人难道不比结婚更好吗？

平赤崑夫：见鬼！那些女人会耍我；我决不会给自己养个婊子。

霍纳：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结婚只不过是给自己养了个婊子。

（第1幕第1场）

正像这场谈话清楚揭示的那样，平赤崑夫感到，女性作为可交换财产在男人中的流动让他受到了损害。就这个集体所有制关系而言，只有一种被控制的、个人化了的版本，才有希望抚平他对男性侵蚀所怀有的紧张的、想象中的恐惧。

黄金白银贩子们宣称说，现金的价值仅仅是被“经济学家”赋予的，而贵金属的价值是无法剥夺的。正像这些贩子们一样，平赤崑夫想象他可从交换的洪流中挑出一个元素，永远赋予其一个价值，但实际上这个价值仅仅是由它在这个洪流中的位置给予的。“我们的姐妹和女儿们，”他说道，“就像高利贷者的钱一样，在放出去的时候是最安全的；但我们的太太就像是他们的放贷凭据一样，如果不放在我们上了锁的柜子里，就永远都不安全。”（第5幕第2场）这个说法也指出，女性、货币以及字据都同样指涉模糊，都是平赤崑夫不可忍受的。他强迫自己的太太写信拒绝霍纳，用一个令人震惊的重要意象来威胁她：“照我说的写，否则，我就用这把削铅笔刀在你脸上写下‘婊子’这个词。”（第4幕第2场）他希望用物理方式在这个特别货币上打下记号，使之成为他自己的不可剥夺的东西——也就是说，就像是金银的例子一样，希望通过它内在的物理特性以及对它的拥有，而不是它在一个更大的象征经济体中所处的位置来确定它的价值——而他的唯一依靠，即他在这里威胁的对象，无可避免地以两种方式背叛了他。首先，会从肉体上损坏这个对象——而他声称在肉体上占有

这个对象很有价值。第二，他威胁着要打下的记号正是命名了她的公共特性和流通特性的东西，而这种公共性和流通性正是他最害怕的。

当平赤崑夫结束了对妻子给霍纳的信的口述，并压制了她每一个想要自己表达的冲动（“我发现，她的风格本可以非常柔和”）时，他命令道，“快，现在结束它，我去取封口蜡和蜡烛；在背后写上‘霍纳先生收’”。像蜡一样柔和、可塑，正面写着“婊子”，而背面写着“霍纳先生收”，平赤崑夫的欲望小包裹迅速抵达了它的终点，但是，它携带的信息恰好与打算的相反，因为他的妻子——“现在他已教会我写信”——已经把自己充满柔情的信换了进去。（“我的信被发到霍纳先生那里去，因为他需要我给人送信。”）在这个世界里，象征性交易的系统有这样的特性：每个试图稳定这些系统的企图——不论在私有或集体所有方面，不论在交换对象的物质性还是透明度方面，不论在异性恋欲望目的或同性社会性欲目的方面——都无可控制地立即产生抵消性的被否定项，而且，它就像是带着复仇之心参与到游戏中来似的，将整个象征系统突然导向这个被否定项的周围，将其价值转移到现在已经女性化了的（被戴了绿帽的）、想要成为符号控制者的人身上。

当斯巴吉斯和平赤崑夫在对涉及女性的象征经济的控制上犯着互补的错误时，霍纳自由地使用着整本规则簿。他在正确的时刻坚持，在正确的时刻放手；他对妇女足够珍视却又不过头；他在将女性商品私有化的关系与将她们流通的关系之间灵活地、不费吹灰之力地进退。如果男人存在的目的是让男人们戴绿帽，那么霍纳就是一名大师。就像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那样，男性雌雄同体（male androgyny）的虚幻——即男女之间对称关系的虚幻，在其中，一个人（男人）可以将自己放到两性的“半中间”，以平等地看待、享受它们——对这部戏以及戏中的霍纳而言，是一种重要的主题可能。但是，也正像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那样，男性的“两性同体”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掩盖而起作用的：它掩饰了一种对妇女不对称的边缘地位、受压迫地位以及被客体化的地位的更有效的控制。

霍纳假装性无能——即“像太监一样糟”（第一幕第1场）——以使自己出轨的性行为对自己、对牵涉到的女人更容易、更安全。一眼看上去，或者，用霍纳自己的话来说，这种策略似乎是一种对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通路的批判和逃避。霍纳宣称，他与周围的男人不同，让他感兴趣的实际上是女人，而不是别的男人的看法：

虚荣公子追女人、打扮、为小事烦恼，  
和周围的人一起成为追女人的人；  
但如果他想受女人珍视，  
你知道，他就会先受到男人的鄙视。

（第5幕第4场）

当然，霍纳在攻击男性友谊的话题，即使对体现在极富魅力的哈柯特和多利兰特身上的友谊也是如此，更不用说让人倒胃口的斯巴吉斯了。他试图用嘲弄的方式怂恿哈柯特和多利兰特对男性纽带作出越来越夸张的、敌视女性的宣称：

霍纳：女人让男人失去好伙伴；虽然我无法享受她们，但我想你更是如此。好的伙伴关系和友谊会带来长久的、理性的、男子汉的快乐。

哈柯特：情妇们就像书籍。如果你太沉迷其中，它们会让你瞌睡，让你不合群；但如果小心使用，它们会使你有更好的谈吐。

.....

霍纳：我告诉你，要成为女人的好伙伴、好朋友和爱人，与成为金钱的好伙伴、好朋友和爱人一样难。你不可能追随两者，那么就选择一边吧。好酒带给你自由，而爱情带走自由。

多利兰特：天，他说得很对。

## 男人之间

.....

霍纳：好了，我自己只想要醉生梦死、逍遥散漫——那些都是美好的、男子汉式的快乐。

（第1幕第1场）

霍纳代表的是自己，而且，有些女人不仅认为他将自己从男性同性社会性通路中排除开来，而且认为他为了女人的快乐而牺牲了自己的（以同性社会性方式定义的）男性特质。比如，菲吉特夫人对他很好奇：

但是，可怜先生，为了我们这些好女人，你会如此慷慨，会是一个真正的好男人，以至于让自己被说成不是男人吗？不是男人！你会让自己遭受男人可能遇到的最大耻辱吗？而这样的耻辱是不会因和你聊天而落到我们女人头上的。

（第2幕第1场）

然而，这部戏以很多方式清楚显示，霍纳远远没有放弃或贬低男性同性社会性的欲望目的，他实际上将其抬举到一个新提升的地位上。如果他放弃了其他男人的友谊和崇拜，这仅仅只是为了与他们形成更亲密的秘密关系——他对这种关系的认知控制如此完全，以至于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个纽带的存在。首先，霍纳（Horner）这个名字直接说明，他首要关注的是给男人戴绿帽的行为，而不是享用女人。他对玛吉瑞·平赤崑夫的追求不是从他第一次折服于她的魅力时开始的，而是当他第一次得知她是平赤崑夫充满醋意地保护着的新娘时开始的。最重要的是，这部戏的结局清楚地显示，与这位被热烈追求的女人之间非三角的稳定关系是这个世界上霍纳最不想要的东西。玛吉瑞·平赤崑夫天真地认为，由于他想给她丈夫戴绿帽，因此他就一定会想要得到她——她这种想法威胁着他小心建立起来的策略的根本基础；为了保护这个策略，为了让自己按

自己选择的条件行动，霍纳毫不犹豫地把她抛回她暴力、专制的丈夫那里。当她似乎威胁着要坦白自己对霍纳的好感时，他抱怨道，“好吧，一个愚蠢的情妇就像不牢靠的地盘，很快得到，也很快失去，男人几乎来不及赚到什么”（第5幕第4场）；但是，使得他们的恋情十分短暂的，正是他的欲望——而不是她的。“仅次于得到新情妇的快乐的，”他说道，“就是甩掉旧情妇的快乐了。”（第1幕第1场）

斯巴吉斯和平赤崑夫否认或压制男性同性社会性情欲机制中女性地位的分裂，因此最终被女性化或动弹不得了。另一方面，霍纳更为成功的策略在于，不去否认、压制或设计这种分裂，而是主动地去体现它，并因此控制它。因为他是主动地去亲自代表——而不是去经受——“阉割”，而且因为他自己扮演了被动的、可流通的商品的角色——因为他在一个方面脱离了情敌的角色而担任了客体的角色——他就能在另一个方面取得无敌的力量，成为主动的主体。然而，正是因为他是个男人，他的自我克制才在实际中提高了他的活动力和力量。这些女人有时也可以“自由地”表现出她们地位的矛盾之处，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她们从未取得那种认知杠杆，那种对她们整个选择范围的控制，而霍纳伪女性化的男性特质则允许他取得这一切。

我已经谈到，霍纳所谓被阉割的地位是如何使他体现出女性地位的分裂的一个方面，即表面上是男性的异性恋欲望的对象，而功能上更是他们对其他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的通道。霍纳能够嘲笑地或机会主义地对他的男性朋友们假装，他现在可以只珍视同性社会性纽带；比如，在与贾斯伯·菲吉特的关系中，他同意被当作家庭财产——本质上被当作女人——对待。但是，他这样做正是为了离女人们更近；在男人们错误地将他视为只具有同性社会性的时候，他可以让女人们相信，男人之中只有他才是完全异性恋的，让她们相信，他对她们的兴趣远大于他对她们的丈夫对他的看法的兴趣。但实际上，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他的动机是同性社会性的，只不过其层次比通常的认知控制层次要高。霍纳体现了女性情欲命

## 男人之间

运中对立的同性社会性力量和异性恋力量,但由于他是个男人(因此也是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主动主体)——而且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才意识到男人们的同性社会性欲望和异性恋欲望不需要是对立的,而可能是完全串通一气的——他能够利用这些表面上的矛盾,方便自己对付男人们和女人们。

类似地,霍纳不仅体现了,也利用了作为占有和交换对象的妇女的地位在私人方面与公共方面之间的分裂。它的一种表现,正如我们在玛吉瑞·平赤崑夫的例子指出的那样,就是(象征上的)交易对象身上看似矛盾的物质性与非物质性幻象。霍纳在有名的“瓷器”一幕中,精彩地戏仿了这种矛盾;在这一幕中,“瓷器”偶然地变成了被突然物化的性行为的能指(signifier):戏中人物没有共同的手势、触碰和肌肤感觉,而是发现自己在为一个有限的物质商品的数量进行荒谬的竞争。

斯桂弥施太太:哦,主啊,我也要拥有一些瓷器。好霍纳先生,不要想着把瓷器给别人而不给我;把我也算上。

霍纳:我以名誉保证,我没有剩什么了。

斯桂弥施太太:不,不,我知道你从前也否认你有瓷器,但你不应该这样打发我。来吧。

霍纳:这位女士得到了最后一个。

菲吉特夫人:是的,没错,夫人,据我确切所知,他什么都没剩下。

斯桂弥施太太:哦,但可能是他还有,只是你找不到而已。

菲吉特夫人:什么,你以为如果他还有剩下的,我会得不到吗?因为我们上流女人从来不会觉得自己的瓷器够多了。

霍纳:别想歪了,我不能给你们所有人瓷器,但下次我会给你一整车。

(第4幕第3场)

这一幕展现了霍纳的不走运,他的性能力——尽管可能很厉害——被公开地物化、数量化,并被公开评价,就像女性的身体那样。另一方面,通

过屈从于，甚至是加剧这一幕物化、女性化的势头，霍纳像往常一样，更加牢固地建立起他对这个话语条件的秘密控制。

菲吉特夫人(对霍纳说)：你这个允诺是什么意思？

霍纳(避开菲吉特夫人)：哎呀，她以单纯、字面的方式来理解。

(第4幕第3场)

妇女的交换地位在公共流通与私有化之间有更广的分裂，而霍纳对这种分裂的控制，也同样地具有参与性，同样地在行。就像他对菲吉特夫人解释的那样，关于他的能力的“秘密”，如果通过行动更广为人知，就会运转得更好(更秘密)，因为，

不是(别的女人)会对你的荣誉有偏见，而是我会对她们的荣誉有偏见；而为你效劳，我会对她们所有人撒谎，让这秘密成为她们自己的秘密，这样她们就会保守秘密……如果这都不能让吹毛求疵的女人闭嘴的话，就让我见鬼去吧。

(第4幕第3场)

对霍纳而言，流通这种“知识”意味着像女人一样，流通他自己的身体，将它作为共同财产，来创造出私有财产的假象。与女人不同的是，他对他的性经历的条件握有控制力。

霍纳的策略很成功，因为，就像我说过的，这让他得以把自己的情欲关系/政治关系分裂为两个“登记册”。这些登记册可以有一种以上的方式来区分。最常规的方式就是描述在表象和真实之间，或符号与所指(signified)之间的那个裂缝。<sup>[5]</sup>实际上，这部戏的各项议题和词汇的确让

---

[5] 关于这一点，参见维斯，《〈乡村太太〉：对男性特质的剖析》。

## 男人之间

这个裂缝成为一个迫切的主题。但是,我们又一次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将霍纳对这个裂缝主动的、极具改变力和控制力的利用与女人们手头可采用的更为稳定的利用方式相区别。这部戏小心选择它所包括的妇女的范围,但该范围简单地由从真实到虚假的连续体来划定。艾利西雅正是由她的真实性来定义的,而非吉特、斯桂弥施之类的女人是由她们对一个虚伪系统的(经常是站不住脚的)依附来定义的,而对此她们并不讳言:

菲吉特夫人:我们的美德就像政治家的宗教,贵格教徒的诺言,赌徒的誓言,以及伟人的荣誉;就是说,去欺骗那些相信我们的人。

斯桂弥施太太:在戏院包厢里,你在我们脸上看到的端庄、羞涩、谦让只不过是好女人的一种符号,就像正厅后排观众带的面具一样。

(第5幕第4场)

在这部戏的进程中,玛吉瑞·平赤崴夫从一个简朴、直性子的真实极端移动到一个同样简单的虚假状态。虽然这些女人中的每一个刻意在不同的相互交往中采用不同的言语和行动,但她们都认为,她们的关系是**既定**的、单一的。代表婚姻和“荣誉”的“符号”也落到了这个窠臼中:菲吉特、斯桂弥施这样的女人对她们社会纽带的掩饰,是不由自主、始终如一的;类似地,艾利西雅对她的社会纽带引以为傲,也是不由自主、始终如一的;她们最终在任何事情上都很无助,只有认可(尽管是通过否认)定义了她们社会存在的结构。(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艾利西雅的真实性至少有可能颠覆使同性社会性欲望以异性恋欲望的面目出现的系统,但是,这种真实性受到允许,因为她与哈科特之间的爱恋关系是这部戏中最没有三角性的:而这也是因为她情况很特殊,是个孤儿,(看起来)有自己的钱,因此相对来说不受父权所有制的约束。她的恋爱的三角性相对不强,这场恋爱是威切利戏中的死胡同之一,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泡沫,似乎从另一种文体飘浮而来,而这在《坦诚的人》(*The Plain Dealer*)一剧中更复杂



地呈现出来。

另一方面，霍纳和女人不一样，在与表述的真相（the truth of representation）之间的关系上，他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到一个欲擒故纵的、偏离中心的位置上。这个位置偏离了中心，因为它对于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也因为需要忍受和控制可能会很痛苦的时间拖延：“如果我可以教训这些做丈夫的，”他以一种机智的、打破平衡的方式说道，“我就可以很快让这些太太们不再受他们的教训。”（第1幕第1场）由于霍纳有能力屈从于性别表述那不可压制的、分化了的权力，并能从它获得动力，从而征用它，所以他为自己构建了一个清楚的两段式的叙述，即女性化，以及随后发生的男性特质的恢复（后者并不与前者产生矛盾）。

要结束本章，就让我谈谈《乡村太太》中机智（wit）\*所具有的交换价值——这个商品最能在主题上体现这部戏本身的体裁特征。让我们以一个传记性小片断开始：约翰·丹尼斯（John Dennis）在一封信里说

威切利先生与上面提到的那位女士（即克里夫兰女公爵芭芭拉·维利埃，她此前有几年也做过查尔斯二世的情妇）之间的通信使威切利先生受到白金汉公爵乔治的青睐，乔治曾热恋那位女士，曾受到她无情对待，并且相信威切利先生是他的快乐情敌。当公爵长期追求她却一无所获后，不论是否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让她震惊（因为她是他的嫡表亲），还是因为她明白了与一个具有如此等级和性格的人——一个吸引所有男人目光的人——私通肯定会很快就传到国王耳朵里去，总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她很长时间以来都拒绝他的拜访，最终，不满、怒气和蔑视取代了他的情意的的位置，他决定要毁掉她。下了这个决心后，他让自己的探子密切地监视她，好让他很快知道哪些人是他的情敌。而当他知道他们是谁之后，他总是公布他们

---

\* Wit 一词除“机智”、“智慧”的意思外，还可以用来表示“机智、敏捷的人”。——译者注

的名字,对那些常常拜访他的人揭穿这位女士,而曾被她公开的名字中有威切利先生。威切利对宫廷有种种前程上的期望,他一知道这件事就明白,如果这件事被报告到国王那里去的话,会带来什么后果。于是,他找到了维尔默特爵爷罗切斯特和查尔斯·赛德利爵士,恳求他们抗议白金汉公爵的错事,因为他伤害的人还没有荣幸认识他,也从未得罪过他。当他们把这件事告诉公爵时,他马上叫道,他并不责备威切利,他只是指责他的表亲。啊,但是,他们回答说,因为让他有参与私通的嫌疑,你会毁了他,也就是说,阁下你就快毁掉一个人,而他的言谈带给你的快乐会大过一切。在这个场合,他们提到了威切利先生身上如此多的闪光点,提到了他的言谈的魅力,以至于公爵——就像他喜欢他的女亲戚一样,他深爱机智的人(Wit)——急切地要见他,两三天后两人共进晚餐。晚餐之后,威切利先生——他当时正处在身体与头脑的亢奋中——认为有必要尽力发挥自己的才华,而公爵如此为他倾倒,以至于他欣喜若狂地叫道,上帝啊!我表妹一点都没看错人;从那一刻起,他与一个他认为是他的快乐情敌的人交上了朋友。

“不久之后,”威切利的传记作者告诉我们,“白金汉安排让威切利做了他担任上尉的步兵连的大尉。”〔6〕

这件轶事证明了弗洛伊德在《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中的观点,即机智是一种重要机制,它能使欲望目标从看似异性恋的对象移动到真正的同性社会性对象。〔7〕在威切利的例子中——既在这个传记中,更重要的是,也在这部戏的内容中,同样有趣的是机智作为阶级成员身分或活动力的象征所具有的特殊

---

〔6〕 引用于麦卡西 (McCarthy),《威廉·威切利传》(*William Wycherley: A Biography*),第91—92页。

〔7〕 弗洛伊德,《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第98—100页。

地位，特别是因为这些东西都与性地位有关。在《乡村太太》中，做个机智的人、赌棍（以诈赌者或骗子为代价）、败家子以及给人戴绿帽的人，都与镇上的贵族绅士相关。相反，缺乏机智则与被戴绿帽的人、城市资产阶级或资格不够的城市绅士阶层联系在一起。比如，贾斯伯·菲吉特是已经在城里做起生意的准男爵，他就不是机智的人，而是“严肃的生意人”（第1幕第1场），因此也是现成的戴绿帽者：他太太评论道，

为了生意他会从太太身边跑开，  
花大心思完成他的生意。

（第2幕第1场）

最初就是贾斯伯爵士那坚持的、浮夸的、资产阶级似的贪得无厌驱使他把霍纳招致到他家的：他喜欢把霍纳称为“我的太监”（第3幕第2场），并对他太太解释说，“一位贵妇应该有一位绅士充当临时护花者，充当临时拉车的马，以免有时你不得不待在家里”（第2幕第1场）。

斯巴吉斯尽管富有，但既没有机智，又没有贵族头衔；因此，他喜欢上一个贵族老爷，而“一个机智的人对我而言就是世上最好的头衔”（第1幕第1场）。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做作如何使他很容易就被人戴绿帽；霍纳说，“只要与他作伴，就可以骗走他的情妇，骗走他的钱，而钱是公共情妇”。（第3幕第2场）平赤崑夫称他为“真正的市镇花花公子之花，这种人在得到产业前就把它们都花光了，在结婚前就被人戴了绿帽”。

执拗的平赤崑夫一如既往，用他自己的保守主义——此处被看作是土地为基础的——来对比斯巴吉斯的经济自由度和性自由度：“但请让我，”他接着说，“寄希望于我自己的财产”——这指的是玛吉瑞（第2幕第1场）。平赤崑夫是位像贾斯伯一样的贵族，但在这部戏以城市为背景的背景下，他朝相反的方向降了级——他回到了他的农村根本，回到了乡下人对花钱的恐惧。他庆幸自己有位乡村太太，她虽然没有钱，但“就像从

## 男人之间

这个镇给我带来两万英镑一样的富有；因为她肯定不会像一个伦敦荡妇那样花钱，以至于破罐破摔，花光自己微薄的财产”。（第1幕第1场）他和斯巴吉斯都认为机智和性占有是可交易的，虽然价钱不一样：“你可以笑话我，但你永远不能和我太太睡，”平赤崑夫咕哝着，而斯巴吉斯感觉正相反。

斯巴吉斯：什么，你认为我会吃醋，像个乡巴佬一样？

平赤崑夫：不，是像个戴绿帽的，像个轻信的小市民。

（第2幕第1场）

那么，做个机智的、给别人戴绿帽的人，就是既不能做乡巴佬，又不能做小市民，而要做一个年轻的贵族式的镇上的人，他与钱之间唯一看得见的关系就是游戏般的（也是掠夺性的）赌博关系。多利兰特认为，“我们这些被他们称之为败家子的人”实际上是唯一可以被称之为富有的人，“我们每天把[我们的]钱用来购买新的快乐”。（第1幕第1场）

这些优雅而又不显商业化的年轻男人与他们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政治地位之间，有着隐藏的、或曰被连根拔起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复辟时期的资本主义英格兰已经颇为危险、尴尬了。（这也可能是为什么赌博成了激发他们想象的经济意象。）他们对那种关系的升华——在这部戏中，这种升华是由“机智（的人）”指代的——的一个后果就是，那些缺乏经济及政治基础的男人也能够通过培养“机智”这个能指来获取属于那些年轻人的经济及政治地位的部分特权。

但是，希望以这种方式取得社会地位的男人必须遵从超凡的自我否认的约束和抱负的约束。正如平赤崑夫和贾斯伯爵士的例子所显示的，如果表现出很在意物质积累或守财，即使对富有贵族中的“机智者”而言，也是致命的。就像威切利一样，一个没有很大财富或不含糊的地位的人如果要以他的机智生活，或是在经济上依赖“花花公子”（wits），就需要有

霍纳那样的策略和技巧。将他的物质需要延迟或升华，通过不同形式的表面女性化来掩饰他的抱负，有能力把与真正的“花花公子”之间的关系想象成是控制性的而不是相互的，这样的人把声音和形体赋予与那些他嫉妒的人的地位中真正的或是表面的矛盾，由此可能成功地为自己开辟出往上爬的路径，又或甚至是得到他欲求的物质。这样的生涯是危险的，而且失败比成功多——这在威切利自己的生活中很清楚。

威切利对《坦诚的人》的“情书献呈”说明了这个策略的某些性意义。威切利将这部戏献给一个伦敦老鸨班尼特妈妈，他使用了一连串双关语，将她的职业描述为与讽刺剧作家的职业相类似：

你对那个老色鬼而言一直是个祸根，而且常常让年轻人恐惧。  
你让强烈的淫欲成了它自身的惩罚，并用欲望浇灭了欲望，就像炸了房子来救火一样。<sup>〔8〕</sup>

类似地，《乡村太太》的开场白——威切利将它放到饰演霍纳的口中说出来——将剧作家的脆弱与对女演员的性利用做比较，因为他们都被男演员背叛，被交给观众的低下品位来肆意对待：

但我们，男演员们，会卑微地屈服于  
爆满的观众席，现在，以及任何时候都如此；  
不，我们常常预期你们会发火，  
并在我们的舞台上为你们杀死诗人。  
在我们的后台我们毫不设防，  
但当你们带着纷飞的旗帜到来时，  
你们知道，我们会耐心地交给你

---

〔8〕 威切利，《坦诚的人》，第6页。

## 男人之间

我们的诗人、处女，不，还有我们的成熟女人。

(第 6 页)

剧作家对男演员的主题依赖在这里和他对“他们”语言的无形控制混在了一起——说真的，正是他把他们交给观众处理的；这种混合在“由奈普太太(即菲吉特夫人)讲述的结束语”中，显现出更清晰的性意味。她作为一名女演员说话，推论可知，她也作为一名在性市场上被出售的女人说话，她嘲弄观众席中的男人，他们为了同性社会性特权而说大话，在床上却无能为力。

你们这些美好出色的男孩，不论年纪长幼，  
被认为是如此热切、活泼、强壮，  
却错待了女士们——而没有错待她们的丈夫；

这个世界不让一个人得到应得的东西，  
你从经验就知道你可以欺骗，  
而人们还会十分相信你，  
但我们女人——没人骗得了我们。

(第 142 页)

就像霍纳一样，这部戏本身似乎通过这个结尾而站到了女人追求快感的主张那一边，牺牲了剧中以男人为导向的表象。剧作者自己似乎经历了一场变形。开场白和结束语都是突出和制造戏剧效果的地方——多个身体将剧作者的言辞当成他们自己的言辞讲出来，表达或错误表达出剧作者的意图；剧作者在这里已经从被具身化为男人(交易女人的男人)变成了被具身化为女人(被交易的腐蚀性物品)。

然而，再一次，这部戏的结局的语境——在该结局中，霍纳为了保护

自己讨价还价的能力，把玛吉瑞·平赤崑夫送回她粗暴的丈夫那里——与复辟时期逛戏院的大环境结合在一起，使“结束语”表面上的女性认同似乎仅仅是一个更大的男性同性社会性策略中的一步。在这一时期，女性身体(female bodies)出现在舞台上，\* 讲着“女人们”(women)的台词，本身就已十分新奇，足以响亮地呼应这部戏对女性作为交换品的物质性或透明性所进行的主题探讨。也就是说，在这部戏中，这样的假设没有受到挑战：女人登上舞台向男人们兜售身体，同时也将男性剧作者的各种概念具体地表现出来；而且，除了艾利西雅以外，观众中的女性被描述成在那儿被展示、被租用，而不是看戏的人。

即使“奈普太太”的结束语代表着女人的声音，它也只是在这个系统内部的一种抗议，而不是对该系统的对抗：“奈普太太”只不过对某些人为的快感发出了直接诉求，这些快感被认为是在妓女和情妇的戏剧交易中——这些交易由男性进行，并提高男性特权——为妇女制造的副产品。正如“莫莉·布鲁姆”以及男性声音的许多其他女性具象一样，“奈普太太”依旧讲述着一种性的语言，它仅仅只能代表一个信息：即“是的”(yes)的各种变体。为了得到她诉求的快感，她宁可给她在性交易经济中的地位裹上糖衣，而不是改变它：她并不打算把“不”(no)包括到自己的词汇中来。即使将这个结束语看作是一种将父权菲勒斯(*phallus*)的意象和权力从易受诱骗的个体阴茎的脆弱性那里分开的策略，这个结束语也并没有赋予女性说话者新的社会动力：不论男性个人在由阴茎和菲勒斯所定义的空间中的前途如何不稳定，她在这个交易经济中的贬黜毫不含糊地与菲勒斯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同意以女性的声音和形象来获得表达的男性作者从“奈普太太”的长篇演说获得的東西远比“她”得到的多。对男人的异性恋活动是如何既被它真正的同性社会性对象所驱使，又可能为之所损害的心知肚

---

\* 在此前很长时期，比如伊丽莎白时代，妇女是不允许登台演出的。

明,为有野心的主动男人提供了手段,而对仅仅以边缘方式存在的女人则没有。讽刺作者一旦经受了饰演女性角色的黯淡(例如当威切利间接恳求白金汉公爵不要“毁灭”他时就是这样),因而掌握了男性欲望的正确道路(“公爵……也深爱机智的人,就像他爱自己的表亲一样”),他就能利用自己的秘密优势更长久地使男性对象在自己面前女性化(“而公爵如此为他倾倒,以至于他欣喜若狂地叫道,上帝啊!我表妹一点都没看错人”)。

在下一章,我们将看到,在斯泰恩的《感伤的旅程》中,这个阶级及性别策略被更强烈地心理化了,它被放到一个人口更密集的社会世界里加以描述。第5、6章讨论偏执狂哥特式小说,在这两章里,我们将更直接地论述男性同性社会性纽带的范围可能如何被恐同打碎,或如何在与新兴的男性同性恋角色的关系中被架构起来。但是,出于本章的目的,与那相关的只需要重新强调《乡村太太》中的三点:所有男性同性社会性纽带中对妇女强制性的和两面性的牵涉,男性之间直接肉体接触的缺席,以及由戴绿帽所代表的同性社会性纽带那具有认知等级的、遵从权力的、“超凡的”(transcendent)特性。这个世界的同性社会性(homosociality)似乎完全以其异性恋来体现;而它的形式并非是兄弟关系,而是极端的、强制的以及极度易变的掌控和贬抑。



## 第四章 《感伤的旅程》：崇性 主义与世界公民

本章解读的文本，就像下两章所要读的文本一样，记录了某种类似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现代社会表达的形成过程。在《感伤的旅程》(A Sentimental Journey)中，20世纪美国读者感到最陌生的就是那种对阶级划分的相对干脆的处理。我们最熟悉的，而且也是所讨论的这个时期中最新出现的，则是家庭这个意象自动凸现，可以用于描述许多不同的权力交易——这样的家庭是精神分析所设想的家庭，由不同性别的双亲以及作为主体的独生男孩构成。就像更近期的思想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万能与极度无力、阉割与阳物授予、母性的抚育与丧失等等幻想的两极，在《感伤的旅程》和哥特式作品中形成了一个背景，其他的权力交易在上面得以铺展开来。然而，在这个充满哀伤和个人感的温暖空间里——艾利·扎雷茨基(Eli Zaretsky)和其他人将这个空间新的独特性和充实性(*freightedness*)描述为是对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的一种人为补充<sup>[1]</sup>——我们可以发现，霍纳冷血的、控制性的情欲策略经过改头换面，以各种更心理化、听起来更舒服的现代版本出现。尽管《感伤的旅程》和哥特式作品之类的小说给男性通过同性社会性渠道获取权力的复杂策略增添了一抹家庭式的动人色彩，但叙事者计

---

[1] 扎雷茨基，《资本主义、家庭和个人生活》(*Capitalism,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划描述的世俗关系和意义在小说中也十分露骨,并用令人费解,又让人产生兴趣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像心理分析本身似的,这是娃娃脸的帝国主义。

关于家庭的心理分析似的观点通常受到这样的责难:这些观点受制于欧洲资产阶级视角,因而无法将他们的观点延伸到这个视角之外。然而,在本章和下面两章中,我的解读的部分观点是,关于男性同性社会性主体的这种现代叙事第一次作为一种对阶级的广泛而特定的解读得到了最具影响力的铺展:在这些小说中,阶级分化的清晰和广度对正在形成的家庭叙事极为重要。但是,宣称这种叙事具有(或原本具有)强烈的、有意识的阶级意味,并不完全是要赞成它。尽管这种阶级意识敏锐而且重要,但它并不仅仅是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而且还以对劳动者的野蛮田园化以及对贵族身分的征用为基础,而这都是出于中产阶级分子的认知需要。简言之,想要掌控男性同性社会性谱系的新的权力关系,<sup>[2]</sup>取决于调动一种关于“私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新叙事——这种叙事具有社会力量,因为它似乎能够描述并阐明各种跨阶级关系。

——这种事,我说道,在法国会安排得比较好。

——你去过法国?男仆迅速转过身来看着我说道,露出世上最为彬彬有礼而又得意的表情。<sup>[3]</sup>

当劳伦斯·斯泰恩(Laurence Sterne)笔下的约里克向多佛出发时,就像《李尔王》(King Lear)里的格罗塞斯特一样,他这个行为是对别人无意中作出的建议的盲目反应。<sup>[4]</sup>不难理解,为什么双目失明、孤苦无助的公爵会因他的世界中那些重要人物的神秘流动而受到驱使,去寻找一个原本不属于他的目标;但这个因为他的男仆彬彬有礼而得意的一瞥就带着旅行箱

---

[2] 见第5章对18世纪同性社会性的改变的讨论。

[3] 斯泰恩,《感伤的旅行》,第27页。接下来的引文将被整合到本章的讨论中。

[4] 对这个问题,参见克维尔(Cavell)《我们的意思必须与我们说的话完全一样吗?论文集》(Must We Mean What We Say: A Book of Essays),第281—82页。

上路的纨绔子弟则是一种更现代的类型，值得获得更多的社会学关注。或许我们是处在沃德豪斯(Wodehouse)\*的世界里，在这儿，有一名为绅士服务的男仆，他像纪夫斯一样，具有一个仆人不可或缺的随机应变的狡黠，而这种狡黠是维护他主人的身分标志式的纯真所必需的……但也很难说；这个仆人说完了他的五个字，露出了那个表情之后，就从这部小说中消失了。赋予他蔑视(讥讽?)的力量的权威来源似乎并不是某种特殊的个性，而是一个地位，一种功能(或这种功能的缺乏)，绅士与他的仆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在整部小说中，这种关系构成了它在实用主义意义上所缺乏的情感意义和阶级意义。约里克与另一个贴身男仆之间的关系是这部小说中持续最久的、也是最温情的关系之一；而在小说的大部分篇幅中，这种关系是通过对女人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征服和交易而得以表达的。

从某种程度来说，约里克与法国男仆拉夫勒之间纠缠关系的潜在条件是常规的，而这种纠缠关系本身则不是。一种不问是非的家长式作风——他假设他自己的幸福就是拉夫勒的幸福；拉夫勒想提供服务的急切的个人欲望既符合雇用条件，同时又证明他们之间有一种特殊的、私人的关系；拉夫勒关心的事和他的各种关系、事务只不过是约里克自己关心的事和关系、事务的缩微的喜剧版本——潜伏在一种带有优越感的做法后面，即，反复使用“诚实的”、“可怜的”来称呼拉夫勒。拉夫勒就像约里克越过英吉利海峡后遇到的所有农民一样，被视为像个孩子——他做不了任何严肃的工作，倒是可以随时投身于音乐、跳舞和嬉闹。就像一般意义上的农民，拉夫勒对音乐有一种自然的、未经雕琢的天分，而且天性快乐。另一方面，就像孩子一样，他必须受到保护而不必忧虑：当约里克认为他可能会因没有护照而被送到巴士底狱时，

对于我的尴尬难题，我打心底里觉得不能显得太严肃而折磨了

---

\* P. G. 沃德豪斯(P. G. Wodehouse)是英国现代著名作家，他的小说中最著名的角色纪夫斯(Jeeves)是绅士波蒂·伍斯特(Bertie Wooster)的贴身男仆。

拉夫勒，这也正是我刚才如此满不在乎地对待这件事……的原因：为了让他知道它在我心里是多么无所谓，我完全丢开了这个话题；而当他伺候我晚餐时，我比平时更加兴致勃勃地与他谈论巴黎、谈论喜剧歌剧(opéra comique)……这个老实人一离开去吃晚餐，我就开始较为严肃地思考我的处境。

简言之，拉夫勒被怜惜地视为一个累赘，尽管这个累赘给人快乐——他被当成孩子，与他相比，约里克似乎只是个可爱的孩子气的成年人。约里克承认他自己对“成年人”的责任的理解非常不确定，在这点上他很不寻常。他认为拉夫勒与这些责任之间有着不变的孩子似的的关系，而这种看法却很普遍。随之产生的不平衡的结构很像《乡村太太》中性别角色的结构：像霍纳一样，约里克对角色具有自由的、可能是控制性的选择，相对那些较为死板的角色分派而言，这种角色选择显得收放自如。然而，就像威切利笔下的妇女一样，斯泰恩笔下的劳动者没有得到这样的自由。区别在于，霍纳施行的控制——甚至他意图控制他人的强迫症——是这部戏的观众看得到的，而约里克的地位所具有的控制潜力，即使在他使用它并从中得利时，读者和其他角色看到的也都是一种脆弱和无助。

约里克表达对拉夫勒的看法的能力——他需要在赞美的掩饰下去描述他们之间关系的具体形式，并使之正当化——就像是他在拉夫勒身上感情投入的程度一样，并不标志着与一个仆人之间稳定的、世袭的、传统的、父权式的关系，而标志着一种充满焦虑，在意识形态上受到威胁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不是一种传统纽带的标志，而是关于这样一种传统纽带的直接的、意识形态化的叙事，因此暗示了约里克与之前那个较稳定的关系之间形成了新的、充满焦虑的关系。正如我们在前言第三部分讨论过的那样，对意识形态的一个有用的观点正是将它视为一种叙事，这种叙事以理想化的而且显然是同时代的形式，将先前系统过时的或逐渐被废弃的价值直接表达出来，并为新的系统服务，而实际上，正是这个新的系统颠覆了先前的那些价值的基础。因此，约里克不仅不习惯这种

他忙于证明其“自然性”的主仆关系，而且对之极感焦虑。比如，当拉夫勒想请一天假，“pour faire le gallant vis-à-vis de sa maitresse”<sup>\*</sup>，约里克就感到很不自在（“这正是我自己现在想做的事”）；然而，他在自省了自己的感情、自己已有的观念后，发现其中存在着一种现代的、资本主义的自然观和社会契约观，而后者事实上使他难以从自己的仆人那里攫取服务：

——仆人阶级的儿女们在他们的契约中放弃自由，但并没有放弃天性；他们仍是血肉之躯，在主人家的约束里，他们仍有自己的小虚荣、小愿望，就像他们为之服务的主人一样——无疑，他们把自我克制定了价——而他们的期待是如此没有道理，以至于我常常得让他们失望，但他们的身分让我有权这样做。

**看哪——看哪，我是你的仆人**——这让我立即失去一个主人拥有的权力——（第 124 页）

毫不奇怪，让自己直接看到是何种相互抵消的、“自然的”理由使得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放弃自由成为合理——表达这些理由不是用一种关于经济权力及需求的粗鲁的理性话语，一种潜在的平等主义的现代话语，而是用类似家庭责任的那种让人安心的、回顾性的话语——对约里克来说很有必要，而对《乡村太太》中仆人的雇主们却并非如此。如果说拉夫勒像个孩子，他归属（而不是从属）的是一个有点像成人的人：他的雇主。

需再次指出的是，拉夫勒不同于孩子的那个方面在父权主义的历书中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这个方面就是性。让一个仆人在与一个更文雅、拘束或没经验的主人之间的关系中担任起在性方面见多识广、游刃有余的角色，是个常见的主题。又一次地，这里的不寻常在于，展现主仆关系并将其合理化的过程具有情感上的强度、紧密的小说肌理及特异性。两个男人亲自上阵的征服与三角化了的征服之间的自由跨越也有点令人眩惑。我们看到，拉夫勒

---

<sup>\*</sup> 法文，意为“好向他的情妇献献殷勤”——译者注

既忙于进行自己的征服——他总是很轻松，脚踏几只船，而且经常以约里克感兴趣的女人们的女仆为目标，*ad majorem Yorick gloriam*\*——又忙于替自己的主人去寻找机会、去追求。比如，“一个好意的家伙为了我的荣誉而多管闲事”——拉夫勒像毛头小子一样，急着想把约里克最完美地呈现给一个贵族妇女，一个潜在的女保护人(或曰，爱人?)——他的这种热心制造了一种情形：约里克需要马上给她写出一封情书。约里克发现自己笔头生涩，但——没问题：在制造了这个机会空间之后，拉夫勒又填充了这一空间，“为他将要擅自行动而连声道歉……他献上他口袋里的一封信，这是他团里一个鼓手写给一个下士的老婆的，而他敢说，这封信很符合现在这个场合。”“我不想让这个可怜的家伙扫兴……”，约里克说，并读了这个花哨的作品：

它只不过把下士改成了伯爵——而且不提周三站岗的事——这封信谈不上合适还是不合适——这个可怜的家伙为了我的荣誉、他自己的荣誉，以及这封信的荣誉而站在那里直发抖——为了让他满意，我小心地取其精华，按我自己的风格写下来——我将它封了口，让他把它送去给德·L\*\*\*夫人。

(第70页)

约里克用这个典型的满不在乎的做法，通过一套有力的“新奇的”认同而将那个农民和那个贵族妇女搅在一起。约里克没有将拉夫勒从其幼稚的“可怜的”低能者的角色释放出来，但他同时也向他的性建议屈从，让拉夫勒在捕获那个被欲求的女人的共谋关系中，成为他的导师/父亲。约里克将拉夫勒牵涉到这个计谋中来，不但没有忽视他与下层阶级的联系，而是强调、坚持了这些联系，这样，约里克也暗中贬低了——甚至侮辱了——德·L\*\*\*夫人，这个人让他迄今为止还是感到畏惧。那么，约里

---

\* 拉丁文，意为“为了约里克的荣耀”——译者注

克的资产阶级需求和男性同性社会性需求使得他对拉夫勒采取了一种田园式的、分裂的看法：拉夫勒既可以被视为一个不中用的、有依赖性的孩子，又可以被视为性经验老到的父亲/导师。（这些都不能被错认为是平等的；这种田园化的分裂可以和南方白人意识形态中将黑人视为孩子与将其视为奶妈之间的分裂相比较。）于是，被嵌入这个分裂关系中的种种男性的共谋允许约里克双重利用德·L\*\*\*夫人：约里克与她之间的关系保障了他有权带着优越感对待“可怜的”拉夫勒，但是，他与拉夫勒之间私底下的、十分具有下层阶级特点的秘密关系，以及他们凭借如何对付女人的“普遍”男性智慧在他们之间贬低德·L\*\*\*夫人的能力，使得约里克将她牢牢地置于他有权主宰的人的范畴里。

这件事只是约里克能够通过将不同的性别和阶级属性玩弄于股掌之间，从而在自己周围创造瞬间形成的、支持性的、表面上带有平等主义意味的“家庭”的一个例子。性别对阶级的划分究竟有多彻底——阶级对性别的划分究竟有多彻底——我们的主人公对此很明白，而他代表的新的男性形象灵活地应对着这些区别。正如我们提到的，他的策略中还算巧妙的是，在理想化了的“无阶级”核心家庭内进行的妇女交易中，他给他与男人们的权力协商戴上凄楚怀旧的面纱。<sup>〔5〕</sup>也就是说，我不对约里克进

---

〔5〕 把现代的、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家庭描述为“表面上带有平等主义意味”或“无阶级”，是将它与它周围世界的等级形式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压缩的方式表达出来。尽管这样的家庭是通过年龄等级与性别等级组织起来的，它的“无阶级”显然是说，它的成员共享一个社会阶级，而不是为阶级而竞争。（在前工业时代共居的大家庭——例如《亚当·比德》中的坡伊瑟一家——中，则不是这样；当然，现代的非家庭组合从意识形态上被认为与家庭不同，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的组织原则是为了社会晋升而进行的个人竞争。）我们再次看到，尽管社会父权主义和政治父权主义从家庭那儿获得它们的名字，但形成反差的是，家庭的父权主义“表面上带有平等主义意味”，因为儿子长大后获得父亲的地位，女儿会获得母亲的地位，而工人长大后却不会获得业主的地位；如果将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女儿也不会获得父亲的地位。将核心家庭视为资本主义竞争的无情世界中的避难所的看法，似乎既难以根除，又充满矛盾。

对这些问题的出色讨论请参考白瑞特(Barrett),《今天的妇女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问题》(*Women's Oppression Today: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沃尔森(Olsen),《家庭与市场：对意识形态和法律改革的研究》(“The Family and the Market: A Study of Ideology and Legal Reform”),以及扎雷茨基,《资本主义、家庭和个人生活》。

行心理分析式的解读,而是将他解读为一位先锋——他在意识形态上用男性“雌雄同体”和看似普遍的心理分析观念来表达、安抚男性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定同性社会性焦虑。

《感伤的旅程》的社会图景中,哪些特点促成了约里克的种种控制?首先,虽然阶级差异是社会图景借以展开的主要层面之一,却是以极为风格化的语汇来描述的。在这里,我不仅仅是指对仆人/农民阶级的田园化,也是指除了仆人和农民之外其他任何劳动阶级(尤其是男性)的缺席。仆人们对约里克阶级及更高阶级的成员担负个人职责,并受到后者父亲般的照顾;而农民,在该小说田园般的遥远图景中,很容易被看成是图画远景上装饰性的、生动的投影。小说对每一个阶层的审视方式使之经常容易通过个人幻想——中产阶级男人的幻想——被解读。劳动阶级妇女甚至更容易受到这种想象上的挪用:在这样的想象中,她们如果不是私人女仆,就是出售手工织物、手套的商贩,或者确切地说,性服务的贩卖者。因此,这部小说远远没有呈现出一个挑战这些想象的劳动世界,一个偶尔会打击、漠视或甚至从根本上反对有闲阶级绅士各种欲望的世界;相反,该小说以绅士及他的种种欲望的意象来编辑、修正劳动阶级的形象。类似地,在该小说中,贵族的权力,甚至于王室的权力,似乎并不来源于,也没有导致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利益根本不同的利益。约里克与他的贵族保护人之间的差别没有来由,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差别像物种差异一样深远,但也像水银一般容易升华。这是纯粹的神秘;任何物质上的差异(material differences)都表达了真正的差异,但两者之间却没有因果关系。相应地,诸如逢迎、对个人的屈从、摆出傲慢姿态、甜言蜜语、勾引之类的种种家庭式伎俩——这些伎俩纯粹是个人化的,并没有建立在对阶级利益或群体利益的明确感受之上——也很适合用于跨越阶级差异向上爬。

《感伤的旅程》按定义来说是一部旅行小说,这一点似乎至关重要,使它得以令人信服地呈现这样一幅充满渴望与诱惑、而又了无生机的社会



地图。一个英国人(在我们这个世纪则会是一名美国人)为愉悦而旅行——特别是到贫穷的地区或国家旅行——就是要求所有的社会都为幻想的需要服务。这对于性幻想尤其如此。一名我认识的当代旅行者报告说,流行于日本的带英文的T恤衫中(比如,“Let’s Sports Furiously All Day and Sweat”[让我们从早到晚寻欢作乐、大汗淋漓]),最普及的那种款式只写有简单的一个词“SEXUALISM”(崇性主义)\*。这种对性欲的文字物化形式的暗示性利用,是为流动性和世界主义服务的,与斯泰恩作品中出现的那种策略类似。

在我们对威切利的讨论中,我们把“机智”(wit)作为17世纪可流通社会溶剂的名称而抽离出来,认为这个符号既代表了男性同性社会性框架中的政治权力,又能通过升华(通过脱离它作为符号与被象征的物质之间的关系)而成为所谓独立的、没有阶级的商品。在斯泰恩作品中,“机智”依旧是那种溶剂的代名词。比如,约里克让一个完全陌生的人B\*\*\*\*伯爵相信他就是《哈姆雷特》中的那个约里克——他最终因此给自己弄到了一本护照:“*Un homme qui rit…ne sera jamais dangereux*\*\*——如果不是国王的小丑,换了任何一个别人,伯爵加了一句,我都不可能在两个小时弄来这个”(第111页)。然而,在这部18世纪末的心理小说中,除了机智之外,性本身,即性欲,也具有同样的表述上的灵活多变,随时准备去表述各种形式的流动性和权力诉求。在《乡村太太》中,无论性被如何商品化、具有怎样的流通性,它仍然仅仅只暗含于一种情形中——即给人戴绿帽,而在《感伤的旅程》中,每个接触、每个关系、每个交换似乎都在恳求被翻译为性的语言——翻译为充血、血脉喷张、女人的可交换性之类的语言。无需多说,这种翻译的可预期性正是让这部小说听起来如此符合“心理分析”的原因之一。

\* Sexualism 一词虽然对性和性快感的追求有肯定意味,但通常都带有对异性恋之外的性向的排斥甚至歧视。不过,该词尚未形成比较固定的意义。——译者注

\*\* 法文,意为“一个会笑的人永远不会构成危险”——译者注

这部小说在最初几段话中就设定了约里克的阶级策略/性别策略的一些重要语汇。在第二段的中间部分，他的英国仆人的一句话掀起的旋风将他送到了法国，但在那儿他被“抓住”了——不是被法国国王抓住，而是有关法国国王的幻想攫住了他的心：他想到了《外籍人员遗产没收法》(*Droits d'aubaine*)，根据这个法令，外国人死在法国后财产要被国王拿走，他觉得无助，觉得受到了掠夺，因而充满怨气(“太不大度！……先生，这可做得不漂亮；这让我很难过……”)，然后，晚餐之后，他变得慷慨、宽容、超脱，最后居然开心起来——“现在，如果我是法国国王，我叫道——这该会是一个孤儿向我恳求发还他父亲的皮箱的好时机！”

在这些段落中，约里克独自出现，但他的狂想不仅为他想象出了一个法国国王，供他责难、原宥并最终加以替代，而且，还召唤出了一个女性在场，像工具一样，助长、定义、转移并吸收他一系列同性社会性的/经济的/民族—国家的思考在自己心中引起的兴奋。这种兴奋在他身上很典型，身体上表现为热血沸腾的高度亢奋，它以对国王血统的联想(“波旁绝不是残忍的种族……他们的血液中有柔和的一面”)而开始，然后又与酒后的脸红相比较——这种比较被否定了——而后又阐释为一刹那间对金钱的漠视和不屑，而到了这个时候，它才间接地朝着性兴奋的方向延伸：

当人与人和平相处时，他手中最重的金属也比羽毛轻得多！他拿出自己的钱袋，轻飘飘地拿着它，手中浑若无物，他环顾四周，好像在找寻对象，与之共享。——这样做的时候，我觉得我身体的每根血管张开了——动脉一起轻快地跳动，而维系生命的每一股力量毫不费力地发挥作用，这本可以打败法国**最物质的才女**(*physical precieuse*)\*：她本身即使再物质主义，也很难把我称为机器——

我很自信，我对自己说道，我本可以推翻她的信条。

---

\* *Precieuse* 指的是法国巴黎上流圈子中受过教育、谈吐机智的女士。——译者注

这个念头的出现，立即把天性带到了她所能达到的高度——在此之前我与世界和平相处，而这完成了我与自己的协议——  
——现在，如果我是法国国王……

（第 28 页）

对约里克而言，从孤儿到国王的路径就是拿出钱袋，想象着广撒钱财并征服一名女人；而且，如果必要的话，这个幽灵般的女人会在钱袋“放松”的时候不请自来。男性之间这一最初的、想象中的财产及金钱交易——“好像他在找寻对象，与之共享”——借助一名贵族女人对该旅行者的血液流动的专注兴趣，而得以流通。

这个小小的内心戏码，一旦作为约里克想象中的财产建立起来，就在接下来十六个短小的章节中以更宏大的、字面上的、主体间的方式演绎出来。我们获知的第一件事是，如果没有女人意象的存在，约里克与他的钱之间的关系就远没有那么文雅。当一名相貌非凡的方济会修士直接向约里克索要时，约里克被一阵对金钱的焦虑打倒了：他不仅违背了自己所有的原则和情感而拒绝了这位修士（“我中了邪”），而且还因为他的乞讨生活而斥责他。他斥责的根据是，这个世界小小的慈善资源已经承载着“各种各样的沉重诉求”，那么，优先权应该给那些有真正需要的人；“我们自己国家的那些不幸者当然具有优先权”；方济会教派并不积极行善，“在生活中没有什么别的计划，而只是由于上帝的仁爱，才得以在懒惰与无知中度过一生。”（第 30—31 页）

这些清教徒式的、民族主义的狭隘情感代表着一个被压抑着的约里克，那个外露的、振振有辞的约里克对这个他深感羞愧。与他所偏好的外放型风格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已经“把我的钱袋放进口袋了——把口袋扣好——把自己稍微摆正一点”。（第 29 页）他的第一个冲动是去责备另一个想象中的女人，即月亮，认为它造成了“我们情绪的潮涨潮落”：

## 男人之间

在许多情形中，我应该对这样的说法更加满意：“我和月亮有过一段关系，这个关系中既没有罪恶也没有羞耻，”而不是让这事完全算作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双方都有份。

（第 29 页）

约里克想要为自己不慷慨的行为开脱，结果是立即找到另一个女性化身。他找到客栈主人，说服自己买了一辆马车；尽管这笔糟糕的交易的赚头让客栈主人独得了，约里克却将这个交易看成是自己的骑士行为，因为他将这辆车视为一名女性：“对（这辆马车）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但有些话可以说——如果少许言语就可以将她从她的苦难中拯救出来，我憎恶吝于言辞的人。”（第 37 页）他坚持认为客栈主人对这件事必定持有同样慷慨的看法。但实际上，这笔通过（幻想中的）女性苦难而进行的小小交易令人满意地结束了，其结果并非是对购买马车有了什么定论，而是出现了这样一个由两个男人构成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客栈主人肯定了约里克是“一位高贵的男人，而且是……*un homme d'esprit*”。\*（第 38 页）

这个场景中，男性对手跨过一个女人被摧毁的尸身而联合起来，他们的关系在相互支持、相互定义中焕然一新。这样的场景在下面要讨论的小说中会一再严肃地发生，但让它首先以斯泰恩在这里所赋予它的勾勒、戏仿的形式出现，这不失为了一件乐事。就像将想象中的最物质的才女用想象来推翻一样，女人的残骸这一壮观景象——显然究竟什么算作“残骸”，或什么算作“女人”几乎无所谓——为客栈主人与房客、主人与仆人、商人与顾客，甚至是国王与臣子之间权力差异的调整，提供了正确的润滑剂。

但实际上并不是任何女性都能扮演这个角色。想象中的女人们可以；“女性的”有轮交通工具可以；疯女人、农妇、月亮、工人阶级女性、妓女

---

\* 法文，意为“一个精神性的男人。”——译者注

等等，正如我们将要看到那样，一样都可以。但在小说中这一刻，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出现了，她是贵族，而且开始变得清楚的是，另一种如同性别划分一样关键的结构划分在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某些阶级划分具有一种非同小可的分化力量，名字中的“德”<sup>\*</sup>这个成分的结构性力量与性别差异的结构性力量一样强大，并改变着性别差异的意义及其结构性力量。

此时被正式提及的这位贵族女人，之前就出现了。我们被告知，在尚未宣布她的在场时，她已经在发挥作用，默默地影响着约里克的意识和行为：

我告诉读者，我无意走出那辆单人马车，因为我看到那个修士在与一位刚刚抵达客栈的女士密谈着——我这样告诉读者的时候，我说的是实话；但我并没有讲出全部实情；因为那位正在与他交谈的女士的外貌体态让我十分困扰。疑虑划过我的大脑，告诉我说，他正在对她讲述发生过的事情（即约里克拒绝给那个修士钱）：我心里堵得慌——我真希望他是待在他的修道院里。

（第 40 页）

至此，约里克在这位女士身上注意到或推断出的所有信息就是，她“来自一个更高的圈子”，但是，这样一个社会地位已经足以在他周围的稀薄空气中投射出一部三维的家庭罗曼史，在这部罗曼史中，任何男人都可能是他父亲，任何有权力的女人都可能是他母亲，只要他们出现在任何以他作为主题想象出来的交流中。这个想象中的初始场景本可以有这样的幸福版本——孩子在夜里爬到父母卧室的门边，听到的不是他们在做爱，而是在低声交谈：“你听到约里克这个可爱的小东西今天说的话了吗？”而让人不快的版本则是目前这个，即，父亲诉说着孩子的不是；但即使在这个痛

---

\* 即“de”，这是法国贵族名字中常见的成分。——译者注

苦版本中，孩子也都无法想象，他父母之间交流的事情或快乐在主题上会与他无关。

在这一事件中，约里克身处这个想象家庭的中心，由此获得了极大的快感与成功。等到这位女士被直接引入叙事时，约里克已经握住了她的手，靠着这种有力支持，他最终使自己与那位修士之间的遭遇划上了如愿的、让一切合理的句号。约里克的自我控诉与修士和女士对他的赞扬和肯定——“我本不知道争论会让一个人的神经感到如此甜蜜，如此愉快，正如我刚才感受到的一样”（第 44 页）——形成了合唱，这一合唱最终以这两个男人郑重地交换彼此的鼻烟盒而达到高潮。这是，或已经是一种通过女性化而形成男性特质的俄狄浦斯情节——这一点直接体现在让修士淡出小说的两个段落中：约里克说，他一直将修士的鼻烟盒带在身边，用“其主人的谦恭气质”来约束他自己的气质——该修士“在军队服役中只得到可怜报酬，同时，他最温柔的恋情又受到打击，……他于是把剑与性都放弃了”。（第 44 页）罗伦佐神父死后，约里克去扫墓，他继承了这位修士通过弃绝自我克制来获取自由的策略：“我的泪水破了闸——但我像女人一样脆弱；我祈求世界不要笑我，而是怜悯我。”（第 45 页）

但是，不论约里克的弃绝的愿望如何彻底，他从不放弃有关性欲的各种主题——或是说，性欲的“普遍适用”价值。实际上，就像在心理分析寓言中一样，弃绝（renunciation）这个概念只有在性的充斥达到最高值的空间中才有意义；其他形式的弃绝似乎都是不可想象的。德·L\*\*\* 夫人的贵族式严苛通过收回触碰而得以表达（“我因为失去了她的手而羞恼，而我失去它的方式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我这辈子还从未如此惨痛地感受过这种怯懦的自卑”[第 42 页]）；她的慈悲则通过重新回报以触碰表现出来，而约里克在社会阶层起伏的包法利夫人式技巧方面所受到的教育，正是一种关于握手的教育：

我的脉动沿着手指传递到她的手指，泄露出我内心的活动：她垂

下目光——随后是片刻的沉默。

我担心，在这个间隙中，我一定做了某些小小努力，把她的手握得更紧，我在自己的掌中感到一种微妙感觉——并不像是她要缩回手去——而是她似乎有了这样的想法——而如果不是超过理智的本能在这危机关头引导我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我肯定已经第二次失去它了——我松松地握着它，就好像自己随时会放开它…与此同时，我在考虑，如果那个可怜的修士已经把那件事告诉了她，我要怎样才能消除深植在她胸中的对我的坏印象。

（第 42—43 页）

约里克与低于他所属阶级的女性的交往，如果真有什么的话，就更加单方面地性化了。既然似乎只有贵族女性才能表达斥责、严厉或对性的拒绝，那么，约里克与社会阶层低于他的女性之间的唯一问题似乎就是，他是否会屈从于诱惑。当他并不想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显示出对性甚为关注的、坚持的、具有侮辱意味的道貌岸然，这时候，只要看到美丽容颜，他会想象出一名会破坏它的纯真的男子，“某个负心的牧羊人”（第 90 页）：他给小女仆的硬币“是个小小的礼物，我告诉她说，这是我对美德必须要表示的敬意，无论如何我都不愿让那个我为之呈献了敬意的人误解我——但是，我亲爱的，我在你脸上看到了纯真——让任何想占便宜的男人遭殃吧！”（第 91 页）约里克通过把她想象成一名（非特定的）家庭成员，而为自己对她私生活的干预找到了正当理由。“我如此强烈地相信我们的血亲关系，以至于我无法抑制地侧过身去看着她的脸，看看我是否能在其中找到家族特征的任何痕迹——嘖！我说道，我们难道不是亲戚吗？”（第 92 页）

当约里克再次见到小女仆时，对血亲关系的确信不再是障碍——实际上，它是一种刺激，是那个氛围下的必要火花。他们最终一起滚到床上，而他们亲密接触的高潮（如果有的话）被篇章间的间歇（“——然

后——”）遮掩了。在间歇之后叙事者重续的叙述中，很清楚的是，无论约里克在他先前对“负心的牧羊人”的幻想中对小女仆的角色表现出如何热切的关注，小女仆自己——就像书中所有劳动阶级女性一样，她一直没有名字——实际上只是作为约里克灵魂的一种性格练习而出现的。

如果造化在编织她的善意之网时，使得某些爱与欲的丝线纠结其中，那么，是否必须撕破整张网，好将它们抽离出来？——伟大的造化之主，请以苦行来鞭策我！我对自己说道——无论您的圣意将我放到任何地方，来**磨砺我的德行**——无论**我会经历怎样的危险**——无论**我的境况会怎样**——**让我感受**源于造化的**种种行动**，这些行动**属于作为男子汉的我**，而如果**我好好把握它们**，我就会将问题交与您的圣断——因为是您创造了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

（第188页；粗体部分是我自己做的强调）

小女仆的诚实被约里克热烈地道德化了，并通过他摆弄她的缎面小包而将其鲜活地主题化了，她的诚实不一定与她的某种心理过程有关，而与约里克的幻想有关——在这幻想中，他与想象中的男性背叛者和想象中的父性“造物主”对立或认同。至于这位女性本身，她就像这里所有的劳动阶级妇女一样，被随心所欲地想象为既有田园式的纯真，同时又“随时能够提供”性满足。

对于任何欣赏《感伤的旅程》的叙事声音和叙事形式所具有的令人惊异的共鸣性和灵活性的人而言，上述说明听起来会很空洞、很粗糙、抠字眼，而且与这本书带来的特别快感不搭边。实际上，这本书的特征之一——也是它主要的意识形态技巧之一——就在于，对它不论怎样评论都会流于粗暴；它的语气和文体选择是变化多端，极不稳定，以至于批评家发现，很难换种说法来重新讲述“代表性”事件，并将它们抽离出来，或无法对“标准的”读者反应作出假设。



我认为，虽然无法避免粗暴，我们还是要对这本书进行评论——而不是将它作为美学欣赏的对象，作为单纯具有诱惑力的艺术杰作而不去碰它——的原因是，它用来抗拒分析的技巧本身与它具有的性政治意义有着最紧密的关系。例如，营造一个温暖的、假性平等的家庭温情空间，并不是这部小说的主题独力完成的：那种暗示的、紧张的、打断式的风格将读者拖入一个复杂的、镜子似的认同游戏，让读者自己努力去把一连串的句子连贯起来。我认为，标点这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问题——缺乏一个系统来标明说话者的频繁变化——尤其重要。它似乎开放了叙事，使来自社会的不同声音可以民主地渗入，但也使那些声音与约里克的意识元素相融合——同时，它将同一种“现实”赋予于他幻想中的对话者、陪衬者，以及他将周围的人在他头脑中所做的最细小的投射。这个将关于阶级和性别的大型社会学套用在关于家庭内个人发展的私人叙事上的工程，通过将主体之间的问题在内心清晰呈现出来的技巧，而变得更为容易——变得不着痕迹、理所当然。

这部小说精确地将约里克呈现为一名人到中年、体弱多病、没有财产的英国男性知识分子，但这并未完全掩饰他那具有多重性的诱人的叙事声音对普遍性的诉求。相反，这种诉求似乎是，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取得一种普遍意识。而且，或许就像我们在威切利作品中看到的一样，在这个世纪，以文学形式坚持“普遍”价值而从中获益最大的，正是没有财产的知识男性。不论如何，约里克的权力，就像霍纳的那样，是以“认同”及“欲望”之间无交流的对等形式呈现出来的——在这里，“认同”与“欲望”是由性别和阶级决定的：它具有流动性、容纳性和普遍性；别人则是固定的、静止的、局限的。这些是霍纳对他人掩盖了的权力形式；约里克则通过家庭这个意象，而将这个事实对自己神秘化了。

在一定意义上，约里克性爱的闪烁不定决定了，要想将同性社会性元素从异性恋元素中区别抽离出来，会格外困难。但是，又一次地，这种感知困难——主题的这种透明性——并不只标志着某位特定作者的技巧，

也标志着文学上新出现的“普遍”共识，这一共识的基础正是这样一个规范性人物：一个假性雌雄同体的、在性方面极为活跃的知识男性，他处于一个日益爱欲化、以家庭为中心的公共话语的语境中。

我前面提到过，约里克坚持认为主仆关系是“自然的”，这就以回顾性的、意识形态的方式支持了一种与理性得到的结果相比要更为现代、更不稳定的关系。类似地，家庭意象在《感伤的旅程》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同时，丧失了家庭自身的物质稳定性。受到最直接保护的家庭意象是保守的父权农民家庭，它包括“一名上年纪、头发花白的男人和他的妻子，五六个儿子和女婿，他们的妻子，以及他们所构成的快乐谱系”。（第142页）的确，约里克在农收季节的欧陆之行看到的所有农民中，普通农民家庭的特征就是贫穷、顺从和快乐：“这次旅行的每一步中，音乐和着劳作的节拍，而她所有的孩子在扛进收获时都欢欣鼓舞。”（第136—137页）我们看到，描写得最细致的农民家庭直观地展现了这个意象：年长的男性家长“在他整个一生……定下了规矩，晚饭后召集全家跳舞作乐；他说，他相信一个快乐满足的心灵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所能感谢上天的最好方式”；这个男人摆弄着“手摇弦琴”，而“他妻子不时唱几句来应和——然后被打断——而当他们的孩子和孙子们在他们面前跳起舞时，又再加入她的老伴”。（第143—144页）

这段话描述的家庭是田园的、理想化的，如美景一般；但是，当约里克自己的生活 and 关注的事在小说中凸现的时候，这样的家庭就退隐到后面去了。这个家庭意象并没有消失——实际上，它具有更大的力量——但它的确被冲淡了。约里克用来取代由祖父母、儿女、孙辈组成的清晰的、真实的辈分层的，是一个充满内涵的父权家庭意象，他把它当成一种现成的、有力的、但并不明确的“血亲”意象来使用，从而使自己对小女仆的性剥削变得合理合法。类似地，在他对受到背叛的疯农妇玛丽亚的幻想中，约里克没有区分与情妇的关系和与女儿的关系：

痛苦使她的容貌带有某种脱尘出世的味道——但她仍然充满女人味——她身上有你想要的一切，或是想在女人身上看到的一切，以致于如果能读到她心中所想，如果能读出我心中对伊莱莎的看法，那就是，玛丽亚**不应该只吃我的面包、从我的杯子里畅饮**，而且应该躺到我怀中来，像女儿一样依偎在我身上。

（第 140 页）

我们已经讨论过，家庭这个意象是如何极具影响地，同时又不断变化地控制了这部小说呈现的阶级观，特别是因为阶级问题和性别问题是通过俄狄浦斯式叙事和男性同性社会性的叙事而发生交错的。还需要清楚指出的大概主要就是，小说中没有任何关于约里克真实家庭的线索。正如在更广泛的欧洲现代思想中所呈现的，在早期资本主义的分裂作用下，当家庭本身的管辖范围及私人物质基础变弱、内部矛盾更大时，“家庭”这个概念的意识形态力量就会增强。福柯《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的观点之一就是，一个本身闪烁不定的、可抽象的“性”意识的盛行——或者至少是它的传播——也伴随着在意识形态上对家庭的否定。

在接下来两章的文本阅读中，一个在《感伤的旅程》中——实际上，在所有这三部前现代的作品中——隐藏起来或不见踪影的术语将被重新介绍引入；在这些作品中，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通过妇女而迂回获得表达，被简单地看成是非有不可的规范，尽管有风险。这个要重新引入的词就是“恐同”(homophobia)。在英国哥特式小说中，直接扔掉这个女性中间项的可能性——也是诱惑和危险——就变成了一个直接的、甚至是令人着迷的文学主题。随之而来的对性和同性社会性纽带的处理方法则在组织上更趋紧密，并对它们公开禁止。在斯泰恩作品中，这个朝着家庭方向的转移是隐含的，但在哥特式小说中，它被具体表现出来。同时，哥特式小说延续着 18 世纪小说对跨越阶级、跨越性别的关系的兴趣；它进一步试验阶级和家庭的相互映射，同时也试验着对阶级关系的其他解读。

## 第五章 走近哥特式小说:恐怖主义与同性恋恐慌

《乡村太太》出版之后的一个半世纪对于男性同性社会性谱系以现代方式具体呈现而言,似乎至关重要。阿兰·布雷(Alan Bray)的《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的同性恋》(*Homosexuality in Renaissance England*)是迄今为止对19世纪之前的男同性恋最为成熟的历史研究。布雷在该书中指出,复辟时期前后有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发展:第一,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男同性恋亚文化;第二(这一点对我们在这里的目的更为关键),形成了一个恐同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以世俗的、描述性的方式形成,似乎足以给英格兰公众的日常经验提供一套可用的认知范畴。在布雷的描述中,17世纪之前对男性同性恋(male homosexuality)的压迫主要表现在神学对它的厌恶,尽管这种方式很绝对,而且具有预示世界末日的意味,但是人们很难将其运用到他们的日常行为以及对这些行为的感受中去。只有到了17世纪末期,布雷才找到基于确认的同性恋身分而依法“屠杀”(pogroms)——用他的话来说——这整个群体的男人的证据。

并不是说同性恋受到更为强烈的否定。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对同性恋的敌意绝对增加了。……这种变化并不是绝对的,而在于人们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反对那种敌意;这种变化的原因不在于敌意

本身,而在于它的对象。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文化,它引起人们关注,延伸了表达同性恋并使之获得识别的区域;服装、姿势、语言、特定建筑以及特定公共场所——所有这些都可能被指认为具有特定的同性恋涵义。<sup>〔1〕</sup>

与可能参与了新的同性恋亚文化的人数相比,在这些“屠杀”中丧生的男子的确切数量很小,但在布雷的描述中,法律上的迫害具有一种不成比例的效应,一方面威慑了正在诞生中的同性恋身分,另一方面又巩固了它。他认为这种身分的制度场所(institutional locus)是“毛丽屋”(molly houses),即男同性恋者们(gay men)进行社交的酒馆、场所。尽管依法进行的“屠杀”对这些地方具有恐怖主义威慑的意图和效果,但布雷也试图解释,为何这些地方在较长时间里被允许开放,并相对较少受到骚扰。

尽管处在充满紧张与敌意的氛围中,它们实际上受到了容忍;这与周期性屠杀的暴力和彻底的野蛮并不一致。对所有观点相反的断言而言,无法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发挥的作用远远超过了满足那些来这里寻求庇护的人的需要:无论社会的态度有多么暧昧,这些地方对于该社会而言,还是有利的。……它们实际上具有双重功能,因为,它们一方面限制了同性恋的散布,同时又保障了它的存在。接纳这样的新身分会招致可怕的前景;对某些人而言,这太过分了。如果同性恋会牵扯出这么广的意涵,那么,对很多人来说,就不能听任它这样下去。那么,那种充满敌意但也切实存在的容忍是否令人吃惊?因为同样的原因,对某些人而言,毛丽屋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提供了一种逃避手段,而对其他人而言,它们有效地关闭了大门:这里牵涉的东西太多了。它们因而既满足了迫害者也满足了被迫害

---

〔1〕 布雷,《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的同性恋》,第92页。

者的需要。<sup>〔2〕</sup>

尽管布雷认为这个社会对毛丽屋的容忍——这种容忍是有限的、具有边缘化作用的——就像它对它们(不定时发生)的迫害一样,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但我认为,他的观点被一个暗含的假设局限了,这个假设就是,男性同性恋与欧洲社会秩序在本质上不相容:即,如果对男性同性恋的管控是通过恐怖主义的选择性而不是通过集体屠杀进行的,那仅仅是因为牵涉其中的男性数量太大,因为迫害本身往往会巩固它们打算根除的同性恋文化。

(毛丽屋)并不难找到;它们不堪一击。那么,为什么对它们只采取遏制?为什么不把它们连根拔起、一了百了?这种似是而非的思路是造成不稳定的原因,结果是两种矛盾反应之间不稳定的平衡。“风貌改造社”(Societies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找到它们的立足点的;它们的作用就是在可能的时候颠覆这个平衡,使遏制变成屠杀和集体灭绝。但这个任务最终无望完成。有时候,即使你的右手得罪了你,你还是无法将其割舍。这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毛丽屋并不是社会里一个可以被割舍的有限实体:它是社会本身的一种功能。因此,当放血治疗结束后,那些当初产生了毛丽屋的压力再次开始运作;它们再一次出现,并获得一种危险的稳定,直到出现另一个镇压它们的行动。不仅是间歇的迫害最终无法达成目的;反讽的是,当公开的迫害结束后,它们为重新创造毛丽屋的那些压力打了气,因为,正是这些明显的、无可避免的敌意使得毛丽屋成为如此紧迫的必需。<sup>〔3〕</sup> [粗体部分是我自己作出的强调]

---

〔2〕 布雷,《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的同性恋》,第102页。

〔3〕 同上,第102—3页。

布雷宣称自己是在描述毛丽屋和新兴的男性同性恋文化如何“是社会本身的一种功能”。但在效果上，他以形容水压的方式，将它们描述为是施于社会的外来的、敌意的“压力”，或至多仅仅是它的气态副产品，而社会出于自己的保守利益，必须尽可能地减小其影响——不论是通过根除（这并不可行）、压迫（这达不到预期目的）还是疏导（这相对有效）。在这一点上，布雷的论述不仅不如它本可以达到的那么灵活，而且有点循环论证，因为布雷描述的“压力”只可能来自某种已经形成的同性恋实体（不论是社会的还是心灵深处的），而与此同时，他所着意描述的，正是这个实体的形成。他似乎觉察到了这个循环论证，而且对其并不赞成，但他的概念模式并不允许他打破这个循环。毛丽屋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社会本身的一种功能”？

布雷在这一点上的论证与杰弗里·威克斯从玛丽·麦金托什(Mary McIntosh)的观点所引发的论证相似：现代“同性恋角色”

具有两个效应：它首先帮助建立了允许行为和不允许行为之间的清楚界限；第二，它帮助将那些被标记为“变态”的行为从其他行为那儿分开，从而遏制、局限了他们的行为模式。<sup>〔4〕</sup>

我们至此对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它包括但又不局限于“同性恋”的男性纽带的谱系——的重要性进行了讨论。我认为，这个讨论对布雷关于“毛丽屋”是如何对整个社会行使一种功能的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个极不相同而更为辩证的初步答案。因为，虽然男性肉体同性恋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社会本身的一种功能”（也就是说，社会持续性结构和社会交易结构中一个必要的非偶然要素），但是，很清楚的是，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这个较大的范畴的确具有那种作为信号的重要性。

---

〔4〕 威克斯，《现身：19世纪至今的英国同性恋政治》，第3—4页。

显然,在交换妇女的框架内,对社会结构的每个方面都至关重要的是,男人之间存在着沉重的纽带——这些纽带是作为社会形式(或多种社会形式)的支柱存在的。同时,这种结构的影响之一就是,对男性同性社会性谱系——即一整套(或许必须是任意的)用来定义、控制及操纵这些男性纽带的区别方式——在意识形态上的利用将是社会控制的工具,这种工具有着不成比例的权力。我认为,“同性恋”(homosexual)这个范畴的重要性——或重要性之一——并不一定来自它与一个新出现的或已经形成的同性恋少数群体或欲望之间的制约性关系,而是来自它的潜能,这种潜能赋予任何拥有它的人一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对决定社会构成的所有男性纽带起着结构性的定义作用。

指出这点后,让我回过头来进一步阐明。布雷无意中“将同性恋者”物化成了一个已经形成的实体;这带来的可能问题之一就是出现了一套关于“社会”或“现状”对压迫或控制这个实体的兴趣的不成熟假设。因此,甚至在对“同性恋者”物化之前,就必定出现对“社会”的物化,将其塑造成是与“同性恋者”相对抗的。这对布雷的论点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功能主义效应。他说,毛丽屋“既满足了迫害者也满足了被迫害者的需要”;但是,既然他所说的“迫害者”显然不是指“恶习预防社”(Societies for the Prevention of Vice),那么,并不清楚他能用这个词来表示什么,除非是某种以同义反复的方式形成,并通过遏制同性恋来获得利益满足的实体。但很清楚的是,他要求我们将这种实体解读为与“既有的权力”、“现状”或某种对社会构成的同样稳定和—统的描述同存共延。以这种方式描述出来的实体,如何不具有某些可能通过对男性同性恋的遏制而达到的目的呢?

从被压迫群体的角度书写历史,似乎会无可避免地会走向功能主义的语义重复——本书也无法完全避免这一点。但是,对于上述模式,我们至少能够详细说明,从认知上分化并因而操控男性同性社会性谱系的力量本身,必须总被视为努力的目标,而不是消极地躺在被物化了的“现状”



中的某种东西。在任何“现状”里，甚至在它里面更具有特权的构成成分中，利益竞争将会产生具有重要意识形态意义的社会交叉点的各种竞争模式及套路。而虽然这整个过程的结果可能因此不是某个单一利益“所期望的”，但其产生的权力空间——甚至可能是权力真空——就会有力地招致不同利益代表对它的挪用，而这些利益本身也因为被牵涉其中而发生改变。

因此，要描述新的社会发展或技术发展的压抑性历史，并不需要使用什么阴谋论，不需要幻想某个特定派别或特定利益无所不在或无所不能。但它也不需要同样一概地拒绝考虑不同民众的不同利益。布雷似乎采用了福柯的观点，将社会的整个肌体作为单一机体加以人格化（不过在布雷的案例中，恐同压迫的对象被排除了），这是一个不同于阴谋论的庸俗多重人格化的观点。与布雷不同，福柯意识到，解释（explanation）的功能主义语义重复并不能通过这策略来展开，因此，他很大程度上干脆悬置了“解释”这个范畴。布雷没有追随福柯这个代价昂贵的举措，这很对；但他对恐同的社会效应范围采取了一种不成熟的狭隘观点，因此延续了而不是拆解了那种被置于“社会”与“同性恋”之间的并不说明问题的对抗关系。

实际上，一旦被布雷敏锐地捕捉到的世俗化情形使得“同性恋者”成为描述实际经验的范畴，那么，所发生的就不仅仅是新近出现的少数群体压迫的条件已被设定，而是一个崭新的、极为有力的工具出现了，可被用来控制通过性别系统折射出来的每一种权力形式——也就是说，欧洲社会的几乎每一种权力形式。这个工具——即对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各种形式设制禁止性或描述性限制的能力——不是由社会任何一个代理（agency）所创造的，而成了那些希望掌握它的人竞逐的对象，同时也成为一种压迫工具，被用来对付那些在特定时间做出它所禁止的行为的人。因此，现代欧式恐同所描绘的是一个统治空间，或是说一个统治机制，而不是那种统治的代理、动机或政治举措。只要有可能在这样做的时候不

低估欧洲同性恋压迫及身分的特异性和严重性,那么,在分析上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记住,这种策略提供的统治不仅针对一个少数人群,而且凌驾于架构了所有社会形式的纽带之上。

如果我们将恐同看作是通过少数人的特定压迫来制约多数人行为的机制,那么,这就更有利于我们思考布雷提出的问题。他问道,在一个恶意恐同的公共意识形态下,我们如何解释,大部分时候,大多数毛丽屋享受了那么多的相对持续的平静期?或者把这个问题延伸成一个关于现代欧式恐同的更广泛的问题:如果对男同性恋者的压迫所具有的结构是边缘的、恐怖主义的、提喻式的,而并非大规模的、灭绝式的、与字面意义相同的,这说明了什么——这对谁有利?

在此,我将“恐怖主义的”与“提喻式的”这样的形容结合起来,以描述一种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这个关系在构成上是不稳定、不可确定的。如果宣扬自己的权利和自由的美国黑人不仅知道他们中一定比例的人会被杀害,而且知道哪些人会被杀害,那么,暴民通过私刑实施的恐怖主义就不会成为一种有力武器。种族灭绝这个“解决方法”在美国南部从来都不可能,因为确切来说,斗争针对的是对劳工力量的控制:只有恐怖主义特别不成比例的效应——它通过暴力的随机性而成为可能——才能产生所需的杠杆作用,同时不会摧毁它所作用的身体。

欧洲社会或许真的“需要”有同性恋男性的存在,也可能并不需要。它真正需要的——或者,用不那么功能主义的方式来说,它的构成利益以多种方式来利用的东西——是一种不成比例的杠杆作用,这种杠杆用以操控所有男性伴侣之间的纽带形成方式。然而,要维持这种不成比例的杠杆作用,就要求权力的展现是不可预测的,而且与受到公开管制的“犯罪”之间具有不稳定关系。(比如,在美国南方,即使强奸是对黑人男性施与私刑的借口,遭受私刑的男人中甚至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受到了强奸指控。而对恐怖行为的合理化与其实际实施之间的这个差距,并没有削减它们的恐怖主义效力,而是其重要部分。)

如要详细说明世俗权力对男性纽带的作用，那么，可以说，对毛丽屋的迫害在性质上类似屠杀，而身明确分的同性恋男性不知道是否会成为合法暴力的对象。但也需要一种更为微妙的应对策略，它与上述策略互为补充，用以加强对那些不属于明确的同性恋亚文化的男性纽带的控制。不仅同性恋男性必须(must)无法确定他们是否会成为“随机的”恐同暴力的对象，而且没有人必须一定能够确定自己不是(他的纽带不是)同性恋。这样，只要行使相对较小的身体强迫或法律强迫，就可能控制很大范围的行为和关系。

上一段落中反复出现的“必须”一词以一种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的方式与我们刚刚讨论过的功能主义相挑逗。(它用一种更为有力的形式，表达了“这并非偶然……”这个闪烁不定、带着不良预兆的说法。)但是，又一次地，我们所描述的是潜在权力的一种空间或机制；要激活它的确要求操控上一段中勾勒的那种钳子运动；在过去三个世纪的欧洲和美国文化中，这种激活已经为了不同利益而被反复实施或尝试；而且，尽管意识形态的各种过程依赖于过去，并在结构上极为保守(见“引言”第三部分)，但得到的结果却是通过恐同的杠杆作用产生的恐怖主义潜能、可敲诈性(blackmailability)和西式男子特征(Western maleness)等等在结构上的残余。

对许多 20 世纪的西方男性而言，面对恐同敲诈的社会压力，他们感到非常脆弱，而所谓的“同性恋恐慌”(homosexual panic)正是这种脆弱感的最为私人的、心理化的形式；但即使对他们而言，那也仅仅是控制的一种途径，与公众认可相互补——福柯和其他人认为，这些公众认可所依赖的制度定义并制约了“性恋者”(the sexual)的无定形疆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并将在第八章进一步讨论的那样，在性压抑的现代语境中，“性恋者”的身体的无定形性(amorphousness)正是其政治力量的栖息地。)

从这个角度看，另一种现象开始产生了新的意义，即，最受肯定的男性同性社会性纽带的形式与最受非难的男性同性恋的社会性表达之间，

出现了重要的呼应和相似之处。用 20 世纪的美国方式来说就是,在橄榄球赛上,在各种兄弟会中,在波西米亚林\*以及在战争小说的高潮部分所发生的事看起来——只需稍微变换一下视角——可以具有惊人的“同性恋”意味;这一切并非主要表达这些组织机构的心理源头是被压抑或升华了的同性恋性欲。<sup>[5]</sup>相反,这是一个具有强制意味的困境通常隐含的条件逐渐明晰的过程。<sup>[6]</sup>(这可以与困扰美国女性的关于强奸的困境相比较:在穿着或行为上“有魅力”——即,像指定的那样——总是被视为“自找苦吃”。)区分“让男人成为另一个男人的男人”与“对男人有兴趣”这两种情况的,仅仅只是一条看不见的、被小心翼翼地混淆了的、总是已经被逾越了的界线。这些条件,这些一致性现在已经根植于我们的文化中,而且大概已经无法根除。然而,谁可以自由地定义、操控并得益于由此产生的窘境,这个问题在今天,和在 18 世纪一样,仍然是一个斗争的焦点。

这样一个看法现在似乎已经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了:男同性恋(male

---

\* Bohemian Grove(波西米亚林),参见本书“引言”注 12。它是位于加州濒临太平洋的索诺马县境内的一片营地,属于波西米亚俱乐部(Bohemian Club)。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是男性,包括政商名流、艺术家、影视明星等各个行业、领域的重要人物。要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会员很难,因此,拥有它的会员身分往往也被视为身分的代表。该俱乐部常常被作为男性权力的象征而受到批评。——译者注

[5] 关于这一点,参见萨洛特(Sarotte)的《像兄弟,像情人:从赫曼·梅尔维尔至詹姆斯·鲍德温的美国小说与戏剧中的男性同性恋》(*Like a Brother, Like a Lover: Male Homosexuality in the American Novel and Theater from Herman Melville to James Baldwin*)和霍赫(Hoch)的《白人英雄,黑人野兽: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特质的面具》(*White Hero Black Beast: Racism, Sexism, and the Mask of Masculinity*)。军队是男性同性社会性最强的机构,也是男性的可控制性最受重视的地方。从这个角度看,男性同性恋与军队之间那种被不寻常地恶化、被严格地、惩罚性地控制的关系得到了解释。威克斯在《现身:19 世纪至今英国同性恋政治》一书第 12—13 页对这种制约的历史作了简短的讨论,但没有对它进行阐释。

[6] 怀特海德(Whitehead)的《赫特福德郡的性敌对》(*Sexual Antagonism in Hertfordshire*)一文以及鄂伦莱希(Ehrenreich)的《男人的心:美国梦和对承诺的逃避》(*The Hearts of Men: American Dreams and the Flight from Commitment*)一书的第 14—28 页都有这样的例子。

gay)运动在其整个历史过程中的主要目标不在于重新定义“同性恋”(the homosexual),而在于控制或重新控制历史遗留定义的使用及其影响。(比如,我们可以想一想自石墙事件以来的同性恋政治中,变装(drag)、坎普(camp)以及极端行为所处的争议地位。〔7〕)在“保守”政治内部——比如,在共和党内部,在其“道德多数派”与资本主义选民之间——关于如何(有针对性地)、以及出于什么目的利用美国恐同和同性社会性的残余形式等等问题的斗争,同样很激烈,但不那么公开。

本书并不特别关注同性恋经验,而是关注整个男性同性社会性谱系的形状,以及它对妇女的作用。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研究男性同性恋历史的学者已经在探究对这一新兴的亚文化进行的迫害的性质、发展和效应;我们自己的重点则放在这些机制上,放在伸入他们自己生活中的意识形态触角上——通过这些机制,未被确认为同性恋的男性会通过恐同的敲诈性而受到控制。

本章和下一章要讨论哥特式小说,将它作为重要着眼点,来理解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欧洲文化如何利用恐同去分解、控制男性同性社会性谱系。在某种程度上,以这样的方式看待哥特式小说与现代批评对哥特式小说的“常识”是一致的,这些批评常常将其视为是对“变态”(the perverse)的探索。我大学时开始看哥特式小说,是因为它们拥有颓废(decadence)的诱人名声。颓废是个极不稳定的概念,〔8〕但很清楚的是,它对中产阶级青少年的诱惑在于,它承诺提供通往成人世界秘密真相的捷径。性的秘密是由那些与官方版本正好相反的实践(最直接的就是乱伦和强奸)代表的。与这些情况紧密相关的是,在颓废文学中,阶级的秘密是由资产阶级的某些人群代表的,这些人可以置身于本阶级的生产方

---

〔7〕 关于这一点,参见威克斯,《现身:19世纪至今英国同性恋政治》,第185—237页。

〔8〕 理查德·吉尔曼(Richard Gilman)用一整本书——《颓废:一个词的奇异生命》(Decadence: The Strange Life of an Epithet)——的篇幅来讨论这个词意义的游移,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仅仅只要将它作为“同性恋”的委婉语来理解,它的不少用法就可以获得解释。

式之外，而且，通过学会表达过时的贵族价值观，他们似乎可以提供某种针对资产阶级官方文化的批判或现成的杠杆作用。

然而，即使在天真的、抱负远大的读者感受到的颓废之魅外，哥特式小说还以戏弄的方式献上了对重要历史问题的洞察。在工业革命历史框架内，哥特式小说沉迷于中、上阶级相互重新评估的各种戏剧化版本中。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内，哥特式小说与新兴的女性作家群及女性读者群之间的关系都是个恒量，而且，历来有一些有用的批评方法，试图在哥特式小说中探询在父权统治形式不断改变的情况下的妇女地位。<sup>〔9〕</sup>与“颓废”的名声相关的一个不那么明显的要点是：在英国，哥特式小说是最早与男性同性恋产生紧密的、相对可见的关系的小说形式，那个时候，不同风格的同性恋，乃至它的可见度和独特性，都是不同阶级之间以及性别之间分裂与紧张关系的标志。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哥特式小说似乎特别展示了个人心理和家庭心理的图景。俄狄浦斯家庭的某些特点持续在这里凸显出来：比如，特许(license)和禁止(prohibition)之类的绝对概念；对乱伦可能性的极大关注；沉迷于对性行为的禁止；由不同辈分之间的暴力威胁所主导的氛围。就连那些不把俄狄浦斯家庭作为跨历史的假定事实来接受的读者，也能从哥特式小说学到很多东西，比如，俄狄浦斯家庭是在怎样的条件下被作为资产阶级社会规范而强制实施的。实际上，哥特式痕迹在弗洛伊德作品中随处可见，不仅仅只存在于《论诡异》(The “Uncanny”)、《错觉与梦》(Delusion and Dream)等文学研究论文中；因此，虽然有些绕圈子，但毫不奇怪的是，心理分析可以作为分析这些文本的工具，而这些文本则为它提供了许多起结构作用的暗喻。

与哥特式小说尤其相关的是弗洛伊德在施莱伯博士(Dr. Schreber)的案例中得出的观点，即偏执狂(paranoia)这种精神病将恐同的机制栩栩

---

〔9〕 请参见墨尔斯(Moers)的《文学女性》(Literary Women)以及吉尔伯特和古芭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等例子。

如生地表现出来。在下一章我们关于哥特式小说的讨论中，我们不会简单地相信弗洛伊德的分析，而将会就一本小说来仔细地检阅它的依据和论述。但是，首先要看到的是，代表了早期“经典”哥特式小说的有限小说群中，包含了一个较大的亚类——《卡勒布·威廉姆斯》(*Caleb Williams*)、《弗兰克斯坦》(*Frankenstein*)、《一名清白罪人的告白》(*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或许还包括《梅尔莫斯》(*Melmoth*)，乃至《意大利人》(*The Italian*)——它们的情节与施莱伯博士的案例几乎丝丝入扣地吻合：最突出的是，每部小说都围绕一名或多名男子，该男子受到另一名男子的迫害，而且认为自己在那位男子面前一览无遗，并经常受到他的强迫。如果我们接受弗洛伊德的假设，认为这样一种受迫害的感觉通过将原始同性恋欲望(或甚至只是同性社会性欲望)改头换面，代表了一种充满恐惧的、幻觉上的拒绝，那么，就有理由认为，这组小说具体表现了强烈恐同的机制。(这并不是说这些作者[他们不同于小说人物]或这些小说总的文化效应必定是恐同的，而仅仅是说，通过这些小说，一个恐同主题的传统成了推动哥特式小说发展的力量。)

同时，对其他经典的早期哥特式小说——而不是僵硬意义上书写偏执狂的小说——的一组作家(沃尔波尔[Walpole]、贝克弗德[Beckford]、刘易斯[Lewis])而言，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人在某种重要意义上，都是同性恋——贝克弗德可以说是众所周知，刘易斯有可能是，而沃尔波尔则不太确定。贝克弗德在1785年被逐出英格兰，罪名是与一个比他小的男子有染，而且，他还与其他年轻男人之间有过证据确凿的恋情。描写过“修士”刘易斯的不同作者不同程度地相信刘易斯有过“男性情人”的说法(比如，拜伦就这样说过)；路易·F·派克(Louis F. Peck)是位谨慎、保守的传记作家；他似乎认为，尽管拜伦的描述“无法被证实或推翻”，却是可信的，在他写的传记中，尽管未做评论，但却包括明显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至于沃尔波尔，他的档案研究者维尔马斯·路易斯(Wilmarth Lewis)只

是总结说,还没有任何关于“公开行为”的“证据”“浮现出来”。<sup>[10]</sup> 贴在这种体裁上的“颓废”和“暧昧”的污名(有时是光荣的),无论如何更多地是因为这三位作家,而不是另外五位。哥特式小说将男性同性恋与恐同之间的辩证关系向英国读者明晰地呈现出来,在这种辩证关系中,恐同以主题的形式出现在有关偏执狂的情节中。但是,直到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哥特式小说中,才出现了可以相提并论的同性恋主题。在更早的哥特式小说中,与男性同性恋的关联最为明显地出现在少数几名作者的生活中,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只是粗略出现。

布雷的《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的同性恋》关注点之一是,质疑将英格兰男同性恋、或曰一个新兴的男同性恋亚文化与贵族阶层相联系的刻板模式——散布这种模式的是诸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之类的历史学家<sup>[11]</sup>以及流行文学。根据布雷出示的证据,经常光顾毛丽屋的英国男人的社会背景极为多样。另一方面,似乎也真的存在这样的情况: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界线——这条线实际上被削弱了,但在意识形态上又被认为是存在的,就像18世纪末的时候那样——对于如何分配关于男性同性社会性谱系的形状的知识和看法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区隔线。例如,保守派对可见(visibility)与不可见(invisibility)的利用对不同阶级有显著区别:沃尔坡尔的生活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良好记载;但对于他本人,我们无法说出他陷入同性恋究竟有多深,因为其贵族环境提供了密切的保护色。对于贝克弗德,总的来说我们知道得更少,但他的同性恋行为是个公开的丑闻——这个丑闻不仅被制造出来,而且定期更新,这样才能

---

[10] 关于贝克弗德,参见亚历山大(Alexander),《英格兰首富:威廉·贝克弗德研究》(*England's Wealthiest Son: A Study of William Beckford*);关于刘易斯,参见派克,《马修·G·刘易斯生平》(*A Life of Matthew G. Lewis*),第65—66页;关于沃尔坡尔,参见维尔马斯·刘易斯,《霍拉斯·沃尔坡尔》(*Horace Walpole*),第36页。

[11] 斯通,《1500年—1800年英格兰的家庭、性和婚姻》(*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第541—42页;布雷在《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的同性恋》第138页注释26中对此做了讨论。



将他的新近富裕起来的家庭排除在贵族阶层之外。

与此同时，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那样，为资产阶级创造意识形态意义的人们忙于构建一种社会世界的景象，在其中，英国的阶级体系被塑造成俄狄浦斯家庭模式，而贵族扮演了注定要被推翻、被吸收的父母的角色。这种意识形态构建的一个重要的、反复出现的、一厢情愿的姿态，就是将贵族作为一个整体女性化了，这样，与中产阶级健旺、富于生产力的价值观相比，不仅是贵族妇女（就像在斯泰恩作品中一样），而且整个阶级的抽象形象都被视为是轻浮的、装饰性的、多余的。（就如我将在第7、8章中讨论的那样，这种将“女性特质”与“贵族特质”对应的做法，也代表了女性特质意识形态的一个特别要素；在这里对性别意识形态与阶级意识形态相互对应的讨论中，重要的是继续强调，性别概念和家庭概念的意义就像阶级概念的意义一样，取决于历史。）

如果我们审视英格兰明确的同性恋角色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至少从17世纪开始，与男同性恋的一种现代典型明显相关的某种东西已经存在，至少在贵族中是这样。关于这个角色（詹姆斯国王版本？）的各种联想包括女性化、鉴赏家身分、高等宗教，以及对天主教的欧洲国家的兴趣——所有这一切都与哥特式传统有联系。（如果这种文化和布雷拿来与毛丽屋相联系的同性恋文化不同，或只有部分交集，或许是因为他的研究关注的是英格兰；流动性和国际主义是最能将英国贵族与其同胞区别开来的特征之一。）当然，这一典型与一个适用范围更大的贵族典型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异，至少在资产阶级看来是这样。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爵士与一名摄政时代的异性恋浪荡子之间在风格上的关联应该比道格拉斯与诸如豪斯曼斯(Housmans)或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之流的19世纪中产阶级同性恋之间的关联更为紧密，后者受这个贵族传统的影响相对较少，转而去扮演对男子气概的强调超过女性气质，对古典正统风格的强调超过欧陆风格的同性恋角色。（请参见第9章和结言部分，这些章节对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男性同性恋各种风格的阶级划分做了

进一步讨论。)

早期哥特式小说的奇怪命运还表现在：尽管这个文体就整体而言有争议，但到 19 世纪，正当贵族在英国社会失去它的规范性力量的时候，它似乎成了具体表现贵族同性恋角色的一种方式。而到了 19、20 世纪之交，在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之后，“贵族”角色已经变成上层和中产阶级同性恋男性最重要的可用角色。这个转变带来的其他后果之一可能就是男同性恋者在政治上的孤立，这一直持续到 1960 年代；同时，男性同性恋似乎也对英国上流文化产生了相当大的、潜移默化的、在许多方面甚为保守的影响。<sup>[12]</sup> 这一转变对新出现的“男子情谊”(male bonding)这一中产阶级恐同文化，对女性以及对有关女性的看法所具有的结构上的重要意义，是全面彻底而且非常复杂的。

“不可言说”(the "unspeakable")是最独特的哥特式象征之一，它在这一系列转变中扮演了征兆式的角色。在整个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男人之间的性关系在那些知晓它的人之中是出了名的，而这正是因为它没有名称——“不可言说”，“不可提及”，“不能在信奉基督的男人中得到命名”等等都是路易·克朗普顿记载下来的说法。<sup>[13]</sup> 当然，它的无名、它的秘密性质，都是一种社会控制形式。正如我在别处以较长篇幅讨论过的那样，<sup>[14]</sup>许多哥特式小说评论家都提到过，哥特式小说中充满了关于不可言说的事物的语言。比如，在《梅尔莫斯》这部关于偏执妄想的小说里，当身为迫害者的梅尔莫斯终于拖垮他的受害者，使他们完全处于接受状态的时候，他才告诉他们他想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但究竟是什么，则从未清楚地传达给读者。手稿在说到这一点时支离破碎了，或是说，变得

---

[12]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的例子包括乔治·斯戴纳(George Steiner)的《背叛的牧师》(The Cleric of Treason)一文，特别是第 179—183 页。然而，我发现，要找到关于这种男性同性恋影响的范围和可能的效应的非恐同的好材料，出奇地困难。

[13] 克朗普顿，《同性恋灭绝：从利未记到希特勒》，第 67 页。

[14] 塞吉维克，《哥特式套路的一致性》(The Coherence of Gothic Conventions)，第 14—20 页。

“完全不可识别”，说话者被这个不可发出的词掐住了喉咙，或是说，这个说法被描述为“充满了恐怖和不虔诚，以至于只是听到它都会犯下不比依从它来得小的罪过！”<sup>[15]</sup>

“不可言说”这个象征在这里似乎具有双重功能。它较为明显的所指是一种浮士德式的协定，因为梅尔莫斯实施了“那种[无名]之术，而它被所有‘信奉基督之名’的人深深憎恶”。<sup>[16]</sup> 这双重意义的另外一半——关于性的那一半——是马图林的观众中的普通人（可能也包括马图林自己？）无法理解的。然而，这却对马图林的侄孙奥斯卡·王尔德有一定意义。70年后，王尔德因为同性恋罪名而遭受耻辱、受到监禁，在他被迫离开英格兰后，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梅尔莫斯。

但是，尽管在浪漫主义时期，哥特式的不可言说是指代阶级与男人的性(male sexuality)之间的特定关联的一个几乎无法穿透的黑话，到19、20世纪之交，它的角色发生了巨大变化。部分通过王尔德自己自愿和非自愿的影响（“我就是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那份爱”），曾经的黑话变成了口头禅。曾经属于贵族的同性恋风格——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伴随它的恐同风格——现在席卷了中产阶级，而且，就像我已说过的那样，带来了复杂的政治效应。哥特式小说也发生了改变：《梅尔莫斯》或《瓦泰克》(Vathek)中的同性恋暗涵已经变得深奥难懂；《道连·格雷》的部分内容成为了——或被用作——同性恋风格和行为的指南手册。

贝弗利·尼克斯(Beverley Nichols)写于20世纪的自传《为父者》(Father Figure)中的一个故事——它本身就是个哥特式故事——将阐明哥特式小说和“不可言说”在本世纪最初几十年实现的某种喜剧性的、有教育意义的、恐吓式的潜在力量。尼克斯的中产阶级父母有一个来自更高阶层的男性朋友，他涂脂抹粉，举止女性化，一名世故的观察者似乎

---

[15] 马图林(Maturin),《梅尔莫斯》;上述以及其他关于“不可言说”的例子来自第3、8、9、11、39章;最后一段引言出自第28章。

[16] 马图林,《梅尔莫斯》,第32章。

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散发着同性恋气息。尼克斯夫妇虽然保守反动,但极为天真,并没有看出什么。他们只是很高兴他们的朋友对他们年幼的儿子有如此强烈的兴趣。但是,一天晚上,贝弗利的父亲醉醺醺地来到男孩的房间,发现他那儿有一本《道连·格雷》——这正是那位朋友送的礼物。这位父亲几乎停止了呼吸。他把书猛掷向儿子。他往上面不断唾吐,嘴边满是白沫。最后,他开始把书撕成碎条——用他的牙齿。

贝弗利吓坏了,而且很困惑:为什么他的父亲会如此愤怒?父亲则无法相信他不知道原因,但终于,男孩明显的困惑说服了他。“王尔德干了什么?”父亲无法讲出本可以解释这个问题的话。相反,他在天亮的时候再次偷偷走进这间卧室,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下了他所谓的那个人的罪行。当他父亲离开后,因期待而狂乱的贝弗利踮着脚尖走到房间放了纸条的那一头。

上面写着:“ILLUM CRIMEN HORRIBLE QUOD NON NOMINANDUM EST.”\*〔17〕

今天很难想象哪本哥特式小说或哥特式象征会有如此重要的神秘力量。对于尼克斯的圈子而言,哥特式小说是两代人之间、阶级之间以及性选择之间的通了电的屏障;对今天的中产阶级读者而言,它不过是在超市中摆着卖的,可以视而不见的东西。18世纪晚期,这些新的恐同表现形式展示出各种不同的阶级和性别关系,在接下来对霍格的《一名清白罪人的告白》的讨论中,以及在第9和第10章对狄更斯写作生涯晚期的维多利亚哥特小说的讨论中,我将就作用于这些关系的杠杆作用的来源和意义提出见解。

---

\* 拉丁文,意为“那个不可提及的罪行”——译者注

〔17〕 尼克斯,《为父者》,第92—99页。

## 第六章 内化了的谋杀：《一名清白罪人的告白》

“它是否和从前一样有力？”

“你说的是什麼，亲爱的？”

“除了我口中的话，我还应该说什么？”

——狄更斯，《爱德温·德鲁德》<sup>〔1〕</sup>

詹姆斯·霍格 (James Hogg) 的《私人回忆录和一名清白罪人的告白》(*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 出现得较晚 (1824 年)，而且，对它究竟是不是部哥特式小说这个问题，尚存争议：要将其归为哥特式小说，就必须将乡土 (苏格兰) 场景和本地宗教涵括到迄今已经被认为主要是关于天主教欧洲的一种文体。然而，《卡勒布·威廉姆斯》和《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 都没有依赖于海外场景，在它之前和之后相继进入了今天的哥特式小说经典文库。将它视为哥特式小说的理由有：它以模糊的方式描写超自然事物；它令人毛骨悚然；它是“心理”小说 (即，它把一般视为内在的冲突直接呈现，并将其外化，例如，呈现为谋杀或恶魔般的诱惑)；它的情节由宗教的绝对真理来驱动；最重

---

〔1〕 狄更斯，《爱德温·德鲁德》，第 206 页。

要的是，它对男性偏执狂作了丰富的主题呈现。恰恰是因为这部小说拥有根植于乡土和本地的这样一个（非严格意义上的哥特式）基础，因为书中人物生动而且有质感，而阶级矛盾既精准又充满焦虑，所以，这正是观察男性偏执狂的某些表现，并检验欲望和迫害与性别是如何与权力获取产生纠结的好地方。

正如许多哥特式小说一样，这一部开始的时候似乎想把成双成对的双重事物或人物清楚区分，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在小说的压力下蜕变成不那么清晰而更加隐伏的东西。<sup>〔2〕</sup>这部小说的名声在于，它对几乎完全相同的事件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书中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迫害有两种不同的偏执狂风格；一个人物可以变成与其他人物外貌酷似的人；诸如此类。但书中也有一对各方面都相反的人物，他们是兄弟——这是哥特式小说中较少出现的设计——这对人物为本书提供了公开的道德动力和社会动力，展示了一套价值，这套价值成了此处解读哥特式信息的依据——起码暂时这样。但就像在我们对莎士比亚第144首十四行诗的解读中看到的那样，不同性别上的对立特征在语义和道德上的呈现削弱并污染了结构上的对应物那按理应是对称的、句法上的呈现，这部小说中正是这样。

小说中的兄弟俩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共同的父亲；他们的社会和家庭坐标极为不同。这本书的第一半几乎都是“编辑的叙事”；据这个叙事宣称，他们的母亲来自格拉斯哥，是“一位市政官（Baillie Orde, Baillie大致相当于“市议员”[Alderman]）唯一的继承人，是他的名声良好的女儿”，<sup>〔3〕</sup>也是“新教改革信条的坚守者中最为严厉、阴沉的一位”（第4页）。“她从一位热烈信奉命运注定论的牧师——一个名叫罗伯特·瑞恩

---

〔2〕 关于这一点，参见塞吉维克，《哥特式套路的一致性》，第34—40页。凯利（Kiely）的《英格兰浪漫小说》（*The Romantic Novel in England*）第208—232页对霍格的《一名清白罪人的告白》的形式做了尤其精彩的描述。

〔3〕 霍格，《一名清白罪人的告白》，第3页。接下来的引言将被整合到讨论中去。

希姆的人——的教诲中汲取了她的信念，当她还很年轻的时候，她被送到乡下嫁给一位比她年长许多的富有地主，戴尔堡的领主乔治·科尔门，而瑞恩希姆陪她去主持婚礼。这场婚姻并不幸福——“这位领主的乡下邻居们称他为‘滑稽、粗心的家伙’，认为他心中对上帝的敬畏实在有限，而且也并不怕什么人”（第4页）——他妻子一直拒绝他的性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领主把她安置到他的大宅顶部一套隔开的房间中，后来把她的精神导师也安排到那儿去了。

这场婚姻中对比强烈的价值观的配对，即有产乡绅与城市资产阶级的配对，在下一代人身上变得甚至更尖锐、更不调和。在不止一个叙事层面上，两个儿子各自的父亲是谁这一问题都很神秘：这里有一个开放的猜测，意谓推出这样的假设——小儿子的父亲是罗伯特·瑞恩希姆；而小说中的每个人，包括“编辑”，都假设认为大儿子的父亲是领主，尽管“编辑的叙事”并没有提供什么重要理由来区别他们是在什么情形下被怀上的。然而，两个男孩或多或少都被坚决地分配到不同阵营。大孩子以领主的名字“乔治”来命名，他对自己的姓氏没有什么疑问，并在大宅底楼与领主共同生活，被抚育长大。但第二个儿子不被她母亲的丈夫承认，而最终，“瑞恩希姆先生出于怜悯和善意，从这位女士那里获得了对这个男孩的监护权，用罗伯特·瑞恩希姆的名字为他施了洗礼——而这正是这位著名牧师自己的名字”。（第18页）

因此，尽管没有任何很确定的“基因”根据，这两个男孩被放到这部小说所呈现出来的反差强烈的阶级环境中；或许这证明了后天培养胜过天然浑成——每个男孩似乎都与自己被指定的角色极为相称。在叙事者的描述中，乔治成为维多利亚小说中的一类典型，更公开地代表了不列颠的种族理想。他是“一名慷慨、好心的青年；随时准备帮助别人，几乎从来不对他人产生不满”（第18页）；与他的弟弟相比，乔治在“学术造诣”方面进益较慢，但他“在个人才能、体形、五官以及构成上流教养的举止和外貌的

所有方面,都优于他的弟弟”(第19页)。<sup>〔4〕</sup>另一方面,小罗伯特·瑞恩希姆“是个机敏的孩子……具有热烈的、浇不灭的热情,而且,还有一种让其他男孩退避的严厉举止。在他上过的不同班里,他是最棒的语法家、最棒的读者、作家和会计,而且很喜欢就受争议的神学观点写论文”(第19页)。他母亲对宗教的虔诚在罗伯特身上得到了双倍加强。“编辑”最喜欢用“矜持”一词来形容他:“他的双唇抿得很紧,以至于他的嘴几乎都看不见了……。他的在场会像霉菌一样影响所有的社交活动或娱乐”;<sup>〔5〕</sup>在体格上他是个懦夫,而且,据他自己所说,他还有说谎强迫症。

在许多方面,阶级与宗教在此交叉的方式并不陌生,可以通过《修底不拉斯》(*Hudibras*)追溯至《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但是,我并不打算从社会学及性格学角度来对待小罗伯特,而是从一个看似不那么有描述性的比较开始:这名阴沉的年轻卡尔文教派信奉者与《乡村太太》中那位富有、幼稚、即将成为名流的斯巴吉斯之间的比较。在第3章对斯巴吉斯的讨论中,我们强调了他对男人交易女人的通路的误解——即使不是误解,他的理解至少也是片面、致命的。斯巴吉斯正确理解(以这部戏展现的世界的方式)的是,女人的最终作用是成为疏通男人之间同性社会性欲望的导管,但他也犯了错误,低估了对欲求女人这个虚构桥段必须进行的投资;而他想要进入与他仰慕的男人的关系的这个欲望缺乏充分的媒介传递,这导致他在与他们的关系中被女性化了。

在对女人价值的直接贬低方面,小瑞恩希姆就像斯巴吉斯一样——他像个走了极端的斯巴吉斯。对瑞恩希姆而言,这种价值贬低具有宗教意义:“特别是,”他在对自己生活的描述中这样说道,

---

〔4〕 关于对19世纪绅士的愚蠢的高度评价,参见依鲁阿(Girouard),《回到凯姆洛:骑士制度与英国绅士》(*The Return to Camelot: Chivalry and the English Gentleman*),第166—68和第269—70页。

〔5〕 对有关偏执狂精神病的“看似正经的”嘴唇的心理意义的深具参考价值的讨论,请参见克里斯(Kris),《对艺术的心理分析探询》(*Psychoanalytic Explorations in Art*),第128—50页。



我让自己鄙视——如果说不是憎恶——女人的美，将它看作是  
人类所能遭受的最大的陷阱，尽管年轻男人和女孩，甚至年纪大的妇  
女（也包括我母亲）都责备我是个不近情理的可怜虫，我却为自己的  
心得洋洋得意；而且，到今天为止，我都庆幸自己已经逃脱了所有陷  
阱中最危险的那种。

（第 103 页）

如果我们——暂时地——搁置瑞恩希姆对女人公开的、“不近情理  
的”价值贬低，转而审视他与男人之间未经媒介传递的纽带关系，那么，我  
们就进入了这部小说中最令人费解、最有争议的领域。首先，尽管这部小  
说两个不同的部分——编辑的叙事和瑞恩希姆的“告白”本身——是从两  
个不同视角讲述同样的事件，但是，它们实际描述的，却是两种极为不同  
的男性同性社会性纽带。编辑叙事的中心部分是小罗伯特和他的哥哥乔  
治之间紧张的迫害关系——这导致了罗伯特对乔治的谋杀。然而，罗伯  
特自己对这些事件的叙事的中心部分，则是他与一名男性人物之间更为  
强烈的受迫害关系，对于这位人物，叙事者几乎没有提到过——他叫吉  
尔-马丁，显然就是恶魔本身。这两个叙事似乎各自都记述了一个可以随  
时放到我们至此一直在讨论的心理范畴之中的关系；但要把两个叙事放  
到一起描述同样的事件，会非常复杂。

要开始讲述罗伯特与他哥哥乔治之间的关系，就要以我们（追溯性  
地）熟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呈现的世界开始。<sup>〔6〕</sup> 在爱丁堡一个特别容易  
引起骚动的政治时刻来临之时，这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显然是第  
一次——这个时候他们刚刚步入成年。罗伯特对他活跃的、广受欢迎的  
运动型哥哥的策略，是一种“女性化”策略——这在我们今天称为被动进  
攻，而他采用的版本既疯狂，又直接体现了这一策略的特点。乔治和他的

---

〔6〕 可参见，比如，伊阿在《欺骗、欲望与小说：文学结构中的自我与他者》第 45—47 页中  
对《永远的丈夫》（*The Eternal Husband*）的讨论。

## 男人之间

伙人们在打网球，“这位年轻乡绅的力量和灵活在他的同伴中引发了最大声的喝彩”，这时，罗伯特“来了，在整个比赛期间都离他很近地站着，总是时不时地说几句嘲讽的尖刻话语”。整场比赛期间，罗伯特

站在那儿，离[乔治]如此之近，以至于有几次他都阻碍了他急速转向，而且当然也让自己不那么体面地被推到一边。这些粗鲁的冲击和推搡——有时还伴随着匆忙的咒骂——不但没有让他保持距离，却只让他与这位比赛之王贴得更近……第二天，以及之后每一天，这同一个带着恶魔神情的年轻人都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第21页）

没有什么能让那些年轻绅士的比赛摆脱罗伯特的参与：当被要求远离球会打到的范围时，他“面露嘲弄地咬着嘴唇”，问道，“有什么法律、法规能强迫我这么做吗？”他“带着如死亡一般肃穆的神情”，

似乎下定决心要守住自己的阵地。他假装用双眼追随着球；但每一刻它们都瞟向乔治。在某个胜利的喜悦时刻，一位参赛者正好鲁莽地说道，“这一击真是漂亮得见鬼，乔治！”而这位闯入者抓住了这个比赛者们爱用的词，然后在每一击的时候都重复它。（第22页）

事情变得更糟了。罗伯特挑起了与乔治的打斗，让自己流了血，并让自己成为

所有人最为憎恶的对象。他没有心思去止住从他嘴里、鼻子里流出的血，也没有把它擦去，以至于他整个双颊和胸部，甚至脚趾上都是血。在那样的状态下，他跑到参赛者中间去；他不待在自己的位置上，而是四处跑动，阻止每一个试图击球的人。他们咒骂他，但无

济于事；他似乎有意招致迫害和殴打，坚定地开着有关受诅咒的老玩笑，彻底地破坏了比赛，以至于无论选手们作出什么努力，他都强迫他们停止比赛，将它放弃。（第 23—24 页）

无论一个人怎样解读罗伯特“恶意的”（第 21 页）瞟视中所带的情感——而且，这的确与斯巴吉斯对“机智的人”（the wits）的真心赞赏非常不同——但很清楚的是，就像斯巴吉斯一样，罗伯特甘愿女性化是为了靠近——实际上，为了在内心靠近——一名来自更高阶级的更有势力和名望的男人。流血的鼻子尤其象征着女性特有的软弱无力：正如简妮特·托德（Janet Todd）指出的那样，这在 18 世纪小说中往往发生在女性受到性威胁的时候。<sup>〔7〕</sup> 在后来的一次打斗中，罗伯特的鼻子“再次流了血，这个防御系统对他来说似乎很自然，就像獾类惯常采取的手段一样”（第 412 页），而他再次拒绝把血洗去。很清楚，他认为自己拥有的赖以平步青云的工具正是那些属于被阉割的人，属于明摆着的甚至令人作呕的弱者的工具。他的力量在于，他在声望上一无所有，因而什么都不会损失：借助于单纯利用卑微而获得的力量，他可以做个无赖的选手，在他哥哥处于下风时落井下石，利用字面上的法律条文阻碍一切——让自己成为彻头彻尾的打游击的讨厌鬼。他在体格上软弱无力、毫无抵抗：他哥哥可以“用自己的左手如此用力地[抓住他的]嘴和鼻子，以至于手指都陷到他的双颊中去了”（第 41 页），在尾声中，当他的尸体被发掘出来时，“所有的肢体，从腰到脚趾，似乎都是完美、完整的，但它们无法经受搬动。在我们把它们重新放回坟墓中之前，它们全都裂成了碎块，只有臀部例外，它还继续保持了一种松弛的形态”（第 227 页）。罗伯特在他的卑微状态中，对女人没有足够的欲望，无法通过她们来欲求男性；相反，他带着恨意与她们达成认同，从而带着恨意将自己抛在似乎处于男性威权源头的一

---

〔7〕 托德，《文学中的女性友谊》（*Women's Friendship in Literature*），第 404—405 页。有趣的是，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布莱德利·海德斯通也有过类似的流鼻血。

位男人脚下。罗伯特对乔治的那种怪异的“追求”正是“编辑的叙事”的主题，它将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描绘成充满谋杀欲念的无名怨忿。与《乡村太太》中通过通奸那种朴素方式追求更高等级的欲望相比，这种欲望更迫近——更普遍、更家庭化，不那么依赖媒介，但它也暴力得多、压抑得多。这个新出现的恶意的、个人化的因素，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就是恐同。

对乔治而言（他弟弟罗伯特也一样），与男人们之间的纽带是他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的客观存在：他常常与成群的年轻贵族男子在一起，而且交际很成功。但与罗伯特不同，乔治是作为一名男人与他的男性熟人相处的，因为他掌握了通过女人来让他的同性社会性欲望三角化的诀窍。这只需用最随意的方式就可以做到。比如，在去教堂的路上，乔治遇到一位朋友，“他正要去格雷弗莱尔教堂见他的爱人，他说：‘科尔文，如果你和我一起去，’他说道，‘我也让你见见她，然后你就会和我一样迫不及待了’”（第 35 页）。或者，当与朋友们一起寻欢作乐之时，他和他们会“换个地方，到妓院去度余宵”（第 48 页）。

乔治快乐、自信地掌控着（无论程度多么轻微）女人，将她们作为男人之间交易的媒介，他这么做只不过是习惯性地重复他父亲（至少是法律上的父亲）戴尔堡领主的习惯。这位领主与他的新娘在他们的婚礼上发生了第一次不合，当时，他“向大厅中每一位相貌还过得去的女孩敬礼致意，他也请她们的爱人同样自由地对新娘这么做来‘报复’他”（第 5 页）。后来，当新娘跑回她父亲家后，她作为一枚对男性关系不再有价值的透明筹码的地位在罗伯特·M·亚当斯（Robert M. Adams）称之为“民俗幽默的精彩一幕”（第 xii 页）中，体现得明白无疑。她父亲假装被领主对待她的方式所激怒，反过来将她作为她丈夫的代表来鞭打：

“……至于他对自己的妻子亏欠了什么，他比我更有发言权。但是，由于他用那种方式对待我的女儿，我要报复他一次……。”

这样说着，市政官开始对这位落跑新娘施以肉体惩罚……“他这

个恶棍！”他叫道，“我要教教他该用什么方式对待我的孩子……；既然我没法碰他，那我就狠狠揍她，因为她是生活中和他最近的人。”  
(第 10 页)

当然，他的目的是把她赶回她丈夫身边，而他成功做到了。

就这样，这部小说前半部中，编辑直率的男性版本向我们展示了迫害，展示了看似不可思议的追求，以及那邪恶的、女性化的、奇怪的弟弟对充满魅力与男性气概的乔治最终的谋杀。小说后半部，即罗伯特自己的叙事，讲述了一个些微不同的、重新编排了的故事：乔治不再是中心人物，相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名叫“吉尔-马丁”的迷人而奇怪的陌生男子对罗伯特的追求、迫害，以及最终的诱陷——罗伯特在这里十分可怜，他精神分裂，而且被女性化了，他坚持把那名男子想象为俄国的沙皇彼得。我们获知，这个关系中隐藏着对编辑的叙事所转述的奇怪事件的解释。

正是小说的后半部中引入了一种真正充满情欲的语言，用来描述男人之间浪漫的痴迷关系。它直接体现的情感——起码在开始的时候——与前半部中弥漫在罗伯特与乔治之间的情感很不一样。同时，很奇怪的是，描写这两种纽带的语言又是相呼应的。比如，当罗伯特第一次见到那个陌生人时，

他朝我这边冲过来，以至于我无法完全避开他；而且，还不止这样：我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某种我无法抵抗的迷幻力量，把我拉向他。当我们彼此靠近时，我们四目交汇，**我永远无法描绘在那让人难忘的时刻席卷我整个身躯的那种奇异感觉。**（第 106 页；粗体部分是我自己做的强调）

这种目光交汇与罗伯特神秘地追随乔治的目光相似：

## 男人之间

不论[乔治]到哪里寻开心,不论他如何善于向所有人隐藏自己去哪儿的打算,他弟弟瑞恩希姆也会出现在那儿,离他总是只有几码远,一般总保持同样的距离,而且时时向他投去让他骨子里发冷的目光。**这种目光无法形容;但它让人感到能刺穿心中最深的内核。**(第34页;粗体部分是我自己做的强调)

看到这位陌生人,罗伯特猛然想到,“他是和我一样的人!”(第106页)这时,这位陌生人说道,“你认为我是你兄弟……;或者我是你的第二个自我。我的确是你兄弟”(第107页)。此外,在小说前半部中,乔治感到罗伯特在他面前出现“就像物质的投影那样规律,或者说,就像密度更高的介质所反射的光线一样规律”(第35页),而罗伯特则这样评论吉尔-马丁:“他就像我的影子一样可靠”(第120页)。当罗伯特开始——可能晚了,因为他已经被牵绊住,做下了两起谋杀——发现这个陌生人令人毛骨悚然而且具有压迫性时,他用恶心和入迷之类的方式来形容这个陌生人,这些词汇可能也会被他哥哥用来形容那个在网球场绊住他的、满身是血、固执而消极的落魄男人:

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身体上缠了条要命的蛇的人,它一直用毒牙衔住他,而又不伤害他,兴高采烈地扭动着它令人恶心的布满鳞片的身躯。(第175页)

罗伯特用来吓唬他哥哥社交圈的人的策略,是鸚鵡学舌地以牙还牙,就像吉尔-马丁在神学讨论中反过来对罗伯特使用的策略一样:

我提议的每件事他都予以默许,而且,就像我当天所想的那样,他常常将它们做到极致,因此我暗暗担心他是在推行亵渎上帝的行为。他的作派很特别,而且对我所有的意见都如此尊重,以至于我完

全被俘虏了，而同时，我对他抱有某种敬畏，这是我无法解释的，有几次不由自主产生了马上撤退，从他身边逃离的想法。（第 108 页）

这两个同性社会性关系之间的许多对应显然是切实的呼应，而不仅只是回声式的呼应。例如，罗伯特不仅如魅影一般追随着他的哥哥，总是在特定时刻习惯性地出现在哥哥右边（第 35 页）。相应地，当罗伯特想象自己受到鬼魅的纠缠时，“总是看到另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总出现在离我所坐或站立的位置等距的同一地点，在我左边大约三步远的地方”（第 139 页）。吉尔-马丁声称自己是罗伯特的“兄弟”，如果我们回头来看这个声明，我们会发现，这在两个重要意义上是真实的：首先，在他们初遇的那一幕中，他看上去和罗伯特本人一模一样；第二，在之后被讲述的事件中，他和罗伯特真正的哥哥乔治看上去一模一样（第 76 页）。实际上，吉尔-马丁可以任意选择以任何人（至少是任何男人）的面目出现。我们也从罗伯特的“告白”中获知，在编辑的叙事中，在罗伯特对他哥哥的所谓的迫害过程的大部分时候，罗伯特都呆在家中的床上出神，或想象自己呆在家中的床上出神；而在这个叙事的后半段，当“罗伯特”似乎在乡下各处展开谋杀式的破坏时，罗伯特本人只觉得自己不过是在睡觉。

简言之，这部小说强烈暗示说，以罗伯特化身出现的吉尔-马丁是大多数杀戮的凶手；或者说，它提供了这样的心理阐释，即吉尔-马丁做出的这些行为是罗伯特无意识愿望的投射。这种手法是司空见惯的。（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这些被讲述的事件的开头，对我们以及对罗伯特而言，还比较容易弄清他与吉尔-马丁之间的区别，即使当吉尔-马丁乔装成罗伯特的时候，也一样；后来，这种清晰的差别很快模糊了，这很符合一般哥特式小说的模式。）然而，对于我们的解读目的最重要的，并不是吉尔-马丁仅仅作为罗伯特的一个情欲化了的偏执狂替身而存在，而在于他在那个背景下的身分不确定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尤其体现在，他在两层意义上是罗伯特的“兄弟”，即他可以忽而扮演罗伯特，忽而扮演乔治。

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恰好戏剧性地表现了认同与欲望的不可分——这种不可分性使男性同性恋成为获得男性异性恋权力的必要结构性条件(参见第1章)。与俄狄浦斯结构相反的是，在欲求其他人(比如，爸爸)拥有的东西与欲求爸爸之间，并没有确定的界限。多变的吉尔-马丁代表着那种纽带的易变性：罗伯特对吉尔-马丁又爱又怕，这既因为吉尔-马丁像镜子一样反映出他自己充满谋杀欲的卑劣，也因为吉尔-马丁反映出拥有权力的男性他者。发生在罗伯特床上的某一幕完美地表现了认同与欲望之间这种无法凝结成形的、彼此交融的流动。当他显然沉浸在恍惚状态中的时候，吉尔-马丁似乎正乔装成罗伯特在外面纠缠乔治：

我被一种奇异的感觉攫住……我大体把自己想象成两个人。当我躺在床上，我认为我们两个人都躺在那里；当我坐起来，我总是看到另外那个人……在场的人是多是少并没有关系：我的第二个自我肯定会出现在他的位置上，这让我的言语和想法混乱不堪，让我的朋友们极为吃惊……关于我是两个人的这个奇特的错觉，我的推理能力无能为力。这最荒谬的部分在于，我极少将自己想象为这两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大多数时候，我认为我的同伴是他们中的一个，而我哥哥则是另一个；我发现，必须以另一个男人的角色来说话、回答，长期下来，是极为尴尬的事情。(第140页)

我们或许可以提出，卧室这一幕中的身分混淆在我们稍后将要讨论的其他两个文本中得到呼应：《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中约翰·哈蒙受到的攻击，以及《智慧七柱》(*Th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中对T. E. 劳伦斯(T. E. Lawrence)的强奸(参见第10章)。斯蒂芬·马科思(Steven Marcus)对此不赞同，他从欲望的角度来描述这种身分消解(或认同的消解)，认为它是虐恋色情作品的特点；然而，基



于他自己的以及这里的这些例子，我认为，更准确的应该是将这种身分消解与性的强迫冲动和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之间的纠结相联系。<sup>〔8〕</sup>

我认为，给吉尔-马丁的身分的不确定命名——即“男性同性社会性权力获得中认同与欲望之间的不可分”——就是给这部小说中关于心理问题的重要领域命名。同时，这种不确定造成的混乱本身——面容、身分、偏执、家庭以及部分相同却又以微妙方式相异的情节等等的增衍——也要求将焦点从关注心理内部的心理学移开，转而观察整个社会结构。这个认知上的混乱的意义之一似乎在于，在这部小说中，象征交易链发生于一个相对散乱的体系中，该体系由延宕（deferral）和错位（displacement）构成，并为它们提供了空间。

这部小说的古怪之处还在于，尽管编辑和戴尔堡的人在男性交易欲望的语境下对妇女压迫似乎都采取了乐观、顺应的态度，但整部小说，特别是编辑的叙事部分，在对其机制和效应的探讨方面，却给予了极不寻常的生动描写和解释。例如，我们已经看到，领主太太的抱怨——她被她的丈夫和父亲当成一个象征他们自己权力的可交换筹码来对待——被叙事者详细列举，虽然他并没有表示任何同情。当他的妻子不再与他同居之后，这位性欲旺盛的老领主在一位洛根小姐的陪伴中得到了安慰——这位“肥胖、活泼的女士”（第 12 页）受到了领主和叙事者的慈爱对待。然而，小说明确指出，她也是他的牺牲品，至少在经济上：她扮演了代理太太、管家、孩子的抚育者和护理人的角色，但在多年的忠实服务之后，她还是不能在他日益衰老的日子里让他对哪怕最基本的事务上心，从而出于她的利益来处理事情（第 51 页）。

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维持小乔治身上诱人的男性特质的条件之一，就是他愿意和他的男性朋友们到妓院厮混。但想不到的是，编辑的

---

〔8〕 马科斯，《其他维多利亚人：英格兰 19 世纪中期的性和色情作品》（*The Other Victorians: A Study of Sexuality and Pornography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第 257—62 页。马科斯自己总结道，他讨论的虐恋有男性同性社会性的基础。

叙事部分在小说中的另一个地方也对随意召妓的做法的意义提出了更具批判性的观点。那天晚上，一位名叫阿拉贝拉·卡尔福特的妓女在妓院外面游荡，等着生意上门，因而见证了对乔治的谋杀，成为编辑的叙事部分的重要角色；她用自己的话讲述了她的故事，提供了与叙事者极为不同的视角。例如，她“认识”——“而这从来不是为了得到什么好处”，她说道（第 56 页）——老乔治和小乔治，对他们并不着迷。她是被某个贵族毁了的良家女子，“她被监禁过；她受过鞭笞，并被认为是个骗子；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对好几个最坏的那种男人有过毅然决然、毫不动摇的忠实，他们每个人都抛弃了她，让她陷入赤贫和耻辱”。（第 64 页）在爱丁堡那个要命的夜晚，她召到的客人是一位年轻的绅士，而他正是乔治的朋友；然而，当他们幽会时，他注意到了她淑女般的谈吐，感伤地请求她“振作起来。告诉我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我能为你做点什么……你会得到我的帮助。”她继续道，

我那时急需朋友，我认为当时正是获得朋友的时机。所以我开始……但我很快认识到，我用过于质朴的方式揭开了赤裸的事实，因而错过了我的目标。当他发现自己坐在一个不规矩的房子里的一个肮脏的角落里，与一名重罪犯坐在一起时（这个罪犯作为骗子受过鞭笞和流放），他的谨慎个性让他警惕起来，他不但没有出于怜悯而被感动，而是感到震惊。他的眼睛盯着我胳膊上的那些鞭痕，从那一刻起，他变得坐立不安，不耐烦地想要开溜。（第 66—67 页）

她的实际境况——即她从一个男人手中传到另一个男人手中，而且一再“代替”占有过她的男人受到惩罚（第 65 页）——太过于残酷，不是那位男子可以用约里克式的怜悯和抚慰来承受的。这种境况最让人记忆深刻的象征就是，她想象自己作为贼被吊死：“我想到自己被吊死，成为众人注视、让他们目瞪口呆的景观，而我和他们中的有些人还有过亲密关系或

联系。”(第 55 页)

然而，女性性欲不仅只在两个乔治的“异性恋”情节中被展现成一种具有腐蚀性、惩罚性并受到惩罚的商品。实际上，尽管罗伯特·瑞恩希姆的故事被精简成了具有男性特质的男人与女性化了的男人之间的欲望和斗争，但是，只有通过一名女人——即他的母亲——的被禁止的情欲，这一切才能得到理解。特别是，正是宗教焦虑和阶级焦虑产生的社会力量，经由他母亲的情欲问题，对他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

正如小说中其他问题一样，母亲情欲的问题在各个方向上——包括朝后的方向——都错位了：作为母亲，拉宾娜自己的合法性被视为是可疑的(第 3、10、44 页)。这看似随意的非难为罗伯特自己的出生合法性问题提供了依据(尽管，正如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乔治的出生合法性问题从未被提出过)。然而，罗伯特的出生合法性的可疑，他的父子关系的可疑，正是他的性格和同性社会性境况的主要形成原因。他在他母亲和老罗伯特·瑞恩希姆的家中长大，他与瑞恩希姆在外貌上惊人地相似——虽然牧师自己指出，

除了血亲关系之外，有很多自然因素都可能造成这种相似。它们常常取决于母亲的所思、所爱；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男孩的母亲被她一无是处的丈夫抛弃后，把自己的所思转向了我——因为我很可能成为她的保护人，这才造成了这种惊人的相似。(第 97 页)

然而，牧师自己对这个很有道理的解释似乎也不那么确定。他把自己身边胆敢怀疑这个说法的人解雇了。而且，他对自己的逾矩的知觉很有可能正是他与上帝努力斗争——以求得那个男孩获得救赎的保证——背后的主要力量。

我与万能的主之间的斗争长久而艰苦……但我已经被他击退

## 男人之间

了，而他从前很少拒绝我的请求；尽管我引用他自己的话来对付他，并竭力让他信守诺言，但是，他在自己的至上力量中有如此多的手段，结果是我被拒绝了。（第 91 页）

老瑞恩希姆宣布他终于从上帝那儿夺得了男孩获得救赎的确认那天，正是小罗伯特初次遇到吉尔-马丁的那天，而谋杀情节的各个要素终于就位了。

这样看来，小罗伯特的女性化似乎部分始于他父亲把他用来作为与上帝的暧昧交易中的筹码：原谅我的逾矩（而不需要我为之告白），并（为了证明一切都已获得原有而）拯救我的儿子。在其他两部哥特式小说——狄德罗（Diderot）的《修女》（*La Religieuse*）和马图林的《流浪者梅尔莫斯》——中，天主教父母试图弥补他们违禁孕育了孩子，将这些孩子奉献出来，让他们从事宗教事业——我们此处分析的小说正是这一做法的加尔文教派版本。这个例子中，交易发生的新教式的内心场所，以及连交易者心中都会觉得隐晦、不合逻辑的交易条件，使得它对孩子造成的裂殖生殖效应即使是在严格的心理层面上都变得似乎完全合理。

在这个交易的语境下，小罗伯特对自己母亲的厌恶变得可以理解。虽然他自己声称这难以理解，但实际上对此也作出了解释：

虽然我知道她是基督徒，但我承认，我总是鄙视她好坏不分的教导，我对她本人也没有什么尊敬。如果这是我的罪行，我永远无法控制它。我坦率地承认这一点，相信这是上天因为她曾经犯下的罪行而对她施加的判决，而我没有力量能够以别的方式对待她。（第 104 页）

罗伯特的“告白”中没有直接说明他是否认为自己是私生子，但这段话将他身上典型的、而且已经是强迫性的伪善施加到第一个给它机会的人身上，说明他的行为无论如何都符合那种知识。在宗教意义上，罗伯特

的成长似乎伴随着这样的想法，即只有男人（老罗伯特、上帝，如果说不是老领主或少领主的话）才能让他身分合法，而女人只能给他带来私生子身分。他说，“在这世上”，他对牧师所欠甚多——牧师给了他“高尚观念”，而在领主不承认是他的父亲之后，这些观念拯救了他。

罗伯特在家中生活的第一个插曲显示，他以母亲为代价，很早熟地转向牧师，寻求宗教支持：在教义问答时，他因为她死记硬背来回答而抓住她的过错，而且，出于一种不够有创意的对罪人的报复心，他启用了约里克式的初始场景的这个美好版本：

“他真是个很棒的孩子！”我母亲说道。

“我担心他变成了一个自鸣得意的呆子”，牧师的随从老巴内说道。

“不，”我的牧师，也就是我父亲（我下面将这样称呼他）说道，“不，巴内，他的确是个很棒的男孩；这不奇怪，因为从他婴儿期起，我就在祈祷，希望他得到这些才华；你认为上天会拒绝这种丝毫没有私心的祈祷吗？不，这不可能。但是，夫人，我的担心是，”他转向我母亲，接着说道，“他注定要遭受不公正的对待。”（第 90—91 页）

在这个关于家庭构成的小戏码中，我们看到，小罗伯特带着狂热和蔑视妇女的坦率，承继了父亲重新组织家庭——将母亲排除在外——的企图，这个家庭将以上帝、老瑞恩希姆和罗伯特之间的交易纽带这种同性社会性方式来构成。瑞恩希姆撒谎说，他对男孩的成就“不带私心”，这个谎言正是这个新的男性家庭的基础。但是，由于瑞恩希姆有能力一再转投罗伯特的母亲，罗伯特在这个家庭中的位置长期受到削弱，不论他母亲如何被贬低、被摒弃，她都是这个新家庭的存在力图否认的最初逾矩行为的一部分。老罗伯特看穿并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这个将这位母亲排除在外的谎言；小罗伯特相信这个谎言，并因此成了它的牺牲品，自己也被它排

除在外。因此，老罗伯特拒绝了这位母亲，而小罗伯特则谋害了她。（如欲了解“作为初始场景的神学论争”的另外一个滑稽版本，参见第 17 页）。

老罗伯特虽然真正信奉上帝，但对于被普遍接受的宗教真言而言，他总归还是（通过他的异性恋）处于一个相对具有操纵力的位置上；有趣的是，即便是这样，在阶级和政治方面，他反过来发现自己扮演的正是小罗伯特那种受操纵的、斯巴吉斯式的角色：那种把其他人那些本质上愤世嫉俗的、分裂的意识形态毫不含糊地表达出来的狂热分子角色。在爱丁堡各个政党的集会上，

阿盖尔公爵和他的朋友们对他的利用就像猎手利用小猎犬一样——猎手们常常发出大叫，让它们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追逐。他们这样做常常是为了开玩笑，想要戏弄他们的对手；在一切讨人厌的人当中，他是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因为知道他的外衣保护他不会受到肉体惩罚，他言语极尽刻毒，乐于看到那些与他争论的人的懊恼和愤怒。但他有时对长老教派的头目们同样**非常有用**，因此，他总是获邀与他们坐到同一张桌子去，当然，这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大人物。（第 20 页）

老罗伯特在政治领域的策略与小罗伯特在网球场上的策略一样。当然，小罗伯特从他名义上的父亲那里继承了阶级地位和阶级仇恨，而这些都成了建构他带着阶级烙印的、墨守成规的、自以为是的“个人”风格的积木。在维护他在网球场上的权利时，他让[这帮年轻绅士中名叫戈登的那位]知道，“他很乐意这个时候待在那儿；而且，除非他能向他证明他和他的伙伴对那块场地有什么更大的权利，超过了他和所有其他人，他就打定主意，要通过坚守那块公共场地上他任意选择的一部分，来坚持他以及他的同胞公民的权利”。

“先生，你可不是位绅士，”戈登说道。

“你是吗，先生？”另一位说道。

“是的，先生。以上帝的名义，我要让你知道我是！”

“那么，感谢这位名字让你亵渎了的主，我不是。如果你们这伙人中有一人是绅士的话，上帝保佑，我真的希望我不是！”（第 33 页）

因此，尽管小说中的偏执狂戏码是通过“俄狄浦斯式”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但是，架构了这些戏码的俄狄浦斯式家庭显然提供了一个场所，这个场所的定义不再是既定的，而是斗争的目标。由父亲、母亲、孩子构成的三人家庭——以及由上帝、父亲、孩子构成的家庭——是从太多的父亲、太少对父子关系的承认、太多的女性情欲、两个不同阶级所构成的巨大的混乱材料中，以蓄意的、武断的、实际上很暴力的方式塑造出来的。

这部小说中错综复杂的并且最终变得暴力的同性社会性欲望圈中，象征各个男性角色之间关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象征是一把双刃剑。此外，这个象征似乎与某些关于肛门(anality)或后进式插入的主题缠绕在一起。例如，为了解决这个男性三角交易的遗留问题，老瑞恩希姆最终让小罗伯特献身于为上帝服务；就在那个早晨，他总结道，“我把他只献给您，完全献给您，永远献给您”：

希望他在您手中成为双刃的武器，成为您口中投出的矛枪，去毁灭、去征服、去穿越；让您的教会的敌人在他面前倒下，成为肥沃土地的肥料！（第 111 页）

罗伯特谋杀乔治时，用的正是一把双刃剑，而且，“死者的两处伤都是从背后受的”（第 51 页）。这件武器镀了金，是吉尔-马丁——“极大地违背了我的意愿”（第 152 页）——硬塞给罗伯特的。金色武器本身就是一个相关的主题：罗伯特已经有过一个（看似来自上天的）幻象：“各种金色

## 男人之间

武器从[云雾般的面纱中]降临，它们的尖端全都指向我”(第 125 页)；而且，他变得痴迷于吉尔-马丁展示的“两把纯金手枪”：

这个漂亮、诱人的小东西是如此完美，如此完整，准备好了要执行奉献者的意愿，以至于我现在想要用它来为他服务。(第 126 页)

小说中的最后一件金色武器，在罗伯特最后的堕落中，被吉尔-马丁在他背后挥舞着，吉尔-马丁在用它来保护罗伯特的同时，也用它来刺激他、让他服从自己：

我暂时被一些可怕的魔鬼包围了，他们用牙咬我，用深红色的爪子攫住我的脸；与此同时，我那令人畏惧的忠实朋友抓住了我外衣的后领，他把我向前推，他的镀金长剑在我周围舞动着，帮我抵抗住他们的联合进攻。虽然我的袭击者很可怕……但是，我觉得自己宁愿落入他们手中，也不愿就这样被我的保护者随心所欲地牵着鼻子走。(第 211 页)

更早出现在书中的一个更具象征意义的双刃武器是圣歌《诗篇》第 109 首；当领主那伙人反过来向瑞恩希姆一家发起法律攻势之后，瑞恩希姆在他的晚祷告上唱起了这首圣歌。

请把邪恶降到他身上，  
在他的右边  
让他最大的敌人，  
乃至撒旦，站在那里。  
当他受到您的审判，  
让他被记住；



如果他向您呼唤，  
让他的祈祷变成罪孽。

.....

求主让他父亲的邪恶  
仍然被记住；  
并且永远不要让他母亲的罪孽  
得以匿迹。

.....

他把诅咒当衣服穿在身上  
这诅咒像水一样，  
进入他的脏腑，像油一样，  
进入他的骨头，让它一直往下走。（第 31—32 页）

这一幕显然是《卡斯特桥市长》中那一幕的源头：亨恰德唱起同一首赞美诗诅咒旧爱法弗雷，发起了一个毁灭之圈，而这最终按这诅咒的字面意思落到了他自己头上。<sup>[9]</sup> 在《一名清白罪人的告白》中，这个诅咒的某些部分落到了这两个年轻人头上：他们各自身边都有撒旦伫立；各自都年纪轻轻就丧了命；各自（尽管方式不同）都习惯于去诅咒，并受到诅咒；由于他们同母，她“罪孽”的不可根除正是使得他们的命运无法分开，并使得来自父亲的不同形式的“邪恶”成为一种爆炸性混合的原因。然而，正如在《一名清白罪人的告白》中法律诉讼加速了诅咒的来临一样，最大的恶果落在罗伯特自己身上——这也预示了《卡斯特桥市长》的情节；双刃剑带来的结局就是他自己内脏和骨头的溶化。

很重要而且具有预言意义的是，即使在建构现代同性社会性谱系的这样一个相对较早的时刻，有关“同性恋”的主题也只是作为显然已经形

---

[9] 哈代 (Hardy), 《卡斯特桥市长的生与死》(*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第 33 章。

成的恐同的附庸而出现的。尤其在这个案例中,内脏和后部成了容易遭受暴力、疼痛和控制的脆弱所在,预先占据了任何可能出现满足感的位置。男性之间的迷恋和不经媒介传导的权力交换等纽带已经采用了双刃武器的形式(兄弟的背部,上帝的口),而不是双面快感的形式。这些快感可能经由推理得到,但只能从围绕它们的暴力形式获得。即使是罗伯特在与吉尔-马丁的交往中感受到的迷人魅力,也是父亲与哥哥对他的拒绝产生的一种反作用;而似乎这种魅力本身几乎从一开始就构成了威胁:“他在我面前获得了一种优越地位,以至于没有他的陪伴我就不快乐,但有他陪伴时,我的快乐也不强烈。”(第120页)“性”本身,不论哪种形式——不论哪种性器官形式——都不是小罗伯特经验的一部分;但性压抑的结构带来的双重制约则是。

恋同(homophilic)主题和恐同主题之间的秩序在此明显瓦解了,从中我们可以知晓两件事情:第一,我们应该由此想到,无论同性社会性谱系的条件以及同性恋身分的意义在复辟时期之后的两个世纪以多么激进的方式在改变,恐同的主题及其意识形态基础可能是这整个复杂系统中最稳定的、保守倒退的因素:爱德华二世遭受惩罚的命运、《爱德华二世》(*Edward II*)的剧情,以及围绕罗伯特·瑞恩希姆的惩罚主题,显然比它们各自所处的实际社会形态或欲望形态具有更多的共性。

同时,我认为,我们可以将这部小说对恐同主题的重视——在这一时期超过了对恋同主题的重视——作为证据,来支持我们对现代心理学形式的恐同的一个主要功能的思考。与我们在上一章提出的观点相一致的是,小罗伯特内心的恐同压力所产生的效应,首先并非压抑了他身上预先存在的对男人的性欲,而是使他成为一个极具响应性的家伙,成为一种工具,服务于远在他出生前就已经存在的阶级斗争、经济斗争和性别斗争。他盲目前进,利用手头少得可笑、少得可怜的资源,朝男性同性社会性的主使地位进发,具有迷惑性的是,这似乎是唯一能保证给他一个社会地位的东西,同时,他内部心理化了的恐同斗争似乎也洞开了一个与他周围的

世界完全吻合的内心空间。在和外部世界中的哥哥那种矛盾的血亲及财产纽带，与那种和他致命的“内在”兄弟的更为矛盾的自恋纽带之间，罗伯特变成一个人身上最赤裸的膜：它仅仅是一种潜在的谋杀欲，对女人和男人同样暴烈，而且可以被任何社会力量掌控，利用，并为之服务。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我认为经典的“偏执狂”哥特式小说整体来看，用我用来分析霍格小说的语汇可以对它作出最好的描述。某些评论已经讨论过这些小说对双重角色和迫害的痴迷与（今天）男性同性恋主题是多么地接近。<sup>[10]</sup> 我想要强调的是，与之相比，这里的关注焦点放在了作为整个男性同性社会性组织谱系的控制工具的恐同上。这样的强调似乎更为精确，更说明问题。从较广的意义上说，它让我们得以把这些小说解读为是对整体上的社会构成和性别构成的探索，而不是对几个具有“少数”性取向的男性个人内在心理的探索。第一，它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更有趣的语汇，用来讨论女性在这些小说以及这些小说描绘的社会中的地位。第二，“作为证据的”问题——它们与任何对个体男性同性恋的文学一批评论论（无须理会历史讨论）相联系的——常常被用毫无启发性的语汇，比如指控或辩护的语汇，来表达。<sup>[11]</sup> 这些对抗性措辞不适合用来讨论虚构的人物和事物，而且，它们带有令人无法接受的恐同假设和曲解了证据的假设，以指控的方式对待同性恋；除此之外，用法律方式来讨论认定的同性恋，会掩盖或否定有关男性同性恋本身的构成和社会意义的、更为基本而又完全没有获得解答的问题的重要性。

我把重点从哥特式小说的同性恋内容转向恐同内容，如果这样做会

[10] 参见，比如说，普拉茨（Praz），《浪漫痛苦》（*The Romantic Agony*），以及庞特（Punter），《关于恐怖的文学：1765 至今的哥特式小说史》（*The Literature of Terror: A History of Gothic Fiction from 1765 to the Present Day*）。

[11] 这些批评论争典型地出现在“弗洛伊德派”批评家和“保守”批评家之间——前者寻找看似同性恋的材料，而后者否认这“证明”了任何东西。但在美国，对同性恋的心理分析思考本身从未抗拒过恐同的回流；因此，这些论争加强而不是挑战了文学研究中的恐同规范。关于这一点，参见艾布拉弗（Abelove），《弗洛伊德，男性同性恋和美国人》（“Freud, Male Homosexuality, and the Americans”）。

带来损失或危险的话,那么,这种损失或危险就在于,它可能会模糊本来可能甚为独特的同性恋少数人群的文学传统,或将其不成熟地“普遍化”。女性主义批评家早就明白,当男性中心论的批评传统称赞一名女性的写作具有“普遍性”时,这通常不是肯定,而是否认她的作品的来源中有属于她自己的女性特异性。对于有色人种作家的作品的伪自然化,我们文化中格外恶毒的种族歧视已经将它的危险降低到最小,但是,“普遍性”这个面目模糊、享有声望的幽灵,还是对至少美国黑人文化的历史施加了一种结构性的,有时又具有分化作用的影响。类似地,对一套首先可能对作为一个特定受压迫群体的同性恋男性——在任何未解问题所触及的范围之外,他们无疑在我们的社会中构成了这个群体——具有特殊意义的主题进行不成熟的恢复(例如,关于社会性别构成的整个范围),会冒制造文化帝国主义的风险。

然而,作为批评家,还是需要能够作为一名男性同性恋文化的参与者来进行解读、发言,并权威地辨识这些主题,确认它们的位置。<sup>[12]</sup>显然,我不是这样的批评家。但同样有趣的是,迄今为止,王尔德之前的哥特式偏执狂传统并没有吸引这样的批评家——至少在他们的文章中是这样,虽然这个传统明显关注男性之间超负荷的关系。我认为,他们这种相比之下之漠视恰好说明了我的观点:那些回溯地看来像是同性恋主题(不可言说之事物、与肛门相关之事物)的主题,即使是被呈现于男性之间强烈关系的语境中时,还是将关于禁止与控制的心理和社会学作为它们的首要所指(referent)。也就是说,它是关于我们今天所称的“同性恋恐慌”(homosexual panic)的,这个事实意味着偏执狂哥特式小说尤其不是关于同性恋者或同性恋的;相反,从定义上说,异性恋才是它的主题。

---

[12] 参见马丁(Martin)的《美国诗歌中的同性恋传统》(*The Homosexual Tradition in American Poetry*),博依斯(Boyers)和斯戴纳的《同性恋:亵渎、眼界、政治》("Homosexuality: Sacrilege, Vision, Politics"),以及克洛格(Kellogg)的《关于同性恋的文学想象》(*Literary Visions of Homosexuality*)中的例子。

相应地，与本讨论最为相关的关于偏执狂哥特式小说的作品并非来自一名同性恋男性，而是来自一个女性主义视角。例如，女性主义对《弗兰肯斯坦》的不同解读的历史，特别包括了玛丽·雅可布斯(Mary Jacobus)简述的女性主义的伊阿式解读，<sup>[13]</sup>清楚地显示了若干种解读方法，我提议的那种分析可以通过这些方法在那个文本中找到共鸣。小亚利克斯·戈尔德(Alex Gold, Jr.)对《卡勒布·威廉姆斯》的精彩解读，一方面用弗洛伊德对偏执狂的分析(认为与男性同性恋欲望的压抑相关)精确地阐释了卡勒布故事的情节，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哥德温是如何彻底地把所有欲望的构成描绘成反映了“财产的残酷色情表现”，<sup>[14]</sup>反映了阶级压迫，性别压迫，以及不同辈分之间的压迫。戈尔德的分析尽管与我的分析不尽相同，但就像我的分析一样，它替 20 世纪的读者将 18 世纪晚期的有用( usefulness)和误导(misleadingness)等概念的交叉点安放到“性化”(sexualization)上面。戈尔德写道：

关于偏执狂的[精神分析]理论可以解释《卡勒布·威廉姆斯》中的情感模式，因为哥德温探索的是关于激情(passion)的政治理论，而激情包含了精神分析中用单纯内在的语汇描述的所有动态因子。<sup>[15]</sup>

除了(但正如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有关)他们对恐同的主题化，偏执狂的哥特式小说，尤其是这两部，都与家庭有着某种关系，正如我已经在对霍格的讨论中简单描述过的一样：和在《一名清白罪人的告白》中一样，在《弗兰肯斯坦》和《卡勒布·威廉姆斯》中，主人公都从各自原本由共栖者组成的杂乱的、非核心式的群落中，用入侵式的、实际上极为暴力的方

[13] 雅可布斯，《这个文本中可有女人？》(“Is There a Woman in This Text?”)，第 130—35 页。

[14] 戈尔德，《只是爱：歌德温的〈卡勒布·威廉姆斯〉中的激情政治》(“It’s Only Love: The Politics of Passion in Godwin’s *Caleb Williams*”)，第 148 页。

[15] 戈尔德，《只是爱：歌德温的〈卡勒布·威廉姆斯〉中的激情政治》，第 153—54 页。

## 男人之间

式,为自己开辟出一个小小的、男性的、亲密的家庭。在由姻亲、被收养的孩子、未婚的成人兄弟姐妹,以及作为准家庭成员和家庭成员的仆人所构成的更加多变和自然的场景已然流行的小说语境中,核心家庭的形象(无论如何扭曲)在哥特式小说中具有损毁力量的主导地位,成了联结哥特式小说的世界和《感伤的旅程》的世界之间的纽带。<sup>[16]</sup>也像在《感伤的旅程》中那样,面对各种改变,正是通过把想象的父权家庭从意识形态上强加给独居、群居和各种不同的物质依赖形式(它们处于各种真实的、纷杂的、不断改变的状态),才使得对性和阶级的持续利用合理化,并改造、延续了这种利用。

---

[16] 除了白瑞特的《今天的女性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析中的问题》外,奥尔森的《家庭与市场:对意识形态和法律改革的研究》和米勒( Miller)的《不同声音中的戒律:官僚、警察、家庭和〈荒凉山庄〉》(“Discipline in Different Voices: Bureaucracy, Police, Family, and Bleak House”)中,都对强制推行家庭制度作了极为有趣的讨论。

## 第七章 丁尼生的《公主》： 七个兄弟一个新娘

以上两章聚焦于哥特式小说在探究男性纽带方面的重要性。在偏执狂哥特式小说传统中，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这种通过女性达成的传导以最敷衍的形式出现；悖论的是，结果展现了这种“异性恋”细节的绝对象征力量的，也正是这个传统，至少从18世纪晚期起就是这样。正如我们在第5章讨论过的那样，正是（现在也是）男性异性恋与其“对立面”之间的区别的细微和任意性，赋予了这种区别以力量，使它得以组织对权力——包括妇女的权力和施加在她们身上的权力——的复杂的历史交易。

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们的讨论将在时间上前移，但同时也向英国维多利亚文化的“主流”靠近。我们从哥特式小说对细节和绝对事物的沉迷出发，从它对强制和禁止的沉迷出发，移向更为广阔、更为综合的意识形态虚构，这些虚构在结构上看似不尽相同：它是体现在“辩证”中的自由结构。这两章讨论的三种虚构，很清楚，都是历史论述、政治论述。妇女在其中具有的表面上重要性不是最小，而是非常大。有关偏执狂，有关男性占有男性的情节元素是相对缺失的，有关恐同的明显主题也是如此。（这些“哥特式”元素将通过狄更斯重新引入我们的讨论，在本章只是简短讨论，在第9章、第10章会更充分地论述。）让批评舆论对哥特式小说在“私人”意义上发生兴趣、对主流维多利亚小说在“公共”意义上发生兴趣，

似乎是最容易的事；但正如哥特式小说的心理折磨仅仅只有当它们是有关权力分配的公共话语中的步骤时才有意义一样，那么，诸如丁尼生（Tennyson）、萨克雷、艾略特等作家的明显具有公共意识形态的作品就需要用欲望和恐惧（phobia）那种被认为具有内在心理性的模式来解释，以明确说明其政治主张。特别是，《公主》（*The Princess*）号称是一部新形式的、关于女性特质的历史及意义的重要的公共宣言；但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甚至于有关“诡异事物”（the uncanny）的哥特式心理，最终为其政治——及其体裁——提供了起结构作用的条件。

综合来讲，丁尼生的独特天才照亮了他所处时代和阶级的那些疲惫、谦恭、无意识的意识形态，并凭着他在其中的投入，以及他出色的抒情诗天赋，使得它们听起来有一种口吐白沫似的疯狂。

丁尼生以一种帝王般的公正来运用这种天才，这样的公正使他就像是送给 20 世纪的意识形态的学生的圣诞礼物，但也使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觉得他不那么可靠。我们已经提出，意识形态的关键就是要在现存的矛盾因子之间无形地斡旋，例如，通过将当下各种矛盾用历时性方式重塑为对源头的历史叙事，从而隐藏这些矛盾的存在。对于一名像丁尼生一样狂热、轻信、矛盾的作家而言，对这些功能性神话中的任何一个产生兴趣，本身就具有某种程度和某种方式上的潜在颠覆性——丁尼生自己是最后一个体会到这种程度和方式的人。只要他一旦体会到，它们通常表现为与他的作品在结构上或风格上的不连贯所作的形式上的斗争。然而，这些形式上的斗争也符合他所处的社会对自身的描述中的极具力量的不一致。

如果，就像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的那样，《亨利·埃斯蒙德》（*Henry Esmond*）是对资产阶级女性特质的非历史图解（乔装成对历史变化的描述），那么，《公主》在某些方面正好相反。它那关于现代女性从属地位的根源的神话被坚定地表现为神话，被放到“波斯”童话那样一个有意安排的非时间的（a-chronic）空间里。另一方面，神话和它那几近侵略性的主



题式框架叙事之间的联系以如此强烈、如此不同的方式受到强调，以至于这首诗似乎强迫读者去寻求把这个神话重新塞回历史的种种方式。这个神话叙事是由一位年轻妇女对将她排除在外的男性同性社会性话语的思索而引发的：

——她想知道，

男人自己对男人讲述怎样的故事？<sup>[1]</sup>

它的内容也是关于强行把妇女驱逐到男性同性社会性交易的框架中。除了更易解释的历史扭曲和体裁扭曲外，诡异(uncanniness)的某些效应还来自相关故事的这种具有磁性的重叠。

这个“神话的”中心叙事以一个奉行独立的女性主义群体的惊人幻境为开始，而以那个时代对家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所作的各种定义性描述中的一种为结束。这个带着爱意建立起来的女性世界以女子大学为中心，它回望发现了一个新的女性历史，向往着一个新兴的、权力在握的未来；然后，这个世界连根带枝都被疯狂地毁灭，它的学术传统和理念被消灭，制度、机构被掏空——这些都是丁尼生的天才在意识形态想象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个童话式的封建场景中两个王国，一个在北方，一个在南方；北方王国的太子从小就被安排与南方王国的公主定了婚。然而，到该结婚的时候，公主没有来。王子从南方国王那里得知，伊达公主已经变成一名女性主义者，和她宫里的两名寡妇一起说服国王，在南方王国北部边境建了一所夏季行宫，三个女人在那儿建立了“一所面向女孩的大学”。王子和两位朋友再次向北部边境进发。他们获知，只有女人才被允许进入大学区域——大门上的告示警告说，“闯入的男子会被处以死刑”——他们冒充是北方来的想要接受教育的女人，潜入了大学。他们一

---

[1] 丁尼生，《公主》，第749页(前言，第2部分，第193—94页)。接下来的引言将会被整合到讨论中去，并用章节、诗行的数字来标明出处。

## 男人之间

进来,就被不同居民发现是男人,但他们每一次都(假装)保证说,他们会不声不响,会立即离开,说服这些女人不去向公主告发,让他们不会被杀死。与此同时,王子爱上了高贵、热情的公主,而他的朋友也各自找到了想追求的女人。最后,其中一位朋友在微醺中发现,自己再也不能掩饰对那些女人的蔑视,在公主面前唱了一首侮辱性的歌——“克制一点,先生,”王子说道,而骗局就这样被揭开了。在这之后的混乱中,公主几乎淹死,而王子救了她的命;她因此赦免了他的死罪,但把他送回了家。

但与此同时,由于她父亲没有像原先谈妥的那样把年轻的新娘交出,两个王国的男人们之间已经在酝酿着一场军事冲突。我们的王子真心地被公主的骄傲和奉献打动了,他一开始反对使用暴力或强制,但很快,他发现自己和朋友们、士兵们一起,与伊达公主的兄弟们和他们的士兵开战了。面对来自北方的军事入侵的危险,而且因为受到男人们在女人群落中引发的异议和沮丧情绪的影响,公主不得不同意遵从战争的结果,如果她兄弟那方失败,就把自己交给王子。结果是他那边胜利了,但前线血流成河;我们的王子被认为丧了命;但他活了下来,与双方其他受伤的人一起被送到大学照料。大学现在被改成了医院,那里的女人们忘掉了她们的学业和她们的女性主义,全身心地爱上了她们照料的男人们。公主的看护让重伤的王子得到重生,她求他原谅她疯狂的、毁灭性的野心,而他确实原谅了她。“我的新娘,”他说道,“我的妻子,我的生命”——

这个骄傲的暗号基于  
平等;每种性别本身  
只算得上一半;真正的婚姻里  
谈不上平等、不平等(vii. 第 282—85 行)

放弃你自己吧:你我的希望本为一体:  
你圆满了自己,也圆满了男子汉的我;

把你的甜蜜小手放到我手中，给我你的信任。（vii. 第 343—45 行）

关于英国家庭史的另类叙事的意识形态意义，我们会在下一章更多地讨论。然而，《公主》的内部叙事提出的神话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将 19 世纪资产阶级性别结构的根源直接追溯到封建贵族阶级。但是，即使在这里，家庭天使似乎并不是新的东西；因为，王子把他理想中的女性气质描述为直接来自他的母亲，并用任何维多利亚中产阶级成员所能辨识的方式来形容它：

第一

不博学，除了端庄的居家风度之外，  
不，并不完美，但充满温柔的需求，  
不是天使，却是更可爱的人，全身透着  
天使的本能，散发着天堂的气息，  
在众神与人之间阐释、传达信息，  
他们看似和她来自同一个地方，但  
总蹑手蹑脚，好似所踏之地  
太过光滑，而所有男人的心灵必然  
在运动中偏离自己的轨道向她靠去，  
用音乐围绕着她。有这样的母亲  
他多么快乐！（vii. 第 298—309 行）

伊达也被驱向这样的命运（它被展现为既是理想化了的过去，也是天堂般的未来）。同时，重要的是，王子母亲这幅怀旧的肖像直到这首诗最后几页才出现；因为，直到那一刻，这首诗至少对封建贵族家庭摆出批判姿态，这种批判如果不是彻底的或前后一致的，起码也是其目的的一部分。尽管这位被如此塑造的母亲是一位上年纪的天使般的好母亲，但是

## 男人之间

创造了她的却是个古老邪恶的男爵家庭：

我母亲像任何圣人一般温和，

.....

但我的好父亲认为国王就是国王；

他不在乎家庭的爱意；

他像手杖在手的学究一样握住权杖

鞭笞冒犯，把长胳膊长手

伸出去，将冒犯者从人堆中揪出来

施以审判。（i. 第 22—29 行）

老国王认为，作为追求者，他儿子太过胆怯：

啧，你不清楚她们，这些女孩。

.....

男人是猎手；女人是他的猎物：

这场追逐中油光水滑的生灵，

我们因为她们的美丽皮毛去猎取她们；

她们因此爱上我们，而我们将她们践踏。

对她们甜言蜜语、备加袒护！那不行！多羞人！

对她们而言，如果他做出她们不敢做的事情，

那么，孩子，最好的玫瑰都抵不上他一半可爱，

他喘息，言行流露出战斗的魅力，带着

自负的姿态到来，跳到

女人堆里，大批地诱惑她们

又惊又喜，赢取一切，尽管逃不过死神

他却让自己亲吻的人脸红：我就这样赢得了

你的母亲，一位好母亲，好妻子，  
值得赢取(v. 第 144—60 行)

王子是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他用来回应父亲的策略也正是霍纳的策略：他把伊达公主的女性主义说成是他父亲粗鄙的父权风格的镜像式的极端，而他自己在他们之间建立了新的辩证关系，以温和的方式达成妥协。对伊达，

“不要过分批评自己，”我说道，“也不要过多责备  
男人的儿子和野蛮的法律”(vii. 第 239—40 行)

但是，如我们看到的一样，当伊达被迫变成王子母亲的翻版时，他远远没有建立起新秩序或新的辩证关系，而只是在旧秩序中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更具优势的位置。找到新位置，或是保持它：因为，可以这样来描述王子的性策略，即，他有些像约里克，在维系男女之间严格的权力和特权区分之时，他偏爱(并允许自己)在男女之间以不那么非此即彼的方式分配“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个人特征，这样，作为一名“女性化”的男人，在暗中获取男性权力的同时，他可能会获许保留婴儿具有的特权地位(在一个严格分化的家庭内部)。(在这个内在叙事中，从婴儿的需求通往妇女的牺牲的特殊途径，正是被不断强制灌输的信念，这在抒情诗中尤其是这样。)简言之，王子在斗争中达到性目的的策略与他父亲的策略相比，只有轻微的、风格上的细节差异：在这场战斗中，他通过输而不是通过赢来获得了他想要的东西。

然而，对他而言，为了得到一个女人而与另一个男人争斗的观念在意义上也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大体上，王子的性感受完全受男人交易女性的结构的影响而形成——女人为男人所用，作为可交换的物品，作为价值筹码，以加强男性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目的。例如，伊达认为，她父亲在她

8岁时,未经她同意,以国家为由而订下的婚约,并不是她的整个生命历程应该取决于某个特定男人的愿望的理由,而他却从未想到要严肃对待伊达这个看法。类似地,就像在丁尼生自己的生活中一样,在这个叙事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以婚姻的方式把姐妹送给另一个男人,以加强兄弟对他的爱。尽管浪漫爱情在王子眼中受到称赞——在他父亲那里则不是这样——但是,在神话式的叙事中,爱情必须总是倾向于批准并加强男人对女人的交易,而不是颠覆它。

在这种骑士规范下,妇女被“尊崇”为男人之间的交流中被动的、高高在上的物品;对这种规范的强调部分说明了把维多利亚资产阶级家庭的谱系直接追溯到中世纪宫廷传统的观点。以“王子”、“公主”这样的语汇来构成叙事,既是惯用的、显而易见的童话技法,又是对历史颇具倾向性的解读。就像《亨利·埃斯蒙德》把谱系叙事定位于贵族阶层一样,它完成了若干简化目的。首先,它允许呈现一种维多利亚中产阶级家庭景观,这种景观否认它的结构和它的经济功能之间有任何关系。通过使风格化了的贵族家庭的坚守与颓败看起来就像是对当代中产阶级结构的充足解释,从而使经济需求变得隐形,并向中产阶级读者隐藏它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历史纽带,同时,也隐藏了这样一种事实:尽管中产阶级名义上成了新兴权力阶级或新贵族,但对于大多数中产阶级成员而言,它的运作基本还是基于男性被拴到工资体系,女性定位于家政奴役体系。尽管在意识形态上符合规范的家庭与资本对特定形式的劳动力的需求之间的吻合绝不是天衣无缝的,但是,新兴中产家庭在其结构中反映出这些必要的东西,其强烈程度就像它反映出封建时期贵族家庭遗留下来的内在矛盾一样。因此,求助于高尚的骑士风范就美化了当代形势,在实际中掩盖了它的历史性,从而使之面目模糊。

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把资产阶级家庭追溯到封建社会的贵族源头这样的假纹章学,并不是使之合法化的唯一有用的意识形态方法。《亚当·比德》模式(参见第8章),即自耕农阶级和工匠阶级的谱系,也有其

作用：例如，它没有将工作和经济需求的因素排除在外，而是将它们合并到中心位置来，只不过采取的形式（个人的工匠身分转化为行会似的作坊生产系统）既肯定了现代工业领域的某些特征（比如对妇女的排除），又隐藏了它与更为个人化的工作模式之间的断裂。

那么，为什么丁尼生在《公主》中对当时的社会结构的辩护要采用仿古的贵族模式？我认为，我们正好可以通过这个问题来考虑这首诗精彩的框架叙事。因为这首诗的场景是一个特别时期（即 1847 年）的英格兰，这样一个英格兰有着丁尼生式的勇猛，几乎代表着内在叙事对封建过去的幻想在当下的简单投射。就像《妻子与女儿》（*Wives and Daughters*）一样，《公主》开头的场景是一个大庄园，它在一年中的那一天向佃农和邻人们开放：

中午时分人们蜂拥而至，  
有他的佃农、妻儿，在那儿，聚集了附近半个  
辖区的人和他们的机构，  
而他是他们的赞助人。我也在那儿，  
从学院过来，拜访那个儿子……  
……和我们这伙人中的其他人一起，  
其他五个人：我们在维维安庄园共有七个人。（前言，第 3—9 行）

正如这些诗句指出的，与《妻子和女儿》不同，《公主》把视点放在那些甚至在维维安庄园不对外开放的平常日子也会出现的人身上；它也不同于任何一部盖斯凯尔（Gaskell）小说的是，它把该地区所有活动——包括该机构面向工业的科学研究——都看作是稳固且清晰地处于贵族恩宠制度的背景里。实际上，丁尼生带着典型的急切的虚张声势，特地突显了将古代特权和鉴赏家身分与现代科学并列而带来的明显不调和；就像小型的艺术兼工业博览会一样，一整天维维安庄园的露天场地都点缀着“一

台小小发条蒸汽机”，“好些个猛烈喷发着蒸汽的模型[引擎]”，“一段小铁路”，一套缩微电报系统，它“来回闪着漂亮信息/往来于模型车站之间”，等等，和这些一同展出的是家庭博物馆永久收藏的地质学标本，希腊大理石雕，来自阿金库尔战役和阿斯卡龙战役的家族盔甲，以及来自中国、马来亚和爱尔兰的帝国战利品（前言，第73—80行，第13—24行）。这一切传达的信息是：科学，或技术，是恩宠制度和鉴赏家身分的合法产物；所有这些嗜好和谐共处，没有偏颇，支持国家统一；那些大地主存在的理由就是要公正地执行全国的共识，保障这些显然人人都迫切想要得到的东西——这个框架叙事带着一种几乎具有攻击性的自信假定了这些主张。

除了这种让阶级冲突从丁尼生笔下的英格兰消失的惊人省略外，这种视恩宠制为进步的贵族导向观点也影响了这首诗的性别政治。诗中有关伊达公主的部分中呈现的女性主义是一种可辨识的、探索的女性主义，而且，从它本身来看，十分激进。它在那所大学被教授或实践的部分包括：独立主义，女同性恋之爱，以女性为中心重新审视西方历史、神话和艺术，批判浪漫主义爱情和男性对女性的交易，以及批判西方医学那种镜面反射式的理性主义。这个精心构想、深具吸引力的大厦怎么会一经男性触碰就分崩离析？它内部被置入了什么概念错误，让它能完全按自己的方式承担起这样的想象，但又轻易地消融于这首诗毁灭性的反动结尾？

当然，我的看法是，它的弱点恰恰在于，这首诗把社会改变想象成某种从上至下发生的事情。因为，伊达公主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与此神话般的南方王国里女性主义的整个发展之间的关系——仅仅只是沃尔特爵爷与他的佃农中的“进步”之间的关系的加强版本：她是缔造者、赞助者、理论家、历史学家，以及一个运动的极致理想——这个运动的客观目的是去解放她们，教育她们，

解开她们脖子上习俗的枷锁，让她们知道

没有人比她们更有贵族气派……（ii. 第127—28行）



伊达对实际生活中的女人的主要感觉是不耐烦，带着一丝怒意和怀疑，怀疑自己不能以英雄的大手笔来解放她们、解放别人对她们的感受：

因为女人，迄今为止，  
被禁锢在比南海岛之禁还糟的境地中，  
闺房中的侏儒，一直没有  
高高的欲望，她们不知道、猜不透  
我们对她们的幸福怀着怎样巨大的热忱。  
如果我们能给予她们更肯定、更迅速的证明——  
啊，与宰牲祭祀的单独做法相比  
如果较慢的方法不那么容易达成我们的目的  
在死亡的任何阶段，  
我们都会迅捷地机敏扑向长矛，  
或跃下传说中火焰的海湾，  
致力于我们亲爱的姐妹们的自由。（iii. 第 260—71 行）

在这个幻想的世界里，即使是真正的共同利益也可能仅仅只通过“权高责重”（*noblesse oblige*）\* 的形式来体现并制度化；毫不稀奇，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关键人物遇到的个人障碍也可以成功地轻松揭示这整个体系。具有特权、扮演祭司角色、有知识的少数人为受凌虐、无意识的多数人作决定，这种由上至下的政治必然成为操控（从内或从外）的对象，成为领袖人物后发的自我利益的对象，成为被领导者造成的社会动乱或破坏的对象。以这种怀旧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女性主义将缺乏信仰，缺乏坚韧，姐妹关系将会被破坏。

---

\* 这句短语常常用来表示一个人的地位越尊贵，他所担负的责任就越重大。——译者注

## 男人之间

这样的意识形态结构允许丁尼生在叙事内部捣毁女性主义社区，就像对待纸牌搭的房子一样；而这首诗的古怪之处部分在于，在这个框架叙事中，丁尼生温和地支持这同一种意识形态结构对于阶级关系具有的价值和持久性。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同时代人在检视这首诗时，觉得它整体上有一种不自在，而他和这些人都坚持把它描述为是形式上或类属上的不自在。

在丁尼生的描述中，男性叙事者陷入他的男女听众对形式和音调的不同要求的窘境中：

我，夹在他们中间，两边都要取悦，  
而又要如实讲述故事，  
我游移在一个古怪的对角线上，  
或许既不能让自己也不能让他们满意。（结言，第 25—29 行）

的确，就像政治观点的游移不定一样，框架叙事与内在叙事之间在形式和类属方面的游移不定也十分惊人，并且还戏剧性地反映了阶级和性别问题。例如，作为集体神话，作为一种必要的意识形态发明，内在叙事的地位被它的作者的不确定性加强了。在维维安庄园的聚会上，讲故事本身，就像女人一样，在年轻男人中间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这种等同最直接地体现在男人与女人复杂关系的集体性与讲故事的集体性之间：讲故事的主意始于大学来的七个年轻男人早前的一个圣诞阅读会，在那儿，沃尔特告诉他的妹妹莉莉娅，

这是你们[女人们]未能参与的证据……  
我们[男人们]一直在议论你们，为你们举杯痛饮……  
——玩起了  
猜字谜，就像圣诞节时那样……

而且常常口口相传地讲起了故事(前言,第 175—79 行)

《公主》中的这个内核故事正是为了把维维安庄园的女人们放到这个语境中才开始的。沃尔特开玩笑说,它是把妹妹作为礼物送给他朋友的场合——

“那么,把莉莉娅当作女主人公接受吧,”他叫嚷道,  
……“让你  
作那个赢得她的王子!”(前言,第 217—19 行)

这个故事要成为一个“七头怪物”,而它的每个男叙事者都要

自己成为英雄!

七个合而为一,就像同一个梦中的影子。(前言,第 221—22 行)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那样,“七头怪物”故事的内部,即怪物的肚子,也是由男性对女性的交易来架构的,就像它当初成型时的情形一样。但在内外之间,出现了一个更加没有预料到的、偏离了中心的主题回应。诗中把男性叙事的彼此相通比作“梦中的影子”的相通,这个在其直接语境中几不可识的奇特比照,一旦与这个内在叙事最著名的一个疑点联系起来,就很有道理。王子从他的家庭继承了——可能是因为一名巫师的诅咒——一种间歇发作的昏厥症,

奇怪的昏厥,天知道是什么:  
突然之间,在大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  
以及当我走着路或说着话时,  
我似乎是游弋于群鬼的世界,

## 男人之间

感觉自己是梦中的影子。(i. 第 14—18 行)

在整首诗中,这种神游状态被用“影子”和“梦”之类的词汇形容,而最常用的就是“梦中的影子”。

我倾听的时候,怪病  
突然发作,随之而来的还有疑惑:  
我似乎是游弋于群鬼的世界;  
公主带着她罗刹般的女侍卫,  
带着嘲笑,带着真挚,  
洪流,喧嚣,成群的国王  
是影子;漫长奇幻的夜晚  
伴随着做过和没做过的事,  
以及存在过和没存在过的物。(iv. 第 537—545 行)

这些发作与“七个合而为一”的叙事框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从诗中消失:例如,每当叙事声音从一个讲故事的男人传到另一个时,就会出现一种神游状态来呼应这个转接时刻。它与利用姐妹来巩固男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和财产关系的联系也一再出现。公主的女伴之一赛姬是王子的男伴弗洛利安的妹妹;王子认为弗洛利安

是我另一颗心,  
而且几乎是我的另一半自我,我们一起  
行动,就像马的耳朵和眼睛一样形影不离。(i. 第 54—56 行)

王子的另一个男伴西瑞爱上了赛姬——他问道,

弗洛利安，你认为这怎么样？我应该追逐  
实物还是影子？这会长久吗？  
我没有被巫师下咒，  
也不像殿下他那样被鬼魅纠缠。我  
恭维自己说，无论哪里  
只要看到实物我就能确认它。好吧，  
城堡是影子吗？其中三座是影子？那位  
甜美的女主人是影子吗？如果不是，  
这三座城堡是否可以给我的破衣服打补丁？  
以我的需求来看，这三座城堡甚为珍贵，  
而赛姬妹妹在我心中无比宝贵……(ii. 第 386—96 行)

不动产能够使影子般的纽带获得实体——这些纽带由女人、言辞以及  
与一位王子的集体认同(尽管这种认同也具有等级高低)构成，它们将  
男人的利益联结起来。

对于王子僵直昏厥症发作的意义和定位，我没有任何纲要性的解读。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最好把这些发作描述为渐渐褪去那层可能将七位男  
叙事者与一位男说话人分开的暧昧面纱。他们投入在他身上的——并通  
过他，又投入到每个人身上的——集体的、矛盾的爱欲和需求，似乎日益  
磨损着他自己对各别分立的存在抱有的幻想。王子是一个单个的人，还  
是仅仅是从男性权利(male entitlement)和男性交易那涵括一切、跨越历  
史、跨越个人的巡回演出中随意截取的一段和弦？他自己没有能力知晓。

在第 9 和第 10 章里，我们将会审阅狄更斯最后的作品，探讨世间男  
性交易的各种幻想版本。但狄更斯的一部稍微较早的小说与这里的讨论  
直接相关。在《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中，皮普陷入的神游般  
的状态和王子的很像。最引人注意的那次发生在奥利克在石灰窖对他谋  
杀袭击的过程中：

他又喝开了，变得更加凶狠。趁他把瓶子斜过来时，我看到里面没有剩太多了。我很清楚，他是在用瓶中物兴奋自己，好来结果我。我知道，它里面盛的一点一滴就是我生命的一点一滴。我知道，当我变成不久前漫向我的水汽——就像我自己前来示警的幽灵——的一部分时，他会急急忙忙赶到镇上，让别人看到他在那儿懒散地待着，在啤酒馆喝酒。我迅捷的想象跟着他到了镇上，画出一幅他身处其中的街景图，把里面的灯和生命与孤独的沼泽和沼泽上遍布的白色水汽作对比——而我就消融在这沼泽的水汽中。

我总结了过去许许多多多年以来的事，而他只说了几句话，但他所说的都在我面前呈现出画面，而不仅仅是言辞。在我大脑激动、兴奋的状态下，不论我想到什么地方、想到些什么人，这个地方、这些人都会呈现在眼前。不管用什么言语描述这些图像的生动都不夸张，但在这所有时间里面，我却又一直极为专注在他身上……以至于我连他手指最细微的动作都注意到了。<sup>〔2〕</sup>

对皮普而言，就像（我这样认为）丁尼生这首诗里的王子一样，这些在心理上呈现出的神游状态，并不意味着一名作者与他塑造的人物的过度认同，而是意味着一个人物在那个短暂的时刻无法从他的作者那里抽身出来。皮普突然获得的一种不寻常的幻想力和心理力量——比如，他后来在精神狂乱中说道，“我是屋子墙上的一块砖，却祈求把我从建筑工人将我安置的那令人头晕目眩的位置拆下来；……我是一台大引擎的钢梁，在海湾上冲撞、旋转，但是……我亲自恳求让这引擎定下来，并把我这部分用锤子敲下来”（第 57 章）——对他刺激很大，而且，与狄更斯自己作为一个名人，一位催眠师，当然也作为一名小说家所具有的最典型的力量太相像了。作者的意识与人物的意识之间的融合来得突然而短命，并具有

---

〔2〕 狄更斯，《远大前程》，第 437—38 页（第 53 章）。接下来的引言将被整合到讨论中，并用章节数来标明出处。

极大的破坏力；在两部作品中，这种融合发生于三种混合压力之下。它们是：

第一，由男性认同、男性叙事者和男性角色构成的困难的**体裁**模式；

第二，在**主题**上强调、凸现男性同性社会性纽带；

第三，单一身分与多重身分之间无法确定的混乱。

我们已经讨论了《公主》中所有这三个因素，以及他们是如何体现在对“七头怪物”的故事的“口口相传”中的——这将这首诗的体裁问题和主题问题联系了起来。在《远大前程》中，这些因素总的来说分得更开一些；只有石灰窖那一幕将它们很危险地放到了一起。当然，在整部小说中，老皮普和小皮普之间小心调试的、变化着的距离起到了体裁上的构成作用，但它采取的方式使“狄更斯”——也可能是狄更斯自己——精力充沛的声音被异常地盖住了。从议题上看，这一幕是这部偏执小说中最具力量的几幕之一，它把男人们放到了狂野的同性社会性敌对关系中来。“你怎么敢，”奥利克问道，“跑到我和我喜欢的年轻女人中间来？”当然，在整部小说中，皮普在何种程度上在心理上陷入奥利克对女人（显著例子是乔太太）的暴力已经引起了很多批评家的注意。但我们看得最多的，还是奥利克在躲避皮普，而皮普在追逐奥利克。

将一个男人与许多男人混淆，以及作者与这种混淆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在《公主》中是中心问题——在《远大前程》这一幕中被古怪地转移并复制了。一方面，当皮普的意识随着奥利克酒瓶空下去而突然增强时，这成了皮普的问题；另一方面，这个问题也附在奥利克自己或他的新伙伴身上。他夸耀道，

我有了新伙伴，还有新主人。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我想让他们替

## 男人之间

我写信时就给我写信——听到了吗？——替我写信，哈！他们用五十种字体写；他们不像你这偷偷摸摸的小子，只用一种字体写。

奥利克特别强调的是最后这一句（“他们用五十种字体写，”他重复道，“他们不像你这偷偷摸摸的小子，只用一种字体写”）。这不是这部小说第一个将奥利克与诸如坎培逊和德拉莫之流的邪恶男人在主题上相联系的地方：这三个人都被塑造成神秘鬼祟的样子，跟在其他男人后面，“会在某个晚上用两栖动物那种缓慢的方式从后面冒出来”。（第26章）<sup>〔3〕</sup>三个人都伙同其他男人一起，对女人施过暴行。<sup>〔4〕</sup>实际上，如果要把这部小说的情节拼在一起，是很难把这群暴力的、具有异性恋占有欲的男人们彼此区别开来的。但是，如果这个由男性交易和暴力构成的多头怪物让这之前喑哑、粗野的奥利克突然获得巨大的表达力，会很令人惊异。更令人惊异的是，他用来进行夸耀的表达方式（很像“用不同声音模仿警察”）突然让他跳到一个小说家代理人的搏彩位置上去，和皮普在一起。古怪的是，男性同性社会性共谋那种催化剂似的压力是超越了个人的。在它最紧张的时刻，在跨越体裁/本体差异的同时，它也可以跨越阶级——它可以把熔炉和铁匠熔为一体，或将用双手干活的人和可以用五十种字体写作的人熔为一体。

我已经提到，男性权利的集体性与它的等级结构并非不相容，而实际上，两者之间还有着不可割断的联系。在《公主》中，这一事实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和政治上的意义。尽管，在七个年轻男人之中，小沃尔特·维维安在权力和特权上肯定是与王子最接近的那位，但承担起把王子的叙事以

---

〔3〕 奥利克：见第15、17、35、43、53章；坎培逊：见第3、5、40、44、47、54章；德拉莫：见第25、26、38、43章。

〔4〕 奥利克：见第15章；坎培逊：见第22、42章；德拉莫：见第59章。德拉莫对艾斯德拉施行的暴力本来并没有与皮普共谋，但事实上构成了她最终向皮普屈服的基础，因此加强了男性权力的集体总和：她说，“苦难比一切教导都强，它教会我理解你有过怎样的心肠。我经历了曲折、打磨，但——我希望——这把我塑造得更好了”。（第59章）



它的最终形式呈现出来之责任的，却是框架叙事的那位无名叙事者——他是位来访的朋友，一名年轻诗人。因此，这首诗的某些政治取向可以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它的观点代表着一种贵族的意识形态，目标观众既包括贵族也包括资产阶级，但它的代言人在恩宠制度中扮演的不是恩主而是受恩人的角色。此外，《公主》中在体裁上的混淆——或分化——与性别分化之间具有更直接、更坦率的关系；因为该叙事（包括其女性主义内容等等）完全被归功于那些年轻男人，而点缀了这个叙事的引人入胜的抒情诗篇——它与所谓的事实之间总有着古怪的甚至颠覆性的偏差——则被认为完全是这个群体中的女人们的功劳：

女人们

在男人们粗豪得多的嗓音中放歌，

就像驻足风之间隙的红雀。（前言，第 236—38 行）

当然，正是由于这关于两性的热烈而又混乱的神话的种种反讽，这个叙事才备受重视，而对它的汇编成集只以它的抒情诗篇，它自称的“女性作品”为依据。或许在那些实际上享受统治特权的人眼中，在那种年代，不能把为他们辩护的重任交给区区一名诗人，无论他觉得自己为这个重任准备得多么充足。或许在他们看来，诗人和妇女的作品如果不是出现在丁尼生诗歌中的话，只能落入同样纯装饰的、天使般的、可忽视的等级。

那么，丁尼生的策略，他的诗人兼叙事者的策略，以及王子的策略，都像威切利和霍纳的策略一样：它们通过表面的自我克制而具体表现了一个特定社会内部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和异性恋欲望的种种矛盾，并把这些矛盾整合在一起，以使升华了的知识增值成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从对认知控制和形式控制的角度看，《乡村太太》是一部几乎完美的戏剧；不论从任何控制形式(form of control)的角度看，《公主》都是一首糟透了 的诗。而就像我们将继续看到的那样，在现代的、被恐同割裂的男性同性

## 男人之间

社会性欲望方面,没有什么文本能像威切利的早期作品那样握有极为集中的认知控制。如果不在别的方面——如果不在主题或题材方面——那么,恐同竖起的电网屏障就会疯狂作用于体裁本身,作用于写书的男人与代他行使叙事功能的男人之间的纽带。上。“抒情诗的破绽”〔5〕,这个被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用来形容小说里作者的欲望——这欲望要么被放纵,要么被否定——那扩散的腐蚀性污点的短语,本身也是现代同性恋恐慌的一个现象。

---

〔5〕 詹姆斯,《给 A. C. 本生和奥古斯特·莫诺德的信》(*Letters to A. C. Benson and August Monod*),第 40 页。

## 第八章 《亚当·比德》和《亨利·埃斯蒙德》： 同性社会性欲望和女性的历史性

第 5、6 章对偏执狂哥特式传统的小说的讨论，是以关于历史时段划分的两个重要假设为基础的。第一个假设在第 5 章中直接讨论过，主要以关于性本身——尤其是男人的性——以及特别是关于对待男性同性恋的态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这个假设在 17 世纪晚期或之后找到一个关键的，但在时间上甚为模糊的历史支点。这个支点就是，对性的制约从宗教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转移到了一套复杂的世俗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上去，比如国家、医学科学、和个体心理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转移要求男性同性社会性谱系中出现一个日益受到压力的、具有侵略性的恐同分化。至此为止，我们的讨论一直集中在男人的生活经历在强制性异性恋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所发生的变化。很清楚，在男人的性别构成结构中，女人具有一种至高的重要性——她们代表着一种绝对的交换价值，本身就是一种表述，而且也是制约着男人的性别系统中的种种痛苦矛盾的最终牺牲品。然而，关于女性角色的这种观念或许是浅近的、非历史的，甚至在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研究范围中也是如此。

关于时代划分的第二点假设至此一直在默默支持着我们对小说的解读，而且在上一章对《公主》的解读中变得更加活跃；它与新兴工业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变化的家庭构成有关。关于所谓的核心家庭，有一种假说

认为,它的重要性和不断变化的意识形态意义在日益增强——这个假说将成为我们解读 19 世纪英格兰男性特质的参考。由于这个时期的女人角色与家庭之间有着强烈的认同关系,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假说,暂时把焦点由男性纽带的历史性转移到女人与男性纽带之间关系的历史性上来。

女性主义的时代划分法假设工业主义下的欧洲女性特质和欧洲家庭都发生了重要改变;这种时代划分法至少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一书。它的某个版本到现在已经成了几乎所有具有历史导向的女性主义研究的标志。与之息息相关的是,女性主义社会科学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人类学家)强调,“家庭”和“公共”之间的区别,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强度。<sup>〔1〕</sup>按照琼·凯利—盖多尔(Joan Kelly-Gadol)的描述,文化“处在标尺的末端,在那里家庭秩序和公共秩序清楚地相互区别开来,”

当剩余价值增加了,私有财产发展了,公社家庭(communal household)变成了一个私有经济单位——这个经济单位即由男人充当代表的家庭(无论是大家庭还是核心家庭)——的时候,妇女……逐步失去了对私有财产、产品和她们自己的控制。作为女性活动的领域,家庭本身变得从属于一个更广的社会或公共秩序——受到国家辖制——而这种社会或公共秩序一般都是男人的领域。这是历史社会或文明社会呈现出来的一般模式。<sup>〔2〕</sup>

---

〔1〕 关于这一点,参见,比如说,米歇尔·辛巴利斯特·罗萨尔多(Michelle Zimbalist Rosaldo),《妇女、文化和社会:理论综述》(“Women, Culture, and Society: A Theoretical Overview”)一文第 17—42 页;该文收于罗萨尔多和路易斯·兰姆菲尔(Louise Lamphere)所编的《妇女、文化和社会》(*Women, Culture, and Society*)。

〔2〕 凯利—盖多尔(Kelly-Gadol),《两性的社会联系:妇女史的方法含义》(“The Social Relation of the Sexes: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Women’s History”),第 819 页。

女性主义历史研究响应恩格斯，倾向于把 18 世纪英格兰——它在向工业资本主义迈进，并逐步聚焦于核心家庭——视为“公共”领域和“家庭”领域日益分离的重要过程中的一个征兆性的时点。

尽管具有历史导向的女性主义(我在此将它简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出于这里讨论的目的，我姑且忽视许多学者和思想家在方法上的很多重要区别)认为这种变化真实而且重要，但是，那些我归结在“激进”(参见前言第三部分)类别下的各种女性主义形式则弱化了它的重要性。在近期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激进女性主义的意见交流中，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工业资本主义与依赖男性的家庭之间的优先权问题——时间顺序上的优先权，解释优先权，或功能/目的论优先权。尽管下面这些问题尚显粗糙，但却是这场关于优先权的讨论中最紧迫、最实际的女性主义问题：从现代对劳动的性别划分中主要受益的，是作为群体的男人，还是作为阶级的资本家？性别化的家庭(the gendered family)在功能上与资本主义的需求之间有多吻合？性别化的家庭是否在资本主义中必不可少？其中一个的改变是否一定会引发另一个的改变？如果会的话，如何改变？

很自然，这场辩论中进行的每一步都伴随着对前资本主义家庭的另类重构。换另一种粗糙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激进女性主义倾向于在历史内部看到相对不作改变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不仅父权统治的事实，而且它的基本结构，都通过抵制或同化经济上的差异或改变来保持稳定；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通过讽刺描述的方法——倾向于将性别化的家庭灾难性地历史化，认为它只是在相对较晚的时候才采用了它现在的压迫性形式(或多种这样的形式)，认为这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的压力之下，是对资本需求的颇为直接的反应。

在这些观点之间浮现的一个更为成熟的中间立场那里，欧洲资本主义似乎出身于，或成长于，一个预先存在的关于家庭的语言。(我这里的“语言”[language]一词不仅指意识形态，也指一个沿着亲缘关系和共栖

的轴线将真实的人和功能合在一起的复杂结构。)<sup>[3]</sup>就像大多数语言一样,这种语言具有多重性,矛盾而冗长;此外,就像大多数欧洲语言一样,它已经被强烈而复杂地性别化了。另一方面,对真正使用一种语言说话的人而言,如果说不是这种语言所继承的性别化形式本身,那么,至少这些形式的特征、逻辑依据和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总能被领会。这样,在即将出现的带有工业资本主义阶级烙印的家庭中,工业时代为这种预先存在的性别划分重新开放了在特征、逻辑依据和意义上的协商。

我使用了一个语言学暗喻来形容这一过程,但是,这不是因为我认为意识形态领域是上演这个过程的舞台。工资劳动发生于家庭之外,男人们被付给“家庭”薪金,而女人为同样的工作得到的则是“额外”薪金,女人变成了劳力储蓄,而同时几乎独自承担起家中繁衍男女劳动力的责任;薪水,职业,甚至往往包括食品消耗,都存在差异;孕育后代由一种性别的一人独自承担——这些事实显然不是任何狭义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建构。同时,很明显,意义形成和重新阐释的复杂过程在这一时期肯定非常接近阶级与性别的共同基础的中心。在这个意义上看,作为意义关系的研究者,我们显然可以追寻,意识形态是如何将未来与过去,将阶级与性别,“以看不见的方式重新编织”起来的。

当然,和裁定“激进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英格兰十九世纪变革的不同解读的问题相比,我在本章中的目标相对较低,而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说它目标较低,是因为通过文学阅读来解决历史学问题具有许多局限性;说它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是因为它最终瞄准的是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问题。我这里要讨论的是萨克雷的《亨利·埃斯蒙德》(*Henry Esmond*)和艾略特的《亚当·比德》(*Adam Bede*),仍然以《公主》为背景;这三部19世纪虚构叙事作品有意历史地或仿历史地描述了妇女的改变中的家庭角色,它与妇女自己的性欲的关系,以及它与男性

---

[3] 我在这里的构想直接受益于白瑞特的著作《今天的妇女压迫》中对这一方面的深入调查,比如,第160—186页。

同性社会性欲望的关系。就像《公主》一样，《比德》和《埃斯蒙德》的结尾都认可了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的“家庭天使”式的女性角色。然而，在这种认可之前，每部作品都各自提供了关于前工业时期的极不相同的封建关系的脉络，但在结尾时，这些关系变成了规范性的、男人领导的核心家庭。每部作品中，家庭结构以及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意义似乎都需要用新出现的“现代”方式来重新定义。在《比德》和《埃斯蒙德》中，异性恋逾矩行为那种具有吸引力的、先发制人的剧情促成了——虽然也掩盖了——阶级之间的权力转换。而且，在这三部作品中，“现代”阶级构成与性别构成的合法化也完全是以男性同性社会性方式发生的：这是男人之间事关荣誉的交易，争夺的对象是一名女性那死去的、不名誉的或被剥夺了权力的身体。

在本章中，我将使用《亨利·埃斯蒙德》和《亚当·比德》这两部小说来说明一种辩证关系，即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女性主义对妇女地位——在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关系中——的历史性所持的观点之间的辩证关系。就像在任何严肃历史小说中一样，在《亚当·比德》中，“迷思”（myth）的发展轨迹组织了社会学图景。在《亚当·比德》中，精细的社会学和涵括一切的“迷思”具有同样的灾难性（catastrophic）结构，我们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性别化的中产阶级家庭的经济基础的描述中看到了这点。当然，我们并不确定艾略特是否会接受“灾难性”一词所具有的损失惨重（disastrous）的涵义来描述这种改变。然而，一个关于阶级和性别基础的（相对而言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在这里被极为细致地表达出来，以至于温和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教授可以轻松地 그녀의 妇女研究调查的一半以这个文本为基础。

这部小说对我们眼下的理论难题所具有的解释性力量来自一种权威和完整性——它依靠这种权威和完整性，根据看似不变的性别角色来安置它的人物；但接下来，这种解释性力量来自一种特定性——它依靠这种特定性，将这些角色放到了处于特定社会结构位置上的特定家庭的生产

和储备经济中；最后，这种解释性力量来自一种绝对的方向性——“迷思”的情节依靠这种方向性，将这些家庭推入了新的关系中，这些关系对某些家庭角色而言意味着消亡，而对其他角色而言，意味着激进的、具有异化效应的重组。

在小说开头对前工业时期社会的综述中出现的是坡伊瑟的农庄，它最典型地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所描述的那种一体化的农业工作场所，在这里，男人与女人的工作充分地重叠在一起。<sup>〔4〕</sup> 部分因为商品和服务——而不是现金——是主要的交换媒介，乳制品和纺织制品（其生产被坡伊瑟太太控制了）从没有被清楚地区分为是家用的，还是市场交易用的。坡伊瑟先生的耕作也没有被这样区分。也就是说，不仅家与工作没有在实际空间上区分开来，同时，作为其特征的生产模式与消费模式在结构上都极为相像，而且价值也类似。

从人口统计学角度看，坡伊瑟家庭也极有弹性。壁炉上放着的一尊计量缪斯(muse of cliometry)\* 就可以帮助她将家庭成员编号、分类。坡伊瑟一家有三代直系成员；此外还有两位侄女，戴娜和海蒂，她们中一个在此客居，另一个则在作仆人；另外还有真正的仆人和农庄工人。但是，在这个涵盖多种劳作的家庭里，不仅每个人都努力干活，而且他们干的活都差不多。当然，从经济上讲，一个人能不能继承农庄的租赁权或那些漂亮织物的拥有权，还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在家庭经济中，体力劳动与管理工作之间的区别几不可分，而且，更重要的是，商品、服务、食宿、伙伴关

---

〔4〕 例如，南西·乔多罗(Nancy Chodorow) 这样来总结这个观点：“在前资本主义和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家庭是社会的主要生产单位。丈夫和妻子，以及他们自己的和/或别人的孩子，构成了合作式的生产单位。除了自己的生产工作外，一名妻子还要履行照顾孩子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训练女孩们——女儿、仆人、学徒——的工作。儿童很早就被整合到成人世界的的工作中去……直到距今非常近的时候，各地妇女都还要参与到大多数生产形式中去。为家进行的生产式是在家中、与家相联系而进行的。”（《母职、男性统治和资本主义》[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第88页。）

\* 希腊神话中的众位缪斯中，掌管历史的是克莱奥(Clio)，而用计量方法研究历史的学科“历史计量学”(Cliometrics)得名于这位女神。——译者注



系以及技能训练是在一种复杂的市场上来交易的，这个市场并不要求用一种通用的理性化单位来度量所有这些东西；在这种经济下，各个人群赖以生活或工作的不同能力不那么容易以非此即彼的方式来划分，比如“家人”和“仆人”，或“男人空间”和“女人空间”。在这个意义上看，家庭沿着亲缘关系和共柄的双轴延展，看起来并没有以非此即彼的方式相互简化。<sup>〔5〕</sup>

当然，在这个经济一体化的家庭中，坡伊瑟太太的个人权威和尖刻很有道理。她不吝于言辞，但她说话的特点不是漫无边际，而是一针见血：这些话一针见血是因为她的发号施令带来看得见的结果；她在家庭物质生产和权力生产中的发言权无需借助于夸大或神秘感。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拿她来与亚当的母亲莉斯贝丝·比德进行比较：相形之下，莉斯贝丝的语言展现出很多罗宾·拉科夫(Robin Lakoff)<sup>〔6〕</sup>用来与“女性语言”相联系的特征：重复、抱怨、自我否定、对无关细节纠缠不休、“焦虑气质和不理智的坚持”，此外还有“一种哀号，它是所有声音中最恼人的，却不带真实哀伤，不能切实发挥作用”。<sup>〔7〕</sup>她说的话总是恼人地在“真实”的边缘徘徊——它充满歉意，同时又带着挑衅，“既耐心又牢骚满腹，既自暴自弃又严苛，整天都在纠缠头一天发生了什么，接下来一天又会发生什么，随时都会为好事坏事哭泣”。(I, 4)“但是，”艾略特在这段描述后又说道，就好像在自相矛盾一样，“她对亚当偶像崇拜般的爱意中混杂着某种敬畏，每当他说‘别来烦我’时，她总是沉默下来。”

我们第一次看到莉斯贝丝时，她站在她与丈夫、儿子居住的家门口。

---

〔5〕 关于以这种双轴来理解家庭的观点，参见白瑞特，《今天的妇女压迫》，第200—203页。

〔6〕 拉科夫，《语言和妇女的地位》(*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尤其是第53—57页。此外，我对“妇女语言”意义的理解还得益于欧巴(O'Barr)和阿特金斯(Atkins)的文章《是“妇女语言”还是“无力的语言”？》(“‘Women's Language’ or ‘Powerless Language’?”)，尤其是第96页。

〔7〕 艾略特，《亚当·比德》，第1卷，第4章，第52页。以下的引文将被整合到讨论中，并用卷数和章数来标志。(我使用的两卷本版本的第1卷以第24章为结束。)

她用久经历练的双眼看着“一个逐渐变大的黑点，在过去的几分钟里，她已经确信这是她亲爱的儿子亚当”正从他作木匠的作坊回家(I, 4)。我们获知，莉斯贝丝自己是位耐劳的人——她“不动脑子”就可以织毛线，她不停地打扫，她从泉边用头顶回一桶一桶的水。但很难不把她所用的语言中充斥的恐怖的、血腥的权力和自大，与她家庭里男性工人的缺席以及(由同样的经济过程所造成的)新兴货币关系的缺席相联系。她在家中的工作被有限地描述为是“家庭内部的”、储备性的，是经济生产的反面。相应地，虽然她的声音将自己呈现为母亲的声音，但实际上却被认为充满依赖，被认为是说话的狗的声音。“与爱我们的女人相比，我们一般会对爱我们的畜牲更和善，”乔治·艾略特在这里这样说道(此时没有人知道艾略特是女人)。“是因为畜牲很笨吗？”(I, 4) 坡伊瑟太太自己也热烈地爱着自己的孩子，但“爱我们的女人”(the women that love us)这个令人焦虑不安的范畴从来不能用到她头上；她的语言无法不举足轻重，因为她在自己家中处于一个制造分量的位置上。

虽然坡伊瑟家的构成原本看起来既丰富又有连续性，而比德一家看起来则显得脆弱、混杂，但是，《亚当·比德》的基本历史轨迹是将小说的规范性的家庭图景从坡伊瑟一家相对一体化的(integrated)农庄转移到比德一家高度特异化的(specified)核心家庭去。作为这个转化的一部分，规范性女性角色必须由坡伊瑟太太转变为比德太太那种类型。到小说尾声的时候，坡伊瑟家中已经只剩下任何会变成坡伊瑟太太的人了；阿瑟·冬尼松唯一的孩子当然已经死了；但戴娜和亚当还拥有他们的小亚当和小莉斯贝丝，这些孩子的作用是将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名字所纪念的人的价值折射到未来去。当然，在何种程度上这部小说从价值评判上讲不是女性主义小说，清楚地显现在它费了多大力气才使得这种转变看起来可以被接受；但是，为这个目的所付出的努力的程度，也很清楚地说明了它的女性主义分析的透彻性。

规范性女性角色的这个改变的主要载体是戴娜·莫里斯。戴娜在小

说中的生涯极为充实，这不仅体现在它的强烈程度上，也体现在它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时期妇女命运的重要线索——这种命运与她们的性别息息相关。尽管她是坡伊瑟太太的侄女，而且在小说开始时也生活在霍尔农庄，但她也是小说中唯一一个直接经历了工业集中化的人物：她靠在斯诺费尔德一家棉纺厂工作来养活自己。同时，对霍尔农庄的姨妈的造访也是她为卫理公会巡回布道的一部分。那么，戴娜的生活模式，在小说开头，似乎代表着工业革命开始时个人主义和自主权(autonomy)给年轻女工带来的某些希望。用她的话来说，她在纺织厂做工的薪水“够用，而且有剩余”(I, 8)，可以满足她的个人需求。她从小就成了孤儿，选择独自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制度上的限制或有效的意识形态上的限制来干预她的活动力，干预她的决断力，而正是由于有这种活动力和决断力，她才能公开地将自己的才能投入到自己选择的事业上去。

很明显，戴娜信奉的卫理教是为她的自主性服务的双刃剑。然而，在小说的开头，卫理教为这位年轻的女传教士提供的条件似乎十分清楚、十分有利，即使以世俗个人主义的标准来看也是这样：通过充分服从于一个单一、神圣的男性权威——这个权威既无所不在，又无所不能——她起码可以在比神低的人的层面上，在与所有生灵(无论男女)平等的位置上发挥作用。她的职业的严肃性成为一种正当理由，使得她具有不依赖姨妈一家的独立性以及四处行走的活动力，同时也使她可以拒绝一门好亲事而不必屈从于过分的社会压力来接受它。作为布道士，她的口才为她赢得了关注、特权和巨大的影响力。然而，在对别人描述她的口才时，她总是淡化自己对口才的控制力：

言语似乎不是由我自己的意愿带来的，就像流眼泪一样，言辞被送到我嘴边，这是因为我们的心灵是充实的，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先生，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被一种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的意愿引领着。(I, 7)

## 男人之间

或许，戴娜对自己的技巧和影响力的运用是通过母性强迫症这个意象来完成的：她告诉坡伊瑟太太，

我无法不投入我的生命为他人的灵魂尽我所能，就像当你听到小托蒂在房子那边哭的时候没法不飞奔过去一样。（I, 7）

简单来说，戴娜的声音中承载着特殊的权威，它在公共性方面甚至超越了坡伊瑟太太，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正是坚持认为这个声音是一个更高的父权表达的工具，而不是她自己的。然而，这个权威的来源极高，以至于它暂时赋予了她一种凌驾于人类男性之上的具体而有力的影响力。也就是说，在这个当口，就像经常在历史上出现的那样，“父权”不再是一个让“女性”屈从于“男性”的单一机制；它成了一张由化合价(valences)和意义形成的大网，尽管这张网具有深深的倾向性，但在某些历史时期，它也能通过它的表达和分配，为女人和男人提供物质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支持。“她一切为上帝，他一切为了她代表的上帝”（She for God only, he for God in her）似乎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成了戴娜与小说中卫理教男性之间关系的结构，而且，很大程度上，她与其他男人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而伴随这一地位而来的权力不仅仅是局限的、超然的，也是世俗的。

但是，既然这个故事必须要以现代的男性主宰的核心家庭为结局（就像弥尔顿[Milton]的作品一样），那么，在意识形态上，该如何对付这样一个乐园——在这个乐园中，夏娃被先造了出来，而且更强壮，她一切为上帝，他一切为了她代表的上帝？当然，在不同小说中，这正是爱发挥作用的地方。当戴娜“爱上”不为所动的亚当时，伴随着她的改变出现的是一种新的、沉默的、顽强的爱欲，它只能通过眼睛表达，而它主要的性敏感区是羽毛掸子：

……这掸子是如何在戴娜手中行动的——它如何触及每个小角

落，触及每个看得到或看不到的壁架——它如何一再触及椅子的每根横木、每只腿，触及桌上每件物品的上上下下，直到抵达亚当的文件和尺子，以及它们边上那张开放的书桌。戴娜为这些东西的每个边角都除了尘，随后她迟疑了，用渴望而又胆怯的眼神看着它们。  
(II, 26)

有趣的是，小说中只有在这一部分里，亚当的名字与圣经或弥尔顿的关联——与他的姓和萨克逊传统之间的模糊关联正好相反——在与戴娜的关系中开始变得凸现出来。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戴娜正带着新的紧迫感和不确定开始自问究竟是谁代表了上帝，又是谁一切为了上帝。

不，亚当；对我而言，我对你的爱似乎并不虚弱；因为我的心牵挂着你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几乎就像一个小孩子牵挂着他所依靠的强者的帮助和柔情一样。如果说我对你的牵挂对我有所影响，我并不担心它会成为我放在神庙里供奉的偶像。但你会让我坚强。  
(II, 28)

在戴娜最终接受亚当的一幕中，这种倾向达到了极致，因为她似乎听到了他的声音，这声音不像是圣经中的亚当的，而像是上帝的。他爬上小山向她走来：

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就在他向前走时，戴娜停住，并转过身来……亚当很高兴；因为，恋人的出色直觉让他感觉到，最好是让她在看到之前先听到他的声音。他走到距她三步之遥的地方，然后说道，“戴娜！”她吓了一跳，却没有回头看，就好像她并没有把这声音与任何地方相联系。“戴娜！”亚当再次说道。他很想弄清楚她究竟在想什么。她习惯于把印象想象成单纯的圣灵诚谕，以至于不会找

## 男人之间

寻伴随着那个声音的看得见的有形物。

但这第二次的时候她回过头来看。那温柔的灰眼睛带着怎样的爱慕来注视这位强壮的黑眼睛男人！看到他，她并没有再被吓一跳；她什么都没说，而是向他走了过去，好让他的手臂能将她拥住。（II, 30）

尽管在这部小说较早的篇章中，天父与凡间男子之间在意义和制度结构上的分裂给了戴娜施展自己的某些真实权力的空间和杠杆，但是，这些赋予力量的裂缝在这里闭合了。实际上，赋予了她权力的意义体系正好形成了她此时投降的基础。在这里，戴娜发现，她的天父的声音正是她的男主人的声音（Her Master's Voice）\*；现在，她自己丧失了声音，只能发抖，呜咽，或是用眼眶湿润的注视来回应它。

同样重要的是，小说结尾对戴娜的权力和领域（sphere）的限制远不仅只发生在个人心理的范围内，虽然小说在这里最有机会使其显得是自愿的、令人兴奋的。工业劳工构成的种种改变似乎同时受到男性工人和资本家的推动，在这个时期，随着工厂系统的发展，这些改变严重地妨碍了女性获得薪水较高的或稳定的工业界工作的机会，虽然这部小说通过一种假设掩饰了这一事实——这个假设就是，对于戴娜而言，婚姻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在她丈夫的村子里定居下来，不再打工赚取薪水。然而，这部小说的确清楚指出，即使戴娜永远不结婚，她也将不得不放弃作为她的独立和权力的根源的布道活动，因为，在1803年，布道的权利被从卫理教妇女手中夺走了。令人寒心的是，我们仅仅只在尾声部分，从亚当口中听到据他所称戴娜为这一规则所作的辩护：

---

\* 值得注意的是，塞吉维克此处将这一短语中每一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强调了“Master”和“Voice”的（天父般的）权威感。“Master”一词既有家庭中男户主的意思，又有“主人”之意。——译者注

大多数女人做布道害大于利——她们没有戴娜的天赋，也没有她的精神；她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她认为应该服从，以做出表率……。我的想法和她的一样，我赞成她所做的一切。（II，374页）

同样令人寒心的是，尾声部分开始的时候，戴娜那狗一般的姿势正是莉斯贝丝·比德第一次出现时我们看到的姿势：她站在一栋房子的门口，极目远望，想第一眼看到回家路上的亚当。实际上，塞斯指出了这其中的相似之处：

如果他在看得到的地方，你就一定看得到他。……你就像可怜的妈妈过去那样。她老是守望着亚当，虽然眼睛都昏花了，还是总比其他人要先看到亚当。（II，第374页）

如果有人听四十名音乐榜（Top—40）的广播，可能会忍不住想起希娜·伊斯顿（Sheena Easton）一两年前颇为成功的歌曲：“我的宝贝去赶早班火车/他朝九晚五地工作，然后/他又有了个家/发现我在等——他。”这首歌的和声部分藏有含沙射影的细语：“只有他和我在一起时——我才有了生命！/他给我的每样东西——都让我感觉很好！”<sup>〔8〕</sup>生产劳动的那种朝九晚五的规律化，和它从家庭那里分离出来一样，是领域意识形态（sphere ideology）的法令性场景的支撑，在这种意识形态下，无法走出“她的”领域的妇女只有静立着等待着男人。男人拥有这个领域，出入自由，但要在规律的、可预见的时间出入，而且这个时间根据他自己的主人人们的需求来确定。

实际上，《亚当·比德》中展示的艾略特社会学的一个点——她对这个点的处理虽然带有倾向性，但也一针见血——正是男性工作的日益理

---

〔8〕 尤尼切坡音乐，音乐广播公司（BMI），© 1980, 1981，百代唱片有限公司（EMI）。

性化：男性工作被放到一个可以用单位来计量和交换的基础之上，逐步与越来越女性化了的家庭领域区分开来。那时的工作时间还不是“朝九晚五”，但小说第一幕就显示了前工业时期的工作任务导向与工厂式时间纪律之间的矛盾：当教堂的钟打了六下的时候，布齐工坊所有的工匠都扔下他们的工具，放下尚未完成的工作——只有亚当没有，他责备道，“我憎恨看到钟还没有真正打响时，男人的胳膊就像是被枪打中了一样垂下来，好像他对工作一点骄傲、一点快乐都没有”。(I, 1)就像在小说其他地方一样，亚当在这里的意识形态主张来源于个人化的、前工业时期工匠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下，制造者被简单地等同于被制造的作品，并从中得到他的劳作的所有价值。然而，重要的是，亚当是作为工坊主人乔纳森·布齐的继承人来说话的，因而，他也是作为这种更为集体化的劳动那被分离出来的利益的未来受益人说话的。对他而言，将目前已经变得空洞的“骄傲和快乐”的价值重新注入工作，具有经济上的意义；但是，他的同事和未来的雇员威利·本在“工作”时间与“玩乐”时间之间作出的清楚区分更符合薪水工人那种直接的、不那么神秘化的情形。在劳动关系领域之外，“死板的、师傅般的”(I, ii)亚当实际上是一名代表了抽象和理性化的英雄：他“写一手很容易读的好字，还会心算——这种水平在附近农村最富裕的农民中都是闻所未闻的”。(I, 9)也许亚当性格中最清楚的就是，理性化工作赋予他的这种对世界的杠杆作用，对这种性格产生了多么彻底的影响。

只要一个人能干活，就应该在可忍受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干活。……事物的性质不会改变，尽管看起来似乎一个人自己的生活除了改变之外就没有别的内容了。四的平方是十六，而你必须比照你的重量来延伸你的杠杆，这在一个人悲伤的时候和快乐的时候都同样真实；关于工作最好的事情就是，它让你能够掌握自身之外的事物。(I, ii)



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地位下降了)家庭劳动现在变成了“女人们的劳动”，依然顽固地以任务为导向，而且未经理性化：照顾孩子、病人或老人并不能因为时钟敲响了就可以停止，给炖肉开平方根也不会使她能够掌握自身之外的事物。就像艾略特指出的那样，劳动的这些历史性错位的结果就是，妇女劳动的空间和时间在意识形态上变得不仅与“真正的”劳动的领域分开了，也变得与时代脱节。也就是说，将戴娜放逐到“家庭天使”的狭小领域的意识形态土壤已经由她早期的布道工作充分地准备好了，但这些布道工作本来也可以孕育很不一样的果实；只有在家庭的经济结构与经济功能——及其大环境——发生灾难性变化的物质基础上，她与神的特殊的世俗联系才会变成一台发动机，驱动如此狭隘而特别的命运。

艾略特选择农村工匠阶层而非城市工业主义的代表来作为她描绘英国中产阶级家庭谱系的载体。就她对现状的温和辩护而言，这个选择很聪明：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提到的，这使她得以暗示，现代工业社会的价值观具有遗传性的——也是适合的——个人化特征，符合私有财产的模式。而且，“资产阶级家庭”——“中产阶级家庭”——“工人阶级家庭”等术语之间的滑移既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挑战——尚未有人迎战。<sup>[9]</sup> 这种滑移漂亮地体现在亚当从工人到作坊主的不动声色的上行滑移，而这一变化没有像他的经济基础脱离私人的贵族恩宠制度那种具有更清晰的“历史性”的转变那样得到重点呈现。

至此，我们一直在以《亚当·比德》为例展现原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性别结构与经济分工不可分离的观点。这种观点的一种推论就是，在18和19世纪中，经济形式朝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单向发展对于女性特质和性别关系的建构具有相应的深刻而不可逆的影响——正如我们现

---

[9] 关于这一点，参见杰弗里·威克斯的文章《资本主义和性的组织》(Capitalism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ex)——该文被收于左翼同性恋集体组织所编的著作《同性恋：权力和政治》(Homosexuality: Power and Politics)，第11—20页；请特别参见第14—15页。

在所体验的一样。在《亚当·比德》中，对这种改变最具揭示意义的地方就是戴娜·莫里斯的命运，在这一过程中，她先是与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大家庭只有着松散的联系，自己则占据了一个具有相对权力和独立性的位置，然后，她从这个位置移到一个更为受限的位置，成为一个高度性别化的资产阶级核心家庭中的母亲，而这个家庭与经济生产场所之间，只是一种被边缘化的关系。

尽管《亨利·埃斯蒙德》似乎在权力从贵族到资产阶级的转移的层面上戏剧性地呈现了一种相关变化，但就像《公主》一样，它将这种表面上的变化根植于预先存在的男女之间的权力划分和角色划分之中，这种划分的结构和内容已经是资产阶级核心家庭的结构和内容了。在《亨利·埃斯蒙德》中，由于性别划分和性别等级被描述为一种凌驾于其他历史变迁之上的相对恒定的形式，这部小说或许可以被合理地视为一部原始激进女性主义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女性性欲问题成了性别角色和男性优越地位的再生产和保护的主要场所。然而，这部小说中，女性性欲本身主要是在男人之间权力交易和象征性物品交易的语境中，才具有了意义，而女性性欲的场景——不论是牵涉到处女还是妓女的场景——似乎总是有规律地、巧妙地以男人之间一件“事关荣誉之事”来结束，而女人则总是被放逐。

艾略特选择农村工匠阶层来绘制她的家庭神秘谱系；萨克雷则有着截然不同的想法。《亨利·埃斯蒙德》中的人物来自一个不同的阶级，他们的游戏筹码要高得多——这些筹码就是伯爵身分和侯爵身分。然而，在某些很重要的方面，两部小说的基本发展轨迹是一样的。不论如何，在每部小说中，被承认了的规范从一个由一位尖刻的女人领导的家庭（这个家庭的人口构成具有弹性，而且很杂）转移到一个由一位男人领导的、定义明确的小家庭，在这一过程中，这位女人的角色不仅在经济上被挖空，而且被急剧地、限制性地道德化了。

在《亨利·埃斯蒙德》中，我们看到在安妮女王治下画境般的、具有骑

士传统的英格兰的一个贵族家庭，它的成员放荡，反动，信奉天主教，并拥护詹姆士二世；在几年之内，这个家庭就变成了一个极为看重家庭生活的、本质上由可靠的维多利亚中期公民构成的圈子，它的成员是虔诚的新教教徒，追随辉格党。<sup>[10]</sup> 第一个家庭拥护詹姆士二世，统治这个家庭的女人伊莎贝尔是一名萨克雷擅长描写的那种老年妇女：她没有孩子，是位自私的信奉天主教的异教徒女家长，她极具权力，富有，略通文墨，风韵犹存，有着丰富的、颇为公开的性史，而且身上绝对没有什么自然的成分。另一方面，瑞祺是后一个家庭的规范意义上的母亲；她以照料她深爱的家庭成员、让他们恢复健康为乐，不施脂粉，在空余时间研读外国文学（虽然“她的文学批评不以理性为据，而是以情感为据”），<sup>[11]</sup>她在性方面既压抑又极具占有欲，几乎达到要杀人或自杀的地步，同时，她自己名下没有钱……总之，她是家庭中被爱戴而又具有报复心的天使。

《亨利·埃斯蒙德》中这种新型家庭和新型女性角色实际的历史合法化要比《亚当·比德》中更生动、更直接，这是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贵族世界，这使得家庭合法性成了更直观的意象。<sup>[12]</sup>亨利·埃斯蒙德是位新式家长，他用两种方式让家庭的新形式变得合法：首先，出人意料地，他并不像大家所想的那样是名私生子，而成了家族头衔的合法继承人——卡索尔伍德五世子爵；第二，占据了权位之后，他放弃了这个头衔，退出贵族世界，象征性地把命运交给未来，采纳了受尊敬的资产阶级那些更谦恭、更私人化的价值观。

---

[10] 在企鹅版（萨塞克斯，哈蒙兹华斯 1970 年出版）的引言第 20—21 页中，约翰·萨瑟兰德（John Sutherland）简洁却颇具意涵地将亨利·埃斯蒙德描述为既是位“18 世纪的男子”，又是位“19 世纪的男子”；就像下文讨论中引用的哈里·萧（Harry Shaw）的观点一样，这提供了与女性主义历史观点构成反差的有用的男性中心论观点。

[11] 萨克雷，《亨利·埃斯蒙德》，第 1 卷，第 9 章，第 89 页。以下的引言将被整合到讨论中，并用卷数和章数来标志。

[12] 萧的《历史小说的形式：沃特·司各特爵士和他的继承者》（*The Forms of Historical Fiction: Sir Walter Scott and His Successors*）第 56—70 页对《亨利·埃斯蒙德》的历史性作了很好的讨论，但这个讨论未能对小说中女性特质历史地位和家庭的历史地位提出问题。

很符合萨克雷风格的是，他强调家庭史神话的历史主义，将它与真实的世界历史事件和人物交织在一起——这里的世界历史意义至少体现在夏季股票或巡回公司的层面。更显著的是，作为老式贵族价值观和性别角色的标志的詹姆士派(Jacobitism)在詹姆士·爱德华这个自称在位者的具体例子上受到质疑。这位冒牌者因为寻花问柳而浪费了继承安妮女王的英格兰王位的机会的那个高潮之夜，正标志着亨利·埃斯蒙德变成辉格党人的时刻，就在这一刻，他的各种计划和欲望总结性地落到了瑞琪身上。当然，在这里，资产阶级家庭被描绘成了阶级矛盾的各个力量的灾难性单向转移的结果。

但在这部小说中，最具萨克雷特色的部分走向了另一个方向。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他不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当然，萨克雷不是女性主义者，就像戴维·里卡多(David Ricardo)不是共产主义者一样；但正如乔治·艾略特一样，萨克雷精于将性别角色作为权力形式来分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女性主义者可以很容易地将我们的理论表述以可理解的方式与他们的发现联系起来。《亨利·埃斯蒙德》中的矛盾不那么直接了当；尽管这部小说对性别关系的历史变迁进行了精良的主题化，但是，它的分析所真正预示的女性主义却是对父权进行激进而且无视历史的批判。至少其他种类的政治变迁的结构本身是从属于性别化的家庭那种看起来稳定、可以自我复制的结构。

例如，在《亨利·埃斯蒙德》的续篇《弗吉尼亚人》(*The Virginians*)中，一个人物说道，“每个女人在心里都是托利党人。教皇称之为浪荡子，但我认为另一词更厚道”。<sup>[13]</sup> 这句话显示出，萨克雷坚持要把性和政治拴到一起，因而“浪荡子”和“托利党人”变成了可以互换使用的特征。然而，这句话也显示出，他喜欢用“每个女人如何如何”这个表达；而该表达的效果就在于，它将“托利党人”一词去历史化，并因此去政治化，以至于

---

[13] 萨克雷，《弗吉尼亚人》，第22章。

政治党派本身不再代表利益斗争，而被用来指派各种恒定的人格类型。此外，有人可能会问，如果《亨利·埃斯蒙德》最终展现了现代资产阶级家庭一劳永逸地脱离“反动的”封建主义影响下形成的情欲形式和性别关系形式的过程，那么，在这部小说的续篇中，我们为什么再一次听到了对女性“天生的”反动情欲的讨论？这个问题仅仅是这后一部小说对前一部小说造成的尴尬的一个开始；因为，从开头到结束，《弗吉尼亚人》只不过是先前那部小说中已经上演过的正剧的直接重复，可以视为一场愤世嫉俗的闹剧，而前面那部背景设在两代以前的小说，则可视作灾难。<sup>[14]</sup>

实际上，让《埃斯蒙德》成为伟大的历史小说，成为一部关于变迁的小说的，只不过是它在框架构思上的巧妙，藉此它似乎向我们表明，它描述的事件发生了，而且只能发生一次。但正如《弗吉尼亚人》清楚展现的那样，一个本可以让《埃斯蒙德》晚几年结束，甚至只是晚几周结束的小小的框架改变，可以让死者复活，让丧失的名誉失而复得或不受影响，让打碎的水罐重新回到井边继续汲水。《亨利·埃斯蒙德》向我们展现了从袋里放出的乡村小猫；照这样说，《弗吉尼亚人》为我们献上了“重归牧场的猫”。但奇怪的是，《埃斯蒙德》的巨大力量——也许不是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而是作为一部关于性别构成的小说——正是体现在这里，体现在它将性别角色呈现为不可抑制地复制自身的东西。如果《亚当·比德》提供了关于性交易的社会学研究的话，那么，《亨利·埃斯蒙德》几乎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场对性的连续性机制（mechanisms of sexual continuity）的分析。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亨利·埃斯蒙德》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现代家庭是会维持詹姆士派封建贵族那种卑鄙的“反动”形式——其男性和女性权力、关系和欲望都杂乱不堪，还是会采用更为牢固和纯洁的、被认为更适合资产阶级工作和价值观的形式。展开这个表面问题的最戏剧性的形

---

[14] 如欲了解对两部小说关系的另一种解读，参见罗林斯(Rawlins)，《萨克雷的小说：一种真实的虚构》(Thackeray's Novels: A Fiction That Is True)，第190页。

式就是亨利自己在两个女人之间作出的选择：瑞琪——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她已经成为新式的家庭天使的化身；此外是她的女儿碧阿翠克斯——她很像她的姨妈伊莎贝尔，正在成长为恶魔般的旧式风格的荡妇。（到《弗吉尼亚人》场景的年代，年华老去的碧阿翠克斯很明显已经变成了伊莎贝尔。）只要《埃斯蒙德》选择了一个单一时机的条件来戏剧化，它就激活并展现了这个家庭的历史症结。但是，作为一部穿越时光的小说，除了它与《弗吉尼亚人》之间的关系外，它还做了某件很不一样的事：它以不寻常的连续性和力量，将旧式的碧阿翠克斯作为新式的瑞琪的女儿来呈现。碧阿翠克斯最终成为的那类女人，不仅是她母亲的哺育风格如此精彩地造就的结果，同时，也如此清晰地反映了原先那种围绕女性特质的社会及政治制度——而这部小说表面的目的就是要记录这种制度是如何被她母亲推翻的，以至于读者最后只留下一个意象，不是有关确定的历史变迁，而是有关一个自我复制的、永不停息的叙事，它叙述着女性特质自身内部的分裂，试图回到过去寻求解释。

关于不幸家庭的诗歌是萨克雷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伟大主题——但这个主题着重的是特定的不幸家庭上。这些诗歌不尽相同，但它们的诗行描述的矛盾和人格结构似乎常常反映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资产阶级家庭，尽管场景中的时间、阶层、地点，甚至人口构成都有可能暗示着某种非常不同的东西。因此，瑞琪第一次婚姻的家——她这时是卡索尔伍德子爵夫人，这个家的随从中还包括了牧师全家和她丈夫的表亲的所谓私生子——纯粹是彼得迈尔式的\*：在她身上，领域意识形态那种内在的强制机制在她身上占据着牢固的位置。她的痛苦首先是因为丈夫常常不在家；她的安慰则来源于对头脑和灵魂的培育，而这一切无可避免地使她更加远离她丈夫的行动和肉欲的天地；她最尖锐的情绪与妒嫉，与对性欲的压抑或隐藏有关(I, 7; I, 11)。很明显的是，她妒嫉是因为她清楚地体察

---

\* 彼得迈尔(Biedermeier)指的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到19世纪中期这一段时间的文学、音乐和艺术作品。这些作品与城市化、工业化条件下崛起的中产阶级息息相关。——译者注

到女人可以得到的爱与权力太少(I, 11; I, 13);而在回应这种缺失的时候,虽然瑞琪作为一名理想化的母亲本来应是家庭之爱的化身,但她反过来变成了一个起阻隔作用的狭窄的路径(前言,第7页)。瑞琪不仅垄断了她周围男人的爱,而且将她所有的爱为他们留存起来——先是她对丈夫和儿子的爱,但很快就是对亨利·埃斯蒙德这位家庭小窝中的阴郁丑小子的爱。成人后的碧阿翠克斯在一次对亨利的发泄中说道,

她对弗兰克小手指的关心都超过了对我的关心——我知道她就是这样:而且,先生,她爱你,爱得太过分了;我因此恨你。我想让她只属于我自己;但她不肯。在我小时候,她爱的是我父亲——(啊,她怎么会这样?在我记忆中,他又和蔼又英俊,但却也非常愚蠢,而且喝了酒以后就不会说话了)。然后就是弗兰克了;而现在,[她爱的]是上天和牧师。我本来可以深爱她的!小时候,我会因为她爱的是别人而不是我而大发雷霆;但她爱你超过一切——一切,我知道她真的是这样。(III, 3)

在碧阿翠克斯的家庭中,第一原则就是父亲与母亲各自关心的事是截然分开的,中间的桥梁仅仅只是母亲的妒嫉;在这样的家庭中,碧阿翠克斯很小就学会了妒嫉——这种妒嫉“如果当着卡索尔伍德爵爷的面说起的话,会让他开心发笑;他会假装最爱弗兰克,逗弄、亲吻他,因为碧阿翠克斯的妒嫉而爆发出大笑”。(I, 8)然而,碧阿翠克斯与她母亲不同;在她那具有蛊惑魅力的父亲的教导下,她不仅学会了妒嫉,而且学会了利用他人的妒嫉。

她早就了解到她的亮眼睛的价值,并尝试着卖弄风情。……对他父亲而言……这不是小快乐……他大笑,鼓励她做出种种滑稽动作。卡索尔伍德夫人严肃、哀伤地观察着这个孩子……她躲开母

## 男人之间

亲那悲伤的眼神，逃向坐在椅子上酩酊大醉并大笑着的父亲那里。她已经让他们两人对立起来了：这个小无赖沉浸在恶作剧的快乐中——她很小的时候就学会搞这些恶作剧了。（I, 11）

然而，事实会证明，碧阿翠克斯在性方面的操纵能力不仅是在这个打上性别烙印的家庭中生存下来的策略，同时也是她在这个家庭中得不到爱和权威的原因。

简言之，《亨利·埃斯蒙德》第一出色之处就是以看似不受时间限制的权威性——过去时态不断地变成现在时态，第三人称叙事不断地变成第一人称叙事——来展现贞女与荡妇是如何相辅相承的。萨克雷的描述的出色之处在于，它不依赖于像对待水一样原始地疏导一种被称为性欲（Sexual Desire）的物化了的東西——无论是男性性欲还是女性性欲：也就是说，男人不是因为已经把一些女人变成了贞女，而同时又要求她们保持自然的性感，才把另一些女人变成荡妇的；女人也不会把说“不”的贞女超我与急不可待的荡妇本我分裂开来。相反，萨克雷的分析将近来对弗洛伊德的某些女性主义解读（见引言第二、三部分和第1章）惊人地戏剧化了，他把性欲描绘成意义丰富、极不稳定的能指，指代着各种权力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伴随着性别差异而来的社会/政治差异造成的。特别是，作为贞女的女性和作为荡妇的女性都是在流通、交换和礼物的语境中获得性意义的；女人如何看待女人——看成道德动物还是社会动物，但最有信号意义的是，看成性的动物——主要（虽然并非只是）发生于一个意义关系的压力之下，在这个关系中，信息的发送者和指定的接收者都是男性。

碧阿翠克斯所处的情欲境况是个细节精致的死胡同。我们可以通过审视女性同性社会性纽带来展开（仅仅只是展开而已）讨论——这一纽带似乎正是这种情欲境况最直接的栖息所。在《亨利·埃斯蒙德》中，最持久、最戏剧性地昭显出来的（至少第一次阅读的感受是这样）的欲望压力就是她母亲瑞琪对亨利本人的欲望所产生的压力。不过，瑞琪的欲望完



全发生在内心，它依赖于禁忌/逾越、忠实/背叛、压抑/袒露等具有强制作用的家庭式二元对立；如果它具有颠覆这些对立的潜力的话，它也只在内心颠覆它们，因而是沉默的、非政治的，而且它采用的模式不允许她与其他女性之间结成同盟。因此，尽管——很奇特地——碧阿翠克斯完全看得到她母亲对亨利的欲望，但这并没有使她自己的任何欲望变得合法。相反，她母亲沉默而又较劲地在自己生活中规避的道德话语，更加彻底地强压到女儿头上去了。碧阿翠克斯面对的情形就像撒旦或弗兰肯斯坦制造的怪物面对的情形一样：撒旦只想要上帝想要（或拥有）的东西，但由于界定善与恶的辞典是上帝写的，撒旦在追求他的欲望的时候，发现自己只有两个难以令人满意的选择：第一，对“善”作出延迟了的、奴仆般的间接默认，这不会让他得到想要的一切；第二，站到上帝对立面去（“让恶成为我的善”<sup>[15]</sup>），由于这些概念来自上帝的辞典，这使他陷入一种不稳定的符号地位，注定要在道德上腐败、堕落。在碧阿翠克斯和撒旦这两个例子中，在家长行为与规定的家长定义之间那种令人丧失力量而又不被承认的分裂是相同的，而这两名成年的子女具有类似的哀伤、空洞/反叛、悲惨的特点（例如，III，3；III，7）。不同之处在于，作为女性，瑞琪不是她的辞典的作者，甚至不是它的重要受益人。相反，尽管这令人痛苦的女性与女性的关系是这部小说最大的特色，它的剪刀机制只发挥了一半，把可怜的碧阿翠克斯和她本来可能实现的情欲架到了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那更为锋利的刃口上。

这部小说中男人们的境况如何？与碧阿翠克斯得到的混杂信息和在男女家长领域之间周旋的余地（需求）形成反差的是，“卡索尔伍德的年轻继承人”无论如何“让父母给惯坏了。他像所有男人一样接受他们的爱抚，仿佛这是他的权利”（I，11）。在他父亲死后，弗兰克取代了父亲的角色，用最毁损的性化了的言辞“宠腻地”形容碧阿翠克斯；他一方面抬高她，另一方

[15] 弥尔顿，《失乐园》（*Paradise Lost*），第2卷，第1章，第110行。

面又保留随时毁损她的权利，正像一名利用她的性感魅力来获得好处的人所做的那样。“看谁来了！呵，呵！……是翠克斯女士，她戴着新丝带；我就知道，她一听说有位船长要来晚餐，就一定会戴上一条。”(II, 7)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瑞琪同样迅速地对她女儿的种种特点予以负面评判，而这些特点正是她教给女儿的；但她的评判的杀伤力或许较小，因为它较不友好、更为锋利、更具个人情感——它是她心灵跳动中承载妒嫉的容器，与伦理评判的半透明表面贴得如此之近(例如，II, 8；II, 15；III, 3)。

实际上，亨利自己也和碧阿翠克斯玩起了同样的游戏：他认为她身上可爱的地方与他认为的道德败坏的特征完全相同，同时，他认为她母亲身上体现了这一切的相反情形(例如，II, 15)；因此，他对她在情欲上的臣服尽管如同强迫症一般，但是，它存在的基础就在于有意无意地将道德评判先悬置，同时，他又随时可以自由地运用这种评判来威胁她，而且他最终让这种评判带着极强的惩罚力量降临到她身上。

正如我已指出的那样，这种双重绞索出于相同的理由，即女性的同一套特点，而损毁着她们又欲求着她们，它在男性之间对女性的某些三角交易中最具有杀伤力。在《埃斯蒙德》中，这种交易的原型在小说较早部分就已经出现了：它体现在瑞琪在她第一任丈夫与放荡的莫汉老爷的热烈友谊中所处的地位。卡索尔伍德的痴迷来得既突然又急迫：“上马之前，我的卡索尔伍德老爷亲吻着另一位老爷，宣称他是他很长时间以来遇到的最好的伙伴”；

我们夫人说，莫汉老爷的言行举止中有某种轻佻，让她无法信任他；听到她这么说，她丈夫爆发出大笑和诅咒；[他]说……莫汉是英格兰最漂亮的家伙；……而且他会让莫汉知晓我们的正经夫人怎么议论他。(I, 12)

卡索尔伍德认为“莫汉是英格兰最棒的家伙；我要把他请到这儿来，

好让他打击一下那……僵死的傲慢”(I, 12);就这样,卡索尔伍德通过把妻子抛给朋友,维护了自己对她的主子地位,而他的朋友到达之后,

才刚换上睡帽、长袍,主人就把一位访客送到他那儿去了:而这正是卡索尔伍德夫人自己,她丈夫让她做了吐司、麦片粥,亲手端给客人。(I, 13)

不必说,尽管就她的感情而言,在肉体忠实的问题上,瑞琪似乎没有受到严重威胁,但是,这种三角关系变成了一个有超载危险的管道,沟通着各种看似可交换的象征物品:譬如,钱(以卡索尔伍德对莫汉欠的赌债形式出现),宗教(以瑞琪想要改造莫汉的愿望形式出现),在性方面的胜人一筹(以莫汉想让卡索尔伍德戴绿帽的欲望形式出现)。这最后导致了一场最终让瑞琪成了寡妇的决斗,虽然她丈夫从未真正怀疑过她的忠诚。

我是否怀疑过她的纯洁?如果我真的怀疑过,她早就没命了。你觉得我认为她会出轨?不,她对此没有足够热情。她既不犯错也不原谅别人的错。我了解她的脾气——而现在我失去了她,老天知道我现在对她的爱是从前的一万倍——没错,尽管她那时像天使一样年轻、美丽——……我以圣乔治的名义发誓,那时候,她和孩子在一起时,比王后教堂的圣母玛利亚还美。我没有她那么好,这我知道……而且我那时觉得她并不属于我,孩子们也不属于我。我昏了头,赌博,酗酒,出于绝望和愤怒沉迷于种种恶习。(I, 14)

通过这些话,卡索尔伍德在临终前清楚地点出,她的纯洁是一种商品,它正是他当初把她抛给莫汉的原因,它既是她对于他的价值所在,也是他一直想要而且现在最终抛弃她的原因。

瑞琪在性方面的美德一方面具有了交换价值,另一方面,在男性之

间那种强烈的交易性质的同性社会性欲望氛围中，它也成了让她窒息的死结；类似地，碧阿翠克斯在性方面的邪恶由同样的男性同性社会性结构以同样的方式激活。我们已经看到，她兄弟弗兰克对她悉心培养起来的见风使舵的调情能力一方面大力促进，另一方面又加以批评；但他做的还不止于此。当碧阿翠克斯似乎要与他的朋友，年轻的布兰弗德老爷结成一门好亲事时，弗兰克成了积极的中间人，把她的一缕头发交给布兰弗德，从他那儿获得了一份签了字的爱的保证，并威胁说，如果布兰弗德不承认卡索尔伍德家庭值得结交，他就要与他决斗；尽管与此同时，弗兰克也因为“翠克斯”在爱情方面的世俗而肆无忌惮地贬低她（II, 8）。

这部小说的政治高潮，即詹姆士拥戴者策划事件的危机，也正是这个事件的高潮，它通过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迂路，建立了碧阿翠克斯的性欲的基础。卡索尔伍德家族与斯图亚特家族的王朝诉求长期纠缠在一起，这种关系在历史上通过以女性为交换礼物而得到表达，例如，以伊莎贝尔对查尔斯二世和他的兄弟提供性服务的形式而得到表达（I, 2）。碧阿翠克斯的男性亲戚与年轻的王位觊觎者之间千丝万缕的纠结极为复杂；而这些纠结包括了亨利的一个决心——他要根据他将詹姆士·爱德华运到英格兰并送上王座的计划的成功与否，来决定他对碧阿翠克斯的追求是“成功还是失败”（III, 8）；虽然这个计划的关键在于詹姆士·爱德华和弗兰克·卡索尔伍德的生日相同、外貌相似，他让人把自己的肖像画成弗兰克，而且最终还模仿弗兰克。这种利用的预期报偿包括，詹姆士会追溯册封他父亲秘密授予卡索尔伍德家族的侯爵爵位；同时，亨利也认为碧阿翠克斯最终会接受自己。

以高攀为意图的个人身分认同、浪漫爱国主义、家族传统、政治抱负和性欲，它们交织在一起，令人心醉神迷；受此驱使，亨利和弗兰克把年轻的王子偷偷带到卡索尔伍德家。亨利满意地看着女人们为他准备的一切：

房间装饰了花卉；床上铺着最高级的床单；两位女士坚持要自己来铺床，她们跪在床边，出于尊重亲吻了床单，因为这些织物将要迎接的是一位国王的神圣之躯。（III,9）

此外，这些女士们还被安排来亲自伺候那位年轻的访客；当他到达时，碧阿翠克斯佩带着埃斯蒙德给她的家族钻石，因为“他们已经达成一致，她应该在国王进入这个家的那天佩带这些光彩奕奕的东西，她看起来像位王后，魅力四射，她的美既富丽又有皇家气度”。（III, 9）

为了卡索尔伍德家族的野心，卡索尔伍德家族的男人们通过他们在实际和想象两方面的努力，成功地撮合了这位“国王”与“王后”。当然，他们一旦成功，女性性欲就开始战战兢兢地充当替罪羊了。

她看起来……光芒四射，眼睛闪烁着神奇的光辉。仿佛出于愤怒和妒嫉，一阵剧痛射穿埃斯蒙德的心脏，……他不自觉地攥紧拳头，向卡索尔伍德望去，后者的眼神回应了他的警讯，而且本身也充满警惕。（III, 9）就在那个晚上，

“我做成了这件事，”[埃斯蒙德]想道，他无法入睡，向夜的深处望去；“他在这儿了，我已经把他带来了；现在他和碧阿翠克斯睡到了同一屋檐下。我为了谁才把他带来的？是为了王子吗？是为了亨利·埃斯蒙德吗？……”年轻王子迫切的眼光追随着碧阿翠克斯的一举一动，这眼光梦魇般地纠缠、追逐着埃斯蒙德。那天晚上，在他发热般的梦中，王子的身影多次出现在他面前。（III,9）

出于妒嫉，亨利最终将弗兰克和瑞琪引向了可怕的、无以弥补的一幕，虽然没有真的指责碧阿翠克斯，但目的却是让她离开伦敦，远离“伤害”。她对他们的谴责有力而无可辩驳：对亨利，她说道，“你是这场针对我的阴谋的主使”；“我退回这些家族钻石，它们属于一位国王的情妇，属

于认为我会成为这样一名情妇的绅士”；对弗兰克，她说道，“我的爵爷，把您的诺言留给您太太吧”；对她母亲，她说道，

别了，母亲；我想我永远不会原谅你；我们中间有某种东西已经破碎，眼泪和岁月都修复不了。我总是说，我是独自一人：你从来没有爱过我，从来没有——而且，从我坐在我父亲膝上那时起，你就在妒嫉我。（III，10）

毫不奇怪，这一幕中的胜利者们最终都“吓坏了，几乎为我们的胜利感到羞耻。我们共同策划了一场阴谋，使那美丽的小东西被放逐、被羞辱——这似乎真的很冷酷、很残忍。我们沉默地看着彼此”。

在结局中，如她的打造者所愿，碧阿翠克斯被证实真的变成了一名妓女。她用藏在《王家肖像》（*Eikon Basilike*）中的纸条把王子引诱到囚禁她的地方，而那一夜恰巧正是他最需要出现在伦敦的日子；家族中其他成员的每一位对她品性的贬责没有任何回转余地。他们中没有谁再见过她。然而，有趣的是，延续几代的男性同性社会性交易——这个具有破坏性的异性恋关系只是其中一个短暂的细节——在这个关头被证明是更为持久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成功的。作为家族首领，亨利对王位觊觎者怒火中烧，正式否认了卡索尔伍德家族对斯图亚特王位传承的忠诚，而且，还摆出一个象征着决斗的短暂而正式的姿态；这之后，埃斯蒙德

后退一步，垂下剑尖，深深鞠躬，宣称说，他已经完全满意了。

“那好吧，子爵，”年轻的王子说道。王子还是个男孩，一个法国男孩，“*il ne nous reste qu'une chose a faire*”<sup>\*</sup>：他把他的剑放到桌上，双手的手指则放在胸口：——“我们还有件事要做，”他说道；“你

---

\* 法语，意为“我们还有件事要做”。——译者注

没看出来吗？”他伸出双臂：——“*Embrassons nous* \*！”(III, 13)

如果男性之间的这个拥抱并不代表卡索尔伍德家族野心的胜利(预期中的、詹姆士拥戴派想要的那种胜利),它却也的确承认了一种更具权威的社会基础。它代表了最终的道德合法化,代表着将历史的火炬从失效了的旧秩序传递给亨利·埃斯蒙德和他似乎将要建立的较小的、男性家长的、遵从性别规定的资产阶级核心家庭。在这个结盟的画面中,一位贵族男性越过一名女性在性方面名誉丧失的身体,将他的道德权威交给一名新兴资产阶级男性;这个画面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意象,它似乎是一个独特的、建立阶级基础的历史性时刻。然而,在这部小说的上下文中,它表面上的历史独特性却似乎是虚幻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用来定义和复制,以及利用和污辱女性性欲本身的跨历史结构,被以同样的三角的、男性同性社会性的方式浓缩了,而这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了重复、不间断的特点。

我们讨论了《亨利·埃斯蒙德》和《公主》中不那么具有历史性的女性特质谱系;讨论中很明确的是,我们关注的焦点是男性交易女性的那种跨历史的——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是非历史的——三角结构。甚至当我们在原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历史小说中找寻“激进—女性主义”性欲结构时,我们都走不了太远。在《亚当·比德》中,最明显的性情节围绕着海蒂展开。就像《亨利·埃斯蒙德》中有关詹姆士拥戴派的情节一样,围绕海蒂的情节最终产生的是被我描述为男性同性社会性结盟的画面——“在这个画面中,一位贵族男性[在该例中即阿瑟]越过一名女性[海蒂]在性方面名誉丧失的身体,将他的道德权威交给一名新兴资产阶级男性[亚当]。”《亚当·比德》的这一幕出现在这部小说最后,而且实际上它发生在幕后;就像《亨利·埃斯蒙德》中一样,这一幕也可以被认为具

---

\* 法语,意为“让我们拥抱吧”。——译者注

有历史建构意义；它的意识形态目的很清楚，就是要在经济和政治上确认资产阶级男性的权威，确认他在新兴的核心家庭中的领导地位。然而，在这两部小说中，这个画面的所谓基础性受到破坏，因为，出于种种原因，它是事后才出现的。在《亨利·埃斯蒙德》中，它在事后出现，因为涉及的事件跨越了几代，这整个链子似乎一直是由几乎完全相同的划分——据说这些划分刚刚构建成——的几乎完全相同的形式所形成的。在《亚当·比德》中，它在事后出现，因为在另一条线索——即戴娜的故事——中，这部小说已经小心地把这些变化——作为变化——历史性地放置到经济和人口因素构成的背景下。

因此，尽管每部小说各自有关性权力的情节似乎切实回应或反映了有关历史性别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更为直露的政治情节，它采取的形式在时间上被置换、被浓缩了。换种说法，正如我们在引言第二部分讨论过的，这样的性(sex)不仅与权力相似，传递了权力，而且还代表了权力，包括——但不止于此——性别的权力关系。性与各种权力形式之间的意指关系十分密切，而且通常是直接的，但它既不简单，也不单纯。

在一部直接取材于历史的小说中，即使是对性情节的浓缩也可能极具倾向性。让我用有关婚姻、有关家庭基础的情节来简单例示——这些情节我们在《亚当·比德》、《公主》和《亨利·埃斯蒙德》中都分析过。在这些小说的每一部中，家庭的演化被浓缩了，它进行的速度，以及故事中的“事故”的安排，使得每位主人公“凑巧”娶到的女人在出现的那一刻都比他更具权力：瑞琪是因为她无论如何都是亨利·埃斯蒙德的母亲；戴娜是因为亚当此时因为海蒂的遭遇而受到打击，而且她从宗教获得的授权暂时使她似乎代表了一个比他拥有的还要更强大、更父权的权威；伊达公主是因为她更一心一意，更热情，受过更好的教育，更有表达力，在情感上更强大，当然还有，在结尾处，比王子更健康。就像伊达公主一样，《埃斯蒙德》中的瑞琪在照料他人的时候爱上了一位谵妄的、完全依赖他人的、似乎就要死去的病人。在《比德》中，戴娜把她的宗教权力想象为是不可



剥夺的；她爱上了一位急切需要她的安慰的男子。在每一个例子中，更紧密地与政治的、智力的、物质的和/或言辞的权威相联系的，都是女性。伊达的女性主义口号是“不高贵/毋宁死”<sup>[16]</sup>——当她第一次提出这项教条时，它的伦理意义是与它在政治权力中的根基牢固相连的。

当然，表面权力的每一种形式注定要被直接翻译成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女性的无权状态。健康的存活者的活力变成了护士的谦恭。布道士的声音的权威变成了宗教寂静主义者的无足轻重。贵族的政治影响力变成了伦理上“高贵的”（即沉默的）维多利亚女主人公的麻痹。然而，在谱系小说中那短短的一瞬，使得女人依附在男人身上的交易——在这些小说每一部中都被呈现为是与使得封建秩序让位于资产阶级秩序的交易同时发生的——就在这短短一瞬，交易似乎发生于一个如此强势的女人与一个如此弱势的男人之间，以致于在这之后，似乎无论怎样利用割让给这个男人的权力，都再也无法危及这个女人的利益。

实际上，有关超然（transcendence）的语言——它继续掩盖资产阶级女性相对权力缺失这一事实——保持了相同的意识形态形式：女性的权力被赋予同样形而上的、迷信的、无根据的特性，这种特性在十九世纪时也被认为是内在于世袭贵族权力的。在每个例子中，权力关系被置换（displacement）到阶级关系的历史虚构中，而它们在时间上被浓缩（condensation）成情色叙事，这是一种面对主张平等主义的公共话语而将性别不平等和其他不平等做理性化处理的方式。

阶级与性别之间相互投射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资产阶级女性被——以某些使她们神秘化，而且很大程度上使她们丧失权力的方式——公开寓言化了，她们象征着高于她们丈夫的阶级的特征。在这些婚姻情节中，妇女的性（sexuality）已经成了性别权力与阶级权力交错、互换的空间。就像在我们的意识形态典型“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堡垒”

---

[16] 丁尼生，《公主》，ii，第79—80行。

(见引言第三部分)中那样,一个关于控制的仿古意象——在这些例子中都浓缩为女性对她们身体的处置——被用来作为一种掩饰,在它下面,这种控制的物质基础可以被预先收回。

这两部历史小说中的性情节——碧阿翠克斯和海蒂的部分——因为具有逾越性而更加引人注目,这些情节将这一意象更坚决地表现出来。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每个性情节似乎都代表了跨历史的、清晰的绝对结构(Structure):即对女人的三角式交易,那种繁忙的、交易上的静态平衡是每一种结构主义形式采取的方式。但同时很重要,在这两部小说中,这些交易发生在关于贵族上等人特权(*droit de seigneur*)变迁的欧洲阶级话语内部,这些话语是虚构的,有着倾向性,但总归也具有历史意义和历史目的。在这儿,关于“诱惑”的阶级话语是区别于,比如说,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种族歧视特征的强奸话语的(见引言第二部分)。

被称为性(sexuality)的框架在这些历史迷思(myths)中提供了一个特别空间,供不断清空和填充具有深刻而特殊的操控意义的“永恒的”形式。在这些常常越界的性情节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个机制。海蒂、碧阿翠克斯之类的女性通过越界进入性领域,这种跨越不是通向愉悦的路径,而是通向权力的唯一道路;这些女性脱离这一领域后,变得更加悲惨,被剥夺了权力,被追溯性地等同于性本身的化身。《失乐园》中也有这个熟悉的情节。对每个女人而言,伴随着这些性叙事而来的就是,她不再能积极找寻以她为主体的权力,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已经构建好的男性之间的象征权力交易,她的被歪曲,她的目的意识,最终证明她只是被指定的客体。

“女性”(female)性欲框架内的主体的越界与弗洛伊德对个人性欲本身的回溯性结构的描述是一致的。<sup>[17]</sup> 但是,从历史上看,对与性相关的

---

[17] 见引言第二、三部分以及拉普兰士和彭塔利斯(Pontalis)《心理分析语言》(*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第111—114页对“延宕了的行为;延宕”(“Deferred Action; Deferred”)的定义。

一切(the sexual)的涵括范围和定义是可变的,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从某种意义上看,我们讨论过的情节线索中没有哪一条与性有关:与婚姻情节有关的是婚姻这个制度,因而很清楚与经济、政治相关,而“性”情节的女主人公都被清楚描述为在性方面麻木,但却野心勃勃。相反地,让我们看看这样一些关系——它们体现的是我们称之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关系,例如亚当与阿瑟之间,或王子与弗洛利安之间,或王子与那些“讲述”他的男人的紧密团体之间,或卡索尔伍德与莫汉之间,或卡索尔伍德家族所有男人与他们的斯图亚特英雄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些关系具有明晰的政治性,里面充斥着在象征、经济和文化层面上的每一种意义和权力的交易,但是,这每一种关系也能——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不同历史呈现中——被放到性的范畴下,而且可能具有倾向性。在这样的例子中,不仅这些男人及其纽带的特权,而且他们的“异性恋”力量,即他们组织妇女生活的权力,可能已经受损,并在性质上发生改变,即使这些关系本身并未发生改变。

然而,从20世纪美国观点来看,这三个维多利亚早、中期的主流文本与第5、第6章讨论的偏执狂哥特式文本不同,似乎并没有以特殊方式处理男性同性社会性谱系中同性恋与恐同的区分。每个文本或多或少都把经由异性恋爱情的同性社会性欲望强制性通路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在每个文本中,这个通路既紧张,又负载着沉重的政治意义。对我们进行中的叙事而言,或许最容易总结、最重要的就是,当一位可以被视为可怜或可鄙的女人在场时,男人们能够交换权力,确定彼此的价值,即使此时他们的权力残存着诸多不平等。在性方面可怜或可鄙的女性形象成了一种溶剂,不仅促进了随着资本主义和现金交易而发展起来的相对民主化,而且进一步地,为通过她而形成结盟的男人们,朝着弥补它的空白和失败的方向前进。

## 第九章 恐同、厌女和资本：以 《我们共同的朋友》为例

八年前，在创作一首关于一位正经历着写作瓶颈的音乐学家的叙事诗时，我加进了一个小小的文学玩笑：诗中一位虚构的心理分析师在为《塔拉萨：[虚构的]肉欲杂志》(*Thalassa: A [fictional] Journal of Genitality*)写一篇虚构文章，文章主题在当时还是虚构的：

“持久的同性恋  
恐慌和文学创造力”(它包括  
细读《我们共同的朋友》)……<sup>[1]</sup>

它谈不上是什么玩笑，但无论如何，它的确记录了我开始思考现在这个研究题目之时略带怀疑的态度，以及这个开端与解读狄更斯晚期作品多么地息息相关。那个时候，我想象中的解读大概更多偏向于作者生平——而我现在觉得，推测性的解读也可行，或也很有趣。但是，在一个更具历史性、政治性的框架下，阐明狄更斯对“哥特式”作品的贡献所产生的影响似乎也十分重要，这一影响即男性恐同的心理化和在政治上的自

---

[1] 塞吉维克，《46岁的翠斯》(“Trace at 46”)，第14页。(这首诗收于塞吉维克的诗集《肥瘦艺术》[*Fat Art, Thin Art*]中)。——译者注

然化。

在第5章对浪漫哥特式小说的讨论中，我们勾勒出英国小说片断的、神秘的发展史，而狄更斯的生涯似乎在个体发展史的层面再现了这一发展。虽然《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写于第5章提到的几乎所有哥特式小说之后，但无论如何，它与前哥特小说《感伤的旅程》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它的流浪冒险模式的构成成分包括男性主仆之间的纽带那满载满溢的家长主义；情感上显而易见的阳光乐天和不将它的（远为公开，较少心理层面的）恐女(gynophobia)当作问题的态度；最重要的是家庭意象的那种（对性别和阶级关系）起结构作用的、“解释性的”、强制的权威，而这一意象实际上对小说中任何情感群体或生活群体都不适合。

而且，就像在《感伤的旅程》中一样，男人之间种种深刻、持久的爱情纽带似乎并不涉及任何私密的禁忌。（它们似乎也不涉及任何形式的肉欲；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恐同禁忌的描绘毕竟是文学式的，无论如何，这种描述似乎比对同性恋肉欲的描绘更加容易产生。）“同性恋恐慌”(homosexual panic)——同性恋诅咒的世俗化在现代、在心理内部的很可能具有普遍性的延伸——似乎尚未触及这些男人或这些纽带。它们可能已经存在于16世纪的英格兰（鸡奸[sodomy]在当时是死罪），但男人们几乎无法在他们自己或他们邻居的行为中确认它，甚至上了床也无法确认。<sup>[2]</sup>

然而，到《远大前程》、《我们共同的朋友》(*Our Mutual Friend*)和《爱德温·德鲁德》面世之时，狄更斯的作品已经融合了偏执狂哥特式小说的关注点和主题，使其成为一个关注中心。特别是，这些小说的每一部都将一个重要情节线索放到三角异性恋的浪漫故事中去——采用了浪漫主义传统——然后，就好像被强制似的，再把焦点从三角异性恋纽带转移到男性同性社会性纽带（在此被称为“欲望情敌关系”）上去。集中在这些

---

[2] 阿兰·布雷在《英格兰文艺复兴时期的同性恋》中(第76—77页)为这个现象提供了一个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例子。

## 男人之间

男性同性社会性纽带中的，是强制、禁忌和爆发式暴力带来的幻想活力；所有这些完全依据偏执狂的逻辑来架构。但同时，这些幻想活力是以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为轴心来构想的；因此，对内心结构的暴露是和对阶级压迫机制的暴露分不开的。

在经典哥特式小说与狄更斯小说之间的半个世纪左右时间中，恐同与阶级结构之间的牵涉方式变得更加不一样了。从很大程度上说，霍格作品中乡绅的规范性地位已经被移交到(某种版本的)英国中产阶级的手中——以诸如《亨利·埃斯蒙德》、《公主》之类的谱系式叙事为媒介。那个阶级充满焦虑的自我定义——从男性同性社会性角度来看，这种定义是针对社会阶梯上的上下两级而下的——由狄更斯之类的新哥特小说家加以完成和批判。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将集中关注这些政治脉络在狄更斯对偏执狂哥特式传统的利用中如何出现。本章主要讨论《我们共同的朋友》，此外还会参考其他 19 世纪英国小说，以探究维多利亚中期英格兰在国内政治层面对恐同的利用。在下一章中，我将以《爱德温·德鲁德之谜》为中心来讨论恐同和不列颠帝国主义文学。

无论如何，《我们共同的朋友》为《男人之间》整个主题项目的展开壮了胆，因为它里面充满了与男性恐同和男同性恋相关的论题。毕竟，人所皆知，在涉及肛交的英国小说中，《我们共同的朋友》最有名。处于小说情节中心的遗产(inheritance)是极有价值的财产，其中包含了一连串狄更斯称之为“灰堆”(dust heaps)的东西。学者们已对维多利亚灰堆的内容做过多层次的论争；而且，许多批评家附和汉弗瑞·豪斯(Humphry House)的著作《狄更斯的世界》(*The Dickens World*)，认为人类排泄物是那些小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经济上也很有价值)。这样的批评家包括厄尔·戴维斯(Earle Davis)、门罗·恩格尔(Monroe Engel)、J. 西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以及西尔维亚·邦克·曼宁(Sylvia Bank Manning)，他们对这个主题要素已做过颇多讨论，而且，就像 F. S. 施瓦茨巴赫(F. S. Schwarzbach)所说的那样，他们常常“希望说明狄更斯是

否理解弗洛伊德晚期对人类排泄物与金钱之间的心理联系的阐述”。〔3〕但是，尽管许多评论过狄更斯作品中排泄物与金钱之间联系的人都参考过弗洛伊德的研究——有时经由诺曼·欧·布朗（Norman O. Brown），但是，弗洛伊德（以及布朗）论点中最主要的部分在他们的论述中不见了。他们的观点常常过于简单，在本质上太过道德主义：他们认为，金钱和排泄物十分相似，因为（或多或少）它们都没价值、很糟。厄尔·戴维斯这样写道，

从经济角度来说，在〔狄更斯的〕世界中，自然增殖（unearned increment）与散布的排泄（diffused excrement）之间看不出什么区别……他在伦敦的每个角落都看到人类在粪堆上辛苦挣扎……他的笔变成了排泄器官，喷出一层滋滋作响的掩盖，遮住了一切在金钱设定的价值下溃烂的器官腐坏——维多利亚标准下的可怕的垃圾。

戴维斯用最受喜爱的古代作品，乔叟诗作中关于赦罪僧的篇章，来总结他的“后弗洛伊德式的”解读：

藏在所有东西下面的是金钱，因为爱钱而不惜一切代价。让大多数人落入地狱的污秽中去的，正是对金钱的巨大欲望。〔4〕

或许更确切的说法是，人人都说，《我们共同的朋友》是唯一一部关于排泄物的英国小说，这样，他们就可以忘掉，这部小说是关于肛交的。因为，虽然弗洛伊德深具洞察力的观点被批评家把污秽和金钱绑在一起的做法遮掩了，但它们是情欲相关的。这些洞见涉及各种与肛门相关的

---

〔3〕 施瓦茨巴赫，《狄更斯与城市》（*Dickens and the City*），第198—99页。

〔4〕 戴维斯，《火石与火焰：查尔斯·狄更斯的艺术》（*The Flint and the Flame: The Artistry of Charles Dickens*），第266、271页。

快感、欲望、纽带和各种形式的性爱。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正是对这些快感和欲望的压抑使排泄物变成了污秽，又使污秽变成了金子。如果一部小说探讨了整个肛门情欲问题，而不仅仅是探讨对钱或“肮脏金钱”或批评家所谓的“灰尘—金钱等式”的道德斥责，那么，该小说就必须也关注弗洛伊德描述的链条中的其他因子：例如，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爱；肛门括约肌、对它的控制，以及它们与施虐之间的关系；身体意象、物质积累和经济地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它至少也应该就与肛门相关的成人生殖器欲望和压抑提供一些看法。此外，一部探讨这些问题的小说应该将它们放到一个涵括社会、阶级、权力、金钱和性别的特定历史视野的框架中去。

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一个尚未得到批评家注意，而小说本身又倾向于掩盖的奇怪的话题，是一个名字。这部小说的一位重要人物把自己称为珍妮·瑞恩，但我们得知——就那么一次——这不是她出生时的名字。她的真实名字是范妮·克利弗(Fanny Cleaver)。与之之后出现的《金碗》(*The Golden Bowl*)中范妮·艾辛海姆那有趣而幼稚得几乎有伤尊严的名字相比，范妮·克利弗这个名字暗示着进攻性——特别是强奸，而且或许也暗示着同性强奸。<sup>[5]</sup> 这个双关语似乎微不足道，但这个细节却指向了某种极为惊人的东西：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有两幕的语言确实强烈示了男性强奸(male rape)。<sup>[6]</sup> 这就是布莱德利·海德斯通对恶棍莱德胡德的攻击(见下文中的讨论)，以及第13章中对约翰·哈蒙的袭击(这将在下一章中讨论)。另一个主题“线索”在另一个不同层面将20世纪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书中男性同性社会性的部分。男主人公中的

---

[5] 这不一定可以从这个双关语推论而来，因为“范妮”(fanny)这个词的性别很模糊：在英格兰整个19世纪，它似乎指的都是女性性器官，但请比较一下这样一个例子：18世纪的蒲伯把身为同性恋的赫维爵爷(Lord Hervey)描绘为“范妮爵爷”(Lord Fanny)；另一个可以比较的例子是范妮·艾辛海姆(Fanny Assingham)。

[6] 总的来说，我觉得，如果上下文意思清楚的话，“男性强奸”(male rape)一词比“同性恋强奸”(homosexual rape)好，因为强奸男人的男人通常不是同性恋——不论根据自我定义还是习惯上的性实践来看，都是如此；该罪行这种暴力的、通常特有的恐同的性质，和它表面上的同性恋取向相比，与我们这里关注的问题更为相关。



一位与另一个男人享受着家庭生活的幸福，在浓情蜜意的时刻，他说了类似“我爱你，墨缜莫”之类的话。<sup>〔7〕</sup>

因此，简单来看，这部小说提供了某种类似男性同性社会性谱系整个范围的东西，包括同性恋肉欲的种种因子。但是，与它最相关的究竟是哪种形式的男性同性社会性关系？“我爱你，墨缜莫”这样的甜蜜誓言几乎承诺了一种阳光的、匹克威克式的纯真——这种纯真涵括了在恐同缺席的情况下的同性社会性之爱(homosocial love)。同时，给一个女人取名为范妮·克利弗，也可能暗示着某种几乎完全相反的事物：在同性恋缺席的情况下的恐同。而那些金色的灰堆则成了完全抽象了的肛门情欲的象征：它们并没有把我们指引向任何个体肛门或知觉上的肛门。要了解这部小说中同性社会性/恐同/同性恋主题的过量存在，了解它们的无处不在，就要求我们看到，对于狄更斯而言，每位女性或男性的情欲命运也是由阶级和经济积累决定，并由这些力量驱动的。

要开始这个讨论，让我先在这部小说的情节线索之一中追寻一串伊阿式的三角，这串三角从最低的阶级一直延伸到职业阶级。它始于赫克撒姆家族的三位成员：父亲盖弗·赫克撒姆，一位不识字的清理工，他靠从泰晤士河里打捞尸体并从它们身上敛财为生；莉西·赫克撒姆，他美丽、善良的忠实女儿；以及查理·赫克撒姆，他的儿子——莉西保护他免受他们父亲暴烈的憎恨，直到查理长大，能够逃走、上学。这三个人构成了第一个三角。

查理既有决心，又勤奋，得以从贫民学校转到国立学校，在那儿，他在年轻的校长布莱德利·海德斯通的支持下成为一名学生教员。就像查理一样，布莱德利出身贫苦——狄更斯这样说：“对于他的出身，他骄傲、易怒、郁郁不乐，希望它被忘掉。”然而，一种热烈的纽带迅速在这位校长和年轻的查理之间形成。在他父亲死后，布莱德利劝说查理不要与他赤贫

---

〔7〕 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第4卷，第10章，第812页。以下的引文将被整合到讨论中，并用卷数和章数来标示。

的文盲姐姐再保持瓜葛。但是，查理恳求布莱德利先来见见莉西，而布莱德利发现自己好像不由自主地疯狂爱上了她。

赫克撒姆一家的三角与查理、莉西、布莱德利之间的三角因为另一个三角而变得更加复杂。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是一位名叫尤金·瑞本的年轻律师，他也爱上了莉西。就像布莱德利一样，他在认识莉西之前与查理有过感情强烈的遭遇，尽管在这个例子中，这种强烈感情的表现形式是双方一见面就几乎像过敏似的不喜欢对方。尤金有另一个表面上看起来不是三角的恋爱关系——他正是那个说“我爱你，墨缜莫”的人。墨缜莫·莱特伍德从上公立学校起就是尤金的老朋友、被保护人，而俩人住到一起的时候，都在法律界漫不经心地寻求成功。

在性格反差和性向反差的掩饰下，阶级反差已经出现。就像性别一样，阶级和控制的一个重要证据将这个小世界分成绝对的两半，即有文化的人与文盲之间的区分——尽管没有性别划分那么固定不变。在盖弗早死之后，这些人中，只有一个人——即莉西这个被人欲求的女人——一直是个文盲。校长和尤金为了谁来教她读书而争吵。但即便在有文化的男性的世界里，阶级的分化也是无情的。查理和布莱德利与知识之间的关系总反映出他们是在充满焦虑的强迫性境况下获得知识的。狄更斯这样评价这位校长：

从孩童时起，他的头脑就成了机械的储藏之所。……他脸上总有一副问题解决了的样子。这张脸属于一个总的来说较迟钝或心不在焉的读书人，好像已经通过拼命努力得到了已经赢得的一切，而且因为既然已经得到了，就不得不把它留住。(II, 1)

布莱德利似乎总处于痛苦之中，“就像……一个身体受到伤害，而且还不愿哭喊出来的人一样”(II, 11)；他施加到别人身上的痛苦似乎来源于他自身内部更猛烈的阵痛；例如，当他对莉西讲述自己教她读书的欲望时，

他就像在内出血一样：

他再次看着莉西，停住了目光。他的脸从灼热的绯红变得苍白，又由苍白变成灼热的绯红，然后是长久的、死人一般的惨白。  
(II, 11)

实际上，如果借用弗洛伊德一位病人的形象，这位校长在社交举止上就像一个肚子里有只饥饿的老鼠的人一样。对他而言，老鼠代表的不是钱，而更具体地说是他小小的私有知识资本。或者，它象征着他的知识带来的利益与他自身的疏离。因为这知识从未让他变得更有智慧；它在教室之外没什么用处；它只不过把他放到——比文盲造成的结果更明确——资本主义劳动生产线上一个特定的、较低的位置上去，而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需求中包括了有文化的劳动大军，而不仅仅是大规模的劳力。布莱德利为他自己的利益而投资储备金的努力——即教莉西读书，这是与查理进行的三角交易的一部分——被尤金傲慢地打断了，因为尤金自己想要免费来教。“你是否既是她的老师，又是她弟弟的老师？”尤金嘲讽地问道；他没有用他的名字，而仅仅把他称为“老师”。和往常一样，布莱德利失去镇静，无法控制脸色——因为他只“习惯面对学校的小观众群，而不适应男人们大大咧咧的行径”。(II, 6)

另一方面，尤金虽然不富裕，却是位绅士，是公立学校出来的孩子。在与自己的知识储备的关系上，他自信、低调地消费它：他表现得再滑稽、再傻乎乎都无伤大雅。他喜欢说“但我要表达的意思太多，以致于我——我什么意思都没表达”(II, 6)之类的话。或者说，

你知道，当我成为男子汉，发现自己是个谜题的时候，我竭尽全力想弄清我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你知道我最终放弃了，不再去猜。  
(II, 6)

墨梯莫疼爱地把他看作“这极端粗心大意的尤金”。对于知识，乃至权力，他都缺乏意识，不把它们当作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虽然他对它们无意识的运用让他变得不仅比布莱德利更可爱、更放松，而且更具毁灭力。尤金对这位教师的奚落从道德上讲颇为丑陋，但在小说的呈现中，这种丑陋总没有那位教师的焦虑和挫折造成的不可爱那么引人注目。赤贫的布莱德利想通过自己的博学而变得独立，却发现他的奋斗让自己在无情的、等级森严的经济体系中陷入了一个无力的、疏离的位置。尤金·瑞本像约里克一样，在对自己与这个经济体系的关系的想象中，认为自己边缘、被动、没有权力；但他发言的时候，却带着靠近这个体系中心的男人所具有的那种声如洪钟的权威。

布莱德利和查里的关系与尤金和墨梯莫的关系相比，在阶级基础上具有差别，而莉西在每个关系中的地位也相应地不同。查理把莉西献给老师的做法象征着男性之间交易妇女时所采用的最纯粹的形式。查理这样对莉西解释：

“然后我进去了。海德斯通先生对我总是很好，而他权力很大，当然，如果他是我姐夫，他对我的友好不会减少，而会更多。海德斯通先生过来，小心翼翼地对我吐露心事，说道，‘赫克撒姆，我希望你赞同我娶你姐姐，希望这会对你有用？’我说道，‘海德斯通先生，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高兴的了。’海德斯通先生说道，‘那么，我就要仰仗你出于对我的了解而在你姐姐面前为我美言几句了，赫克撒姆？’我说道，‘当然了，海德斯通先生，我对她自然有很大影响力。’我的确有，是吗，莉西？”

“是的，查理。”

“说得好！现在你看到了，一旦我们把这事敞开来谈，我们就真的像姐弟那样开始相处了。”(II,15)

对布莱德利而言，他与查理和莉西之间的三角关系代表的不是在社交圈中接近权力的途径，而是从它那儿的可怕偏离；不论我们是否认为他对莉西或查理的欲望代表了重要的情欲纽带，都是如此。因此，毫不奇怪地，在一个充分证明他充满怨艾的追求风格的例子中，他这样对莉西说：

你把我毁了——毁了——毁了……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对你无法忘怀。啊，对我来说，那是多么不幸的一天！那是不幸、悲惨的一天！（II，15）

并非如此；对布莱德利而言，在这场纠结中，与父权权力最接近的关系来自他自己与尤金·瑞本之间的情敌关系。很快我们会清楚，对他而言，这实际上就是整件事的焦点。在我引用过的有莉西在场的那一幕中，布莱德利对尤金发出了威胁；当她很不高兴地反应说“我认为他与你不相干”时，他坚持说，“啊，他有干系。是你错了。他与我有莫大干系”。什么干系？她问道。

**除了其他麻烦之外**，他还可能成为我的情敌。……我对尤金·瑞本先生的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而你一直把我吸引到你那儿去。……我行动之时，满脑子想着尤金·瑞本先生。我在跟你说话之时，满脑子想着尤金·瑞本先生。我已经被晾到一边，我已经被抛了出去，却还满脑子想着尤金·瑞本先生。（II，15；粗体部分是我自己做的强调）

莉西拒绝布莱德利、离开伦敦之后，布莱德利与尤金之间的欲求关系不仅远没有消散，而且变得更火热、更具互动性。这位老师认为——错误地——他可以通过如影随形地尾随尤金来找到莉西，而且尤金也这样说，

我把这位教师逼得发了疯……我引他走遍伦敦……有时候，我步行；有时候，我乘车，这把这位教师的钱袋掏空了，因为他得雇车跟踪我。白天[当布莱德利在教书时]我研究那些隐蔽的“死胡同”。晚上，我带着威尼斯式的神秘探索这些“死胡同”，穿过黑暗的庭院溜进去，诱惑那位教师来跟随，我突然转身，在他退避之前跟他撞个正着。然后，我们彼此面对，而我就好像没有觉察他的存在那样，与他擦身而过，他则忍受着巨大的折磨……我就这样享受着这种追逐的乐趣……刚才，有个美妙的情况让我有点兴奋——这南风 and 这多云的天空告诉我，这是一个适宜出猎的夜晚。(III, 10)

在瑟缇斯(Surtees)的《亨德利·克洛斯》(*Handley Cross*)中，乔洛克先生狡辩说，“狩猎”象征着“战争，而又没有它的罪恶感，而且危险程度只有它的百分之二十五”，但是，卷入这场追逐的两个人就没那么幸运。有一天，在运河边的小道上，布莱德利从背后袭击了尤金；俩人扭打在一起，尤金断了双臂，几乎淹死。不久以后，另一个男人，一个名叫洛格·莱德胡德——这名字既带着邪气又透着重要性\*——的闸门管理员也被人从身后袭击，他在此之前一直在纠缠、敲诈布莱德利·海德斯通。像其他类似场景一样，这个场景的语言也影射了男性强奸：

布莱德利将他的身体环抱住。他似乎被一个铁圈箍住。……布莱德利把他转过身来，让他背对着闸门，仍将他死命往后摁。……“你活着也好，死了也好，我都不放松你！躺下！”

莱德胡德背朝下落入那个光滑的坑里，而布莱德利·海德斯通压在他身上。当被发现的时候，俩人躺在一扇朽坏的门后面的淤泥和浮渣之下，莱德胡德的紧握可能在跌落时就松开了，他的眼睛朝上瞪着。但他

---

\* Rogue Riderhood 这个名字中的 Rogue 的意思是恶棍，而 Riderhood 指的是骑马者的身分。——译者注

仍然被布莱德利的铁圈箍着，而且这铁圈的铆钉很紧。（IV，15）

括约肌式的控制是布莱德利·海德斯通唯一用来抓住不断从他身边流失的权力的模式。对他而言，很不幸的是，在面对女人时，括约肌式的操控无法给他任何优势——面对莉西时就是这样，她根本没有真正理会过他，从一开始就在逃避他。它只帮助他更接近地抓住男人，抓住那些已经被吸进与他之间的沉迷的镜像式关系中去的人，例如，尤金和洛格·莱德胡德——他把尤金牵入那场可以逆反过来的追逐，又穿上洛格·莱德胡德的衣服，假扮他去袭击尤金。就像他不断诉说的那样，他起初对莉西产生充满恨意的恐惧，是因为担心自己会从自己那儿被“吸走”，担心他积累起来的价值会被吸空，让他陷入她的文盲状况和无权无势构成的巨大虚空中。但很具经典意义的是，他就像平赤崑夫一样，害怕把自己与父权的联系交付给一个无权无势的反面，即一个女人，而自己却只能被那些他与之建立起自恋关系的男人当成女人利用，当成女人珍爱。

在这部小说对身体的社会构想中，布莱德利就像其他体面阶级中的下层成员一样，有力地象征了作为私人话题的肛门与欲望和快感等社会力量之间的压抑式分隔。在将消化和对肛门的控制作为经济个人主义(economic individualism)幻象的关键意象来看待这一点上，狄更斯其实是弗洛伊德、费伦齐(Ferenczi)、诺曼·欧·布朗和德鲁茨/加塔利(Deleuze/Guattari)等人的先驱：布朗采取跨文化视点，他评论道，“‘占有’(possession)这个范畴，以及以占有为基础的权力，表面上根源于魔土(magic-dirt)情节”。<sup>〔8〕</sup>对这种排除(exclusion)的一个论题式的描绘就是，把身体破开成两半，一半是胀大的肚子，另一半则是胀大的割下来的脑袋。布莱德利·海德斯通（请注

---

〔8〕 布朗，《对抗死亡的生命：历史的心理分析意义》(Life Against Death: 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第300页。财产和肛门控制之间的联系一定与本章和下一章中讨论的男性“强奸”的一个古怪特征有关：除了一个确实发生了强奸的例子外，被当作“进攻者”来呈现的，往往是那个一般会被当成被动者的参与者；阳物本身则很少出现在这些“强奸”里。

意他的名字)\*是所有人物中与关于肛门的毁灭性主题最相关的,他也不断地作为飘浮“在空气中的枯槁的脑袋”而出现(III, 10; III, 11);维纳斯先生是一位骨架标本制作人兼接骨师,他的铺子里满是装在罐子里的脑积水婴儿,他自己也自暴自弃,“把他强大的头脑泡在茶里”(III, 7);不识字“笨瓜”博芬把他的手杖的头挂在耳朵上,它就像一个飘浮的“熟悉的灵魂”的头或婴儿头一样,而他自己在小说的结束似乎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大头偶(IV, 3; IV, 13);诸如此类。人类消化(*homo digestivus*)的一个不那么让人焦虑的版本就是典型资产阶级成员坡德奈普斯一家和他们的小圈子与他们的“陈设夸张的”餐具共有的“耸人听闻的牢固性”:

每句话都是吹嘘,“你在这儿看到的是我的丑陋,就好像我只是用铅做成的;但我的每一盎司都是价值不菲的很多盎司的珍贵金属打造的;你难道不想把我融化吗?”……所有硕大的银匙、银叉让在场人的嘴巴张大,显然是为了让他们每吃一口都将这个感受从喉咙送下。大部分客人就像那盘子一样。(I, 11)

当然,这申意象最终变成了可怕的灰堆本身。简言之,当人体被当成资本主义的象征时,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就出现了问题;流通的清晰形式不再存在;部分随着价值累积而膨胀,它们获得了自主的生命,最终,权力被描述为是控制物化了的复制品的权力,而这复制品是人用自己身体的废物按自己的形象来塑造的。权力控制的是洋娃娃、玩偶和拼凑起来的骨架,控制的是一个个自恋、单一、没有欲求的个体幽灵。

对布莱德利·海德斯通而言,失联(dissociation)、焦虑、劳苦,以及肉体的自我意识障碍标志着向体面(respectability)的转化,让他的异性恋经历变得沉重、屈辱。上层阶级处理这些事情的方法有多么地不同。尽

---

\* Bradley Headstone这个名字中的姓由“头(head)”和“石(stone)”两部分组成。——译者注



管布莱德利对莉西的企图多么尴尬，它严格来说也还是光荣的，而尤金·瑞本对她则完全没有任何企图。墨缜莫问过他，

“尤金，你计划把这姑娘追到手，然后把她抛弃吗？”

“不，我亲爱的朋友。”

“你计划娶她吗？”

“不，我亲爱的朋友。”

“你计划追她吗？”

“我亲爱的朋友，我没有作任何计划。我什么计划都没有。我没有计划的能力。如果我作出任何计划，我也会因为疲于完成它而将它快速放弃。”(II,6)

这与布莱德利那强迫症般的、努力要攫住权力的做法正好相反。尤金把自己视为漂浮在溪流中的小叶子；经常用来与他相联的一个意象是一条美丽的河流，它为莉西最终找到工作的纸厂提供能源。但是，与布莱德利那种摩拳擦掌、抓住一切的意志相比，尤金意志的缺乏具有更大的能量，这单纯是因为这条溪流那强大、“自然”的路径永恒地增强着统治阶级男性剥削工人阶级女性的力量。尽管莉西决断而独立，而他又脆弱又被动，但要毁掉她的话，尤金几乎用不着做什么决定，更不用做计划。

这条河流的波动似乎在他不安的思考中引起了相应的骚动。如果可能，他会让这些念头安眠，但它们在悸动中，就像溪流一样，全都被一股强大的水流带着朝一个方向涌去……“要和她结婚，门儿都没有，”尤金说道，“而要离开她的话，也是门儿都没有。”(IV,6)

对《我们共同的朋友》的一种传统批评是区分出两组主题意象，一组与河流有关，另一组与灰堆有关。如果，就像我已提出的那样，这些灰堆

可以说成是代表着某种对小资产阶级的焦虑作出最直接反应的资本拟人化(anthropomorphization)的话,那么,从一定意义上说,河流对此提出了批判,这种批判的立足点是一种更具集体意义的资本主义,它是围绕着疏离和货币流动组织起来的。它在性别方面的含义既尖锐,又古怪:这部小说的情节发生在水边,但惊人的是,小说中的所有男人在水面前都很无能;书中有七处溺水丧命或几乎丧命的情节,他们全都是男性;男人们总是把彼此拖到水中;只有一个人,即莉西,具有导航施救的技能。同时,女人的控制力仅仅表现在她们正确地了解到,权力的水流总是从她们身边流走。当莉西和尤金向河里看去时,他们都看到了莉西无力抵抗毁灭的样子。

尤金较高的地位使得他的异性恋关系既比布莱德利的更具剥削性,同时又不那么有罪恶感;类似地,与布莱德利相比,他与男人之间的欲求关系可以在更为开放的同时,又不必太多地卷入压抑的冲突中。有趣的是,它虽然更开放,但似乎它的性意味也要淡得多。在布莱德利·海德斯特对男人们的致命袭击中,括约肌、环绕物、拥抱、男人“铁圈”般的紧箍等意象是很突出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尤金与墨缇莫之间那温柔得多的爱情中,这些意象完全没有出现。他们就像芝麻街的博特和欧尼——有谁会想知道布偶会在床上做些什么呢?布莱德利的那部分故事充斥着与肛门相关的主题;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要对此处的这种沉默——如果说这是沉默的话——作出最好的解释,并不能借助于“维多利亚式的古板”的模糊的提法,而应该思考维多利亚绅士的原始欲望是如何在小说和意识形态上,与来自比他们高或低的阶级的男性区别开来的。

前面已经提到过摸清这个领域会遇到的障碍。对第一手资料的历史研究可以给归纳总结增加血肉和具体细节,这样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或者说,这方面的文章才刚刚出版面世;与此同时,用来理解性史的模式处于快速的、生产性的不断变化中。在这里,我最多只能通过人物传记获取某些证据,以有用的、组编好的形式,来展示维多利亚时期(主要由中产阶级

组成的)小说读者的“常识”或“基本知识”会是什么。我希望能清楚说明,这些归纳总结是多么地不确定,又是多么彻底地经过了中产阶级文学意识形态滤镜的过滤,但我还是将它们呈现出来,迎接其他学者的修正。

就同性社会性/同性恋风格而言,似乎可以根据阶级将维多利亚时期的男子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包括贵族男子以及由他们的朋友和依靠者——包括波西米亚艺术家和妓女——构成的小圈子;对这些人而言,到1865年时,一种独特的同性恋角色和文化在英格兰似乎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这似乎是一种环境,它既有宫廷气息,又与犯罪有紧密关系,与约翰·鲍斯维尔(John Boswell)记载的出现过“同性恋”(gay)一词的那些环境息息相关。<sup>[9]</sup>它似乎构成了一个真正的亚文化,面对在意识形态上充满敌意的主流文化,这种亚文化借助于金钱、特权、国际主义——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秘密的能力——而得到发展。然而,蒲伯(Pope)在《给阿伯诺博士的信》(Epistle to Dr. Arbuthnot)中有关斯伯鲁斯的诗句的确假设,他的读者知晓这样一种角色和文化的存在。这个角色与至少直到最近都还是美国中产阶级同性恋特点的具体典型——实际上,通过其先驱奥斯卡·王尔德——是密切相关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与它联系最紧密的是女性化、易装、乱交、卖淫、欧陆文化和各种艺术。

然而,就贵族之下的各阶级而言,19世纪的时候,特定个人风格与今天被视为“同性恋”的肉体行为之间,似乎并没有联系。我们了解得最多的男人阶级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男人,他们制造了这些小说和报刊文章,也是传记作品的主人公;我们对他们性活动的认识令人吃惊地接近于一种认知真空。在客观上,一名绅士(我将使用“绅士”[gentleman]一词来把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与贵族男性和工人阶级男性区分开来——这种用法不符合维多利亚时期的意识形态,但符合维多利亚时期的实际做法)

---

[9] 鲍斯维尔,《基督教、社会容忍和同性恋:从基督纪元之始至14世纪西欧的同性恋人群》(*Christianity, Social Tolerance, and Homosexuality: Gay Peopl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Beginning of Christian Era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第43页。

有不少性自由,特别是如果他尚且单身,并已成功地避开了组建家庭的潮流做法,避开了他所处的阶级和时代的大部分强制性机制。同时,他似乎也不能轻易地接触其他亚文化,风格化的话语,或获得贵族/波西米亚艺术家式的性少数派所具有的豁免感。因此,或许毫不奇怪的是,与那些社会地位高过或低于他们的男性不同,在他们的拒绝,他们的合理理解,他们的担心和负罪感,他们的升华,以及他们极为多样的性发泄途径等诸方面,英国绅士的性历史具有丰富、凑合、独特的特点。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英国绅士的传记作品充满了古怪,奇异,以及看起来虚假的、吓人一跳的东西;他们似乎并没有预先决定的性轨迹。较好的例子包括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以及稍晚的T. E. 劳伦斯(T. E. Lawrence)、詹姆士 M. 巴利(James M. Barrie)、T. H. 怀特(T. H. White)、哈弗洛克·蔼理士(Havelock Ellis),和 J. R. 爱克利(J. R. Ackerley),其中爱克利在一部自传中描述了他如何从偷偷摸摸的乱交同性恋走向与一条母狗之间长达15年的恋爱。<sup>[10]</sup> 一名单身绅士的性生活总是沉默的、尝试性的、多变的,而且相对独立于特定体裁(genre)——尽管不是性别——的窠臼。

在小说中,单身绅士之间常见的关系在主题上可能平淡无奇,在结构上却十分有趣,在情感上则常常混乱、痴迷:彭丹尼斯和沃灵顿,克莱弗·纽卡姆和 J. J. 瑞德利,柯林斯(Collins)的《阿玛戴尔》(Armadale)中的两位阿玛戴尔,匹克威克俱乐部的绅士们——这些人都像尤金和墨缇莫一样,他们之间的亲近关系没有引发议论,却带着神秘的宿命(身体的虚弱、遗传的恶咒、早先不幸的秘密婚姻经历,或纯粹是极端的厌恶),它把这些伴侣中至少一方永远阻挡在婚姻的大门之外。

对于中产阶级以下的英国人的性生活,很难凑出可靠的描述。在令

---

[10] 爱克利,《我的父亲和我》(My Father and Myself)。

人吃惊的程度上，贵族和（20 世纪初期）中产阶级英国男性同性恋似乎是围绕着对无产阶级男性的物化而组织的，正如我们在福斯特（Forster）、伊舍伍德（Isherwood）、爱克利、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汤姆·德瑞伯格（Tom Driberg）和其他人的描述或关于他们的描述中看到的那样；同时，（在这些中产阶级导向的描述中）没有证据显示工人阶级男性也有自己的同性恋角色或亚文化，除了他们对更具特权的男人而言具有性价值外。可能的情况是，为了让非公立学校教育出来的阶层取得平衡，公开的同性恋行为可能主要被认定为暴力实例：在 1885 年拉布谢尔（Labouchère）修正案之前的英国法律没有将男性身体接触谱系中大多数行为编进法典或判定为犯罪，因此，同性恋行为之所以会引起法律上的关注，常常是因为伴随它而来的暴力，而不是它们本身特有的性内容。无论如何，在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描述中，以及在工人阶级内部，男性同性肉体关系与暴力之间似乎存在着联系，例如，在狄更斯笔下，布莱德利·海德斯的肛门情欲被完全用谋杀和伤害的方式来处理。

与我们的社会所想象的不同，维多利亚时期大多数人既没有对男同性恋命名，又没有将之认定为一种综合征；因此，不同的阶层可能将这个范围内的性行为归类到不同的道德和心理标签下去了。我已经提到，工人阶级可能会把它与暴力归为一类。在贵族中——或者，在中产阶级认定的贵族中——它被放到放荡（dissolution）的标签下，这个时候，放荡本身正在变成（一厢情愿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贵族本身的称呼。在维多利亚小说中，放荡的年轻贵族几乎全都具有斯伯鲁斯似的贵族同性恋“类型”的特征，而且不可能从他们无精打采的、“女性化”的举止判断出最终毁掉他们的会是男宠、女宠、赛马，还是酗酒；铺张浪费是丑闻的首要种类。（参见第 8 章中对贵族身分与女性特质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讨论。）在小说创作中，这种模糊风格的例子包括《尼古拉斯·尼可比》（*Nicholas Nickleby*）中的弗莱德里克·维利索伏特爵爷（以及他更具“男子汉气”、不那么像贵族的死党玛尔伯利·霍克爵士）；《白衣女人》（*The Woman in*

White)中的福斯柯伯爵(以及他更具“男子气”、不那么像贵族的死党佩西弗·格莱德爵士);《埃灵顿的小屋》(*The Small House at Allington*)和《松恩医生》(*Doctor Thorne*)中的泼洛克爵爷;特洛浦(Trollope)的《里士曼城堡》(*Castle Richmond*)中更为光彩照人的戴斯蒙德伯爵派屈克(以及他更具“男子汉气”、不那么像贵族的死党欧文·菲茨杰拉德);以及《我们现在的的生活方式》(*The Way We Live Now*)中的尼德戴尔爵爷(以及多利·龙斯塔夫)。在这每个例子中,只对女性性对象做了直接提及(如果有的话);但在每个例子中,所谓邪恶或放荡的冲动似乎更明显地指向更亲密的范围内的男人。或许,这个类别下的男人中,最能直接引起同情的——无论如何至少是最不古怪、看起来最“正常”的——是没有头衔的那个,尽管在小说的环境中他代表了乡村贵族中破落了支系。代表就是《菲利克斯·霍尔特》(*Felix Holt*)中的哈罗德·特兰瑟姆。关于他的性史,我们得到三条线索,每一条都各有吊读者胃口的意味:我们听说——这被提到过一次,但没有细述——他在游历东方的路上娶的女人正是被他当作奴隶买来的那个;<sup>[11]</sup>我们听说——这被提到过一次,但没有细述——他从东方带了个(不同的)女人回来;<sup>[12]</sup>但我们不断听到的与哈罗德有关联的那个人,却是他那悲伤的、无处不在的男仆兼旅伴:

我不知道他算是犹太人,希腊人,意大利人,还是西班牙人。他讲五、六种语言,每一种都讲得很好。他是厨师、随从、管家和秘书的合体;此外,他还是个有感情的家伙……我猜,这样的人类属种在英格兰可长不出来。如果没把多米尼克带来,我的日子会很糟糕。<sup>[13]</sup>

这里的情节描写严重依赖于含混地呈现一群“不那么像仆人的仆人”,这

---

[11] 艾略特,《菲利克斯·霍尔特》,第3卷,第10章。

[12] 艾略特,《菲利克斯·霍尔特》,第3卷,第3章。

[13] 艾略特,《菲利克斯·霍尔特》,第1卷,第2章。

些人与多米尼克之间曾经有着没有细述的联系。在这样的情节描写的整个过程中，读者等待着多米尼克这个无所不知、方便使唤、善解人意的人物露出他的全部邪恶、光彩，或性要求——这种期待落了空，因为他的主人的那些剥削性质的“东方”奢华只能通过在性方面模糊不清的“颓废”来感受。（请参见第10章对“东方主义”和性特征的进一步讨论。）也许类似地，《道连·格雷的画像》中的人物那些令人吃惊的放荡行径在细节上是使用异性恋的方式呈现的，尽管（如果我们不回溯性地考虑作者的生平的话）巴西尔、道连和亨利爵爷之间的三角关系只有用同性恋的方式理解才具有意义。

上层阶级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常与放荡相联系，而工人阶级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或许常与暴力相联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作为公学（public school）产物的绅士阶层的观点，再次出现不同。当然，学校本身是统治阶级男性同性社会性纽带构成的重要环节。在《孔宁斯比》（*Coningsby*）中，蒂斯瑞利（Disraeli）（他本身不是伊顿公学的毕业生）提出了一个美化伊顿式友谊的意识形态版本：

在学校，友谊是一种激情。它让生命癫狂；它撕破灵魂。往生之后的任何爱恋都无法带来它那样的狂喜或悲伤；没有什么幸福会如此摄人心神，没有什么妒嫉或绝望带来的痛苦会如此将人击跨、如此锐利！这是怎样的温柔、怎样的奉献；这是怎样无边的信任；这是怎样对内心最深处想法无限的坦露；这是怎样令人狂喜的当下和浪漫的未来；这是怎样苦涩的疏远、怎样融化一切的和解；这是怎样狂野的反诉、令人不安的解释、热情的通信；这是怎样丧失理智的敏感、疯癫的感伤；这是怎样的心灵地震、灵魂飓风；这一切都包含在那个简单的短语里——一名男生的友谊！<sup>[14]</sup>

---

[14] 蒂斯瑞利，《康宁斯比，或新一代》（*Coningsby, or The New Generation*），第9章。

坦诚的描述都认为,在大多数公学里,灵魂的飓风常常表现在肉体上。就像年轻的贵族一样,在同样那些公学上学的年轻绅士本来也会见到或参与男人之间的各种性行为;但与贵族不同的是,大多数绅士既没有形成一个群体,也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独特的性身分,以供对相同身分怀有更大需求的成人使用。20世纪作家迈克·内尔森(Michael Nelson)报告说,他问学校的一位朋友,“离开伊顿后,你是否还曾有过任何同性恋倾向?”“听我说,你要小心了,”他的朋友回答道。“在学校里,伙伴们彼此瞎混一下并没有什么。但当我们长大后,我们就把那些小孩玩意儿放到一边了,不是吗?”<sup>[15]</sup>

《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和其他书中都出现过类似观点。大卫对他的朋友斯蒂尔弗斯着了迷;斯蒂尔弗斯称他为“戴西”\*,把他当成女孩看待,而这只不过是 大卫接受的教育的一部分——尽管这教育的另一个较晚出现的部分是痛苦地学会如何形成三角关系,把兴趣从斯蒂尔弗斯转移到女人身上,而且最终(虽然并不彻底)憎恨斯蒂尔弗斯,并以他的死为代价而成长。简言之,一位绅士不会把同性社会性谱系的情色那一端与放荡相联系,也不会把它与邪恶或暴力相联系,而会将其与幼稚相联系,这种幼稚是一种婴儿式的需要,是无力的标志,人们可以带着羞耻或蔑视或否认来看待它,但它不太可能会触发 20 世纪恐同特有的那种恶意的、指责的投射。

这个由学童的欲望转为成人的恐同的缓慢、独特的两阶段发展,其结构似乎来自某些特殊的焦虑——这些焦虑伴随着旨在培养中产阶级“绅士”这个相对较新的阶级的教育过程而产生。与头衔、财富或土地不同,用来定义绅士的条件不单纯是继承而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通过成为某个以特别的方式花钱和花时间的特别种类的人而挣来的。但成为这个有权力但又颇为模糊的阶级的一员的所有初步先决条件——带

---

[15] 内尔森,《贵族和附庸风雅之徒》(*Nobs and Snobs*),第 147 页。

\* 即 Daisy,这是典型的女孩名。——译者注



着某种口音说话，花几年时间翻译拉丁和希腊作品，离开家庭和女人圈——使一个人在有资格积极地在统治阶级中拿自己的前途冒险之前很长时间，就已经不再适合做其他任何形式的工作。

《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情节结束了尤金生活中长久的一段搁浅，即在受召唤和被选中来为帝国进行职业服务之间的悬置。（例如，他已经获得了律师资格，但尚未有人选择雇佣他。）他的地位沾染着父权权威，沾染着法律本身的权威，但是这些尚不属于他。同样地，他从小就被带离家庭，现在很快将被要求回去——而且是要占据家长的有力位置，这个位置将会给他与墨缜莫之间即兴、暂时的关系以及他对莉西看似漫无目的的追求赋予逆反的意义和异性恋的轨道。在小说结尾的暴力场景中，我们看到，这种异性恋的、恐同的意义是多么难以改变地影响了尤金的叙事：他的情敌布莱德利几乎将他溺死；莉西救了他；在他似乎奄奄一息的时候，墨缜莫把他最后的嘱咐理解成他可能会娶莉西；而当他重获新生时，他已经成了结过婚的人。“但你会相信吗，”莉西后来问道，“在我们婚礼那天，他告诉我，他几乎认为他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死？”（IV，16）

尤金在小说结尾已经看起来几乎“像是他从未受过伤害”（IV，16）。与尤金相比，资产阶级家庭的这种反复印刻的恐同话语对另一位人物造成的损害更大。当然，这个人就是莉西。要让莉西有一个童话式的“美满结局”，就要求她不能在形式上和意识形态上被尤金“毁掉”，不能被抛入从事色情业的城市底层阶级，而要被提升到一位维多利亚律师太太隶属的阶级。尤金下了决心，要为了让她被当成淑女而战。但不论有多少好消息，狄更斯并不试图掩盖她的身材在以下变化中可怕地缩小：她从在泰晤士河上摇着清洁船的那名怀着恨意、带着面纱、肌肉发达的文盲，变成了恋爱中的工厂工人，然后，简简单单地，她变成了尤金·瑞本太太。莉西自始至终都是一名反动分子——这是获得公认的。但是，她是位热情似火的勇敢的反动分子：她维护过也挑战过她暴力的父亲；她为自己野蛮的弟弟牺牲了一切；她放弃了与一位更年长的女人——一位小酒馆

主——结盟的机会，仅仅是因为这个女人不愿接受她父亲；她离开自己深爱的男人去了乡下，以维护自己的荣誉；为了救他一命，她毫不犹豫地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但她所有的反动勇气都只得到了令人窒息的反动回报。莉西一旦成了尤金·瑞本太太，就不再是莉西了。

我们看到了莉西如何被她日益明确的性别角色分配无情地缩微，于是，越发清楚的是，在那一刻会被统治阶级用来作为归类自己的男同性恋的意识形态方式，为什么是“幼稚”，而不是女性特质。正如珍·贝克·米勒(Jean Baker Miller)在《关于妇女的新心理学》(*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中指出的那样，性别差异的一个属性是结构上的永久不平等。而成人与儿童之间的关系是暂时不平等的原型，这种不平等在原则上——或意识形态上——存在，只是为了被克服：儿童一定会长大成为家长，但妻子不会长大成为丈夫。<sup>[16]</sup>这个时候，英国高级资本主义的旗舰阶级，即新兴的“绅士”阶级，将要涵括极广范围内的社会阶层和经济地位，从财阀以下，直至赤贫的小职员。为了在绅士阶级内部维系平等的幻象，或者，为了至少维系以能力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假平等，同时为阶级内部差异的扩大辩护，显然很有必要想象一个较长的、复杂的时期，让个人心理进行调试、准备，经历种种认同方式的偏离、重新定义、交叉和再交叉。关于自我的这种拖长了的、令人迷惑的叙事是20世纪俄狄浦斯式叙事的前驱，它使社会分类和职业分类得以按照不同的个人成熟度这种不那么令人讨厌的方式来进行。

直到这种心理学家式的、“发展的”思考方法牢固确立之后，男性同性恋与女性特质之间的贵族联系才被允许成为广泛的公共消费对象——这个改变在王尔德事件中明显显示出来(请参见第5章和结言部分)，而与此同时(即1880年代)发生的还包括男性同性恋语言(例如“同性恋”一词)开始越过阶级传播，同时，同性恋通过“第三性”和“双性兼具”等科学

---

[16] 米勒，《关于妇女的新心理学》，第1章。

理论被医学化了。

但在这整个期间，对于女性而言，性别不平等的不可变性越来越牢固地在道德上以描述的方式铭刻到资产阶级各项制度的结构中。正如《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形成反差的身体形象告诉我们的，当女性看到河流在她自己的形象下面流走时，她深刻地理解了这一点，而通常付出的代价是放弃个人所有权和个人积累。随着资产阶级家庭的产生而出现的认知劳动的分工不是女性的一种权力手段，而是对男性的主—奴臣服关系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个时期，敏感的中产阶级女性认为，加强父权的三角流通过程是通过她们达成的，但并不止于她们——而资本主义男性（他具有清晰的前资本主义身体形象）对于他追求的是什么、为谁服务等问题，还存在误解。但是，他的误解与现实的权力获得之间，常常难以辨别；实际上，在他通过女人与其他男人达成的三角式交易中，这种误解最盲目，但也最接近现实的权力获得。

## 第十章 登上后门的阶梯： 《爱德温·德鲁德》 和帝国的恐同

“好啊，那么，”[奥利克]说道，“如果我不看到你到家，我就会被“吉格”(jigger)!”\*

这个受到“吉格”的惩罚是他喜欢的假设。就我所知，他没有给那个词赋予特定的意义，而用它……来对抗他人，并传达某种极具损毁力量的意思。在我年纪更小的时候，我模糊地相信，如果他亲手来“吉格”我的话，他会用一把锋利的弯钩做这件事。

——狄更斯，《远大前程》<sup>[1]</sup>

在上一章中，我们引用了一位有杀人倾向的教师的话——他对他心爱的女士这样说道：

我对尤金·瑞本先生的这一点知道得很清楚，而你一直把我吸引到你那儿去……我行动之时，满脑子想着尤金·瑞本先生。我现

---

\* “Jigger”作为动词来用时，意义较模糊，意思是控制或上下扯动。为了表现它在这个例子中有意强调的模糊性，此处采用了音译。——译者注

[1] 狄更斯，《远大前程》，第17章。

在跟你说话之时，满脑子想着尤金·瑞本先生。我已经被晾到一边，我已经被抛了出去，却还满脑子想着尤金·瑞本先生。<sup>〔2〕</sup>

在《爱德温·德鲁德之谜》(*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中，约翰·贾斯伯，一位有杀人倾向的音乐教师，以类似的方式对他爱着的女人说话。

罗莎，即使当我心爱的孩子跟你订了婚时，我还是疯狂地爱你；即使当我觉得娶了你做太太，他的幸福就有了保证时，我还是疯狂地爱你；……他把有你可爱面容(他大肆诋毁了它)的照片给了我，为了他，我装作总把它挂在目所能及的地方，而为了你，我忍受折磨膜拜它——即使是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还是疯狂地爱你。<sup>〔3〕</sup>

在狄更斯未完成的最后小说中，约翰·贾斯伯、爱德温·德鲁德和罗莎·巴德之间的情欲三角重塑了它之前作品中布莱德利·海德斯通、尤金·瑞本和莉西·赫克撒姆之间的三角。在每个三角中，男性情敌中先提到的那个(约翰·贾斯伯和布莱德利·海德斯通)都袭击了第二个，想杀死他；而他自己大概都在小说结束前被杀死；每位女性本能地感到，那个暴烈的情敌远没有他自己想象的那么爱她，而是想把她作为一场私密的男性意志较量中的筹码，而这场较量与她并不相关，而且对她不利。<sup>〔4〕</sup>

然而，尽管《爱德温·德鲁德》对《我们共同的朋友》中莉西的情欲情节的重塑是封闭的，却牵涉到一组不同的问题。首先，《我们共同的朋友》

---

〔2〕 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第2卷，第15章。

〔3〕 狄更斯，《爱德温·德鲁德》，第19章。以下的引文将被整合到讨论中，并用章数来标示。

〔4〕 《爱德温·德鲁德》的每个阐释者都必须在对这部未完成小说可能情节的无数假设中，挑一个自己的方向。我应该在一开始就指出，我选择的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观点，即贾斯伯想要杀死爱德温；我同意一个相当普通的观点，即他成功做到了。我也同意一个很多人都认可的观点，即奈维尔会死，罗莎会嫁给塔塔，而海伦娜会嫁给克利斯巴克；我还同意一个有例可援，但不一定完全站得住脚的观点，即戴切瑞是海伦娜假扮的。

中情敌之间的磁场尽管很强,却必须根据他们之间的带着憎恨的暴力互动来推断;而在《爱德温·德鲁德》中,他们之间的爱是他们关系中首要的、最外露且最坚持地加以呈现的方面。贾斯伯名闻克洛伊斯特海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对侄子有着“女人气的”(第13章)热爱,而他侄子也毫不含糊地爱他、崇拜他。这两个男人之间的一些段落描写听起来就像是来自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拿出来的一样:小德鲁德易激动,散发着自信的魅力,他太年轻,因而缺乏洞察力,而且很自私,同时他又很纯真,未经世故——这一切似乎都刺激了他性情乖僻的叔父,激发他秘密地、有创意地制造出无数自我分化和双重意义(例如,第12章)。贾斯伯的爱显然很强烈;当然,这意味着他杀害他心爱的侄子的密谋在动机上有很严重的问题。一个简单的答案是,贾斯伯多年来有意地、有手段地造成了他爱着侄子的假象,这个答案虽然垂手可得,但完全不令人满意。相反,狄更斯似乎想利用故事中提到的鸦片瘾以及/或者似乎隐约存在但没有明说的催眠术,从心理上将贾斯伯的性格描绘成精神分裂:在这种状态下,他对侄子的爱和谋杀他的计划可以共存。那么,很清楚,与《我们共同的朋友》相比,这部小说对未获承认的男性情敌之间的情欲做了更刻意的讨论——这意味着,在这部小说中,否认和分化男性同性社会性爱(male homosocial eros)的机制是一个更公开的主题。

对《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三角关系的另一个改变是:在较早那部小说中出现的情敌之间的阶级差异——海德斯通被压抑的愤怒和瑞本的满不在乎与这种差异之间存在着精准的心理关联——在《爱德温·德鲁德》中消失了。这里的情敌是叔侄,他们属于同样的阶级。总的说来,各个职业的资产阶级成员之间的层次太微妙、太多样,而不成其为阶级差异,这些层次变化占据了家庭图景的大部分。在《爱德温·德鲁德》中起到重要的社会意指功能(signifying function)的,不是阶级,而是种族和异域情调(exoticism)。这些情敌是不一样的,因为一个是金发,一个是黑发;一个要“稍稍唤醒埃及”(第8章),而另一个则要忍受克洛伊斯特海姆的“拥

挤与单调”(第2章)。《爱德温·德鲁德》中暗含的框架从英格兰拓展到了帝国的整个世界；较早那部小说以英语语法和口音来戏剧性地呈现情敌之间的不同，而在这里的呈现方式则是通过地理上的流动性、国际主义以及——特别是——肤色来完成。就像在坡茨奈浦的话语中一样(尽管可能并没有使用他那套衡量)，“英式”与“非英式”——后者在这里意味着各种意义上的东方(the Oriental)——成了主宰一切的范畴。

在本章中，我将通过解读《爱德温·德鲁德》及其他相关文本提出下述观点：关于帝国的一套主题——它与英国帝国主义本身的关系既不远也不近——在文学中的出现，以若干彼此强化的方式改变了哥特式恐同话语的措词方式。首先，它用域内与域外之间那种差别较小、更具二元性质及幻想倾向的区别，代替了充斥哥特式小说的阶级区别意识。(当然，这种区别本身在哥特式传统中亦有其历史。)第二，将剥削式的性欲表达机会——和幻想——用更广、更受到保护的国际场景展现出来意味着，在哥特式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心理分裂机制能够也有必要以异域的方式——通过鸦片瘾，以及通过“东方”技巧来施行的催眠术——来重新获得合理化和解释。<sup>[5]</sup>此外，部分来源于哥特式传统的偏执狂种族主义主题——属国臣民所施与的男性插入和侵蚀——变成了西欧国家意识形态的显著特征。它产生的最终结果就是男性强奸的意象。

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爵士在他收于《一千零一夜》(1885—1888)的著名的“终结文章”(Terminal Essay)中，想把他几十年的旅行和他对19世纪及更早的人类学的阅读一起总结。他对男性同性恋的总结如下：

1. 世界上存在着一个我称之为“索戴蒂克区”(Sotadic Zone)的地方，其西部边界是地中海北岸(北纬43度)，南部边界(北纬30度)……包

---

[5] 在这个世纪后来的时间里，后者与新诞生的心理分析中的犹太精神没有被区别开来；小说《翠尔比》(Tribby)中的人物斯旺格里是一个重要的衔接。《翠尔比》是19世纪法国作家乔治·杜·墨伊埃[George du Maurier]的哥特式恐怖小说。——译者注)

括法国南部,伊比利亚半岛,意大利及希腊,以及从摩洛哥至埃及的非洲海岸地区。

2. 索戴蒂克区向东变得狭窄,包含了小亚细亚,美索布达米亚和伽勒底,阿富汗,信地,旁遮谱和克什米尔。

3. 在印度支那部分,这条带状区域开始变宽,囊括了中国、日本和突厥斯坦。

4. 然后它拥抱了南海岛屿和新大陆——新大陆在发现之时,除了某些例外,索戴蒂克之爱是一种已经确立的种族制度。

5. 在索戴蒂克区中,这种恶习(恋童[pederasty])很盛行,成为地方特点,顶多被认为是轻罪,而在此处定义的疆界边缘的南北部的种族中,这只是个别行为,会受到其他成员的责骂——总的来说,这些成员在身体上无法做出这样的行为,并怀着最深的厌恶看待它。<sup>〔6〕</sup>

总之,维多利亚时期最具探索精神的那些人为男性同性恋文化划出了疆界,它只包括地中海和经济上有剥削价值的第三世界——几乎没有遗漏这个范围内的任何地方。

伯顿坚持说,索戴蒂克区对“这种恶习”的影响是“地理上的、气候上的,而不是种族上的”。<sup>〔7〕</sup>他这种坚持正是伴随欧洲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的一个重要特点,与——比如说——美国的种族歧视不同:它的遗传基础(如果被强调了的话)不那么清楚。在我们的种族歧视的二元幻想中,美国人要么是黑人,要么是白人,从出生起就这样。而殖民者却可能“变成”本地人:尽管气候、风气或习俗常常被以种族的角度来描述,但是它们实际上被视为具有传染性。《爱德温·德鲁德》的第一章指出了另一条种族地位降级的路径:通过对外国物质的摄取。约翰·贾斯伯在伦敦一家鸦片馆醒来,同一张床上还躺着“一个支那人,一个印度水手,和一个形容憔悴的女人”;他注意到,这个(英国)女人“鸦片抽得太多,以致于与那个

---

〔6〕 伯顿,《一千零一夜》,第10卷,第206—7页。

〔7〕 伯顿,《一千零一夜》,第10卷,第206—7页。



支那人有一种奇怪的相像。他脸颊、眼睛和鬓角的样子，以及他的脸色，都被复制到她身上”。而且这种流感似乎并没有到她就停止；实际上，

她的脸和四肢间歇抽搐，就像阵阵划破天际的闪电；当他看着这些发作时，它们带着的某种传染性摄住了他，以致于他不得不退到壁炉边上一把细脚伶仃的扶手椅上去……他坐在上面，紧紧抓着它，直到他控制住这不洁幽灵似的模仿冲动。（第1章；粗体部分是我自己做的强调）

这一章结束的时候，在从伦敦回到他在克洛伊斯特海姆的家的途中，贾斯伯被称作“一个精疲力竭/女人般的旅人”（a jaded traveller）。从贾斯伯到女人（jade）\*：这位英国人因为与浦弗公主的接触而被东方化了——而且，同样地，他被不知不觉地女性化了。当贾斯伯在下一章中被正式介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奇怪地看到，“他的举止有点儿严肃。他的房间有点儿严肃”；我们也不奇怪，他对他心爱的侄子的态度总是“渴望的，严格的，小心提防的”；而且我们最不感到奇怪的是，“贾斯伯先生是个皮肤黝黑的人”。（第2章）

小说中其他被东方化了的欧洲人是孤儿海伦娜·兰德莱斯和奈维尔·兰德莱斯。

一个是出奇英俊、敏捷的年轻人，一个则是出奇清秀、敏捷的姑娘；长得很像；皮肤都很黑，气色很好；她几乎像个吉普赛人；俩人身上都有某种桀骜不驯的东西；都带着猎手的气质；然而同时又都带着被猎取对象——而非猎手——的某种气质。都苗条、柔软、眼疾手快；半是羞涩，半是大胆；眼神犀利；在他们的脸和形体的表达上，一

---

\* “Jade”一词既可以用做动词，表示“（使）疲惫”，又可以用作名词，表示“女人”。——译者注

种难以定义的停顿忽有忽无，就像蹲、跃之前的停顿。（第6章）

兰德莱斯兄妹的野蛮背景比贾斯伯的要干净、诚实——他们在锡兰长大，孩提时生活艰辛、受过家庭暴力。而无论如何，异域传染对海伦娜的影响相对更让她坚强，在道德上更激励她。然而，它的确损伤了奈维尔的健康，而且可能是致命的；他大声说出了他对他的坏脾气的担忧：

我在下人和奴仆中长大，他们来自一个低下的种族，我可能很容易地就已经和他们产生了某种极其密切的关系。我说不准，但有时候，[造成这种关系的]可能就是他们身上残暴的血液。（第7章）

仅仅这两个例子就已经清楚地表明，这部小说对帝国主义种族观的道德解读是很复杂的。兰德莱斯兄妹是英勇的；作为他们最鲜明的陪衬的英国人是赛普西，这位无与伦比的英国市长兼拍卖员自鸣得意地认为，因为掌握了中国、日本、埃及，甚至是爱斯基摩的商品清单，他就“知晓了全世界”。奈维尔因涉嫌谋杀德鲁德而被捕；当思考此案时，“赛普西先生表达了他的见解，认为此案涉嫌人面目黝黑；简言之（这时候，他的眼睛完全停在奈维尔的脸上），就是一种非英国式的肤色”。（第15章）小说将赛普西的偏狭当作一个糟糕的玩笑来对待；同时，最会利用赛普西的沙文主义的人正是贾斯伯——他的邪恶程度与他东方化的程度相当。如果对英国种族和文化的稀有价值（virtu）不作什么批评的话，那么，占据了小说道德中心的似乎正是贾斯伯的陪衬克利斯巴克，一位不止一点点愚蠢的低级牧师；克利斯巴克“白皙而红润，永远保持一头扎进周围乡村深深的流水中[的习惯]”（第2章），他对健身上了瘾，每天早晨都“用和蔼可亲的脑袋打破克洛伊斯特海姆堰坝边缘清晨的薄冰，来让他的体格增强活力”，他接下来会去打拳，“从臂膀挥出最直接的直拳，他神采奕奕的五官充满了纯真，他的拳击手套散发出柔情的慈悲”。（第6章）克利斯巴克充

满活力的——实际上是强迫性的——纯真可以追溯到那些出了名的运动场活动：

棒小伙！男子汉！……这位低级牧师的自信就像当年那位在风中的板球运动场上的守门男生的自信一样。不论事情是大是小，他对职责都一样忠实可靠。就像所有诚实的人一样。就像每位诚实的人一样，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第 17 章）

实际上，克利斯巴克代表着英国式的种族理想，而当曾经救过他的命的“学长”从他对公学的记忆深处重新浮现时，这种种族理想被加倍增强了，“俩人带着最大的诚挚握手，然后长时间地——对英国人而言——把手放在彼此肩膀上，开心地相互对视”。（第 21 章）这位激起这种柔情的人是一个像他老师那样的健身狂，在卫生方面甚至还超过了他：“他的浴室像奶品店。”（第 22 章）

这部小说，尤其在开头，以品味克利斯巴克这种人的愚蠢为乐。

“贾斯伯，在今晚‘音乐流转星期三’的活动上，我们会想你的，但无疑你最好待在家里。晚安。上帝保佑你！‘告诉我，牧羊人们，告——告——告——诉我；告诉——我——我——我，你是否看到（你是否看到，你是否看到，你是否看到）我——我——我的弗洛——洛——洛——拉——拉——拉从这儿经过！”好嗓音的低级牧师赛普蒂姆斯·克利斯巴克教士这样说道。（第 2 章）

然而，克利斯巴克的愚蠢是灾难性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兴高采烈地说道，订下了这终将导致德鲁德被谋杀的见面[第 6 章]），他的健身狂热使得他在豪放的友好的掩饰下对别人施以人身强迫，他有平板、无知的自信，认为他自己那套甜蜜的肌肉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一切似

乎都得到了小说叙事者的强调、认可。此处被突显并在价值上被尊崇的男性同性社会性的版本(在克利斯巴克与塔塔之间,克利斯巴克与奈维尔·兰德莱斯之间)是等级制的,它被设想为以美德为基础——它就是克利斯巴克的“男子汉气概”,他的英国气质;它在情感上很强烈,但难以表达;它太纯洁,太纯洁,太纯洁。

实际上,克利斯巴克与奈维尔之间的关系在两个方面偏离了理想。首先,大概是因为早年接触“低下种族的下人与奴仆,”奈维尔似乎比预期的更会表达他对导师的感激之情:他流过泪(第10章),亲吻过克利斯巴克的手(第17章)。这些都被克利斯巴克接受了,但也投下了阴影,针对的不是奈维尔的道德(他的道德看起来没问题),而是他某种内在的健全。到小说停下来时,似乎奈维尔注定无法完成他的“英国化”;他在道德上完善到了空虚的地步,将死于寒冷和种族歧视的英国气候,把(他爱着的)具有英国气质的罗莎留给塔塔——塔塔是克利斯巴克的另一位被保护人,他更具活力,更有男子气概,简单地说,更英国。

皮肤黝黑的约翰·贾斯伯与他的被保护人德鲁德之间极为沉重的关系是用来对照面色红润的克利斯巴克与门徒的关系的。然而,正如这些将男性同性社会性纽带分门别类过程中常常发生的那样,这个被摒弃的版本与指定的版本之间有令人惊异的吻合。作为彻头彻尾的英国人,克利斯巴克监护两名“皮肤黝黑”的小孤儿,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两个孩子之间有很深的感情;他深爱其中一位,而另一位则将死去。贾斯伯自己“皮肤黝黑”,他监护着两个肤色白皙的小孤儿,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两个孩子之间有很深的感情;他深爱其中一位,而另一位将死去。在爱德温的例子中,正如在奈维尔的例子中,被爱的对象显然无法承受这样的哺育过程而活下来。但也正像在克利斯巴克与奈维尔的关系中那样,这里存在着对爱的过度表达,这被描绘成一个深层次的问题——而且,在目前这个例子中,它还是个道德问题。

毫不奇怪地,只有在鸦片的威力之下,贾斯伯对自己保护的人的感情

才能被最大程度地放弃。但即使这样，他还是摆脱不了关于情欲和谋杀的一切。在这个片断的最后场景中的一幕中，浦弗公主就贾斯伯的鸦片梦境对他进行了质问——小说要求我们将这些梦境想象成他对谋杀德鲁德的狂想，这些狂想一度是准备式的，而现在则是回溯性的。然而，这些梦境的情感和它们那强迫性重复的、痉挛式的节奏，都具有性意味。“当我无法忍受自己的生活时，我就[在这狂想中]寻求安慰，我也得到了。它真的是安慰！它真的是安慰！”他坚持道。而且

我总是在[鸦片梦境本身]的色彩变化和它的美妙景象和绚丽的铺展开始之前，先进行这段旅程[谋杀幻想]。如果它不离开我的头脑，这些过程就无法开始。在此之前，我没有容纳其他东西的空间。  
(第 23 章)

这种重复的、美妙的暴力幻想与实际暴力之间的关系就像性幻想与肉体性行为之间的关系一样，是浓缩和反高潮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常常这样幻想，以致于真的这样做的时候，似乎已经不值得做了，而且这过程是如此之快。”即便在孤独的幻想中，也总存在着高潮来得过早的危险：

别出声！旅程完成了。它结束了。……等一会儿。这是幻觉。让我睡一觉，好让它消失。它太短、太容易了。我必须得到一个更好的幻觉；这是最差的一种。没有挣扎，没有危险的感觉，没有乞求——但我从未见过**那种事**……看啊！看看它有多么可怜、可恶、悲惨！**那**一定是真的。它结束了！

我们看到的情节没有阐明“**那种事**”是什么、“真的”事是什么，以及贾斯伯看到了什么。然而，这个句子的节奏，以及梦本身的节奏，都引导我们将它解读为那个“可怜、赤裸、分裂的动物”，解读为（在这个情景中）感

觉上的巨大失望，而在斯泰恩的作品中，这种感觉“以一种大概的方式结束，并不比痉挛要好”（第 297 页）。在小说中十分清楚的是，贾斯伯的幻想旅程中有一名想象出来的“旅伴”；而这位旅伴就是爱德温·德鲁德。这一幕没有为这种狂想、挑逗、高潮、厌恶提供主题上的落脚点；除非是当贾斯伯经受他那无声的孤独的苦难时，公主用手势戏仿地传达这一切：

他沉重地、沉默地躺着，脸和四肢时不时丑陋地抽搐着。阴惨的蜡烛快要燃尽；这女人用手指拈起它即将烧光的尾端，点燃另一只，然后把闪闪烁烁的那节深深按到烛台里，将它和新蜡烛揉到一起，就好像在给某件丑陋的、不体面的武器上膛一样。

即便是鸦片的安慰都无法让贾斯伯摆脱三件关键之事：他对侄子的爱，他行使暴力的需要，以及性欲的律动。情欲和压抑都与爱德温有关，它们是贾斯伯摆脱不了的。而且，在寻找浦弗公主时，他追求的远远不是鸦片剧院那种德昆西式的辉煌，而是一个机会，以重新排演一个或许已经出现在他意识中的场景。那么，他究竟为什么非要借助于鸦片呢？摄入这种带有异域情调的物质，对他、对小说具有什么作用？

在这部关于化身(doubles)的(哥特式)小说中，如果我们把鸦片视为催眠术的化身或衬托的话，那么，它的重要性就变得很清楚：它是另一种关于意识和意志的技术。小说并没有把这两个主题自动并列，因为，尽管与鸦片相联系的是关于同性社会性关系的情节，即与爱德温共同踏上谋杀之旅，但贾斯伯的催眠力量却在异性恋情节中被施加到罗莎身上。实际上，贾斯伯的催眠力量本身正是他的异性恋情节：它是罗莎恨他、怕他的根源，而且也是她注意到他的性感的唯一原因。

正如弗莱德·开普兰(Fred Kaplan)在《狄更斯与催眠术》(*Dickens and Mesmerism*)中指出的那样，对于狄更斯而言，催眠具有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种意志的渠道。它的欲望(eros)是一种主宰的欲望。作为

一名出色的催眠师，狄更斯从来不允许自己被催眠。这种技术最吸引他的并非“梦游”中的被催眠对象的古怪表现，而是当催眠师的意志从另一人毫无反抗的状态（或者，更刺激地，从反抗的状态）中通过时，它获得了疏通和增强。在这一切中，最刺激的一面就在于，一名傲慢的女子被迫去体现一位全神贯注的男人的意思，执行他的意愿——即使她自己知道那不是她的。<sup>〔7〕</sup>当然，这正是贾斯伯希望施加在罗莎身上的那种“爱”，而且，有些时候，他似乎差不多成功地做到了。作为一名音乐教师兼合唱领队，他正好就处在强迫别人传达“他的”声音——不论他们希望传达的是什么——的位置上：“当他纠正我，或是弹出一个音符，或是演奏出一段曲子的时候，”罗莎说道，“他自己就裹在这些声音中，低声说他把我当成爱人来追求，并要求我保守他的秘密。”（第7章）<sup>〔8〕</sup>

那么，鸦片意识与催眠意识之间的分裂似乎不仅对应着贾斯伯头脑中同性社会性欲望与异性恋欲望之间的分离，而且也对应着将被动性从对意志的主动调动那儿区隔开来的做法。在这样一些情形中，一个人如果要像贾斯伯对待罗莎那样疯狂地将自己的意志力灌输到对方身上，那么，他就需要某种形式的自愿放弃——这种放弃就像他从鸦片铺子里美美地获得的那样，突然、骤发、可靠。但此外，如果要让贾斯伯得以保持心理平衡的幻觉，那么，保证这两个场所、这两种技术之间的区别就十分重要，甚至是必须的。他有必要觉得，对女人的感情和对男人的感情是有差别的。主动和被动是完全不同的。我想抹除某个女人的自我，我对她的感觉不是仇恨，而是爱。我愿意梦到某个男人，我对他的感觉不是爱，而是仇恨。我那主动的、统领式的意志是异性恋欲望，它是我体内某种内在的东西，由我向外散发，我凭借它来征服世界。它是一种催眠。这种危险的被动性作为一种释放，对我而言有时是必要的，它是我对爱德温的迷梦的发生场所，被具体地局限了起来。它就是鸦片：一种外在物质，处于我

〔7〕 开普兰，《狄更斯与催眠术》，第165—215页。

〔8〕 《翠尔比》对此再次提供了一个重要呼应。

自身之外,是我可以随意摄入的东西。<sup>[9]</sup>而且(这部小说用它众多声音中的一个接着说道),它不仅来自我的身体之外,它也来自我的国家之外:它是非英格兰的。罗莎可以宁静地吃她粘乎乎的土耳其美味糖块;但对英国男性而言,土耳其式的快乐具有更多的危险意味。例如,小说第一段关于鸦片梦的描写中,也提及这样的危险:苏丹有将男人们在尖桩上钉死的习惯。(第1章)

伯顿描绘过一些相关的东方习惯。他注意到“索戴蒂克区所涵括的整个小亚细亚和美索布达米亚现在被‘无法言说的土耳其人’——一个天生的恋童族——占据了”,<sup>[10]</sup>他还夸大了这个地区对旅人构成的危险:

对那些在后宫或内闺中逮到的外乡人,最盛行的波斯式惩罚就是把他们剥光后扔到马夫和黑奴群中,让他们暴露于他们的拥抱。有一次我问一位设拉子人,如果病人使出[肛门]括约肌所有的力气来抵抗,刺入还怎么可能:他微笑着说,“啊,我们波斯人有个窍门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用削尖了的帐篷钉戳他屁股上的骨头(尾骨),直到他放开”。某位波斯王子为一位造访东方的上辈著名传教士的劝教狂热激怒,对他施行了这种令人作呕的侮辱:在他的回忆录中,这位传教士自称“受辱者”来暗示这件事;但英国读者无法理解这个告白的全部意义。大约在同一时期,布谢尔总督纳斯尔教长,一位出名的喜欢说滑稽下流话的人,曾邀请在孟买海军服役的欧洲青年,并用酒将他们灌得不省人事。第二天早晨,这些海军军官候补生几乎都抱怨说,香槟让他们的后面部位产生了奇怪的刺激和痛楚。<sup>[11]</sup>

---

[9] 关于这一点,参见威尔纳(Wilner)的文章《没有节奏的音乐:波德莱尔和德昆西散文中的整合与沉迷》(“Music Without Rhythm: Incorporation and Intoxication in the Prose of Baudelaire and De Quincey”)。

[10] 伯顿,《一千零一夜》,第10卷,第232页。

[11] 伯顿,《一千零一夜》,第10卷,第235页。



对贾斯伯而言，这些暴力意象只要在地理上和心理上被局限起来，就尚可容忍——它们甚至发挥了某种功能。只要贾斯伯能把他的鸦片生活与他的催眠生活区别开，他就认为自己的完整性、自己的心理平衡都是安全的。特别是，主动坚持（即性欲）和被动享受（即——某种别的东西）绝对不允许互相沾染。然而，正如我们在对霍格和经典偏执狂哥特式小说的讨论中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双重状态在开始时是清楚区分的，并可以控制，但在本质上，它们要相互侵袭、相互破坏。在《清白罪人》的情节中，罗伯特·瑞恩希姆被这种侵染分解、击溃；类似地，在《爱德温·德鲁德》的情节中，贾斯伯的毁灭是由同样的“传染”（contagion）的“不洁幽灵”造成的。

从小说戛然而止之处的事情发展来看，应该有三条线索让贾斯伯的行径败露，并将他定罪。第一条线索就出现在“鸦片场景”中。正是浦弗公主以贾斯伯吸食鸦片、神志恍惚时无意识发出的言语为依据，将他的故事片断串接起来；她这样做，或许是为了敲诈，或许是出于某种在她自己的故事中尚未揭露的原因。这意味着，贾斯伯所想象的他与鸦片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多重破坏。首先，这直接意味着他的鸦片生活不够隐秘。或许是因为他已将这种意识形式局限在一种隔离开的外在物质（盛在一个墨水瓶里！）中，他才把受控于鸦片的生活想象为是同样封存好了的；但不可能。第二，这意味着，他受控于鸦片的行为并不像他机械地构想的那样具有单纯的被动性。它是主动的，表达了他自己，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他的内在：正如在催眠中一样，他身上某些东西被传达出来。第三，尽管贾斯伯仅仅只将鸦片场景构想成他与爱德温之间的同性社会性互动的场所，但他还是忘记或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使在这儿，也出现了一位女人——并非一位符合他想象中的性生活的女人，而是一位有动机，有欲望，有自身需求的女人。如果主动和被动在本质上没有不同，如果女人和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场景能深刻地相互交错，如果被动和放弃不能牢靠地局限于一种有形的可食物质之中，不能局限于自身之外，不能局限于

男人们的国民生活之外——那么，那里还会有安全吗？

让贾斯伯被定罪的第二条路径是通过克洛伊斯特海姆，即催眠场景和贾斯伯异性恋生活的场景；在这儿，他受到了鸦片意识、嗜眠症或强直性昏厥发作等的侵袭，它们威胁要进入象征着他的主动意志的英国场景。这些发作很频繁，它们打乱一切，并具有破坏性；就像鸦片迷醉状态本身一样，它们或许具有一种被动的亢奋节奏，每每令爱德温感到窘迫。在某个场景中，爱德温因为贾斯伯陷入了这样一种状态而被吓坏了；贾斯伯则将其归咎于鸦片的作用，叫他往别处看。

这个年纪较轻的男子带着惊恐的表情照做了，他垂下眼睛，看着壁炉里的灰烬。较年长的那位凝视炉火的眼神没有放松，而是在他用力紧抓手肘椅的同时变得更紧张，他僵硬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他急喘了口气，恢复到刚才的样子，额头上却带着密密的汗珠。当他如此下陷在椅子里的时候，他的侄子温柔、殷勤地照料着他……（第2章）

这一次以及其他类似发作直接使得贾斯伯在（太晚）获知爱德温和罗莎已经解除婚约的时候崩溃了，因为婚约的解除让谋杀变得“没有必要”——而他的崩溃暴露了他的罪行。这最后的崩溃通过会聚同样的身体意象来体现：“一张目不转睛的苍白的脸，两片颤抖的苍白嘴唇，坐在安乐椅里”，“两只沾着泥的手抓着椅边”，“坐在安乐椅里的一张铅灰的脸，就像铁打的，上面渗出可怕的汗滴或泡沫”，“一个可怕的形体”在“痛苦扭动”，最后，“地板上除了一堆撕破的沾满泥的衣衫，什么都没有了”。（第15章）

贾斯伯的灭亡很像西方坏女巫\*的溶解；神志恍惚和被动对他选择

---

\* 西方坏女巫(the Wicked Witch of the West)是弗兰克·鲍姆(L. Frank Baum)的童话《绿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中的反面角色；当被她囚禁的小女孩多萝西出于反抗把一桶水泼到她身上时，这位不可一世的女巫立即溶化了。——译者注

去掌控、去坚守的阵地发起的侵袭——这种侵袭在结构上类似于性高潮，受到他的激烈抵抗——并不标志着他的终结，而只是终结的开始。就像在伦敦部分的情节中，在这儿，揭开了一切的克洛伊斯特海姆人物看似只是一名被忽视的在场女性：狄克·戴切瑞——许多批评家认为她是海伦娜·兰德莱斯伪装的。在克洛伊斯特海姆这个“同性恋”场所里，贾斯伯对某位女人视而不见，不是因为她维持了女人的身分不变，而是因为她变成了男人。在这里，尽管构成贾斯伯的性欲的本来应该是不留余地的自我约束和对意志的调动，但是，贾斯伯最终之所以无法逃走，是因为他渴望放弃对意志的施用，而在无形中给自己造成了压力。

除了浦弗公主的证据和贾斯伯的崩溃造成的自我背叛的证据之外，让贾斯伯暴露的第三条线索——尽管，在书的终稿中尚不清楚它与自己原本要证明的东西有多么不同——是一个戒指所构成的证据。贾斯伯不知道，爱德温死的时候，身上带着个金戒指；如果——而且这似乎很有可能——贾斯伯用石灰来处理尸体，那么只有这个戒指才能逃脱腐蚀、溶解。当爱德温决定不向任何人提到他口袋里装着戒指时，这里的叙事就注入了这之前的小说中常见的意象：

在时间和际遇构成的巨大铁工厂中，日夜不停，永远锻造着神奇的链子；在这些链子中，有一条被铸入那个出现小终结的时刻，它被铆接到天与地(heaven and earth)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无可战胜的操控力量。(第 13 章)

就戒指的主题，伯顿用他在《终结文章》中神秘的混合语言（例如，“sanctus paederasta” being violemment soupçonné when under the mantle:—non semper sine plaga ab eo surrexit），<sup>[12]</sup>在他关于希腊“病态

---

[12] 伯顿，《一千零一夜》，第 10 卷，第 214 页。

爱名称”的词条下列出

Catapygos, Katapygosyne = 来自 Dactylion 的 pueraruis 和 catadactylum, 戒指, 意指奈里沙的戒指, 但被用于 corollarium puerile。<sup>[13]</sup>

这让人联想到《我们共同的朋友》中洛格·莱德胡德的被杀,“仍被箍在布莱德利的铁圈中”,以及与之相类似的布莱德利对尤金的袭击:戒指象征着被自我矛盾的、压抑的爱欲绑在一起的两个男人那不可分离的暴烈命运。这也让人想起在《远大前程》中将男人们连在一起的铁纽带。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布莱德利挑衅莱德胡德说,“我要抓住你生,我要抓住你死!”类似地,玛格维奇在逃脱了囚船,甚至摆脱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脚镣之后,让自己再次被捕获,目的不过是要折磨被憎恨的孔皮森。“我要了他,”他幸灾乐祸地想。“他知道这一点。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

放了他? ……让他重新把我当成工具? 再来一次? 不,不,不。如果我死在那底下,”他带着强调将戴着镣铐的手挥向深沟;“我要抓住他不放,你一定会在我的双臂中发现他。<sup>[14]</sup>

孔皮森最终让自己和玛格维奇致命地扭成一团,让自己被杀死,从而阻止玛格维奇逃离英格兰;这只不过是老调重弹——实际上,这就像鬼鬼祟祟的奥利克将皮普致命地囚禁于石灰窖一样。这些男人中的每一个,都通过一名他无法去爱的女人,与一名男子形成一个强烈得多的关系,而对这名男子,他只能用最私密的暴力来表白。

我已经提到,而且理查德·伯顿的文章也已证实,在帝国主义文学

---

[13] 伯顿,《一千零一夜》,第10卷,第216页。

[14] 狄更斯,《远大前程》,第5章。

中，当场景设在域外时，狄更斯对偏执狂哥特式传统的运用中暗含的男性强奸的意象得到了更清晰的表现。很不幸，在 T. E. 劳伦斯的《智慧七柱》中，这个主题最终发展成一场真实的强奸。不可避免地，与伯顿对“最流行的波斯式惩罚”或“后面部位产生的奇怪的刺激和痛楚”的那种窥私而又放眼世界的转述不同，这个描述要更具破坏力。同时，在劳伦斯的作品中，极为个人的描述（比如此处）也是极具文学性的。狄更斯作品中的男性“对手”的扭打与几十年后劳伦斯描述中的一次真实强奸及其令人绝望的心理后果之间，有一种应和，它强调在何种程度上男人的情感，就像女人的一样，已经围绕强奸被建构起来。狄更斯的描述之一是这样的：当约翰·哈蒙这个“某地来的人”从海外“某地”回来以后，开始回忆，想弄清他遭受过的一次袭击——袭击他的人有莱德胡德和他的前船伴，一个叫乔治·莱德伏特的人，此人也穿过他的衣服来模仿他（就像海德斯通对莱德胡德所做的那样）。

当[莱德伏特]回来时，我还穿着他的衣服，他身边还有个黑人，穿着亚麻外套，像个招待一样，他把桌上加了鸦片的热气腾腾的咖啡放到一个托盘中，一直没有看我……

这时，我开始进入一阵阵恶心、神经错乱的状态；它们极为强烈，以至于我要依赖它们；但在它们之间有着一些我一无所知的间隙，在那儿，任何有关时间的念头都不存在。

我喝了些咖啡，这时，我感觉我看到他开始无限地膨胀，而某种东西怂恿我向他冲去。我们在门边扭打起来。屋子在旋转，而我们之间有火焰在闪烁，我不知道往哪里打，这使得他挣脱了我。我倒了下来。我无助地躺在地上，被一只脚翻了过来。我被拽着脖子拖到一个角落里。我听到男人们在说话。我被其他人的脚翻了过来。我看到一个很像我的人穿着我的衣服躺在床上。在我感觉像是延续了数日、数周、数月、数年的寂静被男人们在整个屋子里的剧烈打斗打

## 男人之间

破了。那个看起来很像我的人受到攻击，他手中拿着我的小旅行袋。我被踩踏、被人压在下面。我听到击打的声音，以为是伐木人在砍树。我本来不可能说出我的名字约翰·哈蒙——我本来想不到它——我不知道它——但当我听到击打声时，我想到了伐木人和他的斧头，并有了个要命的念头，以为我是躺在森林里。

这还正确吗？还是正确的，只不过，我不用“我”这个词就无法将它对自己表达出来。但这不是“我”。据我所知，并没有‘我’这种东西存在。

沿着某个像管道一样的东西下滑，然后是巨大的噪音，还有像火发出的噼啪闪动，这一切之后，我才恢复了意识。“是约翰·哈蒙快淹死了！约翰·哈蒙，为你的生命加油。约翰·哈蒙，乞求上天，拯救你自己！”我想我在一阵巨大的痛苦中大声地叫了出来，然后某种沉重、可怕、模糊不清的东西消失了，只有我独自在水里挣扎。<sup>[15]</sup>

劳伦斯也经历过时间感的丧失，以及，更重要地，个人身分感的丧失。他因为有间谍嫌疑而被关进监狱，他拒绝了土耳其司令官的性要求，而后者“低声告诉那位下士把我带出去，让他把每件事情教给我”。

为了让我的神志保持清醒，我数着捱了多少记[鞭子]，但数到二十以后就乱了数，只能感觉到疼痛的无形重量，它不像爪子的撕扯——对此我已做好准备——而像是某个过度庞大的力量渐渐裂开我的整个存在，它的波涛沿着我的脊柱向上滚，直到占据我的大脑内部，可怕地撞击在一起。那里某个地方有只廉价的钟在大声地滴答，他们打我的节奏与它合不上拍，这让我感到难受。我扭动、蜷曲，但被按得那么紧，以致于我的挣扎都是徒劳。那名下士停止之后，那些

---

[15] 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第2卷，第13章。

男子接了手，十分刻意地，给了我一顿好拳脚，然后是一阵停顿，在此期间，他们为谁是谁的下一个而争吵，他们放松自己，用难以言说的方式戏弄我。在也许不过十分钟的时间内，不断重复着……

终于，当我被彻底打垮时，他们似乎满意了。不知怎么，我发现自己在长凳下面，仰面躺在肮脏的地板上，我在那儿蜷缩着，头晕目眩，喘着气，但有种隐约的舒服感。我已经准备好在死之前体验所有的痛苦，不是作为演员，而是作为旁观者，想过不再关心我的身体如何动弹，如何尖叫。但我知道或想象到了，我身上发生了什么。

我记得那个下士用他钉了钉子的靴子踢我，让我起来；这真的发生过，因为第二天，我右侧身体一片淤黑而且破了……我记得自己懒洋洋地对他微笑，因为一阵美妙的暖意——或许是性欲——正席卷我的身体：就在那时，他挥起胳膊，全力把他的鞭子抽向我的鼠蹊部。这让我痛弯了身子，我尖叫，或者应该是说，我无力地试图尖叫，但只是张着嘴发抖。有人感到有趣而咯咯笑起来。一个声音叫道，“可恶，你已经把他弄死了”。又一鞭跟了上来。一阵号叫，我的眼前发黑：在我体内，生命的内核似乎慢慢穿过撕碎的神经，被这最后一下无法形容的疼痛从体内驱逐出来。<sup>[16]</sup>

在虚构和自传两种描述中，最令人颤栗、听起来最真实的印象之一就是，从地板上这血淋淋、半昏迷的废人的视角来看，屋子里的其他男子似乎在用一种随意的、普通军营的男性方式互动，他们一起角力，一起大笑，轮流着来。或者，他们也在相互攻击、相互谋杀？似乎无法作出这种区分。当然，对劳伦斯而言，土耳其人在种族上、文化上的异域感（相对“他的”阿拉伯人以及相对他自己而言）似乎象征着他作为男人在掌握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地图上的无能为力。首先，他脱离了与英国人之间十分强

---

[16] 劳伦斯，《智慧七柱》，第5页。

## 男人之间

烈但明显不实在的纽带，去建立与阿拉伯男人之间的纽带，由于政治原因，后者拥有大得多的幻想空间和神秘空间，因此也有更大的空间容纳意志的虚幻魅力。<sup>[17]</sup>《智慧七柱》中许多段落都被用来描绘阿拉伯文化中这种怪异的，但对他来说具有吸引力的男性同性社会性的布局。劳伦斯（傲慢地）描写了他与某位阿拉伯男孩之间的纽带，认为这一纽带是他效忠阿拉伯种族命运的动机：

我爱你，所以我把这些男人汇成的潮流放进我的  
手中并用繁星在天空写下我的意愿  
要为你赢得自由，那七根柱子撑起的宝贵屋宇，  
以使你的眼睛为我闪耀  
当我们到来的时候。<sup>[18]</sup>

同时，他没有意识到，那种假性的相互关系——它让他得以以英国人的身分来操纵那些部落头领的骄傲与感情——有多么脆弱。在为一家对外办公室简报写的关于“如何对付西贾兹阿拉伯人”的《二十七篇文章》中，他建议道，

赢取并保持你的[阿拉伯]领袖的信任。如果可能，在他人面前以你自己为代价来增强他的声望。永远不要拒绝或取消他可能会提出的各项计划。……总是对它们表示赞同，而且在赞扬之后不动声色地修正它们，让他自己来提出这些建议，直到它们符合你自己的意见。当你做到这一点时，把他与之绑在一起，牢牢抓住他的想法，并

---

[17] 关于这一点，参见迈克(Mack)，《我们的失序的王子：T. E. 劳伦斯生平》(*A Prince of Our Disorder: A Life of T. E. Lawrence*)，第216—25页；亦请参见萨义德(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第240—43页。

[18] 劳伦斯，《智慧七柱》，第444—445页。



且尽可能有力地，但又是秘密地，怂恿他，以便除他之外没有人（他自己可能也不是很清楚）察觉到你施加的压力。<sup>〔19〕</sup>

这个做法的代价是，以异常僵硬的方式不停调动英国人的意志，劳伦斯对此很清楚。

对阿拉伯人的秘密控制以对他们做无休止的研究为起始，为终结。永远保持警惕；永远不要吐出未经思考的话，或做不必要的事情；随时留意你自己和你的同伴：聆听经过的一切，弄清表面之下是怎么回事，解析他们的特点，发现他们的爱好和弱点，把你发现的每件事对自己之外的所有人保密。让自己投入阿拉伯人的圈子里，除了手头工作之外，对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要产生兴趣、想法，好让你的大脑只沉浸在一件事里，而且，你对自己的角色要有足够深的理解，不会让小小的失误毁掉无数星期的工作。你的成功将与你为之投入的脑力成正比。<sup>〔20〕</sup>

即使在吐露这样的精神约束带来的压力和脆弱感时，劳伦斯对此还是充满热爱：这是他选择的爱欲。在德拉发生的强奸打破了这个危险的、贾斯伯似的、剥削性质的平衡。“我的完整性的堡垒，”他写道，“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sup>〔21〕</sup>强奸带来的创伤从来都不简单。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激烈冲突的划分男性纽带、性欲和征服的疆域的方式，对劳伦斯来说，毫无准备地、因而是无法控制地与这种方式相遇，使他此前那种代价昂贵、令人兴奋的沉着姿态的自我矛盾之处暴露无遗。“我在德拉失去了勇气，”他写道。

---

〔19〕 引用于迈克，《我们的失序的王子》，第464页。

〔20〕 引用于迈克，《我们的失序的王子》，第467页。

〔21〕 劳伦斯，《智慧七柱》，第447页。

## 男人之间

就像身处克洛伊斯特海姆那些自命不凡的居民中的皮肤黝黑的贾斯伯一样，身处阿拉伯人群中的金发劳伦斯展现了《乡村太太》中霍纳的故事：在种族和国家文化——而不是性别——的领域，他们都试图建立表面上的“雌雄同体”的立场或中庸立场，同时又假装平等地具备两个均衡对立的人群的特征，而实际上却为了个人利益操纵着他们地位的不对称。在吉普林(Kipling)的《基姆》(Kim)中的小主人公——他的名字做了小说标题——身上，英国帝国主义层面上的这种操纵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礼赞。

尽管他晒得像任何一个土人那么黑；尽管他偏好讲当地土话，而且母语说得就像含混不清的拙劣歌唱；尽管他以完全平等的条件与集市上的小男孩们结交；基姆还是个白人。<sup>[22]</sup>

基姆身上混合了印度街头顽童的精华和英式教育，他的半土半洋使他成为“那个大较量”——为保护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而进行的间谍较量——中的理想间谍。因此，毫不奇怪地，那场让基姆建立起自己作为这场较量最好人选地位的考验，正是他抗拒被一名印度男子催眠的那一次。

卢尔根·萨义布把一只手轻轻放到他颈后，揉了两下或三下，一边喃喃低语……

为了救自己的命，基姆本来不可能转过头来。那轻轻的触碰就像用老虎钳把他定住了一样……随着卢尔根·萨义布手的移动，另一阵刺痛的灼烧感像波浪一样顺着脖子往下走。

……到这一刻为止，基姆一直在用印地语思考，但他被一阵颤抖席卷，就像在鲨鱼群中奋力使自己上半身跃出水面的泳者一样，他的

---

[22] 吉普林，《基姆》，第1页。

头脑从吞噬它的黑暗中跳出，并找到了庇护所——那就是英文的九九乘法表！<sup>[23]</sup>

当他的英文九九乘法表和他英国人的意志力让他得以击败催眠之后，

“那个魔力更大吗？”基姆满心疑虑地问[卢尔根·萨义布]。刺痛感已经完全从他的血管中消失了；他感到格外清醒。

“不，那不是魔法。这只不过是去看看珠宝里是否有——瑕疵。有时候，绝好的珠宝也会散落成碎片——如果一个人把它们拿在手里，而且知道正确的方法的话。”<sup>[24]</sup>

如果说基姆能够在种族和国家的意义上展现出霍纳的帝国主义式的假性“雌雄同体”的话，那么，以性别角度来看，他的故事具有什么意义？基姆事实上还是个孩子。对他而言，对男性同性社会性地图的探索，就像他的其他众多探索一样，还是件让人兴奋的快乐之事。他还太小，没有人指望他会利用对女性的欲望来疏导他对年纪比他大的男子的激情。此外，小说的海外场景——更不用说里面类军队的、类耶稣会的、类体育运动的间谍内容——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对整个女性问题都不予考虑。从性别方面看，基姆的印度正是劳伦斯那武士式的阿拉伯虚幻地承诺要成为的世界：这是一种预科学校或公立劳教学校，是个男性世界，在这里，男人们可以相对安全地探索同性社会性的重要地带。这里也有局限，但在这些想象出来的臣服地带——某种程度上如同在真实地带里——恐同造成的裂痕还不是最显著的地理特点。

然而，在英国恐同实体化(hypostatization)的这个高级阶段，这方面的禁令对“国外”要求相对较松，这必须通过拼命强调“国外”与“国内”之

---

[23] 吉普林，《基姆》，第218页。

[24] 吉普林，《基姆》，第219页。

间存在不可沟通的鸿沟来加以平衡。就像贾斯伯一样，与“索戴蒂克区”有关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在一个圈起来的地理空间之内有某种程度的自我放任，但只能在一个(不可能的)前提下：那个空间必须远离主动的、具有重要意义自我构成过程的空间。

《爱德温·德鲁德之谜》的轨迹，如果我们能够重现的话，在涉及这个自我矛盾的两难境地时也具有双重性和自我矛盾的一面。一方面，这部小说在许多方面都默认了有关英国特质、有关文化和种族，或者单纯有关“心理”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把贾斯伯的体验与小说中那些健康的金发人物的体验隔绝开来。例如，在小说现存部分的后面，对为什么罗莎觉得贾斯伯的罪行如此令人迷惑的问题给予了解释：

她对犯罪智力能有何理解——连它自称的学生都总是误读了它，因为他们坚持想要将它等同于普通人的普通智力，而不是把它另外视为可怕的奇迹。(第20章)

另一方面，《德鲁德》具有类似哥特式小说的结构，开头的时候总出现彼此独立的几组偏执的双重性因子，这些双重因子是在男性恐同的投射性压力下形成的，然后，小说开始叙述，展现这种代价巨大、看似稳定的格局如何随着男性恐同下的政治矛盾和心理矛盾日益喧嚣而最终解体。小说的这条轨迹似乎旨在深刻批评英国文化中男性特质或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那种看似不可能却又有强迫性的自我欺骗。当爱德温·德鲁德的谋杀者贾斯伯终于相信这个男孩真的死了的那一刻，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现在发誓，并在这一页中记下这个誓言：我永远不会与任何人谈论这个秘密，直到我手中握有揭开它的线索。我永远不会放松我的秘密或我的追寻。我要抓住谋害了我亲爱的死去的男孩的杀人凶

手。而且我要致力于将他毁灭。（第 16 章）

这里出现的对俄狄浦斯故事的呼应让读者以为，会出现对腐蚀剂最有力、最普遍的利用，这些腐蚀剂显然注定会蚀去贾斯伯对男性的欲望的种种僵硬、不自然的区格。支撑着贾斯伯情感生活的各个部分布满了渗漏点；它们从一开始就被破坏了。墓地里的腐蚀性石灰就像高烧一样，

从沉思的孩子身上  
烧光了  
各自的美丽<sup>[25]</sup>

让爱德温个性中的个人特征荡然无存——只剩下无名的、继承的、“铆接的”、永远延续着男性暴力的金戒指；这正像是奥利克在石灰窖试图要对皮普所做的那样，或是乔治·莱德伏特在石灰屋坑想对约翰·哈蒙做的那样。<sup>[26]</sup>

那么，《爱德温·德鲁德》中的一个倾向就是对男性欲望的组织进行一种去个人化的、具有相对普遍性的哥特式批判——这种批判清除了异域场所与国内场所之间，以及纽带与快感之间的人为区分。如果说它摧毁了贾斯伯与他所“爱”的男人及女人的关系那僵硬、脆弱的结构，那么，面对克利斯巴克例子中极为和谐的结构，它是否可以停住脚步？

它可以。实际上，正如我们在整个对哥特式小说的讨论中看到的，在

---

[25] W. H. 奥登 (W. H. Auden), 《摇篮曲》(Lullaby), 收于《短诗集, 1927—1957》(Collected Shorter Poems 1927—1957) (纽约: 兰登书屋, 1964), 第 107 页。

[26] 狄更斯, 《我们共同的朋友》, 第 2 卷, 第 13 章。当然, 我要强调, 此处一再出现的“石灰”主题指向了这些纽带的压抑的、与肛门有关的方面。20 世纪小说中, V. S. 奈普尔 (V. S. Naipaul) 充满怨毒的作品《游击队》(Guerrillas) 对我这里描述的《德鲁德》做了惊人的字面式的呈现; 这部小说中, (一名黑人对一名白人的) 肛交/强奸以及石灰坑等主题更为直接, 但奇怪的是, 它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 恐同、厌女和种族歧视都被用于证明彼此的正当性——与狄更斯的一面很接近。

## 男人之间

恐同世俗化之后,男性纽带的组织和可操纵性正是依靠一种显而易见的随意性——随意地将“好”或“坏”的名字分贴到不同的同性社会性纽带关系上去。以一种狭隘的、心理化了的眼光来看,完全可以把《爱德温·德鲁德》称为是一部关于一名反常男子的同性恋恐惧症的小说。种族分界线的不规则边缘穿过小说的情节和场景,促使整个景象以粗线条的方式分成两半。如果将这景象放大,可能会显示出,它将一名肤色黝黑的男子那深受困惑的恐同心理与一名金发男人备受保护的恐同心理放到了一起。从一个假想的男性读者的视角,会再次看到某种不同的东西:那种紧抱,那个去个人化了的铁圈——它是对男性同性社会性两难境地的暴烈而茫然的回应——被再次延续下去。

## 结语 走近 20 世纪：惠特曼的英国读者

我们的旅程已经深入——  
我们的双脚几乎来到  
存在之路那古怪的岔口——

——狄金森(Dickinson)<sup>[1]</sup>

我们上面做的最后几个文本阅读将我们放到英国历史上这样一个时刻：这一时刻之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地图马上就要变得完全能为 20 世纪的眼光所理解。到 20 世纪头十年，男性同性社会性谱系上敞开的、无法逾越的恐同鸿沟看上去已经像是这张谱系图的永恒特征。当《纪念》(*In Memoriam*)这样的作品在 1850 年出现的时候，它与这个艰难的领域之间的关系就已经问题重重了；这样的作品其实要到 1910 年才能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写出来。

长久以来，人们都认为，恐同在男性同性社会性谱系中造成的裂缝是以最细微的差异为基础的——这一点在偏执狂哥特式小说中就已经被清楚提出。但实际上，这一点受到了更为恶意的强调。更糟糕的是，正如我们在第 5 章讨论过的：它对那些被它置于每一种控制形式之下的男人们

---

[1] 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诗全集》(*The Complete Poems*),托马斯·约翰逊(Thomas Johnson)编(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60),第 303 页。

产生了更阴险、更具破坏性的作用。男人们的这个两难境地的深层结构，即这个以最细微的、无法决定的区分为基础的极深裂缝，在 20 世纪持续存在着，而且加深了。对同性恋的恐惧不只限于中产阶级的盎格鲁美国男性（姑且先把他们中的同性恋者排除），而且也是他们处理政治和权力——当然，这一切与妇女问题相关——的主要依据。<sup>〔2〕</sup>

以最细微差异来进行区分的原则极为有效，但与此同时，比从前更为确实的是，在 20 世纪，那些或多或少被牢牢放到同性社会性谱系受禁忌那一端的男性，也已经被这禁忌更有力地联合起来了，并且已经有效地着手宣扬并创造一种差异——一种超越了禁忌的差异。因此，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对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整个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只能让位于对我们所了解的男性同性恋和恐同问题的讨论。

这后一个讨论已经充分展开；<sup>〔3〕</sup>这并不是本书的议题。然而，我想在此简单地描绘一下，上面四章概括论述的维多利亚中期同性社会性能量，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压抑和解放的发动机之间，主要的意识形态驱动机制大约是什么。我选择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作为一个代表人物，用他来代表向我们这个已经成型的同性恋/恐同世界的演变历程——这个惠特曼不是在美国写作的那个惠特曼，而是英格兰读者读到的那个惠特曼。

惠特曼声名狼籍，他的个性散发着浓烈的羞怯与狡黠的气息，这种个性在半隐藏状态下最具表达力。实际上，在惠特曼的自我呈现中，对不幸的精明玩味极为微妙、具有活力，以致于这种玩味本身——甚至超过了所

---

〔2〕 参见鄂伦莱希，《男人的心：美国梦和对承诺的逃避》，第 2 章；也请参见霍克，《白人英雄，黑人野兽：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男性特质的面具》和费恩巴赫，《螺旋之路：同性恋对人类生存的贡献》。

〔3〕 参见，比如说，威克斯和罗伯萨姆，《社会主义与新生活：爱德华·卡彭特和哈弗洛克·葛理士的个人政治和性政治》；威克斯，《现身》（*Coming Out*）；德米利欧（D'Emilio），《性政治，性群体：美国同性恋少数族群的形成，1940—1970》（*Sexual Politics, Sexual Communities: The Making of a Homosexual Mino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70*）。



隐藏或暴露的本质——制造了一种情欲的表象，“高潮激荡着低潮，低潮激荡着高潮”。〔4〕在这里的解读中，主题不是惠特曼本身，而是对他的言不尽意在意识形态上的利用；在这里，惠特曼不是作为诗人，而是作为英国性政治史上深具磁力的人物出现。

在惠特曼与贺拉斯·特罗贝尔(Horace Traubel)——他是他在开姆顿(Camden)最后那些年里的鲍斯维尔(Boswell)——之间喜剧式的晚期关系中，年龄造成的衰弱提供了一种奢华，使他可以坦白地、不计后果地尽情表达——“多么甜蜜的床——亲爱的床！当一个家伙年老体衰的时候，床给了他一种自由”，这也给尽情享受有关性秘密的猫捉老鼠游戏提供了一个借口：“你到时候就会听到——并非今晚。那只猫有太长的尾巴要松开，而夜已到了尽头。”每一次真相的揭露都成了年轻人与老人之间的一种调情。例如，当惠特曼向特罗贝尔出示了一封来自艾伦·特瑞(Ellen Terry)的信之后，“他用古怪的眼神看着我：‘你看起来一副饥渴样：我觉得你想要这封信。好——把它拿去。你似乎是在有意做出那副饥渴的样子：这是一种丑角式的卖弄风情。’”〔5〕

的确，一种无害的、笼统的“丑角式的卖弄风情”是那些年开姆顿圈子里的主要调子。惠特曼对肉体同性恋最直接的论述记载就来源于这个环境——来源于它，但同时似乎也破坏或背叛了它。一位英国崇拜者约翰·爱丁顿·赛门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不是一次而是多次给他写信，询问“‘卡拉姆斯’(Calamus)究竟是什么意思，以及在他对同志关系(comradeship)信条的鼓吹中，他是否充分考虑过男子之爱(manly love)与身体有关的各个方面。”〔6〕收到这些来信时，“我的第一本能……就是激烈地逆反——就是强烈、野蛮地说不、不、不，”——在开姆顿，惠特曼这样告诉

〔4〕 惠特曼，《草叶集》(*Leaves of Grass*)1855年版，第119页。

〔5〕 特罗贝尔，《与沃尔特·惠特曼在开姆顿》(*With Walt Whitman in Camden*)，第1卷，第415页；第2卷，第360页；第1卷，第5页。

〔6〕 舒勒(Schueller)和皮特斯(Peters)编，《约翰·爱丁顿·赛门兹通信集》(*The Letters of John Addington Symonds*)，第3卷，第485页。

特罗贝尔。<sup>[7]</sup>在长达 19 年的通信中玩味赛门兹的关注之后，野蛮的“不、不、不”实际上成了他最终给出的著名回应：

卡拉姆斯组诗甚至使得我提到过的这种想法成为可能，这实在是可怕——我只能希望这些篇章本身不要因为如此不必要的，而且当时完全想象不到的病态推测之可能性而被提及——我不承认这些推测，它们讨厌之极。<sup>[8]</sup>

对此赛门兹十分温驯地回答道——“如此清楚、精确地知晓你对我提出的问题的感想，让我得到很大安慰”——但实际上他对此并不满意，并在给特罗贝尔的信中乐观地写道，“我认为他并不完全明白我想问的是什么”。在惠特曼向特罗贝尔吐露了有关这段持续几十年的问询的一切情况之后，对于这个惠特曼并没有完全理解问题方向的说法，特罗贝尔不论如何一定是被逗乐了。赛门兹自己似乎最终有保留地默默接受了惠特曼的回应。在给爱德华·卡彭特的信中提到此事时，他引用了惠特曼的信及信后附言（“尽管未婚，我却已经有了六个孩子”），温和地评论道，“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附言时，我意识到 W. W. [惠特曼]想要通过强调他的父亲身分来消除关于他的这种‘该死的推测’”。<sup>[9]</sup>近年来的一些传记作者也这样认为。惠特曼对这段持久的问询的极度欣赏（“有谁不会爱上写出这样一封信的人？”）<sup>[10]</sup>似乎更多地展现了他的复杂情欲，而不是他的“激烈逆

---

[7] 特罗贝尔，《与沃尔特·惠特曼在开姆顿》，第 1 卷，第 76 页。

[8] 米勒( Miller)，《沃尔特·惠特曼通信集》(Walt Whitman, Correspondence)，第 5 卷，第 72—73 页。在他的重要文集《美国同性恋史》(Gay American History)中，乔纳森·卡茨(Jonathan Katz)把惠特曼、赛门兹和爱德华·卡彭特的相关资料汇编起来，将这些通信以最佳方式综合呈现。

[9] 赛门兹，《约翰·爱丁顿·赛门兹通信集》，第 3 卷，第 492 页；第 3 卷，第 553 页；第 3 卷，第 819 页。亦请参看赛门兹，《沃尔特·惠特曼研究》(A Study of Walt Whitman)，第 76 页，以及赛门兹和葛理士，《性倒错》(Sexual Inversion)，第 19—22 页。

[10] 特罗贝尔，《与沃尔特·惠特曼在开姆顿》，第 1 卷，第 204 页。

反的”最后回应。

当赛门兹发出问询的时候，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历史轮廓正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对惠特曼的不同解读就处于这种变化的围绕之下。在 19 世纪末叶，对于男性同性恋那被证明是持久的、基础广泛的盎格鲁美国式定义的成型，惠特曼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且具有决定性，但几乎可以说，这完全不是——在它的最终效应上——他原本会期望的。即使我们只把他最后那个野蛮的“不”当成一种典型的、言不由衷的自我保护（“我的天性里有某种老母鸡似的鬼祟！”），<sup>[11]</sup>并姑且认为“卡拉姆斯”组诗和“黏性”（adhesiveness）这个中心概念在定义男性同性社会性纽带的时候，有意包含了明显与性有关的东西，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即使假设赛门兹“有意暗示的东西”是性行为（这也是惠特曼在他诗歌中有意暗示的），然而，跨越大西洋后产生的文化偏差意味着，这位仿佛来自宇宙的（Kosmic）美国人送来的性意识形态包裹与这位见过世面的英国人打开的包裹有着很大的区别。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这两种视野之下的假设阶级环境（性意识形态在其中被审视）以及女性——包括“女性特质”及实际中的女性——的位置。

正是这些差异使惠特曼适合成为英国 19 世纪性政治的先知（远比在美国更适合）。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英美的阶级理念之间在概念上的不对应——这种不对应会产生某种结果。英国体系——它的上层仍然围绕着一个日益不相关的“零度”贵族传承、贵族特权和贵族文化来组织——根据文化上和象征上的感知而被有效地详加描述，这不仅仅发生在性领域里，尽管这越来越不能有效描述具体权力和利益的真实线条。惠特曼从一个没有封建史的社会对英国读者发言，那个社会最直观的社会分化更多样化，也更具二元性：乡村/城市，北方/南方，东部/西部，文化/原始，土著/移民，白人/黑人。即便是男女（male/female）的区分，似乎也充

---

[11] 卡彭特，《我的日子与梦想：自传笔记》（*My Days and Dreams: Being Autographical Notes*），第 42—43 页。

满焦虑、极度二元化的社会范畴图景那里沾染了一种额外的粗陋。从美国到英国的翻译不够精确,但具有回响,这使得惠特曼作为一个人物得以体现矛盾的并且深具诱惑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是不大可能综合出现在一个英国人身上的。他自己是一位“工人阶级”人物,但通过这个翻译过程,他却似乎得以将类似英国同性恋系统——在该系统下,资产阶级男性只与阳刚的工人阶级青年发生性接触——的东西付诸实践,并将其神圣化。(约翰·爱丁顿·赛门兹对彼得·道伊尔[Peter Doyle]的故事十分着迷。)当然,以英国方式来看,惠特曼的阶级归属十分模糊,这在任何英国人身上都不会发生。而且,对于纲领性(programmatic)政治,惠特曼身上具有——并帮助塑造了——一种很重要的美式的矛盾态度:一方面,它深信平等本身深植于每个社会问题的核心,另一方面,它认为没有什么个体问题或可能的结构改变能真正开始着手解决这个激进理念的中心性。在惠特曼作品中,由此产生的充满意识形态的无为主义(quietism)反映出非常不同的意象,可以追溯到爱德华·卡彭特、赛门兹、王尔德及 D. H. 劳伦斯等人——他们的政治图景更多地是通过媒介传递的。

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草叶集》中那令人陶醉的、特别的生命力抗拒着翻译,并同样坚持着要获得翻译。例如,手淫与同性恋之间前前后后的游移,<sup>[12]</sup>或是将读者个人卷入与说话者之间的控制戏码时的柔顺与快捷<sup>[13]</sup>,这些都使得往身体层面——系统层面则较不明显——的转移必然是一种扭曲,以及,很奇怪地,成为对原作的去性化(desexualization)。惠特曼早期诗歌和传记坚持强调将阳物兴奋具体化(incarnating)——他的勃起,他永远红润的皮肤,他把生命和健康注入死亡和伤口的场景——这

---

[12] 关于这一点,参见其他人的作品,例如,收于博依斯和斯戴纳编的《同性恋:亵渎、眼界、政治》(《杂谈》[*Salmagundi*]杂志 1982 秋—1983 冬专号)中凯文·碧丁特(Calvin Bedient)的文章《惠特曼:被否决》(“Whitman: Overruled”)(见第 326—36 页)。

[13] 关于这一点,参见塞维奇(Savitch),《惠特曼之谜》(“Whitman’s Mystery”)。

种强调至少起到了一种双重作用。简言之,与其说他拥有阳物,不如说他上演(enact)了一个。虽然这种姿态一开始似乎是在邀请进行一种天真快乐的、抬高男性的阳物崇拜,但它更深的魅力在于这样一个戏码,一个由羞耻、隐藏和展示(exhibition);由充血(这与羞耻有关)和空缺;由充满夸耀的缺失;由像一个女人——因为上演阳物而不是拥有阳物(在这个体系之下)是一种女性的情形;由总是要么什么都是,要么什么都不是,而且面对这样的情形还声称拥有完全的人类人格和欲望这样一种可笑的虚张声势,所构成的戏码(这部诗作或许可以称为《缺席之叶集》[*Leaves of Absence*]?)。D. H. 劳伦斯在性格和情感上与惠特曼相距十万八千里,可能从他那儿学到了这出戏码,但对它颇为痛恨;对它纯粹的绚丽作出反应的其他人(卡彭特,赛门兹,或许也包括王尔德),不得不更加地压抑它——在惠特曼自己提供的巨大帮助下——这样才能描绘出他们为之做出反应的东西。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当把这个关于易变绝对(labile absolutes)的戏码用同一水平层面上的社会语汇翻译出来的时候,这个翻译如何招致了几乎任何方式的建构——只要它的中心问题是男性。更为困难的,是要弄清楚这个戏码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男性同性恋的戏码,或者,它在何种程度上牵涉到了“女性作为女性”的问题(the question of women as women)。这个生机勃勃的障碍本身,即我已经描述过的那种执拗的、表现为展现(show)和讲述(tell)的个人的兴奋,尽管实际上具有潜在的压抑作用,但仍然是惠特曼对女性和同性恋男性——即我们今天所构成的那样——的政治想象的切实影响一部分。

在惊人的程度上,惠特曼对他的英国读者的魔力似乎具有原始的政治意味:《草叶集》的最大特征是,它像一种管道,沟通了男人之间那些在大多数情况下甚为私密或初始的情感。这正是惠特曼希望“卡拉姆斯”组诗在他自己的国家发挥的作用——“这些‘卡拉姆斯’诗歌的特殊意义”:“同志关系(comradeship)是男人对男人怀有的美丽而正常的感情;正是通过热情接受同志关系的发展,未来的美国(我对此要一再重复)才会最

有效地焊接在一起，最终锻造成一个鲜活的联盟。”<sup>[14]</sup>在英格兰，最早出现的《草叶集》版本是被清仓处理的 1855 年版本，它们被一名走街窜巷的小贩带到国外而流传；要追寻这本书每一本的历程，就会感觉像针眼穿透一层层受过教育的社会纤维，拉着男子之爱(manly love)这根连接线，将共同的兴趣连成一个新的整体。赛门兹写道：

我们的沃尔特大师有力量通过亲缘关系似的共同感情把人们凝聚到一起。——我猜想这就是“卡拉姆斯”的意义，这是同志关系准则的精髓。他不仅倡导相互友善的教义，而且本人就是创造这一情感的一种磁力（正如通灵研究人士会说的那样，具有“心灵感应”的能力）。——<sup>[15]</sup>

爱德华·卡彭特称赞惠特曼的诗歌说，“成千上万的人第一次读的时候……就会得到一种新的感悟和一个承接生命力的非凡通道，将他们的活动与精力导入新的方向”。<sup>[16]</sup>惠特曼的照片，被当成礼物的惠特曼书籍，他的手迹的样本，<sup>[17]</sup>关于惠特曼的新闻，充满敬意地提及“惠特曼”（这似乎已被当作辨识同性恋的标志）——这一切都流通在一个认为自己是参照惠特曼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新社区中。

19 世纪英国男性同性恋文化及实践，即惠特曼闯入的图景，似乎已经有了尖锐的阶级分化。正如我们在第 9 章讨论过的，在至少两个世纪或更久的时间里，英国贵族男性以及依附在他们身上的人似乎有一种斯伯鲁斯(Sporus)式的同性恋角色可以利用。（哈弗洛克·葛理士评论说，

---

[14] 赛门兹，《惠特曼研究》，第 72 页。

[15] 赛门兹，《约翰·爱丁顿·赛门兹通信集》，第 3 卷，第 543 页。

[16] 卡彭特，《惠特曼的一些朋友：性心理学研究》(Some Friends of Walt Whitman: A Study in Sex Psychology)，第 16 页。

[17] 参见格罗斯克斯(Grosskurth)，《约翰·爱丁顿·赛门兹传》(John Addington Symonds: A Bibliography)，第 120 页。

“国王们似乎尤其具有同性恋的偏好”。<sup>〔18〕</sup>从某些方面看，它是个女性化的角色；固有的成见认为，男性之间的性关系会减弱感觉上的男性特质，而不是加倍增强它。但这种女性化发生于一个不以才能美德为标准的政治环境里，在该环境下，贵族个人的权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由个人风格决定，而取决于他所拥有的物权或继承权，而且，在这个环境下（一定程度上因为那个缘故），“男性”特征（“masculine” traits）与“女性”特征（“feminine” traits）之间的相互排他性，与它对于 19 世纪资产阶级的重要性相比，总的来说没有那么受到强调，没有那么绝对，没有那么强的政治意义。例如，在赛门兹与蔼理士的《性倒错》中的 27 个男同性恋者案例研究中，有八例明显来自“高等族类”（high bred），他们经济独立，或不从事任何职业；与职业男性或者甚至是从事艺术的男性相比，他们之中把自己描述为具有女性特质或女性化的人的比例要高得多。例如，其中一人“认为自己本应该是个女人，”而另一人“显然在他的穿着、走路姿势、恋爱或使用的装饰、精致物品等方面，都无疑是女性化的。他的身体过度光滑白皙，大腿和臀部浑圆……他的脾气很女性，尤其在虚荣、易怒和小嗜好方面”。<sup>〔19〕</sup>

随着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在人数、可见度和范围上的增加，男性同性社会性纽带的一个新范围出现了，它与男性同性恋的新格局相关连。这个阶级的每个男人都不得不开创一条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道路，这条路名义上是个人主义的，以个人才能为价值取向，而且常常很危险，充满了真正的焦虑。新的具有排他性和强制性的性别角色，给这个没有形状的新阶级赋予了表面上的意识形态独特性；因此，正如我们在第 9 章讨论过的，对各种形式和强度的男性同性社会性纽带进行过探索的年轻男性，试图拒绝把文化上定义的“女性特质”作为一个起结构作用的条件纳入这些纽带。甚至当这个阶级的男性与其他男性建立起公开的性关系时，他

---

〔18〕 赛门兹和蔼理士，《性倒错》，第 17 页。

〔19〕 赛门兹和蔼理士，《性倒错》，第 64、76 页。

们似乎还是认为，只有把女性排除在他们的私密生活之外，才会使他们具有阳刚气，这种想法超过了认为以男性为选择对象会让自己女性化的想法。<sup>[20]</sup> 同性恋贵族男性与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地区（尤其是那些适用宽容的法国民法典[Code Napoleon]的欧洲国家）之间，具有最牢固的文化纽带；与他们不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男性转向古典斯巴达和雅典，以寻求使他们获得阳刚气质的男性纽带典范，在这些典范文化中，男性同性社会性制度（教育、政治导师制、军队中的兄弟关系）与同性恋者之间似乎具有完全连续性，完全把女性世界排除在外。

我们已经讨论过，意识形态是一种在现状中隐藏矛盾或将其合理化的机制；但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所体现的那种不寻常的尖锐而紧迫的矛盾产生了一套性意识形态，它们一方面极为僵硬、极具束缚力，同时又种类繁多，而且充满了明显相互矛盾的叙事。尽管贵族的同性恋模式在维多利亚社会狭窄圈子中的可见度很高，而且在世纪末的时候广为扩散，但是，惠特曼最初的影响力在中产阶级同性恋意识形态内部的辩证法中最容易找到痕迹。惠特曼的两位英国崇拜者赛门兹和爱德华·卡彭特，为惠特曼对那种意识形态的影响指定了不同的方向。这两位中产阶级同性恋男子在牛津、剑桥受过教育，他们都写过关于同性恋、关于惠特曼本人的书。他们各自都认为自己代表并发扬了惠特曼关于男子之爱的观点，使之服务于新的民主理想。然而，他们对惠特曼的使用，在效果上非常不同。

惠特曼认为J. A. 赛门兹不仅“出奇可爱”、非常固执，而且“在某些方面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指征性……和最重要的人”。<sup>[21]</sup> 然而，卡彭特看到的是“赛门兹天性中缺乏稳健和自立”，并总结说，他对同性恋的支持受到

---

[20] 对于英国贵族中那些尚未城市化、尚不具世界性的成员而言，也是如此。在瑟缙斯的《斯班奇先生的投机之旅》(Mr. Sponge's Sporting Tour)中，斯凯姆戴尔爵士与“他的‘特殊朋友’”杰克·斯普拉根之间的纽带也可以看成是这样的关系。

[21] 赛门兹和葛理士，《性倒错》，第xiii页。



了“摇摆和怯懦”的损害。<sup>[22]</sup> 但是，赛门兹对同性恋的支持上的局限正是他对他的时代和阶级所具有的指征性的一部分。在我已经勾勒出的资产阶级同性恋谱系上，赛门兹的文化身分和政治身分是靠近贵族那一端的；实际上，在《性倒错》中，他自己的（匿名）案例史正是上面提到的八个中的一个，而我仅仅只靠参照案例描述本身，就将这八个案例与其他贵族的案例归为一类（他自称“经济独立”）。从描述看来（“仅仅在他对体育的冷淡方面才显得不够男性化，……在穿着或习惯上从不女性化”），在这八个人中，他远不是最女性化的。<sup>[23]</sup> 赛门兹糟糕的健康——他的肺病使英格兰成了对他来说致命的环境——迫使他无所事事，周游世界，他的资助来源于家族的钱和关系，而伴随着他的闲暇与世界主义的，是他在写作上旺盛的专业精神。他不是作为业余作者或仅仅是鉴赏者来进行写作，而是作为一名高产、有素养的记者来写作，就好像他家的生计要依靠他挣的钱一样。（幸运的是，情况并非如此。）<sup>[24]</sup>

一种独特的性—政治叙事从赛门兹所处的中产阶级上层门槛的模糊位置出现了。他喜欢用来源于骑士传统的语汇来描述“卡拉姆斯”之爱潜在的政治效应，但同时又诉诸希腊人那种阳刚的权威。面对惠特曼，他将它形容为“同志关系的多利安式骑士风范”。<sup>[25]</sup> 他在关于惠特曼的书中，勾勒了这种隐性叙事的面貌：

中世纪骑士制度是封建主义的伟大情感产物。尽管它没有达到它自己的理想，但仍然通过使最原始的男性欲望变得细腻、变得清晰而为现代社会贡献了不可计量的好处。类似地，惠特曼彰显的这种

---

[22] 卡彭特，《惠特曼的一些朋友：性心理学研究》，第 11—12 页。

[23] 赛门兹和葛理士，《性倒错》，第 58 页；赛门兹是第 18 号案例，见第 62 页。

[24] 此外，他似乎认为王尔德的那些贵族同性恋朋友具有夸张、阴柔的气质特征，例如罗登·诺尔（Rodén Noel）；对于这些特征，以及王尔德自己的“病态的、涂脂抹粉”的文艺姿态（见《约翰·爱丁顿·赛门兹通信集》，第 3 卷，第 478 页），他很不喜欢，而且很不信任。

[25] 赛门兹，《约翰·爱丁顿·赛门兹通信集》，第 3 卷，第 494 页。

## 男人之间

民主骑士风范可能注定会吸收、控制、提升那些更黑暗、更神秘而且看似不正常的欲望——我们知道，这些欲望在人类天性的基础上广为扩散，不可根除。

……问题[是]，男人对男人的爱是否可以通过一种迄今都未被理解的骑士制度变得高尚，成为更高贵的力量，甚至就像男人对女人的野蛮爱恋一度达到的那样。<sup>[26]</sup>

在《新精神》(*The New Spirit*)中，哈弗洛克·葛理士认为惠特曼关于女人地位的观点中存在着一种混乱(“‘男子之爱’，即使以极端的形式出现，也必然是希腊式的，正如总是与之相关联的对妇女的贬低一样；现代对妇女的贬低要轻微得多，然而惠特曼却真诚地为此感到悲哀”)<sup>[27]</sup>当回应这一描述时，赛门兹问葛理士，

我们是否有理由想当然地认为，如果现代社会能够将男子之爱提升到一种新的骑士精神的高度，就会损害世界通过骑士制度对女性的理想想象而获得的一切？<sup>[28]</sup>

赛门兹喜欢将骑士精神作为一种理想，他的这种看法伴随着这样一种意识：“对女人的诬蔑、不诚实、不忠诚一直以来或多或少主导着所谓的上流社会。”<sup>[29]</sup>但是，将封建主义骑士精神作为一种性政治理想的价值仍然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只需通过更广、更狂热的运用就能将它变成真正的民主。

---

[26] 赛门兹，《惠特曼研究》，第84—85页。

[27] 葛理士，《新精神》，第104页。

[28] 赛门兹，《约翰·爱丁顿·赛门兹通信集》，第3卷，第459页。亦请参见第3卷，第448、483页。

[29] 赛门兹，《民主艺术》(“Democratic Art”)，见《假想与建议文集》(*Essays Speculative and Suggestive*)，第245页。

英雄主义从阿基琉斯的帐篷步出；骑士精神从骑士那嶙峋的战马上跃下；忠诚被认为只不过是对于一个王朝的奉献。……这些高贵价值中的任何一个我们都没有丢失。相反，我们发现，它们无所不在。它们被带到触手可及的地方，而不是被放逐到过去的某个幽远角落，或是被视为特权阶级的特殊财产。……对女性和弱者的骑士式的尊敬，对某个原则或理想的忠诚的自我奉献，将男人像兄弟一样绑在一起的同志关系——这一切都是如此。<sup>[30]</sup>

在实践上，这个版本的惠特曼式民主变成了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某种顺从。至少，对他而言，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似乎不仅唾手可得，而且令人愉悦。

我完全体会到沃尔特的感觉。我最好的朋友中有一位马车夫，一位码头装卸工，一位船夫，一位农庄仆人，一位旅馆搬运工。与他们交谈时，我得到了最大的放松和休息。他们的淳朴以及男人式的友爱给我带来那么多好处。他们的真实生活与我在其中度过攻读时光的奇怪的思想世界形成了如此大的反差——意大利文艺复兴、希腊诗人、艺术、哲学、诗歌——这一切都是我文化中的负累。实际上，我从沃尔特那儿最大的收获就是，他彻底开启了我的双眼，让我看到同伴情谊（comradeship），并让我相信男人之间的绝对平等。我这一类的朋友认为我与这个世界的其他人不同。但是，在赢得他们的信任之后，我看到他们是多么珍惜一个社会地位和教育都高过他们的人的兄弟感情。我真的相信，只要富有的、受过教育的人中大部分与我的感受相同，并像我一样去做，那么，社会问题就会找到它们的解

---

[30] 赛门兹，《民主艺术》，见《假想与建议文集》，第 244—45 页。

决办法。<sup>[31]</sup>

赛门兹提到的船夫是安琪罗·弗萨托，他与他有过充满爱的长期友谊。但当赛门兹旅行，到朋友们的住所去时，安琪罗是作为贴身仆人陪他去的——“他是个老农夫，已经跟了我十年了，而且是个很棒的家伙。现在在旅行中，我真的很依赖他”——当我们读到这些时，我们可以想象，赛门兹想象中的理想民主尽管是以贵族义务(*noblesse oblige*)<sup>\*</sup>、个人的田园理想和屈尊附就为基础的，但并没有如他体会的那样，在结构上威胁到阶级体系。(他的传记作者对这次访问评论道，“当面对一名光彩照人的英俊的 33 岁‘老农夫’时，罗斯太太的反应没有被记录下来!”)<sup>[32]</sup>实际上，赛门兹的政治理想与英国资产阶级为了金钱对无产阶级男性及女性的性剥削的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是微小和不确定的。它似乎主要在于对赛门兹在言辞和情欲上的投入作以惠特曼式的润色。

隐含在赛门兹关于“两种骑士精神”的叙事中的妇女观，也比他想象的要保守得多。对活跃于 19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名知识分子而言，把一种自由主义的性政治观点建立在认为妇女的最大问题就是她们死抱住在之前的封建主义下获得的利益这样一个假设之上，表明了他对同时代关于性别问题的对话的那一部分极度缺乏兴趣。类似地，他似乎完全没有看到，为本关于性倒错的书所做的研究如果既包括女人也包括男人，会更有好处，<sup>[33]</sup>虽然在他的熟人中至少包括一对很有名的、关系持久的女同性恋。他用惠特曼的诗句“我对我爱的女人的爱多么古老”(《坚贞不渝的永恒的爱啊!》(Fast Anchored Eternal O Love!))来为惠特曼“对女

---

[31] 赛门兹，《约翰·爱丁顿·赛门兹通信集》，第 3 卷，第 825 页。

\* 请参见第 7 章中对“*noblesse oblige*”的译注。——译者注

[32] 格罗斯克斯，《约翰·爱丁顿·赛门兹传》，第 271 页。

[33] 格罗斯克斯，《约翰·爱丁顿·赛门兹传》，第 290 页。

性的尊敬”辩护。<sup>[34]</sup>但对惠特曼而言，这首诗并不特别具有女性主义意味；相反，它不过是众多诗歌中的一首——在这些诗中，他十分直接地视女人的爱从属于

出身最纯正的人，  
空灵的存在，仅存的强健现实，我的安慰，  
……你的爱，哦，男人，  
哦，我漂泊生活的分享者。<sup>[35]</sup>

赛门兹理想中的“多利安式骑士风范”牢固地立足于维多利亚资产阶级的一种信念，即，女人和男人“天然地”拥有不同的劳动和活动空间。“对于被更早及更普遍接受的[骑士精神的概念]而言，它是补充性的，不带有偏见的。它会涉及不同的能量领域内的不同种类的个人——可用于僧侣们的共同劳动，或军人对职责的自我奉献，这在此取代了家庭保育的用途”。<sup>[36]</sup>他对农夫生活的想象以他与男人们之间实际的情欲纽带为中心，这种想象也被理想化了，成了“那种正确的社会主义”，其描绘方式清楚显示他对自由所做的美妙描述对女性有着多大的偏见：

我在国外这些人中发现了很多那种情感，它的形式具有彻底的男子气，很值得佩服。婚姻被作为一种家庭制度来追求，而这种情感并不影响婚姻，这在需要孩子们做帮手、需要女人们管理家务的男人中间，总是这样。<sup>[37]</sup>

---

[34] 赛门兹，《约翰·爱丁顿·赛门兹通信集》，第3卷，第459页。

[35] 《坚贞不渝的永恒的爱啊！》，这是第三版的版本。

[36] 赛门兹，《约翰·爱丁顿·赛门兹通信集》，第3卷，第799页。

[37] 赛门兹，《约翰·爱丁顿·赛门兹通信集》，第3卷，第808页。

赛门兹没有兴趣把女人作为性伙伴,这似乎使得他不加质疑地接受他的社会圈子有关她们的风格化了的狭隘观点中最保守的部分。如果真有什么的话,他的同性恋热情可能帮他抒发了一些进一步贬低妇女价值的观点。例如,他给《假想与建议文集》(*Essays Speculative and Suggestive*)加的附录指出,客观上考虑,女人没有男人美丽。<sup>[38]</sup>他在信中也以一种劳伦斯式的口吻详述了“吸收精子”“对于健康及神经活力具有的最有益的作用”,尤其是,有个报告还认为,这有益于婚后立即“让女孩子们受益”。<sup>[39]</sup>但总的来说,与境况与他完全相同的任何一位异性恋男性相比,他对厌女(misogyny)的程度并不更高,而可能更低。他在惠特曼作品中看到对男性特质极高的、充满情欲的价值肯定,但对他而言,这种价值肯定批准了将男性领域与女性领域分开——这在他那极度等级化的社会中,是他自己所属的阶级具有压制性的正统做法。

即使在他自己为《性倒错》收集的研究资料中,也有一些例子中的男性将他们的同性恋与对妇女的经济压迫和性压迫的各个方面直接相联系。例如,其中一个男子“感到,他召男妓,而不去召妓女,是做了一件好事”。另一男子认为,“与勾引并毁去妇女名节相比,这显然没那么糟糕”。第三名男子提出:“妇女的经济条件决定了,如果仅仅将她们作为满足性欲的管道使用,是很不公平的;身体上的节制是不可能的,因此,更好的做法是将公开的同志关系(comradeship)的精神向外扩散,同志关系对许多男人和男孩而言,都是很自然的,当身体被燃起激情时,它终将带来相互的性满足。”这些陈述中的任何一条都可能是轻易放的马后炮,而不是对这一主题的严肃思考的记录。第四个例子可能也如此:“关于这个复杂主题的道德问题,我的感觉是,这应该和男女之爱中的道德问题一样——也

---

[38] 赛门兹,《假想与建议文集》,第418—19页;亦请参见《约翰·爱丁顿·赛门兹通信集》,第3卷,第455页。

[39] 赛门兹,《约翰·爱丁顿·赛门兹通信集》,第3卷,第798页;第3卷,第811页。

就是说，一个人的肉体满足不应以另一人的遭罪或被贬低为代价。”<sup>[40]</sup>然而，我们知道，这第四个人不是一个圆滑的卖弄理性的人，而是一位坚定、实际的社会主义者、女性主义者以及惠特曼信徒——他就是爱德华·卡彭特。

卡彭特的出身和训练与赛门兹极为相似，不同的是，他早年身体很糟，在后来获得健康的同时，也终于得以坦然面对他在性方面对男性的偏好。也就在同样这些年头里，他背离了英国国教（他曾被该教任命为牧师），背离了他出身的阶级，背离了剑桥大学，搬到北部，在工业小镇教书，最终成了一名小规模经营的农夫及凉鞋鞋匠，接连与三位情人（还包括前两位的妻子）建立伴侣关系。他与赛门兹在健康和性的自我接受方面存在差别，同时在总的脾气方面也有所不同：赛门兹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我一直是个很不快乐的人”，而卡彭特则好脾气、理智、快乐——这种性格总是鼓舞人心，但可能有化为虚妄之虞。不论如何，赛门兹似乎认为卡彭特的诗歌集《走近民主》（*Towards Democracy*）乐观到让人无法理解，尽管“当然它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传播惠特曼的生命哲学，传播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新宗教的东西”。<sup>[41]</sup>

一个关于卡彭特轻松愉快的心境的例子就是他在 1916 年的自传里是如何处理他与乔治·墨瑞尔（George Merrill）之间类似婚姻的持久关系的。墨瑞尔这个年轻人“在远远低于文明水准的贫民窟长大”，但“有着独一无二的富于感情的、幽默的、知觉敏锐的天性”。<sup>[42]</sup>他们之间的快乐关系以及他们的朋友对这种关系的反对都被坦率地描写出来——不过，那种反对无论如何都不会是恐同情绪。

如果命运女神在往好处指，那么毫无疑问，我的朋友们（除了

---

[40] 赛门兹和葛理士，《性倒错》，第 57、67、49、47 页。

[41] 赛门兹，《约翰·爱丁顿·赛门兹通信集》，第 3 卷，第 712 页；第 3 卷，第 675 页。

[42] 卡彭特，《我的日子与梦想：自传笔记》，第 159—60 页。

极少数之外)在往相反的地方指!当然,我知道乔治对家务事有着天生的才能,而且,极有可能的情况是,他比大多数女人善于管家。但我朋友中的大多数人想法不同。在他们悲观的描绘中,我的小屋四壁挂着蜘蛛网,主人饿着肚子,不被搭理,而他的助手则在别处取乐。他们既不清楚也不理解这件事的真相。而且,他们对这里涉及的道德情形也心存疑惧。一个在酒馆区以及名声不那么好的社交圈中度过他早年大部分时光的年轻人不会给我带来荣誉,而在我接纳他后,这一点会被他自己的谬举证实。这就是他们的判断。<sup>[43]</sup>

然而,或许正是因为他这种活力,甚至是感觉迟钝(这在他的诗中也是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反帝国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等运动而言,卡彭特是位有吸引力的、聪明的、有成效的作家、组织者。悖论的是,他与墨瑞尔之间公开不对等的家庭角色分配,似乎已成为这个现实的、无妄想的、相对没有涉及剥削的关系的一部分,在这个关系中,墨瑞尔代表了与工人阶级的人们之间的一支纽带,但并非唯一的纽带,也不是其他具有政治企图的纽带的代替品。卡彭特对女性的感情中也有一种类似的表面上的悖论。赛门兹对女人的身体“没有确切的恐惧”,而且,他实际上在婚姻内部也是有能力的,而卡彭特对女人在“身体上”感到“真正恶心”,并发现“与任何这种……的人结婚或同居的念头很可怕”。而且,“男人身上的任何女性化成分……都绝对让我厌恶”。<sup>[44]</sup>但同时,带着和对男人一样的兴趣研究女人(在他关于“同基因之爱”的书中)的,却是卡彭特,而不是赛门兹;正是他写出了关于女性工资、女性性选择以及男性之美的真挚诗歌;正是他将对他这种性向的人的压迫和对他选择的阶级的压迫视为是与“两性的

---

[43] 卡彭特,《我的日子与梦想:自传笔记》,第161页。

[44] 赛门兹和蔼理士,《性倒错》,第61、46—47页。



差异”不可分的。<sup>[45]</sup>

即使缺乏一种持续的理论支持或叙事支持，卡彭特的积极女性主义也坚持了下来。他的某些作品中采纳的女性特质概念似乎与赛门兹的没有太大区别，而且与维多利亚时期一种约定俗成的看法相一致，即，女性的“被动”情欲是或者应该是她们的社会关系的体现。<sup>[46]</sup>他对男同性恋的想象方式有时采纳了同样的成见：例如，在《哦，天王星的孩子》（O Child of Uranus）中，他描述道

你寄居在男人外形中的女人灵魂……  
带着男人行动的力量，受苦却决不叹息的骄傲，  
带着女性的敏感，感受生命的最后纤维……

当他描述（男性）天王星人是如何“被两个性别的人爱着”的时候，这个想象中可能具有压迫性的不平衡就变得更清楚了；在一段可能是对基督教的描述，但也可能是对惠特曼或他自己的生活中某些痛苦事件（例如，卡彭特是安·吉尔克莱斯特[Anne Gilchrist]的朋友）的描述中，他写道，

……女人们打破她们雪花石膏的珠宝箱，亲吻你的脚，给它们涂上油膏，并  
祝福孕育了你的子宫，  
而在你的怀中，躺着你的小同伴，

---

[45] 卡彭特，《我的日子与梦想：自传笔记》，第 95 页。但是，谢拉·罗伯萨姆在《爱德华·卡彭特：新生活的预言家》（“Edward Carpenter: Prophet of the New Life”）以及罗伯萨姆和威克斯的《社会主义与新生活：爱德华·卡彭特与哈弗洛克·葛理士的个人政治和性政治》（第 25—138 页）中，都对卡彭特的女性主义表达了某些重要的保留意见。

[46] 参见，比如说，《如男人的女人一般》（“As a Woman of a Man”），《走近民主》，第 157 页。

## 男人之间

与你嘴唇触着嘴唇。<sup>[47]</sup>

但是,尽管他这里语带赞许,他也觉察到,惠特曼式的“普遍的”情欲有时具有惩罚性的偏颇,尤其在它与女性的关系上:“毫无疑问,在我心中,沃尔特·惠特曼首先是位爱着男性(the Male)的人。他的想法总是第一位地、首要地关注着男人(Men),要掩饰这一事实没有任何好处。”<sup>[48]</sup>卡彭特自己对男性投以情欲的关注,时而感伤地看待女性(the Female),而又相对坚定地与实际生活中的妇女的权益努力——他这种能力并不来源于他在情欲或学术上的哪一种信念,而是来源于他借以游移于这些信念之中的分析技巧和谨慎。由于他既是社会主义也是性研究的先锋,他从未将自己的阶级斗争视野局限在(男性的)赚取工资的工作场所,也没有将自己的理想性向(sexuality)视野局限在(资产阶级式的)让女性失去活动力的工作场所。

利用惠特曼的这两位资产阶级读者既有一致又有反差的生活,我们具体地展现了英国性别制度(sex/gender system)的两种真相(truths)。第一个比较概括,即性的意义与社会意义不可分——在英国的例子中,它还与阶级不可分。“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自身的意义是在阶级差别的条件下制造出来的,出于政治原因而被各阶级自身或其他阶级分配给了各个阶级,并根据不同阶级而具有不同功能,不同表现,不同价值,以及不同结果。第二个真相来源于第一个,但更为具体:性偏好,个人风格里分配得到的男性特质或女性特质,以及对妇女福利的实际支持等问题,几乎总被认为——而且的确如此——在深层次上彼此相连,但并不能通过彼此之间正面或负面的联系而得以概括或预言。男同性恋者“自然的”女性特征,他们“自然的”高度阳刚,他们对女性的“自然的”憎恶,他们与女性的“自然的”认同——这个万金油似的矛盾直觉仓库(我们的社会继承了

---

[47] 《走近民主》,第 387 页。

[48] 卡彭特,《惠特曼的一些朋友:性心理学研究》,第 14 页。

它)绝对不能被错认为一种分析工具。对同性恋的考量不仅完全具有历史性,而且具有多样性,对它的描述要与阶级利益问题相联系,而且必须适当地放到传递性别权力和阶级权力的各种具体制度和形式的语境下——只有这样的考量才具有分析价值;但这种考量方式才刚刚开始出现。

在英国作家阶层的手中,惠特曼的性政治最终采用了什么形式? D. H. 劳伦斯关于惠特曼的文章——其早期版本可能受到了卡彭特的影响<sup>[49]</sup>——在对惠特曼对女性特质的傲慢态度以及他对妇女的优生学态度的批评上,超越了卡彭特。然而,就劳伦斯而言,这种女性主义批评服务于一种程度更高的恐女心理(gynophobia)。例如,他不喜欢惠特曼与妓女之间的心意相通。对他而言,一个女人之所以会变成妓女,要么是因为“她醉心于关于阳物的神话”(如果是这样,她应该会得到满足),要么是因为

在她对从事妓业的精神欲望驱使下,她的天性已经变得邪恶。她已经失去了灵魂。她自己对此很清楚。她喜欢使男人们失去他们的灵魂——如果是这样的话,她应该被处死。<sup>[50]</sup>

在惠特曼和卡彭特看来,一个女人可能会因为需要吃饭或因为受制于某人而变成妓女;在劳伦斯自己对世界所做的本能的、充满恐惧的、对经济视而不见的描述中,涉及这个世界每个居民的每件事都围绕着资产阶级性禁忌以及对阳物的崇拜或颠覆打转,对他而言,惠特曼与卡彭特那种更

---

[49] 劳伦斯,《美国文学经典研究》(*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第 167—168、175 页。

[50] 劳伦斯,《象征意义》(*The Symbolic Meaning*),第 264 页;这段话引用于德拉梵内(Delavenay)的著作《D. H. 劳伦斯与爱德华·卡彭特:爱德华时代转折研究》(*D. H. Lawrence and Edward Carpenter: A Study in Edwardian Transition*)——我自己的讨论受到了该作品的启发。

谨慎、更有政治性的认识似乎太平淡了。类似地，他最初对惠特曼的“单纯完美、没有赘饰、没有遮掩的人的自发性”<sup>[51]</sup>的迷醉被一种更强的恐同感觉所取代。随着劳伦斯对他自己的同性恋欲望的态度变得更为排斥、更为抽象，惠特曼对“在以同志之爱为基础的……新民主”中亲近死亡，亲近死亡意象的欢迎，就变得似乎太女性化、太被动、太柔和。他开始认为，“变态们”在试图“最终歪曲阳物意识这个基本意识，歪曲我们用常识就可以最好表达的东西”。<sup>[52]</sup>对于死亡和男人之爱的问题，必须要有一种不那么轻易让步的、更为强健、专横的方法，这也正是对女性的征服的一部分。

在这儿，在这些**没有女人**，只有**战斗和纯思考以及抽象了的工具性**(abstracted instrumentality)的领域里，让男人们获得对彼此的新态度。让他们用新的敬意对待他们的英雄，用新的尊重看待他们的同志：就如生命和死亡一样，很深，很深……而不朽友谊的终极纽带支撑着他们，越过知的边缘进入未知。(粗体部分是我自己作的强调)<sup>[53]</sup>

因此，惠特曼的影响的一个分支就是走向一个用性压抑和性强迫的铁壁来抵御征服的权威主义王国。(这里我可以作如下评论：尽管男同性恋并不以跨历史的方式与针对女性的政治态度相联系，男人施于男人的恐同

---

[51] 劳伦斯，《美国文学经典研究》，第169页。参见卡彭特在《惠特曼的一些朋友：性心理学研究》中对安·吉尔克莱斯特(Anne Gilchrist)的故事的同情观点；参见罗伯萨姆《社会主义与新生活：爱德华·卡彭特与哈弗洛克·葛理士的个人政治和性政治》中(尤其是第96—99页)描述的涉及卡彭特的类似关系。

[52] 劳伦斯，《D. H. 劳伦斯通信集》(*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D. H. Lawrence*)，第2卷，第1049号。

[53] D. H. 劳伦斯，《人民的教育》(*Education of the People*)，《凤凰：D. H. 劳伦斯身后文章》(*Phoenix: 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D. H. Lawrence*)，第664—665页；引用于德拉梵内，《D. H. 劳伦斯与爱德华·卡彭特：爱德华时代转折研究》。

几乎总是伴随着恐女心理和反女性主义。)显然,对惠特曼的这种解读是他作为一个人物所最不愿承认或接受的:只有力量与抽象,而没有情欲。这种充满憎恨的恐同心理对男性同性社会性谱系的重新塑造——这种重塑承认无名之爱,并将它放在中心位置,却只是为了将它驱逐——最能描述 20 世纪那些灾难性的社会群体,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西斯社会,但又不仅此一个。

惠特曼的第四个英国崇拜者,奥斯卡·王尔德,是一个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认出的偶像版本,尽管它实际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劳伦斯版本的一种补充、残留。赛门兹与卡彭特为了“理解”,为了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进步而进行的耐心的学术努力,被王尔德的生活这一出真正的悲喜剧击溃了:当王尔德被定罪的时候,《性倒错》与《同基因之爱》(*Homogenic Love*)都完成了,但在继而发生的恐慌中,它们的出版都被打断、被延后。同时,它们的时代过去了。具有中产阶级取向,但在意识形态上是“民主的”,具有阳刚气,仿古典,理想主义,具有个人风格的男同性恋政治版本——这两个人以偏向不同的方式体现并努力使之公开并合法化的版本——随着这些延长了的公开审判的进行,似乎错过了它制造舆论影响的重要时机。在英格兰,前所未有的,同性恋风格——以及恐同风格——没有以阶级为依据被层化、被细述、被保密,而是像我们在第 5 章看到的那样,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词——这个词就是“奥斯卡·王尔德”。<sup>[54]</sup>

尽管王尔德命运的压抑性那么鲜明、那么令人痛苦,以至于“去升华”(desublimation)对它而言成了个荒诞的代名词,但是,他作为一个指标人物起到的影响把公共意象——既包括恐同,又包括恋同(homophilic)——导入到一个新方向,使性乃至想象都与政治分开。在第 3、4 章中,我们讨论了威克利与斯泰恩如何将机智和“崇性主义”

[54] 关于“王尔德”,请见第 5 章的讨论。

(sexualism)物化成了指涉不稳定的能指,用来指涉贵族特权,这给能够掌控它们的中产阶级男性提供了操控真正政治权力的危险杠杆。王尔德式的同性恋角色充满机智,而且被情欲化了,在这个角色中,同样的特征与“贵族”之间保留了同样的可升华的指涉关系。然而,“贵族”本身具有的参照地位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本身已经被升华、被女性化了,实质上被掏空了。

作为对“王尔德”的部分回应,在本世纪的英美两国,公开的男性同性恋风格与爱德华·卡彭特传统之间,已经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尽管那在世纪之交似乎蓄势待发。持久的、逐渐占据上风的同性恋典型形象与赛门兹很接近——只有当赛门兹与王尔德很相像的时候:即都是鉴赏家,向中产阶级阐释贵族文化的人,和社会主义者——前提是,社会主义只是单纯为了扩大闲适、特权及高级文化的场所。在这个例子中,英国同性恋者的女性化——这与早前的贵族风格相一致——伴随着对真实世界中的女性的政治命运的兴趣丧失。它伴随着对政治斗争整体的兴趣丧失或希望丧失。同性恋男性和其他类似的受压迫群体之间的潜在联盟没有得到培养。为男同性恋者自身权益进行的斗争陷入了长久的搁置,只有在个人(常常还藏在柜中)经历和一个鲜活但沉默的集体文化层面上是例外。在六、七十年代出现同性恋权益运动之前,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的仅仅是这两方面的相互区别:一方面是贵族风格的、可归类于女性化的、“悲剧的”、富有的或非政治的男性同性恋典型,而另一方面则是活跃的、投射性的恐同大众文化,它赖以为基础的男性纽带与那些它既视之为犯罪又赋予其光彩的男性纽带十分相像。这是劳伦斯和“王尔德”的胜利,是无关爱的强迫症和无关政治的情欲:是对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的偏颇解读或分裂解读的交错配列,它压制了进行更具涵括性的阐释的努力。

## 参考文献

- Abelove, Henry. "Freud, Male Homosexuality, and the Americans." In *Sexua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 Ed. Isabel Hull and Sander Gilman. Forthcoming.
- Ackerley, J. R. *My Father and Myself*. London: Bodley Head, 1968.
- Alexander, Boyd. *England's Wealthiest Son: A Study of William Beckford*. London: Centaur, 1962.
- Altman, Dennis. *The Homosexualization of America,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Homosexual*. New York: St. Martin's, 1982.
- Arendt, Hannah.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 Aspiz, Harold. *Walt Whitman and the Body Beautiful*.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0.
- Barrett, Michèle.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London: Verso, 1980.
- Barry, Kathleen. *Female Sexual Slavery*.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79.
- Barthes, Roland. *A Lover's Discourse; Fragments*. Tr. Richard Howar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8.
- Beckford, William. *The Episodes of Vathek*. Rutherford, N. J.: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 *Vathek*. Ed. Roger Lonsdal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Bell, Alan P., Martin S. Weinberg, and Sue Kiefer Hammersmith. *Sexual Preference; Its Development in Men and Wome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
- Birkin, Andrew. *J. M. Barrie and the Lost Boys; The Love Story that Gave Birth to Peter Pan*. New York: Clarkson N. Potter, 1979.

## 男人之间

- Boswell, John. *Christianity, Social Tolerance, and Homosexuality: Gay Peopl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Christian Era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Boyers, Robert, and George Steiner, eds. "Homosexuality: Sacrilege, Vision, Politics." Special issue of *Salmagundi* 58 - 59 (Fall 1982 - Winter 1983).
- Bray, Alan. *Homosexuality in Renaissance England*. London: Gay Men's Press, 1982.
- Breines, Wini, and Linda Gordon. "The New Scholarship on Family Violence." *Signs* 8, no. 3 (Spring 1983), pp. 490 - 531.
- Brown, Norman O. *Life Against Death: 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59; rept. 1970.
- Burton, Richard F. "Terminal Essay." In *A Plain and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 Arabian Nights' Entertainments, Now Entitled The Book of the Thousand Nights and a Night, With Introduction Explanatory Notes o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Moslem Men and a Terminal Essay upon the History of The Nights*. Medina Edition, Vol 10. N. p.; Burton Club, 1886, pp. 63 - 302.
- Carpenter, Edward. *My Days and Dreams: Being Autobiographical Not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16.
- *Towards Democracy*. N. p.; Albert & Charles Boni, 1932.
- *Some Friends of Walt Whitman: A Study in Sex Psychology*. London: British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ex Psychology, n. d.
- Cavell, Stanley. *Must We Mean What We Say: A Book of Essays*. New York: Scribner's, 1969.
- Cavitch, David. "Whitman's Mystery." *Studies in Romanticism* 17, no. 2 (Spring 1978), pp. 105 - 28.
- Chesebro, James W., ed. *Gayspeak: Gay Male and Lesbian Communication*. New York: Pilgrim Press, 1981.
- Chitty, Susan. *The Beast and the Monk: A Life of Charles Kingsley*. New York: Mason-Charter, 1975.
- Chodorow, Nancy. "Mothering, Male Dominance, and Capitalism." In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Ed. Zillah Eisenstei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9, pp. 83 - 106.
- *The Reproduction of Mothering: 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ology of Gen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 Cott, Nancy F. *The Bonds of Womanhood: "Women's Sphere" in New England,*



- 1780 - 183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Cott, Nancy F. and Elizabeth H. Pleck, eds. *A Heritage of Her Own: Toward a New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9.
- Crew, Louie, ed. *The Gay Academic*. Palm Springs, California: ETC Publications, 1978.
- Crompton, Louis. "Gay Genocide: From Leviticus to Hitler." In *The Gay Academic*. Ed. Louie Crew. Palm Springs, Calif.: ETC Publications, 1978, pp. 67 - 91.
- Davis, Earle. *The Flint and the Flame: The Artistry of Charles Dickens*. Columbia,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63.
- Delavenay, Emile. *D. H. Lawrence and Edward Carpenter: A Study in Edwardian Transition*. London: Heinemann, 1971.
-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R. Lane. New York: Viking, 1977.
- D'Emilio, John. *Sexual Politics, Sexual Communities: The Making of a Homosexual Mino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 - 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 Dickens, Charles. *David Copperfield*. Ed. Trevor Blount. Harmondsworth, Sussex: Penguin, 1966.
- *Great Expectations*. Ed. Angus Cald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5.
- *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 Ed. Margaret Cardwe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Nicholas Nickleby*. Ed. Michael Slat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8.
- *Our Mutual Friend*. Ed. Stephen Gill.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1.
- *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 Ed. Robert L. Patte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2.
- Dinnerstein, Dorothy. *The Mermaid and the Minotaur: Sexual Arrangements and Human Malaise*. New York: Harper & Row-Colophon, 1976.
-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Coningsby, or The New Generation*. Hughenden Edition. London: Longmans, Green, 1881.
- Domhoff, G. William. *The Bohemian Grove and Other Retreats: A Study in Ruling-Class Cohesivenes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 Dover, K. J. *Greek Homosexuality*. New York: Random House-Vintage, 1980.
- Driberg, Tom. *Ruling Passions*.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78.

## 男人之间

- du Maurier, George. *Trilby; A Novel*. New York, 1899.
- Dworkin, Andrea. *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Perigee Books, 1981.
- Ehrenreich, Barbara. *The Hearts of Men; American Dreams and the Flight from Commitment*. New York; Anchor-Doubleday, 1983.
- Eisenstein, Zillah, ed. *Capitalist Patriarchy and the Case for Socialist Femin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1979.
- The Radical Future of Liberal Feminism. New York; Longman, 1981.
- Eliot, George. *Adam Bede*. Illustrated Cabinet Edition. 2 vols. Boston; Dana Estes, n. d.
- *Felix Holt, The Radical*. Illustrated Cabinet Edition. 2 vols. Boston; Dana Estes, n. d.
- Ellis, Havelock, *The New Spirit*. New York; The Modern Library, n. d.
- Engel, Monroe. *The Maturity of Dicke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Engels, Friedrich.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 the Light of the Researches of Lewis H. Morg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Eleanor Burke Leacock.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2.
- Fernbach, David. *The Spiral Path; A Gay Contribution to Human Survival*. Alyson Press, 1981.
- Fiedler, Leslie. *Love and 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 Revised ed.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66.
- *The Stranger in Shakespeare*. New York; Stein and Day, 1972.
- Foucault, Michel.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 Tr. Robert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1978.
- Freud, Sigmund.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Sigmund Freud*. Tr. James Strachey.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For Psychoanalysis, 1953-74.
- Frye, Marilyn. *The Politics of Reality; Essays in Feminist Theory*. Trumansburg, N. Y.; The Crossing Press, 1983.
- Gallop, Jane. *The Daughter's Seduction; Feminism and Psychoanalysi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 Gay Left Collective, ed. *Homosexuality; Power and Politics*.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80.
- Gilbert, Sandra, and Susan Gubar,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Gilman, Richard. *Decadence: The Strange Life of an Epithe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9.
- Girard, René. *Deceit, Desire, and the Novel; Self and Other in Literary Structure*. Tr. Yvonne Freccero.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2.
- Girouard, Mark. *The Return to Camelot: Chivalry and the English Gentlem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Godwin, William. *Caleb Williams*. Ed. David McCracke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Gold, Alex, Jr. "It's Only Love: The Politics of Passion in Godwin's *Caleb Williams*." *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19, no. 2 (Summer 1977), pp. 135 - 60.
- Goodman, Paul. *Making Do*. New York: Macmillan, 1963; rept. New American/Signet, 1964.
- Griffin, Susan. *Pornography and Silence: Culture's Revenge Against Natur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1.
- Grosskurth, Phyllis. *Havelock Ellis: A Biography*. New York: Knopf, 1980.
- . *John Addington Symonds: A Biography*. London: Longmans, 1964.
- Halsband, Robert. *Lord Hervey: Eighteenth-century Courti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Hardy, Thomas.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 The Works of Thomas Hardy*. Wessex Edition. 21 vols. London: Macmillan, 1912 - 1914. Vol. V.
- Harry, Joseph, and Man Singh Das, eds. *Homosexuality i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New Delhi: Vikas Publishing House, 1980.
- Heilbrun, Carolyn G. *Toward a Recognition of Androgyny*. New York: Harper & Row-Colophon, 1973.
- Heilbrun, Carolyn G., and Margaret Higonnet, eds.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en in Fiction: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English Institute, 1981*. New series, no. 7.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 Herdt, G. H. *Guardians of the Flutes: Idioms of Masculinity: A Study of Ritualized Homosexual Behavior*. New York: McGraw Hill, 1981.
- Hoch, Paul. *White Hero Black Beast: Racism, Sexism, and the Mask of Masculinity*. London: Pluto, 1979.

男人之间

- Hocquenghem, Guy. *Homosexual Desire*. Tr. Daniella Dangoor. London: Allison & Busby, 1978.
- Hogg, James. *The 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 New York: Norton, 1970.
- House, Humphry. *The Dickens Worl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 Irigaray, Luce. "When the Goods Get Together." In *New French Feminisms*, ed. Elaine Marks and Isabelle de Courtivron. New York: Schocken, 1981, pp. 107 - 11.
- Isherwood, Christopher. *Christopher and His Kind: 1929 - 1939*. New York: Avon-Discus, 1976.
- Jacobus, Mary. "Is There a Woman in This Text?" *New Literary History* 14 (1982 - 83), pp. 117 - 41.
- James, Henry. *Letters to A. C. Benson and August Monod*, ed. E. F. Benson. London: Elkins Mathews & Marrott, 1930.
- Johnson, Edgar. *Charles Dickens; His Tragedy and Triumph*. 2 vol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2.
- Kahn, Coppélia. *Man's Estate; Masculine Identity in Shakespea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Kaplan, Fred. *Dickens and Mesmerism: The Hidden Springs of Fi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Kaplan, Justin. *Walt Whitman: A Lif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0.
- Katz, Jonathan. *A Gay/Lesbian Almanac*. New York: Crowell, 1982.
- Katz, Jonathan. *Gay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76; rept. Avon, 1978.
- Kellogg, Stuart, ed. *Literary Visions of Homosexuality*. 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8, nos. 3 - 4 (Spring-Summer 1983).
- Kelly-Gadol, Joan. "The Social Relation of the Sexes: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Women's History." *Signs* 1, no. 4(1976), pp. 809 - 823.
- Kiely, Robert. *The Romantic Novel in Englan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Killham, John. *Tennyson and "The Princess": Reflections of an Age*.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58.
- Kipling, Rudyard. *Kim*. London: Macmillan, 1908; rept. 1960.
- Klein, Richard. Review of *Homosexualities in French Literature*. *MLN* 95, no. 4 (May 1980), pp. 1070 - 80.

- Knicht, G. Wilson. *The Mutual Flame: On Shakespeare's Sonnets and the Phoenix and the Turtle*. London: Methuen, 1955.
- Krieger, Murray. *A Window to Criticism: Shakespeare's Sonnets and Modern Poe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 Kris, Ernst. *Psychoanalytic Explorations in Art*. London: Allen & Unwin, 1953.
- Kristeva, Julia.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Tr.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 Lakoff, Robin. *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 Langguth, A. J. *Saki: A Life of Hector Hugh Munro*.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1.
- Laplanche, Jean. *Life and Death in Psychoanalysis*. Tr. Jeffrey Mehlma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 Laplanche, Jean, and J.-B. Pontalis. *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lysis*. Tr. Donald Nicholson-Smith. New York: Norton, 1973.
- Lawrence, D. H.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D. H. Lawrence*. Ed. Harry T. Moore. 2 vols. London: Heinemann, 1962.
- *Phoenix: 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D. H. Lawrence*. London: Heinemann, 1936.
- *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Viking, 1923.
- *The Symbolic Meaning*. Arundel: Centaur Press, 1962.
- Lawrence, T. 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A Triumph*.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Doran, 1935.
- Lennon, Florence Becker. *Victoria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 The Life of Lewis Carroll*.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45.
- Lévi-Strauss, Claude.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 Lewis, Wilmarth Sheldon. *Horace Walpole*. Bollingen Series 25 - 9. New York: Pantheon, 1960.
- Lewis, Wyndham. *The Lion and the Fox: The Role of the Hero in the Plays of Shakespeare*. London: Methuen, 1951.
- Macciocchi, Maria-Antonietta. "Female Sexuality in Fascist Ideology." *Feminist Review* 1(1979), pp. 59 - 82.
- Mack, John E. *A Prince of Our Disorder: A Life of T. E. Law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76.
- MacKinnon, Catharine A.. "Feminism, 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An

## 男人之间

- Agenda for Theory." *Signs* 7, no. 3 (Spring 1982), pp. 515 - 44.
- Marcus, Steven. *The Other Victorians: A Study of Sexuality and Pornography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6.
- Martin, Robert K. *The Homosexual Tradition in American Poetry*.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9.
- Marx, Karl.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 Martin Nicolaus. New York: Random House-Vintage, 1973.
- Maturin, Charles Robert. *Melmoth the Wanderer*. Ed. Douglas Gra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 McCarthy, B. Eugene. *William Wycherley: A Biography*.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9.
- McConnell-Ginet, Sally, Ruth Borker, and Nelly Furman, eds. *Women and Language i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1980.
- McKeon, Michael. "The 'Marxism' of Claude Lévi-Strauss."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6(1981), pp. 123 - 50.
- Mieli, Mario. *Homosexuality and Liberation: Elements of a Gay Critique*. London: Gay Men's Press, 1977.
- Miller, D. A. "Discipline in Different Voices: Bureaucracy, Police, Family, and *Bleak House*." *Representations* 1, no. 1(1983), pp. 59 - 89.
- Miller, Jean Baker. *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 Boston: Beacon Press, 1976.
- Miller, J. Hillis. *Charles Dickens: The World of his Novel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 Mitchell, Juliet. *Women's Estate*. New York: Random House-Vintage, 1973.
- Mitchell, Margaret. *Gone With The Wind*. New York: Avon, 1973.
- Miyoshi, Masao. *The Divided Self: A Perspective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Victorian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9.
- Moers, Ellen. *Literary Women*. New York: Doubleday, 1976.
- Moi, Toril. "The Missing Mother: The Oedipal Rivalries of René Girard." *Diacritics* 12, no. 2 (Summer 1982), pp. 21 - 31.
- Morgan, Ted. *Maugham: A 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0.
- Morin, Stephen M., and Ellen M. Garfinkle. "Male Homophobia." In *Gayspeak: Gay Male and Lesbian Communication*. Ed. James W. Chesebro. New York: Pilgrim Press, 1981, pp. 117 - 29.
- Naipaul, V. S. *Guerrilla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5.

- Nichols, Beverley. *Father Fig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72.
- Nelson, Michael. *Nobs and Snobs*. London: Gordon & Cremonesi, 1976.
- O'Barr, William M., and Bowman K. Atkins. "'Women's Language' or 'Powerless Language'?" In *Women and Language i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ed. Sally McConnell-Ginet, Ruth Borker, and Nelly Furmin. New York: Praeger, 1980, pp. 93 - 110.
- Olsen, Frances E. "The Family and the Market: A Study of Ideology and Legal Reform." *Harvard Law Review* 97, no. 7 (May 1983), pp. 1497 - 1578.
- Osborne, Charles. *W. H. Auden: The Life of a Poe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
- Peck, Louis F. *A Life of Matthew G. Lewi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 Pleck, Joseph H. *The Myth of Masculinit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1; rept. 1983.
- Plummer, Kenneth, e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Homosexual*. London: Hutchinson, 1981.
- Praz, Mario. *The Romantic Agony*. Tr. Angus Davids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Punter, David. *The Literature of Terror: A History of Gothic Fiction from 1765 to the Present Day*. London: Longman, 1980.
- Radcliffe, Ann. *The Italian, or the Confessional of the Black Penitents*. Ed. Frederick Garber. From 1797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Ray, Gordon. *The Buried Life: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ackeray's Fiction and His Personal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rept. Folcroft, 1970.
- Rawlins, Jack P. *Thackeray's Novels: A Fiction That Is Tru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 Reiter, Rayna, ed.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 Rich, Adrienne. *On Lies, Secrets, and Silence: Selected Prose 1966 - 1978*. New York: Norton, 1979.
- Rosaldo, Michelle Z., and Louise Lamphere, eds. *Women, Culture, and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Rowbotham, Sheila, and Jeffrey Weeks. *Socialism and the New Life: The Personal and Sexual Politics of Edward Carpenter and Havelock Ellis*. London: Pluto

Press, 1977.

- Rubin, Gayle. "The Traffic in Women; Notes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Sex." In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 Ed. Rayna Reiter.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5, pp. 157 - 210.
- Ryan, Mary P., and Judith R. Walkowitz, eds.. *Sex and Class in Women's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Vintage, 1978; rept. 1979.
- Samois, ed. *Coming to Power: Writing and Graphics on Lesbian S/M*. Boston: Alyson, 1982.
- Sargent, Lydia, ed. *Women and Revolution: A Discussion of 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1.
- Sarotte, Georges-Michel. *Like a Brother, Like a Lover: Male Homosexuality in the American Novel and Theater from Herman Melville to James Baldwin*. Tr. Richard Miller. New York: Doubleday-Anchor, 1978.
- Schwarzbach, F. S. *Dickens and the City*. London: Athlone, 1979.
- Sedgwick, Eve Kosofsky. "The Character in the Veil; Imagery of the Surface in the Gothic Novel." *PMLA* 96, no. 2 (March 1981), pp. 255 - 70.
- *The Coherence of Gothic Conventions*. New York: Arno, 1980.
- "Trace at 46." *Diacritics* 10, no. 1 (March 1980), pp. 3 - 20.
- Shakespeare, William. *Shakespeare's Sonnets*. Ed. and with analytic commentary by Stephen Boot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Shaw, Harry E. *The Forms of Historical Fiction: Sir Walter Scott and His Successo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Shelley, Mary. *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Ed. James Kinsley and M. K. Josep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Snitow, Ann, Christine Stansell, and Sharon Thompson, eds. *Powers of Desir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New Feminist Library, 1983.
- Steiner, George. "The Cleric of Treason." *New Yorker* 56 (December 8, 1980), pp. 158 - 95.
- Sterne, Laurence. *A 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 Ed. Graham Petrie. Hammondsworth: Penguin, 1967.
- Stimpson, Catharine R., and Ethel Spector Person, eds. *Women: Sex and Sex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Stoehr, Taylor. *Dickens: The Dreamer's Sta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
- Stone, Lawrence.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 - 1800*.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
- Surtees, R. S. *Handley Cross, or, Mr. Jorrocks's Hunt*. London: Bradbury, Agnew, n. d.
- *Mr. Sponge's Sporting Tour*. London: Bradbury, Agnew, n. d.
- Symonds, John Addington. *Essays Speculative and Suggestive*. London: Smith, Elder, 1907.
- *The Letters of John Addington Symonds*. Ed. Herbert M. Schueller and Robert L. Peters. 3 vol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A Study of Walt Whitman*. London: Nimmo, 1893.
- Symonds, John Addington, and Havelock Ellis. *Sexual Inversion*. London: Wilson and Macmillan, 1897. Rept. New York: Arno, 1975.
- Tennyson, Alfred, Lord. *The Princess: A Medley*. In *The Poems of Tennyson*, ed. Christopher Ricks. London: Longmans, 1969, pp. 743 - 844.
- Thackeray, William Makepeace. *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 Esq. Written By Himself*. Biographical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1903.
- *The Virginians*. Biographical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1899.
- Tiger, Lionel. *Men In Group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 Todd, Janet. *Women's Friendship in Litera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 Traubel, Horace. *With Walt Whitman in Camden*. Boston: Small, Maynard, 1906.
- Trollope, Anthony. *Works*. New York: Dodd, Mead, 1921 - 29.
- van der Zee, John. *The Greatest Men's Party on Earth; Inside the Bohemian Grov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 Vicinus, Martha. "Sexuality and Power: A Review of Current Work in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Feminist Studies* 8, no. 1 (Spring 1982), pp. 133 - 56.
- Vieth, David M. "The Country Wife: An Anatomy of Masculinity." *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 (1966), pp. 335 - 50.
- Warner, Sylvia Townsend. *T. H. White: A Biography*. London: Jonathan Cape with Chatto & Windus, 1967.
- Weeks, Jeffrey. *Coming Out: Homosexual Politics in Britain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London: Quartet Books, 1977.
- *Sex, Politics, and Society: The Regulation of Sexuality Since 1800*. London:

男人之间

- Longman, 1981.
- Whitehead, Ann. "Sexual Antagonism in Hertfordshire." In *Dependence and Exploitation in Love and Marriage*, ed. Diana Leonard Barker and Sheila Allen. London: Longman, 1976, pp. 169 - 203.
- Whitman, Walt. *Leaves of Grass*. Ed. Malcolm Cowley. Reprint of 1855 edition. New York: Penguin, 1959.
- *Leaves of Grass; A Textual Variorum of the Printed Poems*. Ed. Sculley Bradley, Harold W. Blodgett, Arthur Golden, William White. 3 vol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0.
- *Whitman: The Correspondence*. Ed. Edward Haviland Miller. 6 vol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9.
- Wilde, Oscar.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London, 1891.
- *The Portrait of Mr. W. H.* Ed. Vyvyan Holland. London: Methuen, 1958.
- Wilner, Joshua David. "Music Without Rhythm: Incorporation and Intoxication in the Prose of Baudelaire and De Quincey." Ph. D. diss., Yale University, 1980.
- Wycherley, William. *The Country Wife*. Ed. Thomas H. Fujimura. Regents Restoration Drama Series. Lincoln, Neb.: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 *The Plain Dealer*. Ed. Leo Hughes. Regents Restoration Drama Series. Lincoln, Neb.: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7.
- Zaretsky, Eli. *Capitalism,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New York: Harper-Colophon, 1976.

## 开拓者：塞吉维克、《男人之间》及其他

——纪念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1950—2009）

郭 劼

今年春天，《男人之间》的翻译已经进入修改。三月的一天，Michael Moon 教授在来信中告诉我，“伊芙的健康恶化了，已经行动不便”。但他旋即加上：“她的精神仍然很好。”(Her spirits are still high.)因为这后一句话，我在担心的同时也多少心怀希望，暗暗觉得，这一次伊芙也能平安度过，但同时也急切地希望早点完成中译本《男人之间》，让伊芙看到。2007年在我们之间的通信中，我告诉了她《男人之间》中文版引进的消息，她很高兴；我相信，看到书的出版，她会开心。但不到一个月，从朋友 Michael Snedicker（也是塞吉维克教授的合作者）那里就传来了她去世的消息。24小时之内，维基百科关于她的条目就在她的生日后面加上了卒日。看着“April 12, 2009”几个字，我觉得难以置信。

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的生涯中，“学术”与“(个人)生活”密不可分。一方面，她的作品中充斥着对现实世界具体问题的敏锐捕捉和思考——这不仅包括“大”的问题，比如，意识形态及其机制，妇女的经济地位，社会生活中同性之间的关系，性与社会运作机制之间的关系，等等，也包括对世界、生活、生命的极其细致入微的观察，比如，情感，肉体感觉，个人的欲

望等。从这个角度说,塞吉维克不仅关注学术本身,更在意现实。

另一方面,除了外界的“大世界”之外,她的作品还与她的个人经历有着密切的纠结,特别是在她罹患癌症之后的作品。“性与性别学术译丛”另一位作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出身哲学,而塞吉维克出身文学——她大学毕业于康奈尔,后在耶鲁取得博士学位。在她的六部专著(不包括编著及大量发表于各处的论文)中,前三部——《哥特式套路的一致性》(*The Coherence of Gothic Convention*, 1980)、《男人之间: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Between Me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Male Homosocial Desire*, 1985)、《柜子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Closet*, 1990)——大量依赖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而从第四部作品《倾向》(*Tendencies*, 1993)起,塞吉维克自己开始作为鲜明的形象出现,越来越多地使用第一人称,将“私事”和“私人感受”糅合到“学术”论述中。

与前四部相比,第五部作品《关于爱的对话》(*A Dialogue on Love*, 1999)在主题、文体上都极为独特。在这本极为“私人化”的书中,她通篇以第一人称出现,以自己作为癌症患者与心理治疗师之间长篇对话的形式,将患癌后的心态、想法作出极为坦诚、直接的呈现,同时,这些对话中还包括了大量关于她自己早年时光以及她的家庭、朋友等的自传内容。《关于爱的对话》在内容上是私密的、内省的;但同时,塞吉维克的眼光却又不时离开自己,移向她一贯关注的诸如性、性别、生命、身体、死亡、恐惧等所谓较具“普遍性”的问题,但此时,从如此贴近个人、接近死亡的角度看过去,这些问题有了不一样的真切的呈现。塞吉维克的最后一部专著《触感:情感、教育、述行性》(*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 2003)似乎又回到相对中规中矩的“学术”路数,但书中对艺术、感官、佛教、情感的兴趣源于她生活中的变故和由之产生的感悟,而这样的转变在《关于爱的对话》中已得到解释。

塞吉维克颇为多产,而且作品多样。除学术作品和上面提到过的自传性作品外,她还是一位诗人。实际上,诗歌也是《关于爱的对话》的一部

分——正如《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 2009)的作者杰森·爱德华兹(Jason Edwards)描述的那样,这部形式独特的作品“部分是散文,部分是俳句”。<sup>[1]</sup> 她的诗集《肥瘦艺术》(Fat Art, Thin Art)出版于1995年。诗歌创作似乎反映出塞吉维克对语言本身的兴趣与迷恋。就像她反复评论的作家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和马赛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一样,她惯用绵密的长句(包括在学术作品中)。这种风格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她作品的阅读难度(以及翻译难度),但并不影响她表达的精准。在无须繁复的地方,她甚为干脆、简洁。她的挚友兼合作者 Michael Moon 教授在给我的一封信里曾由衷地赞赏过,伊芙是一流的作家。

塞吉维克还是一位纤维艺术家(fiber artist),举办过三次个人展览。例如,2002年3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麦丁中心举办的名为《菩萨之散碎世界》(Bodhisattva Fractal World)的展览上,塞吉维克展出了用染色织物制作的以菩萨为主题的系列作品。<sup>[2]</sup> 然而,即便在这样的“非纯学术”创作中,塞吉维克都没有完全偏离她在学术上的兴趣——或者,更准确地说,她的兴趣同时反映在“学术”创作和“非学术”创作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塞吉维克的后期生涯中(尤其是她患癌之后),“学术”与“非学术”之间的界限已经被刻意模糊。例如,她对佛学的兴趣不仅体现在她的纤维艺术作品里,也体现在她这一时期的重要学术著作中。而纤维、组织(tissue)以及与之相关的空间、空间想象、对空间的感官探索(例如,触碰),等等,都成为她最后一本专著《触感》的重要内容。实际上,《菩萨之散碎世界》在霍普金斯大学展览期间,塞吉维克还作了一场学术演讲,内容就是当时即将出版的《触感》一书中与触碰、空间感受、空间想象有关的

---

[1] 杰森·爱德华兹,《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伦敦:路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2009),第155页。

[2] 据爱德华兹介绍,另外两次分别举办于纽约州两所大学(1999—2000)和哈佛大学(2005)。见爱德华兹,《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第8页。

部分。与此同时,她也未放弃旧有的兴趣:与其他作品一样,《触感》对性、性别和妇女问题投入了大量笔墨。例如,她对性别研究领域至为重要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问题作了专门分析。(性别)表演性的时间性在巴特勒等学者的著作中甚为突出,而在《触感》中,塞吉维克提出了“表演外围”(the periperformative)的概念,将关注点从表演本身引向表演的周边,以及表演在(假设)空间上的延伸与覆盖。从这种角度看来,性别表演不再是“表演者”——即性别化(过程中)的人——的独舞;相反,这种表演发生于具体或预设的语境(context)之下。显然,纤维艺术引发的思考(例如,空间,以及时空的交织)给塞吉维克对性与性别问题的理解带来了启发。

塞吉维克的学术作品虽然涵盖较多主题,但相互之间却有脉络可寻,而这种脉络并不局限于与性或性别相关的问题。她首部影响深远的作品正是她的第二部专著《男人之间》。这本书也被视为酷儿研究的开创性作品;然而,此书在塞吉维克的学术之路上并非凭空出现。虽然她的第一本书《哥特式套路的一致性》在知名度和影响上无法与《男人之间》相比,但《男人之间》在同性社会性(homosociality)方面作出的开创性贡献在相当程度上(虽然并非全部)依赖于对哥特式小说的解析,依赖于深刻理解哥特式传统在欧洲(尤其是英国)早期现代(early modern)至20世纪初期在文化表述——包括男性同性社会性关系的文学表述——上的深远影响。《男人之间》之后出版的《柜子认识论》则承袭了《男人之间》对男性同性关系的探究,但将视点从“同性社会性”放到了男性同性恋关系和身分上,审视同性恋身分的不稳定性制造的激荡对西方社会多方面造成的影响。此书也对性研究(Sexualities Studies)、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和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作了阐述,较《男人之间》而言,表现出了对学科性(disциплиnarity)问题与方法的更系统、更自觉的关注。也许正是因为《柜子认识论》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整理及理论化的阐发,在发表之后,该书——尤其是其长达63页的引言部分——成了酷儿

研究、妇女研究、性与性别研究等领域的经典作品。《男人之间》虽然也被视为经典，但被提及时，更多地是与“同性社会性”概念相联系。

实际上，《男人之间》的重要之处，远不止它对“同性社会性”的精彩阐述。这部作品不仅是酷儿研究的先锋性文献，是我们了解酷儿领域逐步形成的过程的必读著作，它对妇女研究、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和文学史研究也有着特殊贡献。再者，对于任何对塞吉维克学术思想有兴趣的人而言，作为塞吉维克早期学术生涯的重要作品，《男人之间》可以帮助了解她的学术背景和源泉，以及这样的背景、源泉对她此后的思想发展起了怎样的作用。

如前所述，塞吉维克出身文学。在她生涯的早期，她的学术研究主要依靠分析文学文本——更确切地说，英语文学文本；《男人之间》就是这样的例子。<sup>〔3〕</sup>对文学作品（例如，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和狄更斯小说）的犀利并略带幽默的解读可谓《男人之间》的重要特点，这反映的不仅是塞吉维克的学科训练背景，更是她颇具个人特征的文学素养和眼光。对于她对文学文本的依赖，塞吉维克自己十分清楚，似乎还对文学文本的局限性表现出某种焦虑。她在《男人之间》引言第三部分说道，“贯穿全书几乎所有的历史性观点都包含在对文学文本的解读中，并由这些解读引导——如果不是因为其他更好原因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自己的能力和训练，才会这样”。但在以文学文本为基础的同时，《男人之间》还清楚地显示出一种超越文学，走近历史，乃至触碰历史的“野心”。

塞吉维克在引言中直接宣称，“本研究以性（sexuality）作为重点议题”。她所关注的性并非抽离了现实的、抽象的性，而是一种“历史的”性。《男人之间》诞生之时，性史尚未作为清楚的、独立的（亚/跨）学科领域出现，尽管此时重要的相关作品——比如，玛丽·麦金托什（Mary

---

〔3〕 如《男人之间》的副标题“英国文学与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所示，该书完全以英国文学为对象。而在她后期生涯中，文本“解读”范围逐步变宽，比如，艺术和非英语文学文本（如法国作家普鲁斯特）都进入了她的视线。

McIntosh)的《同性恋角色》(*The Homosexual Role*, 1968)和福柯的《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卷一于1976年在法国出版)——已经发表。相对于性研究(Sexualities Studies)而言,妇女研究相对较为成熟,而塞吉维克据以超越文学、走向性的历史化的理论工具,正是女性主义。

塞吉维克所借助的,是女性主义的两个分支,即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Marxist feminism)和所谓的“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m)。她在引言中指出,这两个分支的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性别研究方面对“历史变化与经济变化之间的深层关联”给予了应有的关注,但在其“发展中欠缺关于性的理论,而且对性的意义或性经验没有多少兴趣”;激进女性主义正确地“把性放到一个显著的、质询式的位置去”,但同时,这个分支对历史与经济变化却没有前者那样的关注。塞吉维克在方法上想要做的,正是综合这两个分支的力量,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方法用于对性(sexuality)的探询。结果是,在这个对文艺复兴至20世纪初期的文学文本的分析研究中,阶级(class)成了中心性的分析概念,书中展现出来的性观念、性实践、男性同性社会性关系的变迁,是与贵族逐渐没落、资产阶级日渐崛起的历史纠缠在一起的。同时,这一历史并非是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简单的、一了百了的取代;相反,贵族残余得以以种种文化形式残存,并发挥作用——例如,它在同性恋风格形成中扮演着重要的标志性角色。这种种变化、发展,塞吉维克认为,都折射到了同时期的文学(文化)中。它们在文学(文化)表述中固然可能会发生变形、扭曲(例如,在哥特式传统下的变形),但颇受尼采影响的塞吉维克显然也认为,文学虚构并不一定比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文献的历史价值更小或离真相更远;相反,两种材料都有待解读(reading)。这样,塞吉维克也为利用文学文本来书写历史做了某种辩护。

现在,《男人之间》已被视为酷儿研究的经典,但在塞吉维克写出《男人之间》的彼时,酷儿研究尚未成形,而她自己是把这部作品作为女性主义研究来进行的。毋庸置疑,男性的确是《男人之间》的焦点所在,但在她



展示的画面中，妇女占据了不可缺少，而且至关重要的位置。她创造性地运用了伊阿(Girard)的三角结构以及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有关男性对妇女的交易的人类学论述，展示出妇女在男性同性社会性纽带的形成——其形成方式历时地发生改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以及她们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被利用、剥削和/或抛弃。塞吉维克描述这种三角结构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展示妇女地位，更在于揭示这种地位是如何维系了男性同性社会性关系、保障了以男人为主宰的社会的运作的。

1985年《男人之间》出版时，塞吉维克只有35岁。这部作品既带着她自己学术出身的影子，又带着时代影响的痕迹。如爱德华兹指出的那样，塞吉维克在美国民权运动的高峰期步入成年，而她大学、博士生阶段正值法国文学理论开始在美国占据领地之时。<sup>〔4〕</sup>《男人之间》正体现了民权运动那种对妇女、同性恋等群体的关注，还反映了美国人文科学领域的左倾趋势。实际上，《男人之间》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审视男性同性关系、批判男权，也用它来批评资本主义，剖析资本主义对男性同性关系及妇女地位造成的影响。此外，塞吉维克也对种族歧视(例如，引言)和帝国主义(例如，第10章)提出了尖锐批评。

在方法上，《男人之间》反对持非此即彼论调的二元论(binarity)。实际上，伊阿关于三角结构的理论，正为塞吉维克引入不对称性(asymmetry)，打破同性恋/异性恋、男/女、解放/压迫等二元对立(binary oppositions)之间的对称性，提供了趁手的工具。在《男人之间》的文本解读中，同性社会性关系与同性性关系之间，不存在对称性的对立；相反，它们都只是同性关系谱系上位置不同的部分。而书中的核心概念“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一词，正是通过把“社会性”与“欲望”相结合而强调了社会性关系与性关系之间的连续性。塞吉维克对二元论的批判延续了她整个学术生涯。

---

〔4〕 见爱德华兹，《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吉维克》，第8页。

## 男人之间

感谢徐冬在译稿修订过程中的细致阅读和大量宝贵的意见、建议；我还要谢谢她对此书的引进。感谢我父母在我对译稿进行最后校读期间在时间上给我的支持。特别感谢塞吉维克教授和 Michael Moon 教授对我翻译此书所给予的鼓励。

谨以此文纪念塞吉维克教授。

2009年7月于云南昆明